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期刊

学术研究

Academic Research

3

2007 年第 3 期



夏晓虹

夏晓虹，1953年出生于北京。文革期间在吉林插队。

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1984年获文学硕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先后赴日本、美国、德国、捷克、韩国、英国、马来西亚、以色列以及台湾、香港地区从事研究与参加学术会议，并曾在德国海德堡大学、日本东京大学客座讲学。主要关注近代中国的文学思潮、女性生活及社会文化。著有《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诗界十记》、《晚清文人妇女观》、《旧年人物》、《诗骚传统与文学改良》、《晚清的魅力》、《晚清社会与文化》、《返回现场——晚清人物寻踪》、《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阅读梁启超》；并主编“学者追忆丛书”，编校《〈饮冰室合集〉集外文》等。

学术研究

郭沫若题

Academic Research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社 长：张国仪

主 编：叶金宝

副主编：陶原珂 雷比璐

学术研究

(月刊)

2007年第3期 总第268期 出版日期：3月20日

“矛盾辩证法”辨析	马中柱	5
论思维与存在的矛盾互动关系	高家方	9
从形式的历史到历史的形式		
——论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超越	李志安	14
语言、劳动和相互作用的辩证法		
——评析哈贝马斯对黑格尔早期精神哲学的研究	李淑梅 马俊峰	19
无“是”即无逻辑：形而上学的逻辑神话	程仲棠	25
科学发展的新范式	岳经纶	33
中国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 PVAR 分析		
——以中国 31 个省级单位的公路建设为实证研究案例	郭小东 武少芩	40
我国区域工业竞争力的测定与评价		
——我国十大沿海城市工业的广义竞争力实证比较研究	顾海兵 余翔	49
生态学视角的产业组织设立理论研究	彭璧玉	57
吸收潜力、应用能力与企业绩效	湛正群	63
基于利益冲突的公司治理理论演进及其新发展	刘少波	69
人生风险：社会境遇与多元治理	钟明华 龙柏林	75
社会资本视域下的乡村治理	宋黔晖	80
全球化的人类学：珠江三角洲乡村研究的新视野	邹琼	86
试论解决当前我国社会乞讨问题的对策	王保庆	92
鸦片战争前后研究边疆和域外史地的学者群	章永俊	98
略论中国历史上的口传历史时期	丁波	105
荀子、韩非的人性论：李斯悲剧根源	陈桐生	112

各学科室电子邮箱:	政法 gzphilaw@yahoo.com.cn
哲学 gzphl@yahoo.com.cn	历史 gzhist@yahoo.com.cn
经济 gzronger88@yahoo.com.cn	文学 gzliter@yahoo.com.cn

(1958 年创刊)

•审美文化•

- | | |
|----------|-------------|
| 论生态审美体验 | 盖光 116 |
| 试论颓废的现代性 | 陈瑞红 吕佩爱 121 |

- | | |
|-------------------|--------|
| 中国戏剧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变化与发展 | 刘平 125 |
|-------------------|--------|

- | | |
|---------------|---------|
| 晚清外交官廖恩焘的戏曲创作 | 夏晓虹 132 |
|---------------|---------|

- | | |
|--------------------------------------|-------------|
| 献疑于以民俗学为禁忌的作风
——就中国戏剧的发生等问题答解玉峰先生 | [日]田仲一成 142 |
| 南音《目连救母》的道德叙事 | 朱恒夫 147 |
| 论古今汉字形音义关系之变迁 | 张会 151 |

•学海酌蠡•

- | | |
|--------------------------|---------|
| “廷珪”辨 | 黄世瑞 154 |
| 《葡萄牙东波塔档案馆藏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勘误 | 刘冉冉 155 |

•书评•

- | | |
|----------------------------|--------|
| 文化生态园中的理论奇葩
——《文化生态学》评介 | 范英 156 |
|----------------------------|--------|

•学术动态•

- | | |
|-------------------------|-------------|
| “纪念罗香林诞辰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梅州举行 | 本刊记者 王可 158 |
|-------------------------|-------------|

- | | |
|------|-----|
| 英文摘要 | 159 |
|------|-----|

CONTENTS

No.3, 2007

A Discrimination of Concept‘ Dialectics of Contradiction’	Ma Zhongzhu	(5)
On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of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inking and Existence	Gao Jiafang	(9)
Marx’s Surpassing Hegel’s Dialectics: from the Formal History to the Historical Form	Li Zhi-an	(14)
A Review on J.Habermas’s Study of Hegel’s Early Spiritual Philosophy	Li Shumei and Ma Junfeng	(19)
A Logic Mythology of Metaphysics: Non- being Means Having No Logic	Cheng Zhongtang	(25)
The Scientific Approach to Development: New Paradigm of China’s Development Policy in the New Century	Yue Jinglun	(33)
An Analysis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Public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Increase in China	Guo Xiaodong and Wu Shaoqin	(40)
A Positive and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Industrial Competence in Broad Sense of the Ten Coastal Cities	Gu Haibing and Yu Xiang	(49)
A Study of the Theory of Building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 in an Ecological View	Peng Biyu	(57)
The Latent Capacity of Absorption, the Capacity of Application, and the Industrial Efficiency and Acheivement	Zhan Zhengqun	(63)
A Comment on the Involvement and New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about Company Management Based on a Consideration of Profit Conflict	Liu Shaobo	(69)
Life Risks: Social Circumstances and Multiple Managements	Zhong Minghua and Long Pailin	(75)
Countryside Administration under a View of Social Capital	Song Qianhui	(80)
The Globalization Anthropology: the New Respective about the Rural Society Study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Zou Qiong	(86)
A Tentative Study of the Countermeasures to the Problem of Mendicancy in China	Wang Baoqing	(92)
The Scholastic Crowds Who Studied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Chinese Borderlands and Foreign Countries around the Opium War	Zhang Yongjun	(98)
A Brief Talk on the Chinese Historical Period Handed Down in Oral Instruction	Ding Bo	(105)
Xun Qing and Han Fei’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as the Cause of Lisi’s Tragic Destiny	Chen Tongsheng	(112)
On the Eco-aesthetic Appreciation and the Human Eco-existence	Gai Guang	(116)
On the Modernity of Decadence	Chen Ruihong and Lü Pei-ai	(121)
The Change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Dramas in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Liu Ping	(125)
Liao Entao’s Drama Writing, as a Diplomat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Xia Xiaohong	(132)
A Query to Xie Yufeng’s View of Chinese Drama’s Origin Taken Folklore as a Forbiddance	[Japan] Tianzhong Yicheng	(142)
Morality Narration of the Southern Chinese Dialect Drama‘ Mu Lian Jiu Mu’	Zhu Hengfu	(147)
On the Change of the Relations of Chinese Characters among Their Forms, Pronunciations and Senses	Zhang Hui	(151)
A Symposium for Luo Xianglin’s Centenary Birth Held in Meizhou	(a correspondent of the Journal) Wang Ke	(158)
English Main Abstracts		(159)

•哲学•

“矛盾辩证法”辨析

◎ 马中柱

[摘要] 矛盾是一个翻译出来的名词，许多哲学家都是把它当作对立统一来用的，矛盾具备作为哲学范畴的特性，矛盾辩证法同“斗争学”没有直接联系，和谐社会是不能回避矛盾的。

[关键词] 矛盾 矛盾辩证法 一分为二 和谐社会

(中图分类号) B0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03-0005-04

“矛盾辩证法”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用过的概念。恩格斯列举了“运动本身就是矛盾”，数学中高等数学以至“连初等数学也充满着矛盾”，^{[1](P462,463)}以证明矛盾辩证法的存在。实际上从黑格尔起不少哲学家都重视矛盾在辩证法中的核心地位。列宁指出：“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2](P407)}“辩证法就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2](P278)}他把矛盾辩证法的含义讲得更清楚了。有的学者对矛盾辩证法提出质疑（《矛盾辩证法质疑》，载《岭南学刊》2006年第4期，以下简称《质疑》），主要集中在质疑矛盾范畴上，并认为，“我们今天要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清除矛盾辩证法及其影响。”因此，怎样认识辩证法的矛盾范畴以及矛盾辩证法，对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很有意义，《质疑》提出的问题，有利于学术争鸣，把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故提出几点商榷的看法。

一、矛盾范畴的由来

作为辩证法的矛盾范畴，是和韩非在他的《难一》与《难势》中提出的形式逻辑矛盾律的矛盾不相同的。韩非所讲的“不可同世而立”的“矛盾之说”，与亚里士多德差不多同时提出了形式逻辑的矛盾律，形象地表述了两个相互否定的判断不能同真、必有一伪的矛盾律含义，在逻辑学上作出了杰出贡献。但这一“矛盾之说”，同辩证法的“矛盾之说”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正像《质疑》所言：“从出处上看，说的本来并不是辩证法的问题。”但在中国哲学史上并不是如《质疑》所说：“未见有哪个哲学家用‘矛盾’一词来说明对立统一关系的”。唐代刘禹锡谈到祸福相依附的矛盾时说：“祸福之胚胎也，其动甚微；倚伏之矛盾也，其理甚明。”^{[3](P225)}强调祸福之间存在互相倚伏和转化的矛盾。当然刘禹锡尚未从普遍意义上概括出辩证矛盾概念。明清之际的方以智，详细论述了“一分为二”与“合二为一”的辩证矛盾观，并说，“正信之子，只学天地，……学天地者不妨矛盾。不必回护，不必玄妙，不妨矛盾。”^{[4](P225)}在肯定客观世界的矛盾前提下，肯定了人们在认识和主观逻辑上进行矛盾表述的合理性。当然，这还是一种朴素辩证法的矛盾观，只是以直观方式认识到了矛盾变化规律。但刘禹锡、方以智等人对矛盾辩证法的探索，却为辩证矛盾的提出打下了哲学史的基础。

那么，辩证矛盾又是从何而来的呢？《质疑》认为，韩非的矛盾是一个本来和辩证法没有什么关系的词，后来何以会成为几乎和辩证法具有同等意义的重要哲学范畴并为人们普遍认同呢？是“由于毛泽东的崇高威望和绝对权威，《矛盾论》所阐述的理论观点，演变为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最高权威阐述”而来。这是不符合中国哲学史实，特别是中国现代哲学史实的。我倒同意著名的中国哲学史家冯友兰所说的：“‘矛盾’是一个翻译出来的名词，上面所讲的故事（指韩非《难一》所讲的楚人叫卖矛和盾的故事——引

作者简介 马中柱，中共广东省委党校教授（广东 广州，510053）。

者注)，只是这个译名的出处。”^{[5](P446)}就手头资料来看，这个译者最先可能是研究黑格尔哲学的著名学者贺麟先生提出的。他在 1930 年发表于当时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中的《朱熹与黑格尔太极说之比较》一文中，称“黑格尔全系统的中坚是矛盾思辨法 (dialectical method)。”^{[6](P631)}并说：“黑格尔则认为太极的矛盾进展，经过正、反、合三个历程。”^{[6](P631)}说明贺麟当时已用矛盾一词来翻译黑格尔关于“既对立而又统一”这种辩证关系。贺麟在 1936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黑格尔学术〉译序》中提出：“黑格尔的矛盾法”包括“矛盾的实在观”、“矛盾的真理观”、“矛盾的辩难法”。并把这种实在观的矛盾列为：“相反的矛盾”、“递进的矛盾”和“相辅的矛盾”。他还分析了黑格尔与马克思之矛盾法的异同，以及肯定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似乎切实领会到黑格尔相反相成的根本观念”。^{[6](P654-655)}从《矛盾论》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是读了《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这本书的。1936 年出版的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毛泽东读过；1936 年 11 月到 1937 年 4 月毛泽东读了西洛可夫、爱森堡合著的《辩证唯物论教程》译本；1937 年 5 月毛泽东读了李达寄给他的《社会学大纲》，这三本书都是把矛盾与对立统一当作相同的规定使用的。这说明毛泽东在写《矛盾论》前所读的这些著作都将矛盾一词与对立统一一词同等看待，这种情况并不是如《质疑》所说由《矛盾论》阐述的理论观点所演变成的。《矛盾论》讲矛盾规律还是沿用了艾思奇、李达和《辩证唯物主义教程》对矛盾的用法。至于后来的教科书、哲学论文“几乎无一不以《矛盾论》为权威的根据”，矛盾辩证法“成为人们所普遍接受并在现实中发挥重大作用的理论观点”，这确实和《矛盾论》的宣传、普及有关，但是否也和《质疑》所说：“矛盾分析法对人们分析和认清当时形势、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确起过重大历史作用”有关呢？“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理论在实践中的显著成效，往往使它的影响不胫而走。

二、“矛盾辩证法的理论困境”从何而来

矛盾辩证法揭示了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循着这个实质和核心去了解和掌握辩证法，才能把握辩证法的精髓和灵魂，在实践中做到分析矛盾，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从而游刃有余地解决面临的各种问题。为什么《质疑》会认为把“矛盾范畴设定为辩证法的核心范畴，或者将辩证法直接地称为矛盾辩证法，必然在理论上陷入无法摆脱的困境”？我想主要是由作者对矛盾的理解有问题引起的。

矛盾具备作为哲学范畴的特性。《质疑》认为“组成矛盾这个概念的‘矛’和‘盾’是两种具有明确指向的古代兵器”，“属于抽象层次较低的概念”，“不具有作为哲学范畴的特性”。虽然《质疑》也肯定：“由矛和盾组成的矛盾概念不再用来专指两种具体器物，而主要是在两者关系特性上的运用，”但作者仍然摆脱不了矛和盾曾指向的古代兵器，所以不能把握到矛盾“作为哲学范畴的特性”。这里的原因就在于作者对矛盾只停留在表象的理解上，而没有由具体表象进入到抽象反映的上升和深化阶段，实现认识过程的飞跃。矛盾概念是反映客观对象的思维形式。思维形式并不直接属于客观对象，而只是客观对象在我们头脑中的主观形式。正如马克思所说：“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7](P112)}这种“改造”就是通过理论思维扬弃它直接的外在表象，而深入到它的间接性去把握它的内在本质和规定性，把握和运用这种思维形式。《质疑》在否定矛盾作为“哲学范畴的特性”时，处处不忘矛和盾这两种十分具体的古代兵器，说明他始终脱离不了矛和盾的表象。黑格尔讲过：“表象固然以矛盾为内容，但不曾意识到矛盾，它仍旧是外在的反思。”^{[8](P68)}这是由于表象的直接性掩盖了矛盾的本质内涵，使他只能陷入外在的反思。《质疑》承认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哲学范畴，当然是具有“哲学范畴的特性”的。如果只停留在基础和上层建筑这种建筑物的表象上，那就思考不到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和建立在这种生产关系上的思想、观点以及相应的制度、设施的体系之间的本质关系，它们同样也没有“哲学范畴的特性”了。

矛盾不是马克思所讲的那种简单范畴。《质疑》为了说明矛盾“不具有哲学范畴的特性”，还举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的话来说明矛盾是不可能表现“较多方面的联系或关系”的简单范畴。其实，马克思这段话是阐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抽象思维行程是符合于现实的历史过程的。简单范畴所反

映的关系在“较不发展的具体可以已经实现”。^{[7](P20)}但它只有在比较发展的具体里，才能在精神上表现出“较多方面的联系或关系”。^{[7](P20)}马克思举了占有、货币等范畴的变化来说明。货币在资本存在之前、银行存在之前、雇佣劳动存在之前就存在过，但它“较多方面的联系或关系”是在资本、银行、雇佣劳动等等出现以后才产生的。矛盾则不然。矛盾是以扬弃的形式把同一、差异、对立诸环节包含在自身的统一体中的具体范畴，它本身就包含“较多方面的联系或关系”。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把黑格尔的本质“通过各种有区别的环节的运动”概括为：“同一—差别—矛盾”，^{[2](P139)}说明矛盾是比同一、差异、对立更深刻、更本质的东西，它具有的“哲学特性”绝不亚于辩证法的其他范畴。

矛盾要在运动、变化中才能把握。恩格斯曾说：“当我们把事物看作是静止而没有生命的，各自独立、相互并列或先后相继的时候，我们在事物中确实碰不到任何矛盾。……但是一当我们从事物的运动、变化、生命和彼此相互作用方面去考察事物时，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在这里我们立刻陷入了矛盾。”^{[1](P461-462)}《质疑》认为，矛盾双方不是互相依存、更不能互相转化，至于互相渗透、相辅相成、互相合作等，则是和矛盾概念正好相反的属性。我觉得这正是没有在运动、变化中去看矛和盾。试想：一手持矛，一手持盾的士兵在战场上作战，他手中的矛和盾在运用中自然是相互依存的，不但盾要依赖矛，矛也要依赖盾，他手中的矛和盾在运用中也会互相贯通、互相转化，更会相辅相成、互相合作。何况现代军事装备，从坦克、军舰到导弹，都是把攻击（矛）和防护（盾）结合在一起，它们不但互相渗透，而且融为一体。可见，只有在运动变化中，才不会只看到矛盾互相排斥的“本意”，而是也能看到它们互相依存、互相转化、相辅相成等“固有属性”。

这说明要摆脱所谓“矛盾辩证法的理论困境”，不是如《质疑》所说：“不再使用矛盾辩证法的提法”，而是要从哲学高度、从辩证法高度正确理解矛盾，克服用表面、静止的观点去了解矛盾的内容。

三、“辩证法在现实中的扭曲”不是由矛盾概念造成的

“矛盾哲学”同“斗争哲学”没有直接联系。《质疑》认为，把矛盾设定为“反映事物对立统一关系的最高范畴，必然造成辩证法在现实中的扭曲”，“矛盾哲学”直接联系的是“斗争哲学”，在“文革”中“直斗到昏天黑地……也是矛盾辩证法在现实中的逻辑结果。”《质疑》在前面已告诉我们，把矛盾“设定为对立统一关系的最高范畴”是从毛泽东的《矛盾论》引起的。《矛盾论》发表于1937年8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时我们党正开始与国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矛盾哲学”不但没有“直接相连”产生“斗争哲学”，而且纠正了王明在统一战线中实行的“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关门主义路线，促成了同国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随后又纠正了王明的“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即“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阶级投降主义路线，在统一战线中建立了“又联合，又斗争”的全面政治路线。延安整风中，党内产生了“团结一批评—团结”这种处理党内矛盾的“公式”，对犯错误的同志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纠正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方针，实现了全党的大团结。实践是包含理论而又高于理论的，这些实践上的成功证明了党在这一时期包含《矛盾论》在内的各项基本理论方针政策是正确的。《质疑》也认为《矛盾论》的确起过重要的历史作用，肯定了《矛盾论》的真理性。我们怎么能将《矛盾论》发表20多年后出现的“斗争哲学”作为它“在现实中的逻辑结果”呢？实际上“斗争哲学”是1957年以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产生以后提出来的，是同《矛盾论》中关于矛盾的统一性和斗争性相结合的观点背道而驰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对毛泽东同志这方面的错误所做的科学分析，为我们正确认识“斗争哲学”的错误思想根源指明了方向。所以把“斗争哲学”造成的祸乱，作为矛盾辩证法的逻辑结果，是逻辑与历史完全脱节的。

“一分为二”是一个辩证法命题。《质疑》认为，“矛盾斗争再深入一步就是一分为二。……改革开放时，为什么每出现一种新事物，有人就要先问‘姓社还是姓资’呢？就是把事物放在一分为二的框架去思考。”确实，矛盾理论要求观察问题一分为二，一分为二是一个辩证法命题。但矛盾理论同时也要求合二为一。黑格尔认为，“不能把对立面结合起来，不能达到统一”，“那就是空洞的辩证法”。^{[2](P311)}列宁也同意

黑格尔的观点。所以，一分为二与合二为一的统一，就是矛盾的对立性与统一性的统一。上个世纪 60 年代初，“左”倾错误批判杨献珍同志的“合二为一论”，认为只有一分为二是辩证法，而合二为一则被批判为形而上学和修正主义，对矛盾理论进行了片面的割裂，已经脱离了矛盾理论的框架。我们不能把这种片面的一分为二观点当成马克思主义的矛盾理论的命题，这是不言而喻的。至于在改革开放中，有的人对于新的事物要先问姓“社”姓“资”，这不是“一分为二”、“两点论”，而是否定一分为二的“一点论”。因为这些人看改革开放，不是把重点放在“三个有利于”上，而是放在制度上；在制度上，他们又只要社会主义的东西，不要非资本主义的东西作补充，更不能让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合作、联合和混合生长，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他们总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的路，所以在改革开放上迈不开步子。这里最深刻的思想障碍不就是一点论吗？很显然，他们把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事物放在“一点论”的框架中去思考，而不是《质疑》所说的“放在一分为二的框架去思考”。

和谐社会不能建立在无矛盾论的哲学基础上，既然“斗争哲学”和把“一分为二”片面化是违反矛盾辩证法的，那么，《质疑》还把矛盾辩证法视为“‘左’的错误路线的深层次的哲学思想理论基础”是站不住脚的。《质疑》还认为，如果不去掉矛盾辩证法，“我们今天要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必将阻力重重”。按照《质疑》的意思，只要“不再使用矛盾辩证法的提法”，也就没有“阻力”了。这倒很容易，但能行得通吗？《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没有矛盾，人类社会总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进步的。”何况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且正处于空前的社会变革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正是各种矛盾的多发期，怎么能无视矛盾的存在，去落实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呢？所以《决定》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决定》要求我们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居安思危，深刻认识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科学分析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既然如此，如果我们不想回避矛盾，不让矛盾积累和发展起来，就不应“清除”矛盾辩证法，而是应该学习掌握它，提高理论思维能力，去正视矛盾、分析矛盾、找到化解矛盾的正确途径，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2] 列宁全集(第 38 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 [3] 刘梦得文集(卷二十四) [M]. 转引自. 中国古代同一思想史 [M]. 济南：齐鲁书社，1991.
- [4] 方以智. 一贯问答 [M]. 转引自. 中国古代同一思想史 [M]. 济南：齐鲁书社，1991.
- [5] 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新编(第 2 册)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 [6] 贺麟. 黑格尔哲学讲演集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8] 黑格尔. 逻辑学(下卷) [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责任编辑：何蔚荣

论思维与存在的矛盾互动关系

◎ 高家方

[摘要] 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并不像传统物质本体论在精神与物质的二元对立中所理解的那样，是一种简单的决定与反作用的关系，而是一种建立在实践“中介”上的包含“两个先在性”的相互决定、互为前提、相互渗透的矛盾互动关系。是否坚持思维与存在的矛盾互动关系是界定辩证唯物主义与否的标准。

[关键词] 思维 存在 矛盾互动 哲学派别 标准

(中图分类号) B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7) 03-0009-05

一、思维与存在的关系

恩格斯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1](P219)}人们通常把恩格斯对哲学基本问题这一经典阐释中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等同于“精神与物质”的关系去理解和解释，由此，在精神与物质的二元对立中以精神和物质“谁是第一性、谁决定谁”作为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标准。实质上，“思维与存在”和“精神与物质”是两对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范畴。

首先，不能简单地把“思维”范畴等同于“精神”、“意识”。在哲学的意义上，“思维”就不仅是指“意识的内容”，而且是指“意识的形式”；不仅是指关于思维的对象的“对象意识”，而且是指构成、把握、统摄和反省“对象意识”的“自我意识”；不仅是指“思想的内容”，而且是指“思想的活动”。同时，也不能简单地把“存在”范畴等同于“物质”，它不仅包括“物质”的存在，也包括“精神”的存在。用近代哲学方式说，“存在”不仅是“意识外的存在”，而且是“意识界的存在”，即“精神”的存在。^{[2](P138)}正是这种“思维和存在”之间的相对性和多义性，构成了“思维与存在”之间的极为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

通常人们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解释成简单的矛盾关系，因而把哲学的基本问题分解为两个方面：一是思维与存在“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即思维与存在的“本原”与“派生”的关系；二是思维与存在有无同一性的问题。前者作为本体论问题，成为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标准，后者作为认识论问题成为划分可知论与不可知论的标准。这种对思维与存在关系的简单化看法或解释，实质上是只看到了思维与存在矛盾关系的一个方面，即存在对思维的“时间先在性”。这种看法也正代表了传统本体论哲学的思维方式。它的根据在于：一是，思维乃至其载体（人）是自然存在生成的产物，人的意识、思维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因此，自然界作为本原性的存在对于人的意识、思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二是，没有被反映者，就没有思维赖以反映的对象，也就没有思想意识。因此，客观事物和现象作为对象性的存在对于人的意识、思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我们丝毫不否认这种把存在对思维建立在“时间先在性”上的理解，它确实构成了思维与存在矛盾关系上的一个重要的方面。但问题是，通常的解释中只是得出这样的结论：存在在先，思维在后；存在第一性，思维第二性；存在决定思维，思维反映并反作用于存在。虽然这种解释的内容本身是正确的，但作为对思维与存在复杂矛盾关系的结论性看法却是片面的。

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其重要特征在于，不仅具有“精神和物质”关系的“时间先在性”问题，而且具

作者简介 高家方，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哲学博士（广东 广州，510006）。

有超越“精神和物质”关系的“逻辑先在性”问题。在“精神和物质”的“时间先在性”问题中，二者的关系是不可变易的，即“物质”是“本原性”的存在。而在“思维与存在”的“逻辑”关系中，则表现出极为丰富和极为复杂的矛盾关系。^{[2] (P138)}

恩格斯不仅指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而且还强调“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只是在近代哲学中“才被十分清楚地提了出来”，“才获得了它的完全的意义”。^{[1] (P220)}相对于古代的本体论哲学，近代哲学不再是离开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而直接断言经验的或超验的“存在”并以此去解释全部的经验世界以及关于经验世界的全部知识，而是已自觉到了“思维与存在”之间的矛盾并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当作最基本的哲学问题进行研究，从而使研究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矛盾关系的“认识论”问题成为哲学的基本问题。人们把近代哲学对古代哲学的这一变革称之为“认识论转向”。超越传统本体论哲学的近代哲学，它的最主要的意义在于展开了对思维与存在复杂矛盾关系上的研究，即开始涉及了思维对存在的“逻辑先在性”问题，当然，整个近代哲学的根本问题是“思想的客观性”问题，也就是人的思想是否具有客观内容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恩格斯在论述近代哲学与哲学基本问题的关系时指出，18世纪的唯物主义“只限于”证明一切思维和知识的内容都应当起源于感性的经验，而没有从“形式”方面去考察“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与此相反，近代的唯心主义则从“形式”方面去研究“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但却把“意识外的存在”作为在认识论上无意义的问题而排斥在“思想的客观性”问题之外，因此只能是抽象地发展思维的能动性，而不可能真正地解决思想的客观性问题。^{[2] (P143)}德国古典哲学家在“认识论”的意义上，在使哲学基本问题获得“完全的意义”上作出了作为近代哲学的理论总结意义上的贡献，如黑格尔即力图在辩证法的“本体论”、“认识论”和“逻辑学”的统一中去解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费尔巴哈则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归结为思维与“感性存在”的关系。

近代哲学以它“认识论的转向”为标志在哲学基本问题上完成了对传统本体论哲学的超越。但它始终在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中去寻求思想的客观性，没有冲出认识论的界域。近代哲学的根本缺陷在于，离开人的实践活动及其历史发展去回答“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

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 (P19)}思维的基础，乃至“思维与存在关系”构成的最根本的前提是实践。离开实践，便不会有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生成于“实践”中，“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所蕴含的全部矛盾关系都植根于人类的实践活动之中，“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的历史演化和历史发展都展开在人类实践的历史过程之中。因此，在对思维与存在矛盾关系的理解上，必须从“认识论”界域跃迁到“实践论”界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转向”完成了这个任务。“实践”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基础，而且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范畴。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既不是黑格尔的“无人身的理性”与其“逻辑规定”的关系，也不是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个人”与其“感性直观”的关系，而是“现实的人”以“感性的活动”为基础的与“现实的世界”的关系。对“思维与存在关系”的哲学理解应以实践为基础，而不是以“物质”或“思维”为基础。因为“现实的人”就是从事实践活动的人，“感性的活动”就是人的实践，“现实的世界”就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对象，即现实的客体。离开实践，“存在”等于“有之非有”，实质上是“存在着的无”；同样，离开实践，“思维”从其生成及其内容的获得上也等于“实质的无”。所以，“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应是建立在“实践”中介基础上的，对它的认识也应是动态而非静止的，发展而非凝固的。

近代以前的哲学是离开“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而直接断言“世界”的；近代哲学坚持“没有认识论的本体论为无效”；现代西方哲学则坚持“没有语言学的认识论和本体论为无效”。人类必须用“语言”去理解“世界”和自己的“意识”，并用“语言”去表达对“世界”和自己的“意识”的理解；虽然“世界”在人的“意识”之外，但“世界”却在人的“语言”之中。“语言”对于“存在”来说，既是消极界

限，又是积极界限。现代西方哲学这种对“思维与存在”的“中介环节”的寻求，表明它的“语言”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虽有区别，但都是对“主客二元对立”的积极消解。“语言”和“实践”一样，其中凝聚着“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的复杂矛盾关系。

扬弃旧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语言转向”的积极成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论观点，站在当代水平上来理解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显而易见，“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决不等同于“精神和物质”的关系。在思维与存在的复杂矛盾关系中，既不能排斥或否定存在对于思维的“时间先在性”的一面，更不可忽视或降低思维对于存在的“逻辑先在性”的一面。必须明确，“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是以“实践”为中介的，而“实践活动属于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否定性的统一活动，只有自觉地去认识它才能全面把握它充满矛盾性的复杂内容。在人们对它自发的认识中，必然会把它所包含的矛盾的内容肢解开来，分割成为互相对立的因素，以片面的形式去加以表现。存在观点夸大自然存在的本原作用和基础作用，意识观点夸大思维活动的能动作用和创造作用，二者形成两种完全对立的片面性的思维方式。”“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实践是主体依据一定目的变革客体的感性活动。……实践是一种具有直接现实性的活动，……同时是一种实践目的性的活动。”“在实践活动中，自然的基础作用和主体的创造作用是结合在一起的。实践活动……它就是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相互规定、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的活动。”^{[4]P124-125}

因此，思维与存在关系中的“存在”就不仅是外在世界的“存在”，而且从其现实性上、从“实践”的客体上来说，更是实践中的存在、思维中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贝克莱提出的“存在就是被感知”，以及当代哲学家提出的“意识界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世界”是属人的“世界”，“存在”都是思维中的“存在”。从“改变世界”的意义上，思维创造存在。思维着的人不仅是物质世界长期发展的产物，而且更是一个悖论性的存在，是一个自我创生的存在。“自然”不仅是人所依赖、认识或思想的对象与前提，而且更是人的思想的创造物——人化自然。以上表明，没有实践便没有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而实践是有意识有目的的人的实践；思维在“存在”的“现实性”上对于存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思维在“存在”的“生成”上对于存在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从实践的观点出发，在哲学的层面上，与“存在对于思维”的“时间的先在性”相比，“思维对于存在”的“逻辑的先在性”更合于“思维与存在关系”的本质。

所以，“思维与存在关系”中包含着“时间先在性”和“逻辑先在性”的双重决定关系。“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以实践为中介，是一种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的相互决定、互为前提、相互渗透的矛盾互动关系。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是动态的、发展的。当今，在主客体的交互作用中显露出的实践关系、认知关系、价值关系和审美关系的相互交织；在认识的结构、机制和功能上显露出的认识的生理基础和心理过程，认识的语言中介和逻辑规则、思维的结构机制和功能；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显露出的主体的能动性和受动性、认识的反映性与选择性和随机性、科学发展及其社会后果问题、微观客体与认识中介、客观实在与理论解释、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语言与意义、价值观与真理观、文化传统与人的现代化、人的自由与历史规律、人与自然的统一、人类未来与人的自我认识等等，都是在“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上展开的有待于我们在哲学的层面上深入理解和探讨的重要问题。

二、思维与存在的矛盾互动关系与哲学上的两大基本派别

通常人们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称之为哲学两大基本派别。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争贯穿于整个哲学发展史。什么是唯物主义？什么是唯心主义？二者的划分标准是什么？这一问题似乎早已是哲学的定论。这虽说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然而，站在当今时代发展的高度，又确有一个如何重新反思与解释的问题。

近代以前的哲学作为“离开认识论的本体论”，它探讨的问题是“物质本体论”问题，是个经验层次上的精神和自然界“谁先谁后”的问题。恩格斯说：“思维对存在的地位问题，这个在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中也起过巨大作用的问题：什么是本原的，是精神，还是自然界？——这个问题以尖锐的形式针对着教会提了出来：世界是神创造的呢？还是从来就有的？”^{[1]P220} 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本原”问题而分成了

“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对此，恩格斯又特别强调地补充说：“除此之外，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用语本来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它们在这里也不能在别的意义上被使用。”^{[5](P7)} 恩格斯在这里说得很明白，即这里的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只是说世界是上帝或神创造的呢？还是本来就有的？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意思。当然，“人类社会产生以后，……面对着分化了的世界去追寻自身与对象世界的关系，去说明世界的统一性及其基础，正是人类理性思维的最自然的追求，也是其最重要的任务。”^{[6](P6)}

近代以来的哲学发展，提出了如何从认识论上划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问题。列宁说：“从物到感觉和思想呢，还是从思想和感觉到物？恩格斯主张第一条路线，即唯物主义的路线。马赫主张第二条路线，即唯心主义的路线。”^{[7](P36)} 这“两条认识路线”所表述的是在认识论上“物质”与“精神”何者为“本原”的问题。除此之外，也没有别的意思。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唯物主义。我们应该认真理解并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正确界定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及其标准。这个问题与蕴涵在思维与存在关系中的“两个先在性”，即“时间先在性”与“逻辑先在性”有关。“时间先在性”是经验事实的陈述，它具有存在论和认识论的双重内涵，即存在论上的物质和意识谁为“本原”问题和认识论上的“意识外的存在”与“意识界的存在”谁为本原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以及“全部旧唯物主义”都坚持物质是意识的本原，“客观世界”是“意识内容”的本原。自然，相反的回答就被视为唯心主义。但问题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标准就应该仅仅归于这种如此简单的认识吗？难道，从前的所谓“唯心主义”大师们，竟能如此单纯地断定“精神决定物质”吗？列宁说，从“粗陋的、简单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哲学唯心主义只能是“胡说”；与此相反，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哲学唯心主义是“把认识的某一个特征、方面、部分片面地、夸大地……发展（膨胀、扩大）为脱离了物质、脱离了自然的、神化了的绝对。”“直线性和片面性，死板和僵化，主观主义和主观盲目性就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8](P411-412)} “逻辑先在性”陈述的不是事物间在时间序列中的先后顺序，而是事物间在“逻辑”上的“优先地位”。这种“优先地位”问题分为“自在”和“自为”两种情况。“自在”意义上的逻辑在先是本质对现象的“逻辑”上的优先地位，古代的哲学唯心主义，如柏拉图的“理念论”，即歪曲地“夸大”本质对现象的“逻辑先在性”。所谓“自为”意义上的“逻辑先在性”是主体对客体具有“逻辑”上的优先地位。对认识的“客体”来说，“主体”逻辑地在先；从“主体”把握“客体”的程度上来说，主体的实践与认识水平逻辑地在先，即主体的“经验”、“知识”、“思想”以及“意识”、“激情”、“意志”和“目的”等对“客体”的逻辑先在性。近代以来的唯心主义哲学，都歪曲地“夸大”了主体对客体的“逻辑先在性”，如贝克莱、黑格尔、叔本华则分别把“主体的感觉”、“思维”、“意志”视为本原性的存在，把客观世界视为派生性的存在，也就是列宁所说的“把认识的某一个特征、方面、部分片面地、夸大地……发展（膨胀、扩大）为脱离了物质、脱离了自然的、神化了的绝对。”

恩格斯指出，马克思所开辟的哲学道路是“沿着实证科学”和“利用辩证思维”概括科学成果的途径去追求可以达到的相对真理。^{[9](P215-216)} 一般地说，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仍然是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标准。然而，综上所述，需特别明确指出的是，不能把“标准”仅仅局限在问题的一个方面（即“思维与存在”谁为本原上），也不能把标准限定在“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的抽象的“二元对立”中。“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派别的“标准”，应该界定在是否坚持以实践为中介的“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的包含着“两个先在性”的相互决定、互为前提、相互渗透的矛盾互动关系上，由此划分出严格意义上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念发展体系，是以唯物论为基础，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相统一，由抽象到具体地展现思维与存在矛盾统一的范畴发展体系（即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实践为中介，对思维与存在的“两个先在性”完成了对立统一的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以存在对思维的“本原

性”的唯物主义为基础去解释思维与存在的相互关系的发展，又是以思维对存在的“能动性”的辩证法为内容去解释思维与存在的历史的统一，因此实现了唯物论基础与辩证法内容的统一，成为科学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不仅是对所有唯心主义哲学（片面夸大认识的某一特征、方面、部分，使其发展为脱离了物质、脱离了自然的、神化了的绝对）的修正，而且也是对所有旧唯物主义（从坚持客体性原则的“独断论”特征上看，旧唯物主义实质是一种貌似唯物主义的唯心主义）世界观的超越。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 [2] 孙正聿. 哲学通论 [M].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8.
-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 [4] 高清海哲学文存(第1卷) [M].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
- [5] 李秀林主编.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0.
- [6] 欧阳康.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规定的再思考 [J]. 教学与研究, 1997, (6).
- [7] 列宁选集(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 [8] 列宁全集(第38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9.

责任编辑: 罗 萍

从形式的历史到历史的形式

——论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超越

◎ 李志安

[摘要] 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是一个意识被实体化，并以形式历时性建构的方式完成了绝对精神的自我实现的历程。唯物辩证法则赋予形式以现实的历史内容，揭示形式的变化只是真实的历史变化的反映，它在此过程中展现了自己的历史必然性和反体系性，并通过对历史的形式进行现实的实体化过程获得上层建筑的概念，解释了它的反作用功能。本文在探讨唯物辩证法在诸多方面超越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同时，赋予唯物辩证法以独立性品格。

[关键词] 形式 历史 历史必然性 反体系 实体化

(中图分类号) B0-0; B516.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7) 03-0014-05

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区别，乍看起来仅是联系与发展的主体上的差异，前者是绝对精神、理念或形式，后者是客观物质以及现实的历史。其实，二者的区别可以更具体地表现在黑格尔以独立的概念形式建构起了自身历时性的发展过程，即形式的历史；而马克思坚持一切被思考的形式，包括思维着的自身所凭藉的形式，都源自现实的社会历史。前者的历史指形式的历时性发展，后者的历史指形式的现实性内容。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就是通过形式探索其背后的整个真实的社会历史结构，即还形式以现实的历史内容，这使唯物辩证法在诸多方面超越了唯心辩证法。

一、从形式到历史

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体系在《精神现象学》中被展现为形式的自我发展和实现的过程，这是辩证法的幻觉，因为它描述的不是一个变化发展的世界，而是一个变化发展的精神理念。在意识的最初“感性确定性”阶段，黑格尔的精神实体就已被深深地埋入对世界的认识过程中，成为意识独立并向上发展的根据。他的意识一开始设置了主体与客体，以及思维与其客观的生存境况之间的二元论分裂前提。在“自我意识”一章，辩证法以自身为对象，是一个绝佳的自我检讨的机会，是它最能发现自身的历历史本体的时刻。但黑格尔此时也没有意识到自我真实的历史根据，因为初始的二元论分裂预示了它此时要想自救，超拔自己于绝对精神之外是不可能的。所以，唯心辩证法的结果只能是“苦恼的意识”：不变的绝对精神要想把握变动不居的客观世界，就只有通过祈祷来获得了。它在此后的发展都是对绝对精神的不断丰富和补充，以及细致的推论或逻辑安排而已。实体化的绝对精神注定自己无法回到客观的历史现实，并把自身融入其中，而最终只能以“绝对知识”的形式高高地悬挂在真实的历史之上。黑格尔的形式辩证法同时为自身建构了一个历时性的模式，即在诸多的对象之间进行分析，然后把它们的某一因素（结构、要素或范畴）选择分离出来作为独立的形式，建构一个历时性模式，并讲述它的凭思维建构出来的其内部发展的幻觉性历史。在这个确定的模式中，思维的形式或对象都被按照它们的逻辑进行理解和分析，这种形式的历时性构建虽然是逻辑与历史的一致，但它与真实的现实历史是分离的，于是它只能把自己局限在独立的概念形式之内。但为了证明自己的历史合理性，它就只有死死地盯着现实的历史，从中寻找某个形式的开始和结束的标志。

作者简介 李志安，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博士生（广东 广州，510631）。

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不仅讲述逻辑与历史的一致，而且讲述现实的历史，它的形式就是其所处的历史境况，是历史的真实活动着的人以及他们的现实生活。形式不是独立的，它没有自己发展的历史过程，真正过程也不是形式的历时性过程，而是现实历史变化本身。“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态便失去独立性的外观。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1](P31)}于是黑格尔的形式的变化发展不是自足的，它实际上是社会历史的发展在形式上的表达。社会、政治或经济等质料依照自身的逻辑发展在抽象的形式上产生出爆发性的解放效应，这种效应在黑格尔那里被看成是形式的独立发展过程。所以，逻辑与历史的一致以及形式与内容的符合实际上应该被颠倒地看作是历史内容以逻辑形式的发展来显示自身的变化，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形式观，它的真正任务正是通过形式的发展变化来探索其背后深层的、相应的社会和历史结构。

形式是在历史中产生的，于是我们看到的唯物辩证法也利用形式来展现自身，但它不是黑格尔的独立的形式。这典型地表现在《资本论》中对“商品”的阐述，由此商品形式不仅获得清晰的自身存在合法性，而且展示了在具体历史境况下与其他经济形式的关系，并把自身融合于历史境况中。在中产阶级经济学家那里，商品与其他诸如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形式之间是一种普遍独立的、非历史的机械式相互作用。但实际上这些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关系如何，人们是无法获得一个普遍结论的。因为无论在哪个特定的社会历史发展时刻，它们都存在着各不相同而又相当具体的比例，当现实的历史变化时，这些要素的比例也发生变化。于是在整个社会处于某种经济因素占优势的情况下，其他的经济形式就会因此体现出自身的独特性，“商品”形式就是如此：“古代世界中商业民族——腓尼基人、迦太基人——表现的单纯性（抽象规定性），正是由农业民族占优势这种情况决定的。作为商业资本和货币资本的资本，在资本还没有成为社会的支配因素的地方，正是在这种抽象中表现出来。”^{[2](P110)}这样，当其他民族处于农业优势情况下，商品范畴就在贸易发达的腓尼基以及迦太基两个民族中突显出来。这就是形式在历史中生发，各因素在其中此消彼涨，某个新形式又会展现自己抽象的纯粹性概念的过程。

唯物辩证法时刻对自己形式的历史性保持着清醒的认识，从不把某个形式普遍永恒化。它也描述如国家、法律等诸种上层建筑形式的发展，但由于它把这种形式的变化复归于其所处的历史，它就成了黑格尔形式历时性建构模式的终结。

二、从决定论到必然性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整个绝对精神自我实现的一部分，这个世界是绝对精神的产物和自我实现的工具，人同样如此。“理性的狡计”表现出自然界、人类历史及精神的三个阶段的发展是被更大的理性的历史决定着的，它就是纯逻辑意义上的绝对理念对人类社会的单向度决定。波普也把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定义为“历史决定论”，这是不公正的。因为作为因素之间的单向度决定是纯粹的自然科学模式，是在实验室中所清楚呈现的。而作为纷繁复杂的关系或不具有透明性的历史，我们无法找出那种清晰的要素间的单向度决定。历史的事件都是独特的、异质的，如果非要找出历史发展中类似于自然科学的决定论模式，人们在考察对象时，就只有排除其中的细节，以越来越一般化的，去个体性的视角来找出那些不同事件中的同一的或经常出现的因素。但这里应该警惕的是，即使同一的经常出现的因素也只是相类似的，它们具有各自不同的历史境遇。这样我们只能以远离历史事件，不断地调整考察不同事物的焦点或焦距为代价来获得历史领域中的相似性。

普列汉诺夫的文章《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似乎给了把唯物辩证法定义为历史决定论的人以理论支持：“卓有影响的个人，由于其心灵和性格的特殊品质，能够改变事件的个别特征和它们某些特定的结果，但是他们无法改变它们的一般倾向，这种倾向是由其它力量所决定的。”^{[3](P304)}但普列汉诺夫所用的“决定”一词绝不是历史决定论的含义，因为此处“决定”的概念也不是那个单纯的要素间单向度的意义，它指的是复杂的整体性历史本身。形式在历史中不是被某个因素决定的，它在整体的境遇中呈现的是“历史的必

然性”，即人们在不断探求事件以及形式背后的历史结构，随着考察焦点的扩大，人们领会到此事件或形式何以必然以这种方式而非其他方式发生。唯物辩证法的历史必然性在此处发挥的是阐释学的转义功能，即从对形式的考察最终转向那个真实的历史。即使是新黑格尔主义者的贝内代托·克罗齐也认为唯物辩证法“既不是历史哲学的先验的新观念，也不是历史思维的新方法；它只能是历史释义的准则。这一准则劝导人们关注所谓的社会经济基础，以便更好地理解后者的形式和变异。”^{[4] (P77-78)}当然马克思对经济因素的强调只是更接近那个真实的历史，它不是对历史的替代，而是对真实历史的复归。在对形式的历史性考察中，唯物辩证法的理论进路就是从形式开始，获得其背后的特定的历史，具体的、具体的历史，最终是整个历史真相。它于是把形式消解于历史之中。

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从一开始就把形式纳入历史范畴中，在根本上克服了黑格尔的二元对立，所以，在对形式范畴的辩证考察上，前者以“历史必然性”的方式超越了后者唯心辩证法绝对精神的历史决定论。

三、从体系到反体系

唯物辩证法中形式的历史性、必然性表明辩证思维所考察的一定是在历史情境已经形成了的形式，它不具有对尚未产生的历史以及形式进行预测和断言的能力。于是唯物辩证法具有一个重要的属性就是“事后有效性”——这一点与黑格尔不同，“历史的终结”就是其历史哲学体系的预言。唯物辩证法因而也不是形式体系的哲学，它是把所有的哲学体系复归于其历史境遇中的哲学，是反体系的。它在诸多的体系哲学那里体现出自己反体系的批判功能，更是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的超越。

就辩证法的形式与历史的纠缠关系来说，黑格尔也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不过在其绝对精神的统领下，辩证法最终丧失了其矛盾性，成为无矛盾的统一。“哲学作为有关世界的思想，要直到现实结束其形式过程并完成其自身之后才会出现。概念所教导的也必然是历史所呈示的。这就是说，直到现实成熟了，理想的东西才会对实在的东西显示出来，并且把握了这同一个实在世界的实体之后，才把它建成一个理智王国的形态。”^{[5] (P13-14)}黑格尔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思想形式与其历史境遇的矛盾，设立了一个绝对理念的形式，当思维与历史最终统一时，历史就终结了。由于跳出了现实的历史，这一点只有历史哲学家才能够对其加以领悟和阐述，于是黑格尔在辩证法的终点处为哲学家保留了一个单一的外在于历史的地位，他自己就是这样的历史哲学家。这当然与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大相径庭。因为真正的辩证思维能够察觉自己与所研究的客体是相同的历史运动，它在任何时刻都不具有超越历史的地位。于是人们把自己作为观察者的立场纳入正在进行的辩证批判思维，这里就不再具有黑格尔需要最终解决的矛盾，也无需为历史设立一个终点，一切处于历史中。于是，马克思在辩证法的最后一刻把黑格尔的那个超越历史的、高高在上的、甚至是绝对理念化的历史哲学家拉下了水。

唯物辩证法的反体系结构以及批判锋芒，使人们在对它进行系统阐述时产生了困难，反体系的马克思主义自身当然不能是体系的。那它是什么？凝固性可能是一切符号的特征，当每一个对其进行系统表述的符号在凝固为体系时便歪曲了唯物辩证法。布哈林对此有充分的论述，他认为当人们把马克思主义表述为“科学社会主义”时，实际上助长了人们对唯物辩证法的误解，因为此时人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客观系统的观念体系，而不是在事件中运动，随着历史境遇而不断改变其自身的理论，这实际是把在结构上拒绝一切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转变成了意识形态。^{[3] (P306)}唯物辩证法只是严守着自己的现实界限并对体系的形而上学发挥着批判的功能，于是我们看到了马克思在面对不同形而上学体系时所呈现出来的多幅面孔：“针对布鲁诺·鲍威尔及其‘青年黑格尔学派’朋友们的唯心主义，马克思对唯物主义作了论证。针对费尔巴哈的消极唯物主义，马克思捍卫了作为黑格尔辩证法核心的积极性和相互性原则。针对绝对唯心主义和‘庸俗的’(归纳的)机械论这两者的宿命论，马克思宣称人类创造自己的历史。不过他又针对使用这句话的革命派补充说，历史不是凭空捏造出来，而是在明确的限定条件下创造出来的。”^{[3] (P309)}在这里我们看到唯物辩证法在不同的历史境况中的具体运用。同时，唯物辩证法也就在对其他理论的批判和

矫正中呈现出自身。

四、从意识实体化到实体化的历史

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是以人的意识的实体化为基础的，这是人类认识以主体为中心的心理学根源。所以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抨击作为西方中产阶级主导意识形态理论的“形而上学”时，指的是培根和洛克的经验主义，而非黑格尔的唯心主义。黑格尔辩证法中的唯心主义源自人类认知过程中的形而上学冲动，即在认知过程中，人无意识地以自我为中心，这是经常发生且不可避免的，它是思维本身的普遍化本性以及个体心灵之间的矛盾的一种解决形式。因此，这种形而上学对唯心主义及唯物主义具有相同的诱惑。区别在于唯物辩证法的心理学功能，就是要遏制这种幻觉，它以健康的方式贬低精神本身的要求，贬低个体心灵对普遍性的要求，在自然和社会——历史世界中为我们的存在和集体中心找到基础。它能察觉自己不具有超越历史的地位，与所研究的客体是相同的历史运动，因而谨慎地与自身的形而上学冲动斗争，在每次冲动来临时用真实的历史遏制它。

但唯心辩证法做不到这一点，它只能在认知的形而上学冲动中把自身实体化。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描述了认知过程中主体意识的实体化过程。当思维进入事物背后以理性形式呈现普遍必然性规律时，它就将真实或感性世界的因素投射到居于现象内部或外部超感性领域里去，这个领域就是事物的抽象的法则所在，是被意识所发现的。当自我意识观照这些法则或事物时，理论思维的抽象过程就倾向于以自身来替代现实客体：“自我意识既然就是理性，那么它以相对于他物 [或对方] 的否定态度就转化为一种肯定态度……它现在可知它自己就是实在，或者说，它可知一切实在不是别的，正就是它自己；它的思维自身直接就是实在；因而它对待实在的态度就是唯心主义对待实在的态度。”^{[6](P154-155)} 在这里，我们看到意识在独立和升华中把自身确定为绝对精神，它实际上是把那个反映在思维中的普遍性法则和获得该法则的个体意识调和起来，即把个体意识普遍化，从此支配着这个世界的发展变化。这实际上是对形式及其历史内容的真实关系的颠倒，黑格尔认为超感性领域就是思维以颠倒的方式置换了真实的历史，而这一颠倒既是经验世界的反映，又是对它的解释。观察者们认为这个颠倒的世界不仅是真实的，且本身就是一种现实。

马克思揭示了唯心辩证法对形式与其历史内容的真实关系的颠倒，同时提出了对其矫正和超越的方法：“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绝不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7](P24)} 就唯物辩证法把形式复归其境遇来看，这种超越的落脚点在于真实的历史，即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它把自我意识的永恒化、抽象过程用自身来替代现实客体的内在力量等唯心辩证法的要素通过解码，将它们的指涉转换到我们身处其中的社会文化世界的领域。恩格斯通过对商品拜物教把商品本身普遍化、永恒化的倾向的批判，不仅解释了产生商品拜物教的真实的历史境况，而且通过把商品形式进行客观历史化，使它在更现实的历史中对社会起着客观的反作用。“生产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东西。但是，产品贸易一旦离开生产本身而独立起来，它就会循着本身的运动方向运行，这一运动总的说来是受生产运动支配的，但是在单个的情况下和在这个总的隶属关系以内，它毕竟还是循着这个新因素的本性所固有的规律运行的，这个运动有自己的阶段，并且也反过来对生产运动起作用。”^{[8](P485)} 黑格尔的独立法则被实体化为绝对理念支配着现实世界；而唯物辩证法认为由于社会分工，研究、掌握并运用这些法则的人和机构在现实中也出现实体化，这些机构独立为一些专门的部门，由这些人利用这些法则来发挥反作用于社会的功能。如按照商品规范专门制定和执行的法律部门，它们实际上与社会真实的历史境遇拥有相同的现实品格，就是那个现实的诸上层建筑。这些形式一旦被实体化为具体的社会历史中有形的上层建筑，也就成了真实的历史的一部分，与其原先的历史境遇混合在一起，继续推进历史的发展，产生新的历史形式。就上层建筑一旦产生且同时成为影响社会的现实力量而言，这与其之前的客观历史基础也没什么差别。所以恩格斯说：“这样一来，一切都倒置过来了。而这种颠倒——它在被认清以前是构成我们称之为思想观点的东西的——又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并且能在某种限度内改变它，我以为这是不言而喻的。”^{[9](P488)} 因此，黑格尔的那个绝对理

念在恩格斯这里已经实体化为诸种客观的上层建筑机构了，它们融入原来自身赖以产生的客观历史中，并一起推动着历史的前进。

五、结论

在马克思对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超越中，我们看到一个新的马克思形象。历史释义学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独树一帜，它伫立在那里，即使不四面出击，也使所有的形而上学、唯心主义在它的面前相形见绌，或碰了钉子，或轰然解体。唯物辩证法总是在对唯心辩证法或形而上学的体系哲学的批判中展现自身，但它由此产生了一个负面效应，即似乎只有主体心灵以及思维形式走向僵化的体系之后或同时，唯物辩证法的功能才得以发挥，这样马克思主义就不自觉地沦为“黑格尔之后”的辩证法，于是人们总是参照黑格尔来理解马克思。

两者的理论进路表面上似乎一致，马克思与黑格尔都在做着一个相同的事，即把感性世界的内部法则实体化。所不同的是黑格尔把它实体化为绝对精神，而马克思把它实体化为现实部门，这两个不同性质的实体又都对社会发挥着反作用功能。两相比较，由于考察视角的转换，我们可以获得唯物辩证法的两种意象，一是对形而上学进行批判矫正的“黑格尔之后”，一是其自身在完全不同的实体化道路中的唯物辩证法。但事实是唯心辩证法与唯物辩证法之间有着完全不同的实质，它们在辩证法的起点就埋下了各自的种子，前者始源于绝对精神并复归于绝对精神，后者始源于现实历史并复归于现实历史。所以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黑格尔之后”，对它的理解亦无需参照其对手，唯物辩证法具有自己独立的品格。它在考察现实的历史中生发出自己的具有真实的历史内容的形式，并把这些形式通过现实的历史实体化过程复归于历史，唯物辩证法就在这样的否定之否定中获得了自己的历史释义学体系。马克思以历史的形式超越了黑格尔的形式的历史，这本身就是唯物辩证法所具有的批判的反体系功能。但马克思就是马克思，我们不能因为他吸收了“合理内核”就抓住黑格尔不放，更不能在阐述独立的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理论中永远地打进黑格尔楔子。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3] 詹姆逊. 马克思主义与形式 [M].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
- [4] 贝内代托·克罗齐. 历史唯物主义和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 [M]. C.M. 梅瑞迪恩译. 纽约，1966.
- [5] 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 [M]. 范扬，张企泰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 [6] 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上卷) [M]. 贺麟，王玖兴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 [7]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责任编辑：罗 萍

语言、劳动和相互作用的辩证法^{*}

——评析哈贝马斯对黑格尔早期精神哲学的研究

◎ 李淑梅 马俊峰

[摘要] 哈贝马斯力图改变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劳动的辩证法为主线的传统，提出区分劳动和相互作用的观点。他认为，黑格尔耶拿时期的《精神哲学》就创立了语言、劳动和伦理关系的模式，这些模式具有异质性、等价性，它们在自我的形成中起着各自的作用。黑格尔是在伦理意识的实践领域探讨自我意识问题的；是把自我理解为逐步形成的辩证过程；是对不合理的交往关系的反思批判。哈贝马斯的论述对于克服把实践简单地归结为劳动的观点具有一定的意义，但他却把劳动曲解为人们对自然的技术性活动，把人与人的关系归结为伦理关系，排除了人与人的社会生产关系，把人类的解放寄希望于合理的伦理规范的建立。

[关键词] 语言 劳动 相互作用 辩证法

(中图分类号) B516.59; B516.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7) 03-0019-06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存在着以探讨劳动的辩证法为主线的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大都把批判物化劳动、使人从物化劳动中解放出来作为关注点。由于物化劳动观点中包含着科技理性批判的因素，因此，它逐步演化为对劳动的技术性理解与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尔诺就提出反对“实践第一性”的观点，他把劳动主要理解为支配外部自然的技术性活动，理解为对道德实践的侵蚀。他认为，德国古典唯心主义所理解的实践是指向主体自身的内在的道德行为，而经过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改造，则把它“向外翻转”，使之成为改造和控制外部自然的技术性行为，把它同谋取物质利益的活动结合了起来。由于技术性劳动对实践的侵蚀，因此，人们对自然的技术控制模式又被运用到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上，使人受到科技理性的全面统治。他由此得出了悲观主义的结论。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思想家，哈贝马斯既继承了阿多尔诺批判技术性劳动侵蚀道德实践的观点，又试图克服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悲观主义倾向，推进社会批判理论。他提出，不能把实践归结为劳动，而要凸显实践的主体间伦理关系——相互作用的意涵。他于1967年发表的论文“劳动和相互作用”，就是力图设置区分劳动和相互作用的框架。为了给他的这一框架提供理论支持，在这篇论文中，他考察了黑格尔耶拿时期的《精神哲学》。他认为，黑格尔的这部早期手稿中就包含着区分劳动和相互作用的思想。他通过对黑格尔的这一思想资源的发掘，论证和阐释了他自己的区分劳动和相互作用的思想。

一、对黑格尔早期精神哲学分类方法的研究

哈贝马斯认为，黑格尔在耶拿时期的《精神哲学》中，创立了一个语言、劳动和伦理关系三种模式辩证统一的理论体系。但他后来又放弃了这一理论体系。哲学界并未意识到黑格尔早期精神哲学的独特价值，而是把它视作《精神现象学》的理论准备。哈贝马斯指出，在技术进步的目的理性活动模式冲击着相互作用的当代，我们应该高度重视黑格尔的这部手稿，发掘黑格尔区分劳动和相互作用的思想，将劳动和相互作用这两种要素严格地区分开来。

哈贝马斯认为，在耶拿时期的精神哲学中，青年黑格尔创立了一个不同于后来《哲学全书》的独特的

* 本文系教育部博士点基金项目(03JB720007)。

作者简介 李淑梅，南开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马俊峰，南开大学哲学系博士生（天津，300071）。

理论体系。与《哲学全书》把精神分为主观精神、客观精神和绝对精神三个发展阶段不同，在耶拿手稿中，在客观精神阶段之前的不是主观精神阶段，而是一个似乎更适合于被称之为抽象精神的阶段。黑格尔把这一阶段的精神理解为理智和意志的统一，这种统一是在语言符号表述、劳动和伦理关系的基本联系中建立起来的。^{[1](P34-35)} 在这里，黑格尔提出了语言、劳动和伦理关系的分类方法，他把语言、劳动和伦理关系作为辩证联系着的“三种等价模式”，它们“各自以自己的方式协调主客体 [关系]”。“[它们] 涉及的还不是似乎是按照同样的逻辑形式形成的诸阶段，而是形成本身的不同形式。”^{[1](P4)} 这三种辩证模式结合在一起，才把精神显现出来，才形成自我意识。此外，上述三种辩证模式还与不同性质的经验的模式结合在一起，各逻辑形式都因其产生的经验的不同而相互区别。哈贝马斯认为，黑格尔早期的这种分类方法和理论框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哈贝马斯指出，在耶拿时期的精神哲学中，黑格尔是从自我出发的。然而，黑格尔所理解的自我超出了康德、费希特关于孤立的自我的反思关系，提出了主体间相互联系的思想，认为自我意识是以主体间的相互承认为基础的，是主体间相互交叉、相互作用的衍生物。各个自我不是首先作为孤立的主体而存在，然后才彼此相互作用，形成主体间的关系，而是通过沟通而“相互形成为主体”。黑格尔把自我理解为普遍和个别的统一，这是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自我只有经历一个从主观性过渡到客观普遍性的过程，才能与他人相互认同；自我也只有在与他人的相互关系中，才能认识到自己与他人的差别，认识到自身的独特性，实现自我认同。

与康德所理解的自我是抽象道德的、理论的和技术的意识的统一不同，青年黑格尔认为，自我是通过伦理关系、语言和劳动的媒介而形成的，是在诸种自我形成模式及其辩证统一中实现自我同一的。黑格尔认为，“那个第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实存——作为中介的意识——就是作为语言，作为工具和（家）产的意识的存在，或者是作为简单的一个存在：记忆、劳动和家庭的意识的存在。”^{[1](P15)} 在上述三种模式中，哈贝马斯最关注的是伦理关系。他首先用了很大的篇幅来探讨这种关系。他指出，在黑格尔那里，伦理关系是主体间通过斗争而得到“相互承认的意识”。主体间通过斗争而走向成熟的相互承认关系既是一种家庭伦理实践关系，又是认识关系的基础，每一方都通过相互承认而领悟到自我同一性的独特意义。

与伦理关系不同，“语言并不包括行动着的和生活在一起的主体的交往，而仅仅是与自然界联系在一起，并给物以命名的孤独的个人的符号运用。”^{[1](P15)} 语言是“命名的意识”，它使想象的、图像的王国变为名称的王国。语言的出现使人有了记忆力，有了意识，学会把意识与意识的对象区分开来。语言具有综合的功能，它能够将多样的事物按其共同特点冠之以同一个名称。语言具有代表性，它不仅能表征一个事物或事实，而且能“表达出它对我们的意义”。通过运用语言符号，主体既能客观地把握事物，又能意识到自己是主体。语言还具有人民性，是被人们共同承认和使用的具有普遍性的东西。因此，“在语言的范畴中，精神是世界的逻各斯，并不是孤独的自我意识的反思。”^{[1](P16)}

劳动是一种能够满足人的生存欲望的活动，但劳动不同于动物的直接满足生存欲望的活动，它通过工具的中介而使欲望的满足得到延迟。满足欲望的对象只有先生产出来，然后才能进行消费。劳动活动、劳动产品是暂时的、易逝的，而工具则留存了下来，它可按其所体现的劳动规则反复地被任何人用来征服自然。因此，工具和语言符号一样，都具有长久持存性、普遍性。工具的中介表明，劳动是技术性的“机巧的意识”，是意识让工具代替自己作用于对象。

哈贝马斯对黑格尔耶拿时期自我意识形成的三种辩证模式的考察，强调了这些模式的“异质性”和“等价性”，认为它们都以各自的方式在自我意识的形成过程中起作用。如果把其中的任何一个模式提升为主导的模式，都会歪曲黑格尔的哲学，形成相互分歧的理论。新康德主义者卡西勒把符号表述的辩证法作为居于主导地位的模式，用以解释康德哲学；卢卡奇只是抓住了黑格尔哲学中的劳动的辩证法方面，来说明主客体统一的历史过程；新黑格尔主义者蒂欧多·里特则按照为承认而斗争的辩证法模式提出精神的自我分段概念。^{[1](P21)} 由于他们各执一端，因而都失之偏颇。

二、语言、劳动和相互作用的关系

在分别考察了上述三种模式之后，哈贝马斯考察了它们之间的关系。哈贝马斯指出，在黑格尔所说的上述三种模式中，语言符号的运用是抽象精神的第一个规定，后两个规定都以它为前提。首先，主体间的交往活动离不开语言。语言作为一种稳定的、有效的文化传统包含在主体间的交往活动中，“相互作用取决于大家都熟悉的语言交往”；其次，工具性的劳动也离不开语言。劳动离不开人们的语言沟通与协作，同时，劳动中也伴随着对事物的命名活动。但从根本上说，劳动是主体支配自然的独自的活动。

哈贝马斯又考察了抽象精神的其他两个规定——劳动和相互作用之间的关系。哈贝马斯强调指出，劳动和相互作用的联系对于耶拿时期的精神哲学来说是中心联系。^{[1](P28)} 具体而言，劳动和相互作用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它们相互区分，互不依赖。交往规范是以文化传统为基础的，它不依赖于工具性的劳动，劳动虽然要在语言交往的条件下形成，但人对自然的技术规则不同于主体间的交往规则；工具活动遵循的是自然界的因果性，而主体间的交往活动遵循的则是命运的因果性。因此，“把相互作用归结为劳动或者从相互作用中推论劳动，都是不可能的。”^{[1](P23)} 其次，劳动和相互作用又是相联系的。黑格尔通过考察法律规范同劳动的联系说明了这一点。黑格尔认为，法律是人们的相互承认的制度化，但这种相互承认只涉及对他人财产权利范围的承认，并通过这种承认而确定自己的财产权利，确定自我的同一性。“财产作为法律承认的实体”产生于工具性的劳动，是劳动的产品。“因此，在得到承认的劳动产品中，工具活动和相互作用是相联系的。”^{[1](P23)} 契约是通过主体间的利益权衡和斗争而达成的，是主体之间相互承认和遵守的共同意志，是自由平等的关系的确立。所以，“自我同一性的制度化，法律上得到承认的自我意识，是劳动和为获得承认而斗争这两个过程的结果。”前一个过程是从外部自然中获得解放，后一个过程是从人自身的内部自然中获得解放。这两个过程交织在一起：“我们赖以从直接的自然力量的律令下解放出来的劳动过程，包含在争取承认的斗争中，以致在这种斗争的结果中，在法律上得到承认的自我意识中，也包含着通过劳动获得解放的要素。”^{[1](P24)} 不过，哈贝马斯强调，劳动和相互作用的联系是以它们之间的区别为前提的。黑格尔“既不把相互作用降低为劳动，又不把劳动提高为相互作用”。^{[1](P24-25)}

哈贝马斯指出，黑格尔的上述思想在后来的《精神现象学》中得到进一步发挥和发展。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考察了自我意识形成的历史，说明自我意识是一个由抽象到具体的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的每一阶段上获得的主客体同一都是克服主客体对立的结果，但这种同一又都是暂时的，而不是对立的最终解决，因而意识又要怀疑和识破这种同一的假象而发展到更高的阶段。哈贝马斯认为，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关于主奴关系的论述，是他唯一一次从伦理学理论中完整地提出劳动和相互作用的辩证联系的观点。黑格尔指出，从表面上看，奴隶只是单方面地承认主人，依赖于主人，没有独立自主性，但奴隶却又通过单方面地支配自然而显示出自身的独立自主性；主人看上去是完全独立的，但主人的生活却依赖于奴隶的劳动，他只有承认奴隶的劳动才能成其为主人。这样，主奴就通过斗争的辩证法而相互承认，获得各自的自我意识。但由于这时黑格尔已放弃了原来的研究模式和分类方法，建构了实体即主体的框架，因此，劳动和相互作用的辩证法已经失去它在耶拿时期所具有的“构成模式”的意义。这在后来的《哲学全书》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在那里，语言、劳动不再是精神的形成原则、构成原则，而是成了绝对精神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成了从属于绝对精神的东西。诚然，在黑格尔后来的哲学中，伦理关系的辩证法对精神的构成依然具有自身的价值，但这已不是主体间爱和斗争的辩证法，而是孤独的绝对精神运动的辩证法。在黑格尔那里，绝对精神即是绝对伦理。

哈贝马斯认为，黑格尔后来之所以放弃了早期的研究模式，这并非偶然，在其早期精神哲学的研究中就包含着这种可能性，这是由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性质所决定的。在耶拿手稿中，“黑格尔已经以精神同自然的绝对同一性为出发点，而这种同一性以既定的方式预断了精神形成过程的统一。”^{[1](P26)} 在青年黑格尔那里，语言和劳动涉及的是主体与自然客体的关系，语言表述的辩证法和劳动的辩证法是在认识和行动着的主体同客体的关系中展开的。但自然客体只具有物性的外观，它同主体一样，在本质上也是精神

的。既然客体不过是有语言表达能力和劳动能力的主体的对应物，那么，就可以把以语言和工具为中介的主客体关系想象为主体借助于中介外化自己的本质力量并将其收归自己所有的过程了。与语言和劳动的这种主客体模式不同，伦理行为的辩证法是在主体间层面上进行的，因此，它不是精神外化的模式，而是经历斗争、暴力的异化的模式，它的运动的结果不是对客体物的占有，而是主体间的和解，是被破坏的友谊的重建。然而，在黑格尔那里，既然自然客体的本质同主体一样也是精神的，那么，人同自然的关系也就成为主体人同隐藏着的另一主体（客体）的关系了。这样，就可以用主客体的辩证统一模式代替主体间的辩证统一模式，即用主体的对象化和重新占有对象的模式代替主体间关系的异化和和解、重建友谊的模式了。尽管黑格尔在耶拿时期非常强调劳动和相互作用的关系，但黑格尔完全可以不借助于这种关系而考察精神的自我同一。黑格尔哲学的上述唯心主义性质使得他后来就放弃了早年关于劳动和相互作用关系的研究模式。黑格尔哲学的核心范畴“绝对精神是孤独的。绝对精神同自身的统一，以及同它与之相区别的作为它的它物的自然的统一，最终不能按照行动着的和有表达能力的主体通性模式来想象”。^{[1][P28]}因此，在黑格尔后来的哲学中，不再是自我在他人中认识自己，而是主体在他物（隐藏着的主体）中进行认识。这与其说是认识，不如说是“在对应物中重新发现了自己”，^{[1][P28]}是主体自己反思自己，自己认识自己。这样，主体间的相互承认变成了主体经验的自我反思。哈贝马斯推断，黑格尔是“根据自我反思的模式来想象绝对精神的运动”的。^{[1][P28]}

由上可见，在语言、劳动和相互作用的关系中，劳动和相互作用都离不开语言的媒介，因此，哈贝马斯主要考察的是劳动和相互作用的关系，尤其是强调了劳动和相互作用的区别。“在‘劳动’的范畴下，哈贝马斯主要考察的是有关对自然和社会环境的技术统治的问题，在‘相互作用’的范畴下，他主要探讨的是关于交往的个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即伦理关系）的问题。”^{[2][P30]}前者体现的是人对自然的技术性统治，后者标示的是人与人的道德行为模式。在哈贝马斯看来，这是两类不同性质的问题，不能将它们混为一谈，人类的解放不能等同于技术的进步。

三、黑格尔早期精神哲学的思维范式转换的意义

哈贝马斯高度评价了黑格尔的耶拿手稿，认为它在哲学史上具有思维范式转换的意义，它实现了德国古典哲学由主体的自我反思模式向主体间反思批判模式的转变。这主要表现在下述三个方面。

1. 黑格尔是在伦理意识的实践领域探讨自我意识问题的，而不是在理论哲学框架下进行反思的。康德是在理论哲学中探讨自我意识问题的。在他那里，认识论首先是要反思主体自身的认识能力。而黑格尔则是在伦理交往实践领域探讨自我意识问题的。哈贝马斯说：“黑格尔在自我概念中阐明的辩证法的基本经验，不是产生于理论意识的经验领域，而是产生于实践意识的经验领域。”^{[1][P12]}黑格尔认为，自我意识的经验产生于主体间相互作用的经验，在相互作用中，我学会了用其他主体的眼光来看我自己，^{[1][P6]}形成自我意识。这就是说，自我意识是通过主体间相互冲突、相互斗争的交往实践而在他人和他人的认识中确立起自我，并通过他人对我的认识而使自我认识到自身。这就把自我意识的形成建立在了伦理实践基础上，就把认识同实践联系了起来，同反思伦理实践中的问题联系了起来。

2. 黑格尔把自我理解为逐步形成的辩证过程，而不是从成熟的主体出发。康德继承和发扬了启蒙运动的传统，他认为，主体是有理性的人，他具有先天的认识能力，而无须在认识活动中发展和完善自身的能力。由于康德设定的认识主体是成熟的、完满的，因此，经过反思所把握到的是纯粹的、同自身相关的认识主体，是没有形成和发展过程的静态的东西。而在黑格尔看来，自我意识的同一性不是事先预设的认识前提，而是通过表述的辩证法、劳动的辩证法和为了获得承认而斗争的辩证法而形成的，是辩证运动过程的结果。他说：“自我意识的同一性不能理解为最初的同一性，而只能理解为已形成的同一性”。^{[1][P20]}这样，黑格尔就识破了作为先验意识的最初统一体——自我同一性的假象，发现了康德的错误是把保证先验意识统一性的各种辩证过程净化了出去，把结果当作了前提。

同康德相似，费希特也立足于成熟的主体。费希特提出要构建一个从自明的和绝对可靠的原理出发推

演的哲学体系，他把“绝对自我”当作一切认识的先验基础和前提，当作认识论逻辑的最高根据。在费希特看来，“自我”是能动的和绝对的，是以自身为根据的，这是自明的，是无需论证的。但是，自我可以通过论证自我反思的诸阶段，即通过自我设定自身、设定非我和扬弃自我与非我的对立而返回自身的合乎逻辑的行动，展现出自身的自明性。因此，在费希特那里，自我意识就是一种返回到自身、同时在执行中又是清晰可辨的活动。费希特似乎只是深化了康德的自我意识的先验的统一，只是把这种抽象的统一变成了最初的行为。^{[1](P7)} 在黑格尔那里，自我意识不是自身相关的统一体，不是自我和非我的统一，而是普遍和个别的统一，即社会化和个性化过程的统一。这是在语言、劳动和相互作用的中介下自我意识的形成过程，是自我逐步成熟的过程。哈贝马斯说：黑格尔“放弃‘完美的’认识主体这一立场”，^{[1](P20)} 把自我意识的同一性理解为“由三种异质的形成模式决定的形成过程的统一”。^{[1](P21)} 这是用辩证发展的理性批判和取代启蒙以来的固定不变的成熟理性。

3. 黑格尔建构的是反思批判不合理的交往关系的理论模式，而不是主张孤独的自我的反思关系。康德所理解的主体是“孤独的和自满自足的主体”，^{[1](P13)} 这在他的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中都表现出来。在理论哲学中，康德把认识主体的同一性理解为基于抽象的自我的主观性；在实践哲学中，他虽然承认道德法则的普遍性，但这只是孤立的道德主体把对自己普遍有效的行为准则设想为可以运用于任何道德主体的外推的结果。它对我来说是普遍有效的，那么，它就被设想为对一切有理性的人也同样是有效的。在康德那里，道德准则的普遍性是抽象的普遍性，是从先验上考虑的普遍有效的道德律令，是“行为者在没有破裂的主体通性的框架内的事先的同步化”。^{[1](P13)} 既然道德准则已事先规定好，已预先确定可以被一致遵守，那就无需通过不同主体间的相互理解与沟通而予以调整和改善了。于是，康德就把主体间相互作用的伦理行为从道德领域分离了出来，就取消了对主体间扭曲的交往关系加以反思批判的任务。哈贝马斯指出：从康德的道德观点出发，“我们必须撇开黑格尔所说的伦理关系，以及撇开主体处在相互作用中的关系，即处在形成过程中的关系。我们必须撇开包含在暴力交往的辩证过程中的那种东西和从这种过程中产生的东西。”^{[1](P14)} 而黑格尔对主体间相互斗争和相互认同的辩证关系的探讨，则建构了主体间交往的模式，赋予了哲学以反思批判扭曲的交往关系、使人获得解放的使命。

哈贝马斯分析道，康德之所以从抽象、孤立的主体出发，这基于康德对理性的目的性、技术性的理解。在哈贝马斯看来，劳动和战略活动都是有目的的理性活动。劳动是主体按技术规则进行的有目的的独自活动；战略活动是主体为了达到一定目的而采取的对策。在康德那里，就理论认识而言，“抽象的认识批判是按照亚里士多德采用的手工劳动（劳动的主体用手工活动创造物质）的模式来理解范畴和直观形式同经验材料的关系的。”^{[1](P19)} 这就是说，理论认识只是囿于现象领域，根据范畴和直观形式对感性杂多的材料进行加工整理而形成知识，这种加工整理是一种根据主体的主观意图来进行的操作活动，从而体现了理性的目的性。就道德意识而言，康德所说的体现主体意志自由的道德行为只能是“战略活动的一种特殊情况”，是主体面对可能性而独自做出的选择和决断，而无需通过不同主体间的相互理解与沟通。

费希特的自我意识是我在我的一切观念中把自己理解成同一的自我，同时又完全撇开被思考的东西而形成的。因此，哈贝马斯说，在费希特那里，“自我的产生全然靠自身；知识学的辩证法，始终同孤独的反思关系相联系”。^{[1](P6)} 费希特认为，自我意识是我在设定的非我身上认识自身时形成的。但非我不过是一个与自我相同的“他者”，是“作为他人的另一个自我”。自我同他的关系，实质上是自我同自身的关系，自我可以在他我中认识自身、反思自身。因此，费希特所说的作为自我和非我统一的自我意识，是一种“孤独的反思关系”。而“黑格尔则相反，他迷恋于自我和他人在精神的主体通性的框架中的辩证关系；在精神中，自我不是同作为他的他人的自身相沟通，而是同作为他人的另一个自我相联系”。^{[1](P6)} 这是一个通过斗争而相互承认、相互和解的关系。

哈贝马斯不仅把青年黑格尔的思想同康德、费希特的思想相比较，而且同马克思的思想相比照。他认为，马克思虽然不知道黑格尔早期精神哲学的手稿，但他“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中重新发现了劳

动和相互作用的关系”。^{[1](P32)}然而，“马克思对相互作用和劳动的联系并没有作出真正的说明，而是在社会实践的一般标题下把相互作用归之劳动，即把交往活动归之为工具活动。”由于马克思把工具活动作为一切范畴产生的范式，“因此，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的天才洞察也就随即受到了机械主义的曲解。”^{[1](P33)}

通过对黑格尔耶拿手稿思想的发掘，哈贝马斯认为，尽管青年黑格尔没有对劳动和相互作用的关系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但他的研究却引发我们关注这一问题，使我们认识到，“精神和类的形成过程，基本上取决于劳动和相互作用间的联系。”^{[1](P34)}哈贝马斯设置的劳动和相互作用的理论框架对于克服把实践简单归结为劳动的观点具有一定的意义，但他却把人类解放的希望由劳动的合理化转向伦理交往规范的合理化，这表现出了他的社会改良主义的立场。他把劳动曲解为人对自然的技术性活动，把相互作用归结为人与人的伦理关系，这就把人与人的社会生产关系排除了出去，否认了变革不合理的社会生产关系对于人类解放的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 [1] 哈贝马斯. 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 [M]. 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 [2] Thomas McCarthy. The Critical Theory of Jurgen Habermas [M].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 1978.

责任编辑：何蔚荣

无“是”即无逻辑：形而上学的逻辑神话

◎ 程仲棠

[摘要] 逻辑与本体论均以“是”为核心，无“是”即无本体论，同样无“是”即无逻辑——这就是流传于中国学界的一个形而上学的逻辑神话。本文的目的是对这个神话进行解构，读者将会发现，“是”在亚里士多德的词项逻辑中不过扮演一个可有可无的小角色，即作为组成逻辑常项的一种可供选择的语言要素；在斯多葛派的命题逻辑中根本没有地位；在现代逻辑中亦无影无踪。这一切表明，没有“是”，逻辑照样运作。无“是”即无逻辑论的症结在于把逻辑和形而上学混为一谈。

[关键词] “是” 形而上学 传统词项逻辑 斯多葛派命题逻辑 现代逻辑

(中图分类号) B81-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7) 03-0025-08

一、引言：逻辑神话的哲学背景

系词（动词的子类）“是”（英文为 *to be*，其他西方语言也各有相当的系词，这里以 *to be* 作为西文系词的代表）在逻辑中具有决定性意义，有“是”才有逻辑，无“是”即无逻辑——这就是流传于中国学界的一个跨世纪的逻辑神话。这个逻辑神话主要有两个哲学来源。

其一，文化主义逻辑观。文化主义逻辑观，是按照“文化主义”即“人类事务中的一切都是文化问题”的学说^{[1][P106]}对逻辑所作的一种哲学解释。张东荪在上世纪30-40年代就提出文化主义逻辑观，基本观点是文化决定逻辑，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逻辑。^[2]它的一个重要支点，就是语言决定逻辑论。张东荪认为，形式逻辑是西方语言系统的产物，中国语言不合于其系统，自与此种逻辑有“格格不入”之处。^{[3][P391]}何以见得？他提出了一个决定性理由，就是“文言上却很少有与英文 *to be* 相当的字”，即系词“是”，难以构成命题，因而“全套名学的推演必发生困难”，^{[3][P346]}最后作出结论说：“此即所以中国没有西方式的逻辑的缘故了”。^{[4][P230]}当张东荪说中国古代没有形式逻辑时，他说出了历史的真实，我也认为：“中国古代没有逻辑学，而只有逻辑理论的萌芽”。^[5]但是，他对中国没有形式逻辑的症结所在的诊断是错误的，先秦时代的汉语确实没有系词“是”（先秦有“是”字，但不作系词，“是”的系词用法或曰始于西汉，或曰始于六朝），不过，系词“是”的缺席或迟到，与中国逻辑的流产没有任何关系，严复就用无“是”的文言表述了19个有效的三段论式，用4个无“是”的表达式，即“凡甲皆丙”、“无甲为丙”、“有甲为丙”和“有甲非丙”，正确地表述了传统逻辑A、E、I、O四种性质命题。^{[6][P156]}严复的翻译成果表明，无“是”的古汉语也可以作为形式逻辑的载体，中国古代无逻辑另有原因，非关中国语言。张东荪基于文化主义逻辑观而创立的无“是”即无形式逻辑论，就为“是”的逻辑神话奠定了基础。我对张东荪的文化主义逻辑观已有评论，^[7]下文就不再重复这个话题。

其二，形而上学逻辑观。它是近年来随着我国哲学界对西方形而上学或本体论中的关键词 *being*（英文 *to be* 的分词，其他西方语言中的系词也各有相应的分词）如何翻译的讨论而兴起的。不少学者提出，过去把 *being* 译为“存在”或“有”是不适当的，不能反映 *being* 与 *to be* 的联系，应改译为“是”，这对于正确地理解本体论是至关要紧的，因为本体论“就是关于‘是’的学问。没有‘是’这个词，本体论的产生是难以想象的。”^{[7][P34]}从这种看法可以引申一个推断：无“是”即无本体论——对此，本文没有异议。

作者简介 程仲棠，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广东 广州，510632）。

问题在于某些学者进一步将本体论的特征强加于逻辑学，从无“是”即无本体论，推出无“是”即无逻辑学。这是一个类比推理，依赖于一个哲学预设：形而上学（核心就是本体论）与逻辑学的根本性质是相同的。这是把形而上学与逻辑学混为一谈，我称之为形而上学逻辑观。

基于形而上学逻辑观的无“是”即无逻辑论有两个不同的版本。一个是低调的，其确切含义是：无“是”即无传统逻辑，即承认无“是”即无逻辑论不适用于现代逻辑；另一个是高调的，其确切含义是：无“是”即无任何逻辑，无论传统逻辑或现代逻辑。

低调的无“是”即无逻辑论，可以王路先生的看法为代表。其主要观点如下：

- (1) 传统逻辑与形而上学均以“是”为“核心”，“有相通之处”。^[9]
- (2) “是”是“逻辑研究的对象”，“传统逻辑提供的理论是关于‘是’的理论”。^[9]
- (3) 因为古汉语没有“是”，所以中国古代没有形式逻辑。他写道：“有‘是’，则从语言方面提供了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看得见摸得着的语词，才能使人们去研究它。若是没有这个‘是’，则很难想象怎样去研究它。让我们考虑一个相反的例子。古汉语中没有‘是’作系动词，因此逻辑学家没能对‘是’进行逻辑分析，也就没能形成相应的逻辑理论。”^{[9](P34)}

高调的无“是”即无逻辑论，可以张志伟和萧诗美两位先生的看法为代表。张先生的主要看法如下。

- (1) 如果希腊语言中没有系词“是”，亚里士多德逻辑就无从建立；“正因为古代汉语中没有系词‘是’，所以中国古人始终没能建立起真正具有纯形式性的逻辑体系”。^{[10](P13)}
- (2) “是”是思想和语言的“逻辑界限”。何解？他说：“没有‘是’的语言和思想就没有逻辑，所以，‘是’是思想和语言的逻辑界限。在这个界限以内，语言和思想就是有逻辑的，就是能够清楚明白的；在这个界限以外，语言和思想就是没有逻辑的，就不能够清楚明白。”^{[10](P15)}值得注意的是，当他说“没有‘是’的语言和思想就没有逻辑”时，不但指没有逻辑学，而且指没有逻辑思维。这本来也是无“是”即无逻辑论的题中应有之义，却难得说得如此“清楚明白”。
- (3) “‘是’词不但在日常语言中的逻辑地位是不可动摇的，而且在现代逻辑体系中的根本地位也是不可动摇的”。^{[10](P14)}

萧先生同样认为，无“是”即无逻辑论适用于现代逻辑，他比前两位更激进的地方就是断言：“假如没有‘是’的运作，那就没有任何思想。我们无法想象一种没有‘是’的思想”^{[11](P188)}——这一断言本身就没有系词“是”的运作（加引号的“是”属元语言，用作名词，而非系词），那么算不算思想？如果不算是思想，这一断言就毫无意义；如果也算是思想，那就证明“没有‘是’的思想”是存在的。萧先生似乎没想到，越是高调，越容易陷于自我否定。

按照诸位先生的描述，“是”简直成了掌管逻辑之神，就像希腊神话中没有阿波罗就没有阳光，没有阿佛洛狄忒就没有爱，没有缪斯就没有诗一样，没有“是”就没有逻辑，甚至没有思想——这是一个形而上学的逻辑神话。将背负着人类理性基本准则的逻辑系于语言中一个“是”，以“是”的在场作为逻辑思维得以孕育和逻辑学得以诞生的先决条件或必要条件，这是“是”所不能承受之重。

本文的目的就是对形而上学的逻辑神话进行解构，读者将会发现，“是”即便在最辉煌的年代，也不过在一切可能的逻辑世界中的某一个逻辑王国（在那里，亚里士多德为王）扮演一个可有可无的小角色，没有“是”，逻辑照样运作。

二、传统词项逻辑不是关于“是”的理论，而是关于类的理论

传统逻辑包括两个不同的逻辑系统，就是亚里士多德的词项逻辑以及斯多葛派的命题逻辑，这里暂且不说斯多葛派命题逻辑，而只讨论“是”与传统词项逻辑的关系。

(一) “是”在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中可有可无

如果问亚里士多德逻辑的核心是什么，应当说就是亚氏在《前分析篇》创立的三段论系统。可是，亚氏在表述这个系统的4种性质命题的形式以及由它们组成的三段论时，却偏偏不用系词“是”。首先揭露

这一事实的是精通希腊文的波兰数理逻辑家卢卡西维茨，他说：“在借助于字母形成三段论时，亚里士多德总是把谓项放在前面而把主项置于后面。他不说‘所有 S 是 P’而代之以‘P 表达所有的 S’的表达方式，或更经常地用‘P 属于所有的 S’。”^{[12](P10)} 例如，三段论 Barbara 式的“精确的译文”是：“如果 P 表达所有的 M 并且 M 表达所有的 S，那么 P 表达所有的 S。”^{[12](P11)}（为便于与下文比较，两处引文均以 S、P、M 替换原文的字母——引者注）

这一事实也得到英国逻辑史家威廉·涅尔和玛莎·涅尔的确认，他们指出，在《前分析篇》中，亚氏“几乎”把表达式“S 是 P”都换成“P 属于 S”和“P 表达 S”。^{[13](P80)}

亚氏在《前分析篇》陈述具体命题时也用“S 是 P”形式的表达式，例如，“如果一切快乐都不是善，那么一切善的东西就都不是快乐。”^{[14](P85)} 这是亚氏在给出性质命题的换位律时举出的例子。显然，“S 是 P”形式的表达式是符合语言习惯的，而“P 属于 S”和“P 表达 S”这样的倒装表达式在一定程度上是违背语言习惯的，人们在解读亚氏的表达式时，恐怕也要把它们还原为“S 是 P”一类的形式。那么，何以亚氏在刻画三段论的逻辑形式时，偏偏用有违语言习惯的表达式呢？如果说亚氏有先见之明，早就埋下伏笔，与后世的无“是”即无逻辑论者开一个超越时空的玩笑，当然也不过是神话。一个合理的解释是：亚氏之所以选择无“是”的表达式，正是为了表明，他的三段论理论并非以“是”或“S 是 P”这样的语言形式作为研究对象，而是以“S 是 P”、“P 属于 S”和“P 表达 S”这些不同的语言形式所表达的同一的逻辑关系作为研究对象。这种解释的根据在于：语言只是逻辑的载体，而非逻辑的本体（即逻辑本身），逻辑的本体是唯一的，逻辑的载体是多样的，逻辑的本体与载体的关系是一对多的关系，所以，不同的语言形式可以表述同一的逻辑本体。

鉴于“本体”一词在哲学上充满歧义，有必要进一步明确“逻辑本体”的概念。在本文中，“逻辑本体”是与“逻辑载体”（指语言）相对而言的，指的就是“逻辑本身”。追问“什么是逻辑本体”，就等于追问“逻辑是什么”，或“逻辑研究什么”，所以，“逻辑本体”、“逻辑本身”与“逻辑的研究对象”，实质上是同一概念。

那么，三段论的逻辑本体又是什么？众所周知，传统词项逻辑是一种外延逻辑，每一个词项变项 S、P、M 都可解释为任意的一个普遍概念的外延，即普遍概念所指的一类事物，简称为类（即数学所谓“集合”）。在这一解释下，每一个性质命题所表示的就是类与类之间的关系。类之间有 5 种基本关系，就是全同关系、真包含于关系、真包含关系、交叉关系和全异关系，任何两个类之间都逃不出这 5 种关系。每一个有效的三段论则反映了类之间的基本关系的规律。逻辑语义学的奠基者塔尔斯斯基论及传统词项逻辑时就指出，它“几乎可以完全简化为类与类之间的基本关系的理论”；^{[15](P73-74)} 又说：“传统逻辑中的最重要的定律是一些直言三段论定律，它们完全相当于……关于类的理论的定律”。^{[15](P74)} 由此可见，传统词项逻辑“实质上是类逻辑”，^{[16](P47)} 类之间的基本关系及其规律就是其研究对象，也是其逻辑本体。

只要能够表示逻辑本体，语言形式可以不拘一格。例如，全称肯定命题所表示的是全同关系与真包含于关系的并集，称为“包含于关系”——这就是全称肯定命题的逻辑本体。其载体可以用含“是”的表达式，也可以像亚里士多德和严复那样用无“是”的表达式，它们在逻辑上没有任何差别。又如，三段论 Barbara 式所反映的是包含关系的传递律，可表示为：

如果 $M \subseteq P$ 并且 $S \subseteq M$ ，那么 $S \subseteq P$ （“ \subseteq ”读作“包含于”）

这就是 Barbara 式的逻辑本体。其载体除了传统的含“是”式之外，还可以有无“是”的表达式，亚里士多德式如前所述，严复表述为“以凡乙之皆丙，与凡甲之皆乙，故知凡甲皆丙也”。^{[6](P156)} 我们又何尝不可说成：“乙者，皆丙也，甲者，皆乙也，故甲者，皆丙也”，或“乙全在丙内，甲全在乙内，故甲无出乎丙之外者也”？无“是”即无逻辑论者能够指出，当把甲、乙、丙解读为任意的类时，这 3 个文言无“是”式在表述包含关系的传递律方面有什么差错吗？

由此可见，“是”或具有“S 是 P”形式的表达式，只是词项逻辑的一种可能的载体，而非唯一的或

必不可少的载体。在这个意义上说，“是”在亚氏三段论中可有可无。

(二) “是”的真实身分：组成逻辑常项的语言要素

逻辑常项是现代逻辑的概念，传统逻辑的逻辑常项，是现代学者对传统逻辑的某些表达式的一种解释。让我们先听取卢卡西维茨的解释。他认为与传统三段论不同，亚氏三段论不是推理形式，而是蕴涵式，前件是由大前提和小前提组成的一个合取式，后件相当于结论。^{[12](P9)} 卢氏首先指出，亚氏三段论系统有三个辅助性的命题逻辑常项，就是“如果”、“并且”和“非”，^{[12](P92)} 然后写道：

剩下还有四个常项，即“属于所有的”，“属于无一的”，“属于有些”，“不属于有些”。它们是亚里士多德逻辑的特征。这些常项代表着普遍词项之间的各种关系。^{[12](P23-24)}

他还说，这四个常项也可以用另一种表达式表示：

这四个常项可以由“所有——是”，“没有——是”，“有些——是”，“有些——不是”来表示；这些常项是二元的函子。^{[12](P91)}

卢卡西维茨的看法可总括如下：除命题逻辑常项之外，表示词项之间的逻辑关系的常项共有4个，即：(1)“所有——是”或“属于所有的”，(2)“没有——是”或“属于无一的”，(3)“有些——是”或“属于有些”，(4)“有些——不是”或“不属于有些”。

与卢卡西维茨的看法不同，王路先生认为“是”、“不”、“所有”和“有的”每一个词都是一个单独的逻辑常项，“是”则是“逻辑常项中最核心的概念”。哪一种看法有道理呢？这就要根据逻辑常项的概念加以衡量。

何谓逻辑常项？我们可以给出这样一个定义：一个表达式是某一个逻辑系统中的逻辑常项，当且仅当它能够表示这个逻辑系统中一定的逻辑关系。如果这个定义不错，那么卢卡西维茨的看法就是正确的，因为每一个表达式都可以表示类之间的某些基本关系：(1)“所有——是”或“属于所有的”表示包含于关系；(2)“没有——是”或“属于无一的”表示全异关系；(3)“有些——是”或“属于有些”表示全异关系的否定，即其余4种关系的并集，又称为“相交关系”（有别于交叉关系）；(4)“有些——不是”或“不属于有些”表示包含于关系的否定，即其余3种关系之并。这样，4个表达式就穷尽了类之间一切可能的基本关系，即普遍词项之间的全部逻辑关系。可见，这些表达式就是传统词项逻辑的逻辑常项，传统逻辑的4种性质命题形式，就是由这些“二元的函子”和词项变项S、P组合而成的。

按照卢卡西维茨的看法，“是”不是一个逻辑常项，而只是组成逻辑常项的要素。“是”是有歧义的，在传统逻辑的性质命题中，可以表示包含于关系（在“所有S是P”中），也可以表示相交关系（在“有些S是P”中），一个有歧义的、不能表示一种确定的逻辑关系的表达式，不能作为逻辑常项。“是”只有与“所有”或“有些”组合起来，才能表示确定的逻辑关系。相反，如果把系词“是”看作逻辑常项，就必须把量词“所有”和“有些”也看作逻辑常项，也就等于说传统逻辑包含了量词的研究或量词的理论，这不符合事实。现代逻辑才开拓了量词的研究，量词研究以引入个体变项x为前提，“所有”可表示为“对所有x而言”，“有些”可表示为“至少有一x，使得”。传统逻辑没有引入个体变项，不可能有量词的独立研究，所以，“所有”和“有的”单独地都不是传统逻辑的逻辑常项，它们同“是”和“不是”一样，只是组成逻辑常项的要素。笔者十多年前论及4个逻辑常项时，就强调说：

值得注意的是，在传统逻辑中，量词和联词都只是构成逻辑常项的要素……本身没有独立意义……在构成逻辑常项的要素中，量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忽视量词的独立意义是传统逻辑的一大缺陷，量词的意义在现代逻辑中才得到充分的研究（谓词逻辑又称为量词理论）。^{[16](P10)}

王路先生说，“是”是一种“稳定的语言要素”。^{[1](P341)} 这说得好极了，“是”的真实身分就是也只是一种语言要素，确切地说，是组成逻辑常项的一种可供选择的语言要素。在传统逻辑的发展史上，4个逻辑常项被定型为“所有……是”，“所有……不是”，“有的……是”，“有的……不是”，乃语言习惯使然，非逻辑所必需。从逻辑的观点看，4个常项也可以用不含“是”的语言形式表达，亚里士多德式如上所述，严

复就表达为“凡……皆”，“无……为”，“有……为”，“有……非”。所有这些表达式，在逻辑面前个个平等，每一个都是可以被取代的，没有哪一个是不可或缺的，含“是”表达式的“不可动摇”，是语言习惯造成的假象，在逻辑理论上没有任何根据。

总之，与王先生的断言相反，传统词项逻辑不是关于“是”的理论，而是关于类的理论；“是”不是传统词项逻辑的研究对象，类之间的基本关系及其规律才是传统词项逻辑的研究对象。

三、无“是”的斯多葛派命题逻辑：逻辑神话中被遗忘的王国

斯多葛派的命题逻辑是逻辑神话中一个被遗忘的王国，它的字典恰好没有“是”。

斯多葛派命题逻辑有别于传统词项逻辑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对命题只作宏观的研究，即只研究命题的真假二值以及命题之间的真假关系，而不对命题的内部结构作微观的分析。所以，在斯多葛派的命题逻辑系统中，根本就没有主项和谓项的概念，又何须引入系词“是”呢？

这里不妨对斯多葛派命题逻辑系统的语形和语义作简单的介绍。

这个系统的语言包括两个基本的构成部分，就是命题变项和命题联结词。斯多葛派用序数词“第一”，“第二”，“第三”……作为命题变项，每一个序数词都可以代表任何一个具体命题。这个系统共有4个命题联结词，就是“并非”，“如果……那么”，“或者……或者”和“并且”，分别表示否定、蕴涵、严格析取和合取，它们就是这个系统的全部逻辑常项。

这个系统共有5种不同的命题形式，即：(1)“第一”；(2)“并非第一”；(3)“如果第一，那么第二”；(4)“或者第一，或者第二”；(5)“第一并且第二”。(1)是简单命题形式，(2)-(5)都是复合命题形式，分别代表负命题、假言命题、不相容选言命题和联言命题。

斯多葛派逻辑的基本的语义观点就是命题只有真假二值，用他们的主要代表人物克吕西波的话来说，“一切命题都是或真或假的”。^{[17][P93]}按照这一观点，每一个命题变项或解释为真命题，或解释为假命题，即或以真为值，或以假为值。在解释下，4个命题联结词的意义就在于表示某种真假关系。所以，“在斯多葛派的逻辑系统中，所有复合命题形式都是真值函项，它们同命题变项一样以命题的真值（真或假）为值，而它们的真值则完全决定于其中的命题变项的真值”。^{[16][P117]}斯多葛派的命题逻辑就是一个建立在二值原则和真值函项之上的、由假言推理、不相容选言推理等复合命题推理的“正确推理形式或推理规则组成的自然推理系统”。^{[16][P121]}

由此可见，斯多葛派的命题逻辑与“是”没有任何瓜葛。如果说“是”作为一个可有可无的语言要素，还可以和亚里士多德逻辑攀上点关系，那么“是”与斯多葛派逻辑简直就没有关系可言，单凭斯多葛派的命题逻辑就足以证伪无“是”即无逻辑论。

一切把中国古代无逻辑归咎于中国语言的论者，都暴露了他们的一个逻辑盲点，就是看不见命题逻辑。依命题逻辑，任何形式的陈述句，包括无“是”句、无主句、独词句，都可以充当简单命题，因为命题逻辑把简单命题当作不可分解的逻辑原子，对其内部结构根本就不闻不问。况且在古汉语中，也充斥着“非”、“若（如、使）……则”、“且”、“又”、“而”、“或……或”、“抑”……一类的命题联结词，它们可以表示各种复合命题，可见，古汉语给命题逻辑提供了足够的载体。中国古代没有建立起命题逻辑，症结不在于中国语言，而在于人们对语言的理解，就是始终停留在直观的层面，而没有上升到抽象的层面，所以，对陈述句或简单命题未能抽象出真假二值，对命题联结词未能抽象出真假关系，从命题联结词即命题逻辑常项长期被当作无理可解的“虚字”，就可以看出人们对逻辑关系是何等麻木。

四、“是”在现代逻辑中无影无踪

现代逻辑是用形式语言表示的，“是”当然不会出现在形式语言中，这是不成问题的。问题是：在现代逻辑的形式语言或语义解释中，有没有“是”的对应物，或“是”的投影呢？什么也没有。

现代逻辑包括命题逻辑和谓词逻辑。现代命题逻辑是斯多葛派命题逻辑的一个形式化的发展，同样把简单命题当作逻辑原子，只取其真假二值，不管其内部结构，所以，在现代命题逻辑的形式语言及其语义

解释中，根本就没有与“是”对应的符号。

谓词逻辑可以分为一元谓词逻辑和多元谓词逻辑。一元谓词逻辑是从传统词项逻辑发展而来的，二者有一定的对应关系，不过，“是”在一元谓词逻辑的形式语言中却没有对应的符号。就全称肯定命题而言，无论“所有 S 是 P”、“P 属于所有的 S”或“凡 S 皆 P”，其逻辑公式均为：

$$\forall x (S(x) \rightarrow P(x))$$

就特称肯定命题而言，无论“有些 S 是 P”、“P 属于有些 S”或“有 S 为 P”，其逻辑公式均为：

$$\exists x (S(x) \wedge P(x))$$

可见，在形式化中，同一个性质命题的含“是”表达式与无“是”表达式没有任何区别。

公式的语义解释是刻画公式的逻辑本体的，同传统词项逻辑一样，一元谓词逻辑的本体也是类之间的关系及其规律（主要区别在于：传统逻辑预设一切类均为非空类，谓词逻辑则无此预设），所以，一元谓词逻辑公式的语义解释要用类理论即集合论的语言表示。例如， $\exists x (S(x) \wedge P(x))$ 的解释可以表示为：

$$S \cap P \neq \emptyset \text{ (S 集与 P 集之交不是空集)} \quad [16](P347)$$

可见，“是”在一元谓词逻辑的语义解释中也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exists x (S(x) \wedge P(x))$ 可以读作：“至少有一 x，使得 x 是 S，并且 x 是 P。”这是公式的读法，不可混同于公式的语义解释。公式的读法无非是将形式语言翻译为自然语言，它与逻辑载体有关，而与逻辑本体无关，也不是逻辑系统的构成部分。萧诗美先生却把 $\exists x (S(x) \wedge P(x))$ 这个公式的读法，当作证明现代逻辑“不仅没有把‘是’作为多余的东西消除掉，反而使它变得更醒目”的根据。^{[11](P188)}这个根据是靠不住的，公式的读法同性质命题的表达式一样是多样化的，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公式读作：“至少有一 x，使得 x 兼备 S 与 P 两种性质”；“至少有一 x，使得 x 既为 S 亦为 P”；“至少有一 x，使得 x 既属 S 又属 P”……不用“是”不是可以照样解读吗？

“是”在多元谓词逻辑中也没有对应物。多元谓词逻辑是从德·摩根于 19 世纪中叶创立的关系逻辑发展而来的，多元谓词逻辑公式的原型就是关系命题。关系命题一般是不含“是”的，例如，2 元关系命题“贾宝玉爱林妹妹”，3 元关系命题“武汉在北京与广州之间”。如果关系命题不含“是”，那么相应的谓词逻辑公式当然不会有“是”的符号化身。在极少数含“是”的关系命题中，“是”也没有独立的意义。例如，“曹操是曹植的父亲”，是一个二元关系命题，“是……的父亲”是一个二元谓词，“是”只是组成这个二元谓词的可有可无的语言要素。显然，这个命题等值于“曹操，曹植之父也”。以 F(x, y) 表示“x 是 y 的父亲”或“x, y 之父”，a 表示曹操，b 表示曹植，这两个命题可以形式化为同一个二元谓词逻辑公式，即：

$$F(a, b)$$

以上是就经典逻辑而言的，在模态逻辑、相干逻辑、多值逻辑、直觉主义逻辑、模糊逻辑等非经典逻辑系统中，同样寻不着“是”的踪影。

如前所述，张志伟先生断言，“是”“在现代逻辑体系中的根本地位也是不可动摇的”。支持这一“宏大叙事”的却只有一个问题理由：“集合论之所以能够合乎逻辑，正在于它的‘属于关系词 (∈)’。这个‘∈’正相当于传统形式逻辑系统中所必需的普通关系词‘是’”。^{[10](P13-14)}他把“∈”（属于）称为“属词”，说“我们完全可以把‘是’词换成属词”。^{[10](P14)}

但是，“集合论之所以能够合乎逻辑，正在于它的‘属于关系词 (∈)’”一说，就是令人费解的。张先生似乎不知道，要建立集合论不能单凭“∈”，还须借助其他符号，例如“=”（等同）、“⊂”（真包含于）、“⊆”（包含于）、“∪”（并）、“∩”（交）、“¬”（补）等等，否则凭什么将“集合论之所以能够合乎逻辑”，归功于“∈”呢？

“∈”“相当于”“是”一说也不能成立，二者没有等同关系，不能互相替换。“是”是多义词，可表示

元素与集合之间的属于关系 (\in)， $a \in K$ 意即： a 是 K 集的元素；也可表示集合之间的包含于关系 (\subseteq)， $L \subseteq K$ 意即： L 集是 K 集的子集。这是两种不同的关系，具有不同的性质，金岳霖早就指出：“‘ \in ’无传递质而‘ \subseteq ’有传递质（在这里“ \subseteq ”表示包含于关系——引者注）”。^{[18] (P82)} 把“ \in ”当作“是”的等价物，必然导致属于关系与包含于关系的混淆。例如，张先生把“所有的人都是会死的”，换为“所有的人 \in 会死的”，^{[19] (P13-14)} 就是错误的，错在把包含于关系当作属于关系，“所有的人”与“会死的”均表示集合，两个集合的关系是前者包含于后者。

可见，无“是”即无现代逻辑论者根本就拿不出像样的论据，不过是徒托空言，实际上，“是”在现代逻辑中无影无踪。这一切就像李商隐所说：“来是空言去绝踪”。

五、逻辑与形而上学有共同的核心吗

王路先生认为，传统逻辑和形而上学有一个共同的核心，就是系词“是”。他写道：

概括地说，逻辑以“是”为核心，主要在于它体现了一种最简单、最基本、最普遍、最重要的句式，即“ S 是 P ”。形而上学以“是”为核心，主要在于它体现了人们在探求周围世界和与自身相关事情的过程中一种最基本的询问和陈述方式“是什么”。“ S 是 P ”和“是什么”有一个共同的因素，这就是“是”……在逻辑和形而上学中，“是”的论述方式不同，核心地位却是一样的。由此也可以看出逻辑与形而上学的相通之处。^[20]

这种看法似是而非，如果传统逻辑确实以“是”为“核心”，何以在亚里士多德逻辑的核心部分即三段论系统中却被边缘化，以至几乎不见踪影？亚氏的表达方式表明，不用系词“是”也可以建立三段论系统。可见，“是”根本就不是传统逻辑的核心，甚至也不是传统逻辑的必要成分，如前所述，它不过是组成逻辑常项的一种可供选择的语言要素。

“是”即逻辑和形而上学的共同核心一说的症结，在于把“ S 是 P ”这样一种“句式”当作命题的逻辑形式（简称“命题形式”）。“ S 是 P ”只是一种语言形式，不是一种命题形式，因为它没有量词这个组成要素，究竟表示全称还是特称命题，是不清楚、不明确的（人们往往把“ S 是 P ”理解为“所有 S 是 P ”，这是由于假定它省略了全称量词；若不假定它省略全称或特称量词，则“ S 是 P ”不能代表任何命题形式）。“ S 是 P ”所概括的只是“所有 S 是 P ”、“所有 S 不是 P ”、“有的 S 是 P ”和“有的 S 不是 P ”的共同的语言形式，不是它们的共同的逻辑形式，换言之，“ S 是 P ”只是它们的语言形式的公因子，不是它们的逻辑形式的公因子，它们也没有逻辑形式的公因子。同样，“是”也只是性质命题的语言形式的公因子，不是它们的逻辑形式的公因子，“是”在逻辑上根本就没有独立意义。由此不难明白：“是”不是逻辑和形而上学的共同核心，而只是西方的某种常见的语言形式和形而上学的共同核心。

逻辑和形而上学也不可能有共同的核心。王路先生所谓形而上学，指的是本体论，或称“是论”，它与逻辑之间有一个根本性的差别：逻辑具有全人类性，是“超文化或跨文化的”，^[21] 因而也不受语言的支配，不会因语言的不同而异；相反，“是论”没有全人类性，是依赖于西方语言的，显然，如果语言中没有相当于 to be 的系词及其分词，就没有“是论”。怎么能够设想两种根本不同的学问会有共同的核心呢？

“是”即逻辑和形而上学的共同核心一说，导致了形而上学逻辑观与文化主义逻辑观的合流，同归于语言决定逻辑论，语言决定逻辑的论题与逻辑具有全人类性质的论题是不相容的。王路先生是肯定逻辑具有全人类性，而否定逻辑具有民族性的，他说：“只要是逻辑，就不可能有民族性，就不可能反映某一民族的语言特色。”^{[22] (P33)} 我欣赏这一观点，但想不通这一观点怎能与他的“核心”说和谐共处。按照“核心”说，逻辑只属于语言中含有“是”的民族，无“是”的民族（多半是非西方民族）即无逻辑，不但没有逻辑学，而且没有逻辑思维，这样，逻辑具有全人类性质的论题岂不是完全落空？让我们看看相反的说法，就是胡适在《先秦名学史》的一个注释中引述的英国哲学家霍布斯的如下一段话：

但是有些民族，或者说肯定有些民族没有和我们的动词“is”相当的字。但他们只用一个名字放在另一个名字后面来构成命题，比如不说“人是一种有生命的动物”，而说“人，一种有生命的动

物”；因为这些名字的这种次序可以充分显示它们的关系；它们在哲学中是这样恰当、有用，就好像它们是用动词“is”联结了一样。^{[19][P41]}

霍布斯的意思可以这样转达：无“是”的民族也可以“构成命题”，通过一定的次序显示逻辑关系，含“是”的表达式“人是一种有生命的动物”，与不含“是”的表达式“人，一种有生命的动物”，在哲学中没有任何区别，同样是“恰当”的。霍布斯的话表明，无“是”的非西方民族也可以分享逻辑，若要维护逻辑具有全人类性质的论题，倒不如听从霍布斯。

[参考文献]

- [1] 特瑞·伊格尔顿. 文化的观念 [M]. 方杰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 [2] 程仲棠. 评张东荪的文化主义逻辑观 [J]. 中国哲学史，2006，(3).
- [3] 张汝伦编选. 理性与良知——张东荪文选 [C].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
- [4] 张耀南编. 知识与文化——张东荪文化论著辑要 [C].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台出版社，1995.
- [5] 程仲棠. 逻辑要与中国现代文化接轨 [J]. 社会科学战线，1996，(4).
- [6] 穆勒名学 [M]. 严复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 [7] 俞宣孟. 本体论研究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 [8] 王路. 逻辑与形而上学 [J]. 文史哲，2004，(1).
- [9] 王路. 理性与智慧 [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
- [10] 张志伟. 是与在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 [11] 萧诗美. 是的哲学研究 [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
- [12] 卢卡西维茨. 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 [M]. 李真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 [13] 威廉·涅尔，玛莎·涅尔. 逻辑学的发展 [M]. 张家龙，洪汉鼎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 [14] 亚里士多德全集(第1卷) [M]. 苗力田主编.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 [15] 塔尔斯斯基. 逻辑与演绎科学方法论导论 [M]. 周礼全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 [16] 程仲棠. 现代逻辑与传统逻辑 [M].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0.
- [17] 肖尔兹. 简明逻辑史 [M]. 张家龙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
- [18] 金岳霖文集(第1卷) [M].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
- [19] 胡适. 先秦名学史 [M]. 上海：学林出版社，1983.

责任编辑：罗 萍

·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新世纪中国发展政策的新范式 *

◎ 岳经纶

[摘要] 本文旨在运用政策范式概念，分析中国发展政策领域的范式变化。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政策经历了两个明显的范式阶段：单纯经济增长（GDP主义）政策范式（1978-2003），以及正在形成的、以科学发展观为标志的新发展政策范式（2003年开始）。自改革开放伊始，发展政策主要由追求GDP数值所主导，权力下放和市场化是主要的政策工具。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中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和环境领域出现的急剧变化，使得GDP主义政策难以为继。旧的政策范式受到了挑战，政策制定者们在寻求新的政策范式。2003年非典疫情的爆发，以及“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发展政策范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个新出现的范式转向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三者的平衡。

[关键词] 政策范式 范式转移 发展政策 科学发展观 以人为本

〔中图分类号〕D6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7) 03-0033-07

自上世纪80年代中政策科学在中国出现以来，公共政策的研究已成为一个热门的学术研究领域。西方学者建立的有关公共政策的概念和理论在中国的公共政策研究中开始得到广泛应用。本文运用彼特·霍尔（Peter Hall）的政策范式（policy paradigm）概念，认为“科学发展观”这一新概念预示着一种新的政策范式在中国的出现。“科学发展观”的形成不仅反映了中国新领导集体为重新思考自改革开放以来所实施的发展政策所作的努力，而且反映了公共政策，尤其是发展政策的一个新方向。从2003年倡导新的发展思路以来，中国政策制定者们开始重新审视所面临的政策问题，调整政策目标的设置，运用新的政策工具，乃至实行新的政策制定模式。

一、政策范式与范式转移

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最先提出“科学范式”（scientific paradigm）的概念。^[1] 所谓“范式”，一般而言，指的是一个科学流派或学科据以形成其理论、规律和结论，以及进行相关实验之哲学和理论框架。广义上，任何一个哲学或理论框架都可以称之为范式。虽然每个范式都有其自身的完整性、价值观和假设，但它们并非不会受到挑战。一个曾经稳定的范式如果不能继续为既存的问题提供适当的解决方法，它就会被弱化。这样，范式转移（paradigm shift）就会发生。库恩将范式转移定义为一个新的概念传统，是解释中出现的根本改变，据此，科学以一种全新的和改变了的观点来看待某一知识和活动领域。^[2]

在库恩提出的科学范式概念的基础之上，彼特·霍尔在研究公共政策制定的学习过程中率先使用了“政策范式”（policy paradigm）概念。^[3] 他将政策制定看作是一个通常包含了三个中心变量的过程：指导特定领域之政策的整体目标，用来实现这些目标的政策技术或工具，以及这些工具的精确设置。以这三个变量为基础，霍尔识别了政策变化的三个不同类别：现有政策工具设置的变化，用以实现政策目标的基本工

* 本文得到中山大学二期985工程公共管理与社会发展创新基地专项基金资助。

作者简介 岳经纶，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广东 广州，510275）。

具的变化，以及政策这三种构成要素都出现的变化。他进而把这三种变化分别命名为“第一序列变化”(first order change)、“第二序列变化”(second order change)和“第三序列变化”(third order change)。第一序列变化指的是基本政策工具的水平(或设置)的变化，第二序列变化指的是据以实现政策目标的基本技术(工具)的变化，即采用了新的政策工具。第三序列变化指的是政策所有三种构成要素的变化，也就是政策目标的改变。第三序列的变化是最根本的，因为它代表了政策制定的知识框架的明显转移。这个框架就是“政策范式”，也就是“一个不仅指明政策目标以及用以实现这些目标的工具类别，而且还指明它们需解决之问题的性质的各种概念和标准的框架”。^[2]

政策范式已经成为政策科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其要点是：那些影响人们理解公共问题及其解决办法之可行性的既定信念、价值和态度是政策内容的重要决定因素。^[3]政策范式代表着“一套通过限定政策制定精英可能认为有用和值得考虑的备选方案的范围来约束行动的认知背景假设”。^{[3](232)}它影响到政策制定者们所追求的广泛目标、认识公共问题的方式，以及他们考虑采纳的解决办法的种类。理解政策范式的一个简单办法就是将之与“意识形态”这类传统的哲学概念或近期的“话语”(discourses)或“框架”(frames)这类社会学概念联系起来。^{[3](233)}

在霍尔的分析中，尽管第一和第二序列变化相当于库恩的“常规科学”，第三序列变化则反映了一个十分不同的过程，这个过程的标志就是与“范式转移”相联系的政策话语中的重要术语所发生的根本变化。^[4]第一序列和第二序列变化发生在一个相对封闭的政策网络中，这些变化的累积不会导致第三序列变化的出现。第三序列变化呈现出了其独有的特点。范式转移是由特定类型的事件，也就是在现行范式中被证明反常的事件所引发的过程。由于“异常事件”(anomalies)在现有范式下不断累积，政策制定者为了纠正这些问题，就会改变政策工具的设置并试验新的政策工具。如果他们的努力没有奏效，就会出现政策失败，从而削弱旧范式的解释能力，并引发人们广泛寻找替代性的范式，以及进行修正政策的试验过程。^[4]“该过程的核心是政策权威中心(locus of authority)的转移。权威中心的转移似乎是范式据以转移之过程的一个关键部分。导致这些重大变化的过程不会只局限在国家自身的范围内，它最终会通过选举竞争和更广泛的社会讨论而产生影响”。^[4]经过一段或短或长的时期，新范式的倡导者获得了权威地位，并且通过改变现有的组织和决策安排来实现新范式的制度化。这一过程就是政策范式的转移过程。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政策的范式阶段

政策范式可以在一个国家某一阶段总体或特定的政策领域中识别出来。根据霍尔的观点，政策范式是植根于政策制定者头脑中的知识框架，不仅支配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的选择和设置，而且还支配着政策制定者对其想要解决之问题的认识。^[4]政策范式代表着政策行动的框架，可以依据制定者如何设定政策目标、选择政策工具和界定政策问题而加以识别。

本文运用霍尔的范式概念，试图区分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领域的政策范式。基本上，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发展政策可以分为两个明显的范式阶段：单纯经济增长(GDP主义)政策(1978-2003)，以及正在形成的以“科学发展观”为特征的新政策范式阶段(2003年开始)。在识别政策范式时，本文除了考虑政策目标、政策工具和政策问题的界定之外，我们把其他诸如政策取向(policy orientation)、政策制定风格(policy making style)和政策语言(policy language)也纳入考虑范围。

新中国建立后，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通过国民经济计划，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然而，由于领导层没有把经济规律与政治热情区分开来，利用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等政治手段去实现经济增长，付出了巨大代价。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仍然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弱国。人们缺乏生活必需品，仍然受到贫穷和饥饿的折磨。70年代末邓小平的复出和1978年在全国范围展开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标志着新的政治权力中心的形成，中国开始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为了改善极端落后的国民经济和保障人民的温饱，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领导集体在70年代末期决定放弃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为了提高经济效率、加速经济增长、增强市场竞争，中

国开始采取一系列市场导向的政策，如创立私人市场、取消福利补贴、精简政府机构、放松市场监管，以及国有企业改革等等。经济增长成为国家的最高政策目标和政府认可性的源泉。这些变化和发展表明，中国的发展政策出现了新的范式，我们把这一范式称为“单纯经济增长”范式（参见表一）。

在这一范式下，经济建设的重点放在狭义的经济增长上。结果是，GDP 成为制定国家发展计划最具决定性的考虑因素。GDP 的增长速度和人均 GDP 的高低成为决定地方政府在全国发展等级中的经济地位和级别的标准，甚至被用作衡量地方领导人政绩的最重要指标。结果，追求 GDP 增长成为各级政府的中心任务，GDP 数字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以及改革开放时代，特别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政策辩论的基础。最终导致一些不适当的发展政策和战略被用于提高全国的 GDP。

虽然政府在政策制定方面仍起主导作用，但是新出现的利益集团，尤其是政治和经济精英对公共政策的影响越来越大。由于市场制度尚未发育完全，各种利益还没有组织起来，因此，政治和经济精英可以利用各种发展规划和项目去谋取经济利益。由于缺乏市场透明度高和竞争性强的买主，有价值的公共资产往往以象征性的价格卖给那些与政策制定精英有密切关系的既得利益者，却不须考虑公众问责。精简公共部门和减少福利补贴的政策给低收入居民带来了不利影响。政府从教育、医疗、住房等领域的退出意味着最低收入家庭难以满足最基本的需求。低收入居民，主要是城镇下岗工人、进城务工的农民，他们无力支付教育、医疗和住房等支出。老百姓的基本需求得不到满足，导致了很多社会不稳定因素。从 90 年代末开始，单纯的经济增长范式已经受到严重的挑战和公众的反对。所有这些预示着政策范式新的转变已势在必行。

表一 范式阶段一：单纯经济增长（GDP 主义）（1978- 2003）

政策范式		单纯经济增长（GDP 主义）		
问题界定		短缺经济损害了党和国家的合法性。		
政策目标	以商品（Goods）为中心	* 改变经济落后的局面 * 加快经济增长	* 提高经济效率 * 增加 GDP 总量	
政策取向	市场导向政策	* 减缩公营部门 * 解除市场管制 * 政企分开	* 发展私人经济 * 贸易和外来投资自由化	
政策工具	市场驱动型的工具	* 分权 * 放松管制 * 市场化	* 私有化 * 自由化 * 宏观经济控制	
政策制定风格	国家机关主导	* 政府仍然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导者 * 专家的高度参与，尤其经济专家参与政策制定	* 经济精英在政策制定中的角色地位上升	
政策语言	黄色语言	* 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 致富光荣	* GDP 和人均 GDP

三、GDP 主义、社会不公以及异常事件的累积

长期以来，官员们用 GDP 作为是否有公共福祉的指标。GDP 的明显局限是不能衡量非经济维度的国民福利，而后者却是整体发展的重要部分。此外，GDP 尺度忽视收入分配问题，少数高收入群体所取得的经济利益可能被看作是所有人的经济利益，而且，它也不能区分出高经济增长所制造的受益群体和受损群体。

在单纯经济增长（GDP 主义）的政策范式内，就 GDP 数量而言，中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从 1978 年到 2004 年，中国 GDP 从 1473 亿美元增至 16494 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到 9.4%；外贸从 206 亿美元增

至 11548 亿美元，年均增长超过 16%；中国外汇储备从 1.67 亿美元增加到 6099 亿美元；农村贫困人口数目从两亿五千万减少到两千六百万。^⑤然而，单纯经济增长政策加剧了收入不公、社会腐败、环境恶化和生态危机等社会问题。不仅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趋于紧张，而且自然环境不断恶化，空气、水污染严重，土地荒漠化，森林被破坏，以及生物多样性减少。

中国的社会不公首先反映在收入分配差距上。自经济改革以来，反映收入差距的一个常用指标基尼系数急剧上升，城乡之间、沿海和内陆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据一些学者估算，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基尼系数是 0.3。^⑥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研究小组进行的第一份家庭调查所得的数据，全国基尼系数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为 0.382。该小组 2002 年进行的另外一项调查显示，全国基尼系数接近 0.46，中国基尼系数从上世纪 80 年代初的 0.3 增加到 21 世纪初的 0.46。这意味着中国国民收入差距在过去二十年间扩大一半多。^⑦

成功的经济改革也产生了巨大的贫富差距。根据全国的抽样调查，1988 年，最高收入群体的收入份额是最低收入群体的 7.3 倍。在 2002 年的不同收入群体的收入份额中，占总人口 1% 的最高收入群体掌控着全部收入的 6.1%。占总人口 5% 的最高收入群体掌握了总收入的 20%。10% 的最高收入群体掌握着近 32% 的收入。十分之一的高收入群体平均收入是相同比例的低收入群体的 11 倍。收入差距的扩大，明显地表现在 80 年代末期的农村收入、90 年代初期的城市收入以及 90 年代末期的城乡收入中。^⑧

随着收入差距的增大，中国产生了大约 4000 万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村贫困人口和 1000 万城市贫民。其中，下岗工人、失业人员、退休人员、效益不佳的国企工人、贫困农民、外来工人和失地农民是受影响最严重的群体。虽然 90 年代中期各地方政府都设立了贫困线，但许多生活在贫困线下的人并没有享受到政府补贴。此外，城乡二元化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中国现在的城乡差距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人均收入是农村居民的四倍，而全世界这个比例的平均数是 1.5。1997 年以来农民收入处在下降之中。^⑨城乡收入差距导致大量农民转移到城市。有超过一亿农民离开了农村到城市寻找工作。这是和平年代最大的国内人口流动。沿海与内地，尤其与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之间也存在很大差异，一些学者称中国存在“四个世界”。第一世界是指最繁荣的城市地区，第二世界指相对发达的沿海省份，第三世界是贫穷的内地省份，第四世界则是最贫困的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居多的农村地区。^⑩1999 年，上海的平均收入（15516 美元）是贵州省（1247 美元）的 12 倍。

不平衡发展的结果是中国社会关系日趋紧张。2002 年 8 月，三位著名学者对中国社会危机发出了严重警告。作者引用了大量统计资料和数据，认为中国民间的不满越来越多，社会处于重大危机的前夕。如果处理不当，社会将会失控，政府将会失去支持。根据这篇文章的分析，中国社会危机的主要诱因包括失业、政治腐败、农民的沉重税负、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治安的恶化等等。^⑪

从 90 年代中期开始，为了维持社会和政治稳定，中国政府作了一些政策调整。为了安抚农民的不满情绪，中央政府多次对地方和基层政府过重的税负做出批评。村级选举进行了改革，给予了农民更大的权力。政府也推出了一些保护性政策，如设定了农产品最低收购价和回购不能在市场上以最低价售出的粮食。此外，还在农村推行了旨在减轻农民负担的费改税政策。国家财政对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投入了更多的资金，低保制度成为下岗工人和城市贫困人口生活的重要保障。

新世纪前夕，政策出现了更大的变化。为了缩小地区差距，2000 年实施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一年之后，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以此应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挑战。然而，单纯经济增长的政策范式所带来的日益恶化的发展情况直到非典疫情的爆发才完全被政策制定者所意识到。

四、非典危机、领导层换届和新政策范式的出现

2003 年初，中国遭受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公共危机——非典（SARS）疫症。虽然疫情扩散很快，但是，疫情真相没有得到及时公开报道。当时正值“两会”在北京召开，有关部门担心公开非典疫情会引发社会恐慌和动荡，对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政府官员对非典危机的最初反应反映了旧的单纯经济增长范

式的约束。为了获得经济发展所需的社会环境，决策者最先考虑的是社会稳定。因而，任何对社会稳定具有潜在危害的事件都被压制下来。然而，在全球化时代，非典疫情的迅速失控演变为国际性危机。政府隐瞒真相的努力遭到了越来越多的国际压力和国内的反对。4月初，美国媒体公开呼吁隔离中国。许多国家宣布禁止中国人入境。突然之间，中国政府处于前所未有的国际压力之下。显然，非典在中国的大范围爆发是一项严重的政策失误，这个失误严重冲击了当时的政策范式。在这种意义上，非典爆发是引发政策范式转移的“触发性事件”。^[10]

在这种情形下，党中央新领导层决心推动政策变革。4月17日，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了一次关于非典的会议。此后，政府政策出现了180度的大转弯。政策转变的标志出现在4月20日，当时，中央宣布罢免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长孟学农的职务。接着，中央政府又采取了另外一些有效的举措：成立了由副总理吴仪任组长的全国抗非典领导小组，取消传统的五一长假期，关闭所有娱乐场。一场抗击非典的全国性人民战争开始了。中央领导到全国各地巡视，检查地方政府对非典的应对。成百上千人被隔离，出现大规模疫情暴发的医院被关闭。同时，还起草和发布了措施严厉的《突发性公共卫生事故应急管理条例》，规定任何人故意传播非典病毒将判以死刑。抗击非典不力的领导被免职。更重要的是，政府一改过去隐瞒真相的做法，允许和鼓励对非典疫情进行全面报道。党组织和新闻媒体动员全社会应对非典危机。此外，还建立起了更加畅顺的信息通报机制。在中央加强信息收集机制的同时，也要求地方政府及时准确地通报非典病例。政府不仅积极动员国内力量和资源抗击非典，而且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中国政府承诺与世界卫生组织进行积极的合作，后者在处理非典危机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所有这些变化显示，中国党政领导正在调整其政策风格，中国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正在出现一些新的变化：大众传媒的地位上升，并推动了信息透明度的提高；不称职官员被罢免，显示出公共问责制度的形成；社会弱势群体得到了更多的关注，显示出向社会公正的转向。同时，政府的公共关系管理能力也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中国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中出现的变化，似乎不只是对非典危机的本能反应。事实上，非典危机促使中国决策者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在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保持平衡。通过吸取非典危机和环境恶化的经验教训，新领导层致力于构思中国发展的新思路。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新的概念。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中共中央第一次提出了以人为本的发展政策。这是中国发展政策的一个突破。自此，许多新的政治术语流行开来，如“以人为本”、“和谐社会”、“执政能力”、“环境友好型社会”和“节约型社会”等。不仅政策环境变了，而且目标体系和引导政策的工具设置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济社会平衡发展，成为政策制定者的首要关注。这些新的政策调整标志着中国政府开始积极面对新的社会和经济环境，显示出新的政策范式正在中国出现。

透彻分析SARS危机后中央政府所发布的重要政策文件，可以发现发展政策领域中正在成型的政策范式之主要构成成分。我们将新的政策范式称为“以人为本的发展”（见表二）。在新的范式下，政策问题从社会公平的视角得到了重新定义。虽然经济增长仍然被视为是重要的政策目标，但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也给予了同等优先权，至少我们可以从官方陈述中看出这个变化。“人”取代“物质”成为政策选择的基础。在政策取向方面，人民的福祉，尤其是社会弱势群体的生活，引起了政策制定者的高度重视。在政策工具选择方面，政府更加重视公民社会和工商界的角色。政策制定过程开始强调自下而上的视角和公共参与。甚至中国的最高政策制定机构——中共中央政治局也定期进行学习，从学术界吸取更多的政策相关知识，从而提升公共政策的质量。这一新的政策范式虽然仍处于构建的初期，但已经成为中国领导人采取政策行动的指导框架。

我们可以以十一五规划的制定为例来加以说明。2005年10月，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与以往关注经济增长的五年计划不同，《建议》把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摆在了最优先地位，要求把更多的社会和人文指数纳入新的规划当中。虽然经济建设仍然是重要的课题，但是社会公

正和人民福祉受到了同样关注。新的规划倡导建设和谐社会、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实际上，中国高层政策制定者已经将 2006 年定为“转轨年”，表明中国公共政策的方向将从根深蒂固的 GDP 主义范式转向以人为本的发展范式。也就是说，2006 年是转向“以人为本”的发展政策范式的第一年。

表二 范式阶段二：以人为本的发展（2003--）（形成中）

政策范式	以人为本的发展		
问题界定	社会不公导致社会冲突		
政策目标	以人为本	* 保持经济增长、环境保护和社会公平之间的平衡 * 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维护社会公平	* 建构和谐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政策取向	国家、市场和公民社会的混合	* 加强政府、市场和社会的伙伴关系	* 提供更多的利益给社会弱势群体
政策工具	混合型工具	* 规制型的政府 * 建立共识	* 公民参与 * 回应性治理
政策制定风格	国家—社会的伙伴关系	* 政策过程更多的公众参与结合 * 透明与问责	* 政策制定过程中科学和民主的 * 学习型政治局
政策语言	绿色语言	* 共同富裕 * 环境友好型社会 * 社会公正和平等 * 合作、友爱与和谐	* 节能型社会 * 可持续发展 * 社会、经济与人的全面发展

在回顾了范式转移的过程后，我们可以发现，不同社会群体间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城乡差别、地区差异、城市贫困人口和生态退化构成了对单纯经济增长政策范式的挑战。换言之，这些就是库恩所说的“异常事件”。非典的爆发是一个“触发性事件”，加剧了所有这些问题的严重性。正如霍尔指出的，政策范式可能会受到“异常事件”，即不能被旧范式所理解的发展的威胁。处理这些“异常事件”的努力也可能会要进行调整现有政策路线的试验。但是，如果现有范式真的不能解决这些问题，这些试验将会导致政策失败，从而进一步逐步削弱现有范式及其倡导者的权威。^[2]

五、结语

本文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政策的两个范式阶段，重点介绍了 2003 年非典危机爆发后政策范式的转移。根据政策问题界定、政策目标、政策取向、政策工具、政策制定风格和政策语言等几个方面，本文辨认了中国发展政策的两个范式阶段。在单纯经济增长的范式阶段，政策问题界定突出人民生活水平的落后，政策目标则是要发展经济，满足人民的温饱，从而提升政府的政治合法性。为了达到这一政策目标，采取了市场导向的政策取向和市场驱动型政策工具。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有产阶层的兴起，经济精英开始参与政策制定过程，市场话语（也称为黄色话语，因为作为金钱象征的黄金是黄色的）进入了政策内容之中。第二阶段是以人为本的政策范式阶段。在这一阶段，政策问题的界定围绕着因经济发展不平衡而引起的日益严重的社会不公平现象，政策目标则是减少社会冲突，构建和谐社会。为此，选择了以人为本的政策取向和混合型政策工具。政策制定过程鼓励国家和社会的合作，开始强调公众参与。为了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平衡发展，政策语言中包括了越来越多的环保因素，绿色语言越来越盛行。

总而言之，本文是将政策范式应用到中国政治环境的初步尝试。因为中国政策范式转移的过程远不够清晰，与彼特·霍尔的理论相比，本文所描述的范式转移似乎不是特别清晰。而且，这个新政策范式尚处于初始阶段。在很大程度上，新的政策范式是由中共第四代领导集体所发起的政策倡议。由于中国政治制

度中复杂的中央—地方政府的不断坐大，要让地方政府从根深蒂固的GDP主义政策范式转移到以人为本的政策范式，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正如霍尔所指出的那样，现行的制度，如果要想引导出变化的力量，则需要有足以削弱根深蒂固的现有政策范式的外在推动力。尽管如此，可以肯定的说，中国现在的政策制定者正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参考文献]

- [1] Thomas•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2nd ed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0.
- [2] Hall, P. A. Policy paradigms, social learning and the state: the case of economic policy-making in Britain [J]. Comparative Politics, 25, 3 (1993): 275- 296.
- [3] Howlett, M and M. Ramesh. Studying Public Policy: Policy Cycles and Policy Subsystems [M]. Canad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 [4] Oliver, Michael J. and Hugh Pemberton. Learning and Change in 20th Century British Economic Policy [Z]. Paper read at The British Study Group, at Centre for Europe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2003- 12- 03.
- [5] 胡锦涛. 在北京财富论坛开幕式上的讲话 [Z]. 2005 年 5 月 16 日.
- [6] 杨宜勇, 辛小柏. 中国收入分配的现行模式及发展趋势 [A]. 汝信, 陆学艺, 单天伦主编. 2002: 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 [7] The National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s for China [Z]. http://www.undp.org.cn/downloads/nhdr2005/NHDR2005_complete.pdf.
- [8] 胡鞍钢, 邹平, 李春朴. 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地区不平衡: 1978- 2000 [A]. 汝信, 陆学艺、单天伦主编. 2002: 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 [9] 王绍光, 胡鞍钢, 丁元竹. 经济繁荣背后的社会危机 [J]. 战略与管理, 2002, (3).
- [10] 郭巍青, 朱亚鹏, 李莉. 在灾难中学习: 非典危机应对 [A]. 白钢, 史卫民, 陶黎宝华, 岳经纶主编. 中国公共政策分析年报 2004 年卷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责任编辑: 柏桐

•经济学 管理学•

中国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 PVAR 分析

——以中国 31 个省级单位的公路建设为实证研究案例

◎ 郭小东 武少芩

[摘要] 为有效揭示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方式,本文采用基于面板数据的向量自回归方法,建立三阶滞后 PVAR 模型,对中国 31 个省级单位 1994- 2004 年的公路投资建设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公路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互动关系,其相互间作用机制是复杂的、多重的和多样的,两者间的基本关系是“非对称互动关系”。本文依据实证结论对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非对称互动关系”进行了探讨,对政府如何更好地进行公共投资决策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 公共投资 公路建设 经济增长 PVAR 模型

(中图分类号) F06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7) 03-0040-09

一、相关文献及问题的提出

在西方经济学界,通过一系列实证研究,不少研究结果认为公共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确实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例如 David Alan Aschauer 于 1989 年利用美国 1949- 1985 年的数据,估计出美国公共投资的产出弹性为 0.39,^①从而认为公共投资对拉动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意义。在 2000 年 David Alan Aschauer 又建立了一个扩展了的新古典主义增长模型去验证政府介入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结论显示公共投资每增长 10%,单位资本的产出在未来两年内增长 2.9%。^② Cazzavillan 也于 1993 年利用欧洲 12 个国家 1957- 1987 年的数据,估计出公共投资的平均产出弹性为 0.25,从而认为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影响作用。^③此外,Sébastien Dessus 和 Rémy Herrera 在 2000 年以 28 个发展中国家 1981- 1991 年的面板数据做为样本,建立联立方程,使用固定效应方法估计了公共投资对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公共投资对长期经济增长具有正的效应,但当公共投资过度时,公共投资会抑制经济的增长。^④ Shioji 和 Etsuro 也于 2001 年对美国和日本的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在这两个国家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地区人均产出的增长具有积极作用。^⑤此外,近期也有少数文献关注公共投资效率的提高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重要性,这些文献的结论显示公共投资被利用效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有正的影响。

另一方面,也有不少实证分析显示,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负的影响,或至少其作用是不明朗的。如 Evans 和 Karras.G 在 1994 年利用美国 48 个州 1970- 1986 年的数据,检验了美国公共投资对私人部门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公共投资中的教育投资对增长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但是其他项目的公共投资对增长并无明显的效应,甚至有的公共投资(例如公路、供水以及污水处理系统等)对增长会出现负向的拉动作用。^⑥ Garcia- Mila, Teresa, Therese McGuire 和 Robert Porter 也于 1996 年利用美国 48 个州 1970- 1983 年的数据建立经验模型,检验了高速公路、水的供给和污水处里、其他公共投资三类公共投资对经济的影响,结果显示,这三类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并不显著。^⑦除了将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为研究热点外,也有一些学者关注经济增长对于公共投资的影响,并对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了研究。如 Clarida 于 1993 年对美、法、德、英等国的分析表明,全要素生产率与公共投资是协整的,但因果关系

作者简介 郭小东,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少芩,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博士生(广东 广州, 510275)。

的方向不确定。Christodoulakis 也于 1993 年通过对希腊 1964-1990 年的数据估计，结果表明公共投资对产出具有格兰杰因果关系，产出对公共投资则不具有格兰杰因果关系。

受国外学者对于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热烈争辩的影响，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也致力研究我国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如娄洪 2004 年通过建立理论模型来分析公共基础设施资本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用以揭示公共投资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论表明，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存在二元结构和人均资本低的国家，继续保持基础设施资本存量的高增长率，是保持我国经济高增长率必不可少的条件。¹⁸ 张海星 2004 年运用内生增长理论构建计量经济模型，对中国的公共物质资本投资、公共人力资本投资及 R&D 投资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进行了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发现，三种公共投资具有不同程度的正向经济增长效应，并且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三种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及驱动机制又有所不同。¹⁹

从上述对国内外的文献的回顾来看，绝大多数的研究集中在分析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最终影响方面，也有一部分文献对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了检验，这些研究固然都有益于我们加深对公共投资作用的认识。但是，本文认为，要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认识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仍有不少需要继续展开研究的问题。其中一个较突出的问题就是公共投资的作用机制问题。因为，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是颇为复杂的。这两者之间，应该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而且这种双向互动关系中，既有着一方直接影响另一方的关系，还有着一方通过其他因素的作用再对另一方发生影响的关系。若忽视这种双向性，只从某一方面的作用看问题，一些重要的机制作用很可能被忽略。

因此本文试图通过选择某一种公共投资作为分析样本，借助于更具解释能力的计量模型来分析该项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检验两者之间作用的机制，揭示两者之间作用的关系，以求对公共投资的作用有一个更为切实的认识。

二、分析样本的选取与变量的描述

为实现这一研究目的，本文拟采用 PVAR 分析方法，以我国的公路投资建设为样本，对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分析。

(一) 分析样本的选择

本文选择公路投资建设作为分析案例，主要基于以下考虑：其一，公路建设是公共投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我国而言，改革开放以来，公路建设一直是公共投资的重要方向。我国不断加大了包括公路建设在内的各种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公路投资额更是快速攀升，从 1997 年至 2002 年的 5 年间，我国公路投资额共达 1.4 万多亿元，此后年份，我国公路建设投资额，2003 年为 33218822 万元，2004 年为 41757536 万元，2005 年为 42962695 万元。²⁰ 公路建设在整个公共投资中所具有的突出地位，就使其作为分析对象具有较为显著的意义。其二，对公路这种准公共品供给的分析，有利于加深对政府投资方式的认识。公路建设既是一种投资，也是一种准公共产品的提供。而任何一种公共产品的提供或任何一笔公共投资，实际上都是面对不同目标进行选择的结果，也是政府投资行为特征的体现。其三，以公路作为分析案例，便于面板数据分析的进行。面板数据分析需要相关数据较易于“切块”。就我国而言，相对于教育、铁路等公共投资，公路的数据较易于切块划分。

(二) 变量的描述

为了有效考察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本文选取了四个变量进入模型，表 1 给出了各变量的定义。我们以我国各省人均 GDP 年增长率代表经济增长情况。以公路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为例代表公共投资水平，本文选取各省级单位按土地面积计算的公路密度的年增长率作为公路基础建设水平的度量指标。公路密度（单位：公里/百平方公里）是指一定土地面积平均拥有的公路里程数，它反映某一地区公路网的密度情况。受公路建设影响最直接的行业可以说是交通运输业，运输业的扩张直接带动地区内以及地区间贸易往来，对地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本文选取货运量来衡量公路运输业发展水平，货运量

指在一定时期内，各种运输工具实际运送的货物数量，该指标是反映运输业为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服务的数量指标。^{[1][2][3]}表 2 列出了 1994-2004 年 11 年间全国公路货运量占总货运量的比值。从表 2 中可以看出，历年来公路货运量占总货运量的比重在 3/4 左右，足以证明公路货运对整个货运体系的重要性。因此，本文采用各地区公路货运量年增长率作为衡量公路货运业发展水平的指标。受公路运输业扩张的影响，公路运输业职工就业人数必然大量增加，为了全面分析公路建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本文将公路运输业就业情况作为变量代入模型，本文采用公路运输业职工人数与第三产业就业人数的比率作为变量，来考察就业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公共投资本身具有向前向后的关联效应，决定了不只是公路建设本身会对经济增长有影响，必然是公路建设整个体系作用于经济增长，因此本文选取公路货运量指标和反映公路货运就业情况的指标作为变量带入模型，有利于从整体上分析公路建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而有利于我们全面了解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表 1 各变量定义

变 量	定 义	单 位
hwdl	按土地面积计算的公路密度增长率	百分比 (%)
vcargo	公路货运量增长率	百分比 (%)
htt	就业率=道路运输业职工人数/三产就业人员人数	千分比 (‰)
grgdgdp	人均真实 GDP 增长率	百分比 (%)

表 2 1994-2004 年公路货运量与总货运量的比值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0.7581	0.7615	0.7578	0.764	0.7701	0.766	0.7646	0.7535	0.7525	0.7429	0.7296

本文所采取的四个变量 {hwdl, vcargo, htt, grgdgdp} 的取值，来自中国各省级政区 1994-2004 年的数据，是非均衡的面板数据 (unbalanced panel-data)。其中重庆 1996 年成为直辖市，所以 1994-1996 年的数据视为缺省。本文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历年《统计年鉴》以及历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其中，hwdl 是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各地区年末公路里程数以及《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的各地区土地面积计算而成；vcargo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各地区公路货运量计算而成；htt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各地区道路运输业职工人数与各地区第三产业就业人数相比而成；grgdgdp 根据当年价格的数据折算成以 1990 年为基年的可比价格计算得出的。

三、计量方法的选择

在研究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时，最常见的做法是建立经验模型，采集时间序列数据，然后对变量做回归估计。由于时间序列数据通常都带有明显的时间趋势，具有非平稳性，利用这类数据对变量作回归时，可能存在“伪回归”问题。为了避免“伪回归”现象，需要先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如果变量之间不具备平稳性质，则不能以传统的回归分析方法进行分析和检验，而只能采用协整方法检验他们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协整检验的结果可以给出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但并不能给出这些均衡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为解决这一问题，还需做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因此，该方法所受制约较多。

作为对传统回归方法的突破，Sims 在 1980 年提出了基于数据统计性质而非经济理论的向量自回归 (vector autoregression, 简称 VAR) 估计方法。他认为，经济活动会随时间的变动而呈现在变量数据上，通过对数据本身的特性加以剖析，便可了解经济活动的特征。VAR 模型是一种时间序列分析法的动态模式，不需有先验 (a prior) 的理论基础，也不需考虑变量内、外生及因果关系的问题，而是将各变量直接视为内生变量，以该变量及其他变量滞后项为解释变量，由一组回归方程来表示变量间的互动关系。Sims 所提出的 VAR 模型，除了可以分析滞后项变量对其他变量是否具有显著的影响外，还可以通过脉冲一响

应 (impulse-response) 分析更进一步了解变量间的动态互动 (dynamic interactions) 关系。VAR 取代传统的联立方程模型在应用经济学领域取得了明显成效，被广泛地应用于分析具有众多观测值的宏观时间序列上。然而，现实中的某些数据的观测值很难满足时间序列所要求的数据长度，例如面板数据 (panel data) 一般拥有相对较少的观测值。此外，个体的多样性也是分解数据 (disaggregate data) 的一个重要特征。因此，将 VAR 直接应用在面板数据的估计上是不恰当的。

为了克服 VAR 方法的限制，Holtz-Eakin 在 1988 年首次提出了基于面板数据的向量自回归^[12] (Panel Data Vector Autoregression, 简称 PVAR) 的估计方法，随后这一方法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PVAR 继承了 VAR 的许多优点，不同的在 PVAR 中，只要 $T \geq m+3$ (T 为时间序列的长度， m 为滞后项的长度) 便可以对方程的参数进行估计。而且当 $T \geq 2m+2$ 时，便可在稳态下估计滞后项的参数。PVAR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相当灵活的分析框架。首先，沿袭 VAR 的优点，不再需要区分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而是把所有变量均视作内生，可以真实反映出各变量之间的互动关系；正交化脉冲—响应函数能够分离出一个内生变量的冲击给其他内生变量所带来的影响，因此可以用来分析一个变量对其他变量的影响程度。其次，个体效应允许了不可观察的个体差异，时间效应则捕捉到个体在横截面上可能受到的共同冲击。

本文采用的就是基于面板数据的向量自回归方法。在分析过程中，本文曾尝试了多个滞后阶数，最终根据脉冲—响应函数的收敛情况，选用了滞后三阶的 VAR。

所采用的三阶滞后 PVAR 模型形式如下： $y_{it} = \alpha_i + \beta_t + My_{it-1} + Ny_{it-2} + Py_{it-3} + \varepsilon_{it}$

其中 $y_{it} = [hwdl_{it}^1, vcargo_{it}^2, htt_{it}^3, grgdp_{it}^4]$ ， i 代表省份， t 代表年份， M, N, P 均是 4×4 的系数矩阵， α_i 是 4×1 的个体效应向量， β_t 是 4×1 的时间效应向量。第 1 ($=1, 2, 3, 4$) 个方程的扰动项 ε_{it}^1 满足 $E(\varepsilon_{it}^1 | a_{it}^1, \beta_{it}^1, y_{it-1}, y_{it-2}, y_{it-3}, \dots)$ 。本文的模型仅仅施加了所有地方政府都具有相同斜率系数的约束，而对 y_{it} 的无条件均值和方差没有加任何限制。

本文的估计步骤分为两步。

1. 在面板数据上估计 VAR。由于模型包含时间效应和个体效应，本文首先运用横截面上的均值差分去掉时间效应 β_t 。由于本文的模型是动态模型，本文采用向前均值差分来消除个体效应 α_i ，从而避免由于个体效应和回归元相关而造成的系数估计有偏。时间效应和个体效应都消除后，接下来本文采用 GMM 方法得到模型系数的有效估计。为了避免有限样本偏差，本文只选取了 $t-1$ 期的变量即 y_{it-1} 作为工具变量。

2. 估计脉冲—响应函数 (Impulse-responses)。脉冲—响应函数所描述的是系统中某一变量的一个正交化创新 (也称 shock) 对其他变量的影响。由于本文的目的是考察以公路为例的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公路投资指标 $hwdl$ 与经济增长指标 $grgdp$ 是我们设定的主要观察变量，而货运量指标 $vcargo$ 与就业指标 htt 则是我们为了更好地认识这两个主要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和作用机制，根据经济运行中存在的关联关系而设定插入的参与变量 (当然，如果不受篇幅限制，按照该分析方法，我们还可以加入更多的相关指标进入这个变量序列，使分析体系更显完备)。这些变量的排序遵循 Choleski 分解 (Choleski Decomposition) 的排列顺序排列，其形式为 { $hwdl$, $vcargo$, htt , $grgdp$ }。此排列顺序意味着后面变量同期和滞后期都受到前面变量的影响，而前面变量只会受到后面变量滞后期的影响。文中 Monte-Carlo 模拟给出的脉冲—响应函数是在 90% 的置信区间。

四、计量检验与结果分析

(一) PVAR 分析所显示的分析结果。本文利用统计分析软件 stata8.0 对四个变量的面板数据做了分析，表 3 给出了 PVAR 估计的结果，括号中为经过 white 异方差调整的 t 统计量。其中 $(t-1)$ 、 $(t-2)$ 、 $(t-3)$ 分别代表滞后一、二、三期。

从表 3 内容可见，对于本文所要观察的两个主要变量间的直接关系，统计分析所显示的结果是一种较模糊的不对称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就公路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关系而言，按表中第二列给出的结果，随着 $hwdl$ 的变动， $grgd$ p 在滞后三期中的变动趋势均不显著，且其变动方向在滞后一期为负，滞后两期为正，滞后三期却又为负，表明从公路投资的角度看， $hwdl$ 与 $grgd$ p 之间的直接关系并不稳定，但 $hwdl$ 对 $grgd$ p 毕竟还有一些“有所作为”的表现。反过来，就经济增长与公路投资的关系而言，从第五列数字可以看到，随着 $grgd$ p 的变动， $hwdl$ 在滞后一、二期都是向负的方向变动，且其变动在 5% 的水平上显著，其变动趋势滞后三期时在 10%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从经济增长角度看，公路建设与经济增长之间是一种明确的负相关关系。因此，这两个主要变量之间直接的双向关系，体现为一种非对称的关系。

表 3 PVAR 估计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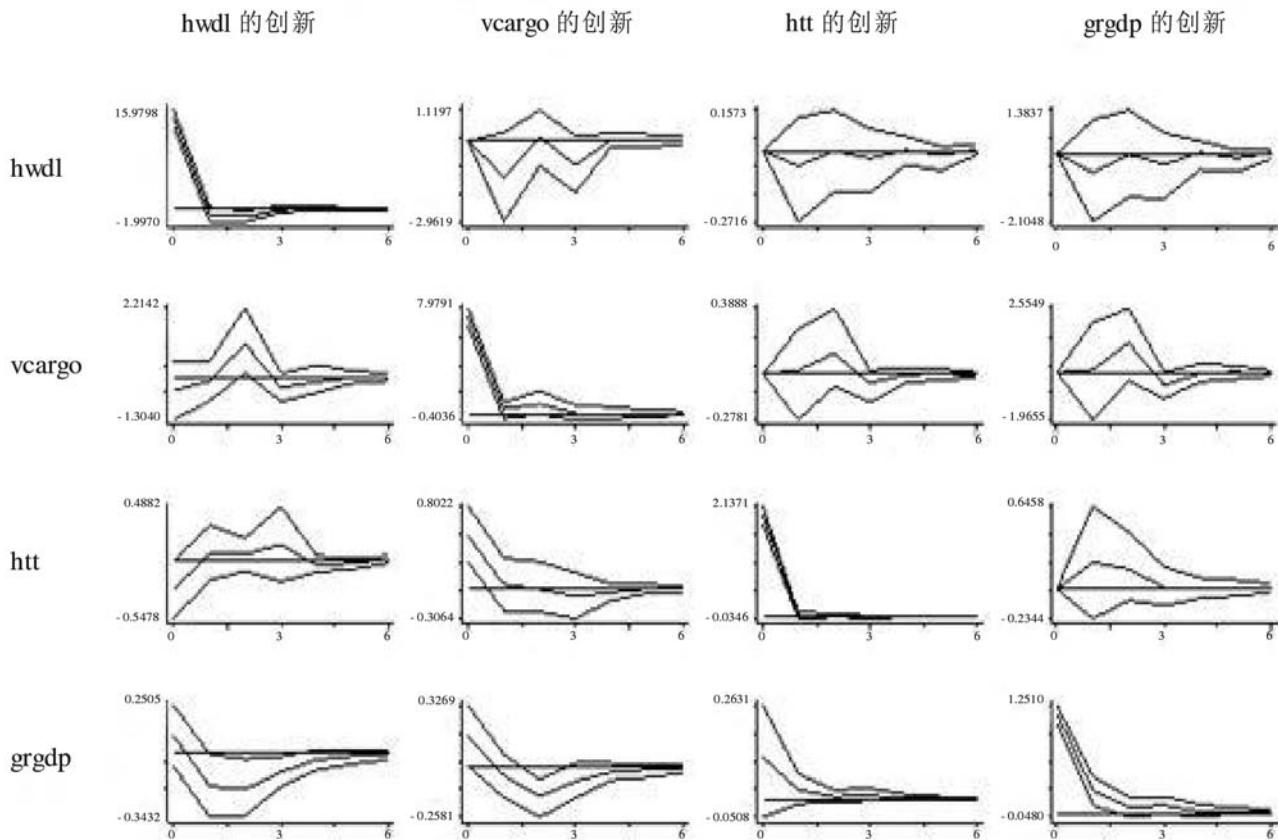
	$hwdl(t)$	$vcargo(t)$	$htt(t)$	$grgd$ p (t)
$hwdl(t-1)$	-.05231685 (-.10932101)	-.00393697 (-.14595864)	.00250973 (.25632442)	-.01369176** (-.19962982)
	-.1693253 (-.13070469)	.05058404 (1.0252724)	.00011325 (.00565481)	-.01020907 (-.12386212)
$vcargo(t-1)$	-.0000593 (-.04305213)	.00713055*** (6.5727359)	-.00125042*** (-.3.5086728)	.00017147 (1.1607733)
	-.48760087 (-.58618209)	.08116656 (.07457754)	.18073683 (.79111465)	.22617099** (2.51495)
$htt(t-1)$	-.08834641** (-.2.1884992)	.07371739* (1.9041969)	.00470988 (.77770715)	-.01177145** (-.1.966804)
	.01224826 (.17170956)	.08762077 (1.1260006)	-.00287394 (-.14010435)	-.0212181*** (-.2.7897285)
$grgd$ p ($t-1$)	.00126254 (.97073054)	.00344167*** (5.3181552)	.00223526*** (8.1843199)	-.00007807 (-.67803251)
	.09020999 (.15171742)	.97991511* (1.685547)	.09684335 (.67703475)	.00435518 (.0748768)
$hwdl(t-2)$	-.00659744 (-.2841449)	-.00041419 (-.02043216)	.01315064 (.85681943)	-.00563108* (-.1.9084696)
	-.12585562 (-.1.2251018)	.04004634 (.87214149)	-.00550536 (-.3191395)	-.00572705 (-.86263629)
$vcargo(t-2)$.00167311* (1.7290464)	-.00301016*** (-.3.5295197)	-.00187005*** (-.7.7981634)	.00025288*** (2.7404703)
	-.14317448 (-.30222924)	-.71769294* (-.1.7913358)	-.0232092 (-.27994598)	.06710098 (1.4936025)
$htt(t-2)$	-.00659744 (-.2841449)	-.00041419 (-.02043216)	.01315064 (.85681943)	-.00563108* (-.1.9084696)
	-.12585562 (-.1.2251018)	.04004634 (.87214149)	-.00550536 (-.3191395)	-.00572705 (-.86263629)
$grgd$ p ($t-2$)	.00167311* (1.7290464)	-.00301016*** (-.3.5295197)	-.00187005*** (-.7.7981634)	.00025288*** (2.7404703)
	-.14317448 (-.30222924)	-.71769294* (-.1.7913358)	-.0232092 (-.27994598)	.06710098 (1.4936025)
$hwdl(t-3)$	-.00659744 (-.2841449)	-.00041419 (-.02043216)	.01315064 (.85681943)	-.00563108* (-.1.9084696)
	-.12585562 (-.1.2251018)	.04004634 (.87214149)	-.00550536 (-.3191395)	-.00572705 (-.86263629)
$vcargo(t-3)$.00167311* (1.7290464)	-.00301016*** (-.3.5295197)	-.00187005*** (-.7.7981634)	.00025288*** (2.7404703)
	-.14317448 (-.30222924)	-.71769294* (-.1.7913358)	-.0232092 (-.27994598)	.06710098 (1.4936025)
$htt(t-3)$	-.00659744 (-.2841449)	-.00041419 (-.02043216)	.01315064 (.85681943)	-.00563108* (-.1.9084696)
	-.12585562 (-.1.2251018)	.04004634 (.87214149)	-.00550536 (-.3191395)	-.00572705 (-.86263629)
$grgd$ p ($t-3$)	.00167311* (1.7290464)	-.00301016*** (-.3.5295197)	-.00187005*** (-.7.7981634)	.00025288*** (2.7404703)
	-.14317448 (-.30222924)	-.71769294* (-.1.7913358)	-.0232092 (-.27994598)	.06710098 (1.4936025)

注：括号内为异方差调整的 t 检验值，* 表示 10% 的水平显著，** 表示 5% 的水平显著，*** 表示 1% 的水平显著。

因此，通过把其他参与变量纳入分析系统，我们可以看到，公路建设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一种“非对称的互动关系”。通过其他参与变量的作用，公路建设对经济增长具有较为确定的推动关系链条，而经济增长对公路建设的作用链条则未能切实达至终端。对这种“非对称的互动关系”，我们可以在以下进行的脉冲一响应函数分析中得到进一步的说明。

(二) 脉冲一响应函数所显示的分析结果。通过对四个变量的面板数据的分析，图1给出了各变量之间的正文化脉冲一响应函数。

图1 正文化脉冲一响应函数



该脉冲一响应函数有效地体现出公路投资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虽仍显复杂，但两者间互相作用的途径变得更为明显，其“非对称的互动关系”也变得更为清晰可辨。

先看公路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直接关系。如果仅从直接关系看，两者间的互动关系仍是一种关联性不强的非对称关系。就公路建设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而言，从图1第一列最后一图可看出，面对公路变量 hwdl 的一个正文化创新，grgdcp 在同期增加到了 0.0879，但在滞后期中却均呈现负的影响，不过这种负的影响毕竟在逐渐减小，在收敛过程中不断“向好”。反过来，就经济增长对公路建设的直接影响而言，第四列第一个图显示，面对 grgdcp 的一个正文化创新，公路变量 hwdl 在同期没有变化，在滞后一、二期中分别为 -0.5649、-0.0096、-0.3224，而在滞后第四期中增加到 0.0422，在滞后第五期中为 -0.1361，在滞后第六期又增加到 0.0518。以上内容表明，公路建设与经济增长之间直接互动关系并不明显，从一些若隐若现的互动关系中，体现的也是一种缺乏关联性的非对称关系。两个主要变量之间这种直接关系，与

前面 PVAR 分析结果基本是一致的。

进一步，当我们像 PVAR 分析一样加进其他参与变量，从展开的角度加以观察时，则情况发生明显变化。公路投资与经济增长间通过其他变量而形成的“非对称互动关系”变得清晰起来，这种“非对称互动关系”的作用途径也进一步凸现出来。对此，我们同样从两个方面加以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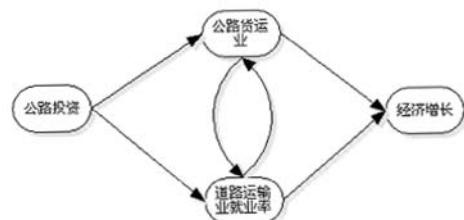
一方面，公路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清晰完整的作用路径。从脉冲一响应函数我们可以分析出多条公路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途径，我们以较为典型的途径为例加以说明。从图 1 的第一列可看出，随着公路建设 hwdl 的一个正文化创新，货运量 vcargo 一直处于波动中，按分析所得数据，当期减少到 -0.3541，滞后一期减少到 -0.0706，但在滞后二期已经增加到 1.1225，其滞后六期的累计效应为 0.4372。这表明，从总体效应上，公路建设的增长切实拉动了公路货运量的增长。进而，从第二列可以看出，对于 vcargo 的一个正文化创新，htt 呈现长期的正响应。htt 当期增加到 0.5073，在滞后一期为 0.0290，随后逐渐恢复到平衡状态，表明货运量的增长显著地拉动了运输业就业率的上升。再进一步，按照第三列情况，面对 htt 的一个正文化创新，grgd़呈现长期的正响应，同期增加到 0.1156，滞后一期为 0.0265，滞后二期为 0.0069，随后逐渐恢复到平衡状态，表明道路运输业就业率的上升确实显著地拉动了经济增长。通过类似的分析，我们可以找出公路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其他多条作用途径。例如，对于 hwdl 的一个正文化创新，htt 同期减少为 -0.2810，在滞后一期开始变为正向，增加到 0.0531，滞后二期为 0.044，滞后三期为 0.1353，表明除当期之外，在各滞后期，公路建设对道路运输业就业率均有正向拉动作用。而从前面的分析知，就业率的上升可直接带动经济增长。另如，从第三列我们可以发现，随着 htt 的一个正文化创新，vcargo 在当期的响应为 0，在滞后一期为 0.0235，在滞后二期为 0.1238，随后其响应幅度逐渐下降，围绕平衡状态上下波动，直到再次恢复平衡，其滞后六期的累计效应为 0.0721，表明 htt 对 vcargo 在滞后期具有正向拉动作用。从前面的分析知，货运量的增长反过来拉动就业率，进而拉动经济增长。这一系列公路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途径，我们可以用图 2 加以归纳表示。

另一方面，反过来看，经济增长对公路投资的作用则有所不同，其拉动作用的链条总是在公路建设这一终端变量之前归于消失。脉冲一响应函数显示，由经济增长这一变量伸向公路投资的拉动链条，也是在多个路径上展开的。在此，我们同样选择较具代表意义的作用路径为例进行分析说明。

从图 1 第四列可看出，随着 grgd़的一个正文化创新，htt 在同期没有变化，在滞后期却长期呈现正响应，相关数字显示，在滞后一期增加到 0.2094，滞后二期为 0.1579，滞后三期为 0.0088，滞后四期为 0.0044，滞后五期为 0.0048，滞后六期为 0.0027，随后逐渐恢复到平衡状态。滞后六期的累计效应为 0.388，表明经济增长确实在拉动着道路运输业就业率的提高。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又已知，htt 对 vcargo 的影响在滞后六期的累计效应为 0.0721，表明 htt 对 vcargo 在滞后期也具有正向的拉动作用。但是，这种一环接一环的拉动关系推进到公路建设这一终端环节时，情况发生了变化。图 1 第二列显示，随着 vcargo 的一个正文化创新，公路密度增长率 hwdl 当期变化为 0，滞后一期为 -1.3254，滞后二期为 0.1278，滞后三期为 -0.9041，滞后四期为 0.0133，滞后五期为 0.0045，滞后六期为 0.0023，随后逐渐回复到均衡状态。其滞后六期的累计效应为 -1.9619。也就是说，当源自经济增长的作用链条伸延至货运量后，对货运量的变化，公路建设所作出的反应在总体上是个负值。

我们看另一个源自经济增长，通过参与变量而形成拉动作用在公路建设这一终端变量之前归于消淡的例子。从上例分析知，经济增长拉动道路运输业就业率 htt 的提高。据此，我们接着看下一环 htt 对 hwdl 的作用。面对 htt 的一个正文化创新，hwdl 在当期变化为 0，在滞后一期为 -0.0565，滞后二期为 -0.0010，滞后三期为 -0.0298，滞后四期为 0.0030，滞后五期为 -0.0147，滞后六期为 0.0058。可见，面对 htt 的变

图 2 公路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途径



化，公路建设的响应时正时负，以负为多，其反应是相当消极的。

根据以上经济增长对公路建设作用方式的例子，我们可将这种关系用图 3 加以归纳显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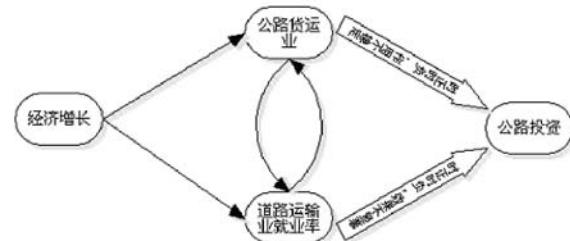
对比图 2 和图 3，可清楚地看出，公路建设和经济增长这两个变量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有着明显的差异。公路建设通过其他变量的作用，可以确切地拉动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通过其他变量对公路建设的拉动作用远远为弱，甚至为负。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两者间的一种非对称的互动关系。而且，源自经济增长的作用链条基本上止于公路建设之前的一个环节，而未能有效地到达终端，这应该是经济增长与公路投资非对称互动关系的关键特征所在。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运用基于面板数据的向量自回归方法，对中国 31 个省区 11 年的公路建设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研究，通过对 PVAR 估计的结果和脉冲一响应函数的分析，得到如下结论。(1) 公路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明确的双向互动关系。如果仅从两者的直接关系看，公路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似乎并不存在强有力的相关关系，但加入其他参与变量后，两者间的关联关系变得清晰确定起来，统计分析有效显示出两者间的作用是双向的、互动的，而且其作用机制是复杂的，并不是简单的 A 与 B 之间的因果关系，而是存在着多重的互动关系。(2) 公路建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是非对称的互动关系。统计分析显示，源自公路建设的作用链条可顺畅地达至终端，从而对经济增长形成有效的拉动作用；源自经济增长的作用链条则往往在达至终端之前归于消淡，从而未能对公路建设产生明显影响。(3) 公路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间接拉动作用值得注重。就一般经济理论而言，包括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在内的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直接、间接作用这两方面。一方面，基础设施建设中伴随着资本、劳动等要素的投放，本身会直接形成一定的产出，从而形成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另一方面，公路建设有通过各种途径对经济增长起着间接的推动作用。公路投资可通过扩张总需求、形成乘数效应、改善投资环境等促进国民经济的增长。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也提出如下建议。(1) 应进一步注重政府和市场这两大机制的协调、互动。从我国实践看，通过政府的积极作用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实施包括公路建设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先行一步的策略，在总体上是合理的，这已为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所证明。但在实施基础设施建设的决策过程中，应进一步注重来自市场的反馈，以进一步加强政府和市场这两大机制的协调、互动关系的建立。(2) 政府在运用公共投资作为宏观调控手段时，应注重公共投资所产生作用的滞延性问题。正如本文脉冲一响应函数所显示的那样，公路投资对经济体系的作用具有滞延性，其对公路货运业的正向效应在滞后二期才能显现出来（为 1.1225），对公路运输业就业率的正向拉动作用要在滞后一期才能显现出来（为 0.0531）。此外公共投资会导致需求量的提高，公共资本存量增加将导致私人资本边际生产率的提高，这些都是公共投资乘数效应产生的原因，而生产性公共资本发挥乘数效应的持续时间会比较长，正如本文的分析结果显示的那样，公路运输业就业情况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可以持续到很长时间，当期为 0.1156，滞后一期为 0.0265，滞后二期为 0.0069，滞后三期为 0.0088，滞后四期为 0.0024，滞后五期为 0.0019，滞后六期为 0.0017。实际上，大多数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都不可能在投资当期就完全释放出来。因此，公共投资对经济的直接及间接效应都存在滞延期。这要求我们在宏观调控政策的制定中充分注意公共投资作用的滞延性，从而更合理地把握好宏观政策的出台时间和政策力度。

图 3 经济增长对公路投资的作用途径



[参考文献]

- [1] David Alan Aschauer, Is Public Expenditure Productive,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89, 23: 177- 200.
- [2] David Alan Aschauer, Public Capital and Economic Growth: Issues of Quantity, Finance, and Efficien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ol.48, No.2. January, 2000, pp.391- 406.
- [3] Cazzavillan G, Public Capital and Economic Growth in Europe Countries:a Panel Data Approach [R] . Working paper, 1993, No.93.11.University of Venice, Venice.
- [4] Sébastien Dessus & Rémy Herrera, Public Capital and Growth Revisted: A Panel Data Assessment, Econmn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ol.48.No.2. January, 2000, pp.407- 418.
- [5] Shioji & Etsuro, Identifying Monetary Policy Shocks in Japan, Journal of the Japanese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es, 2000, 14:22- 42.
- [6] Evans & Karras G, Are government activities productive?Evidence from a panel of US state [J] .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94, 76:1- 11.
- [7] Garcia- Mila, Teresa, Therese McGuire, and Robert Porter, The Effect of Public Capital in State- Level Production Functions Reconsidered,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cs, February, 1996, 78:177- 80.
- [8] 娄洪. 长期经济增长中的公共投资政策——包含一般拥挤性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存量的动态经济增长模型 [J] . 经济研究, 2004, (3).
- [9] 张海星. 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分析——中国数据的计量检验 [J] . 财贸经济, 2004, (11).
- [10] 据交通部网站公布的统计数字, 如 2005 年数字见 http://www.moc.gov.cn/05tongji/gudinzc/t20060328_31967.htm.
- [11] 中国统计年鉴 2005.
- [12] Holtz- Eakin, Douglas, Whitney Newey, and Harvey S.Rosen.Estimating Vector Autoregressions with Panel Data.Econometrica, 1998, 56, 1371- 1395.

责任编辑：黄振荣

我国区域工业竞争力的测定与评价

——我国十大沿海城市工业的广义竞争力实证比较研究

◎ 顾海兵 余翔

[摘要] 本文认为竞争力应该不仅仅是从“争”的角度来理解，更应该从“和而不同”的角度来理解，即广义竞争力，“竞合力”或者说广义上的竞争力才是提升工业竞争力的关键所在。正是基于这种广义竞争力的新视角，本文采用了两种不同的竞争力测定方法，对沿海十大的工业竞争力进行了实证比较研究。

[关键词] 工业 广义竞争力 区域经济

(中图分类号) F06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7) 03-0049-08

一、竞争力的含义

(一) 狹义竞争力与广义竞争力(竞合力)

竞争力，更确切的表述应该是“竞争”“能力”，因为在汉语词典中，只有“竞争”，并没有“竞争力”这一词条。^①竞争力的对应英文为 competitive power (竞争能力) 或 competence, competitiveness，究其来源，竞争力可能是源于对外文的翻译。对于竞争力涵义的界定，不同研究学者和机构基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多种解释，如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研究院 (IMD)、世界经济论坛 (WEF)、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等都对竞争力有不同的定义。这些基于多角度对竞争力的定义也正好反映出竞争力研究的复杂性和其构成的多维度性。对于“竞争力”，可以从“争”的角度来理解，但是若认为这种能力只有通过“单赢”或“你死我活”的争夺中才能表现出来，这种争胜能力才是竞争力的本质，对于这种意义上的竞争力，我们称其为狭义上的竞争力。为了获取这种排斥合作和优势互补的竞争力，往往会导致人为设置各种门槛，失范的竞争行为的出现。

现代竞争理念不仅仅强调“零和博弈”和“单赢”，而且更多地强调“双赢”和“多赢”、“共赢”。为了争胜，我们不仅要有击败对手的能力，更重要的还要具备在一定情况下和对手坦诚合作，实现多赢的能力，这样的竞争力我们称其为广义竞争力。随着未来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竞争力与合作力同等重要，因此，在强调“竞争力”的同时，我们更应该提倡“竞合力”。“竞合力”或者说广义竞争力才是提升工业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二) 广义竞争力(竞合力)与区域工业竞争力

未来的市场将会更加成熟，更加细化，竞争也将更加激烈。未来的消费者将同样是更加成熟的消费者，而成熟的消费是分层的消费。与其相对的生产领域，未来的工业行业也必将会是分层、细化的行业生产结构。“大而全”、“小而全”的传统工业生产、经营方式必将向“专、精、特、新”的方向转变。每个企业将只能扮演巨大产业链条中的一环这样的角色。此时专业化 (specialization) 将在发挥和提升工业竞争力的过程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各个工业企业必须认识到自己只是整个生产链条上的一个点，只有将这一个个“点”资源化为“链”资源，然后再由这些“链”状资源发展、融入到“网”状资源的发展，各个企业才能有立足之地，整个地区的行业才会有竞争力。各个企业必须在生产中做到分工协作，既有专业化

作者简介 顾海兵，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余翔，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北京，100872）。

^①注：对于“竞争力”这一词条，我们查阅了大量不同类型的汉语词典，发现这些词典中都没有收录这一词条。

生产，又有产业链的整合。

区域工业竞争力未来强大的出路就在于对区域工业资源的整合。区域内的企业就必须加大优势互补、分工协作，必须提高专业化水平，增强“抱团”力度，加强彼此间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竞争的竞合关系。在工业行业内部形成供应、物流配送、售后服务等不同层次的产业，拉长工业的产业链条，分工协作，提高工业的附加值。

正是基于此，我们认为对于区域工业竞争力应该从以下角度去理解：区域工业竞争力是一种立足本区域的比较优势并能够进行财富创造的能力，这种能力是通过与其他地区或部门的较劲和协作表现出来的。区域工业竞争力是一个比较性的概念，是一个多维集合的概念，包括区域工业的收益结构、收益规模、收益结构的变动率、收益规模的扩张率、收益效率以及区域工业竞争的可持续性。区域工业竞争力的实质是对资源和市场的占有能力，具体表现为服务的提供力、资金和技术在不同区域间转移的吸引力、产品在市场上的占有率以及产出和销售的效率增加的内生扩张力。

二、区域工业竞争力的影响因素

区域工业竞争力的大小和强弱往往是多个因素共同作用合力的表现。能够影响到竞争力的因素有很多，如区位、自然资源、历史传统、文化习俗、创新精神、制度环境、资金状况等等。

1. 自然区位和要素禀赋状况。自然区位和资源区位对于不同的区域差异很大。不同的区域具有不同的自然资源，不同的区域使用不同的生产要素。自然区位和资源区位的差异决定了区域产业的专业化和工业的分工格局。一般而言，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条件下，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将会得到优先开发。尤其是那些垄断性自然资源对区域工业竞争力的影响更大。丰饶的自然禀赋通常意味着较高的竞争起点。但是富饶的自然禀赋，往往也会使一个地区失去创新的动力，而沉迷于自然的恩赐。而且，自然禀赋条件对于区域工业发展的制约作用往往会随着社会的进步而减弱。

2. 历史传统和人文环境。任何区域的社会经济的发展都是对历史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虽然有创新，但是谁也不可能完全割裂历史而独立发展起来。正如戈登（Gordon）和切西尔（Cheshire）（1998）^⑪在其文章中所指出的：一个城市的历史和在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产业结构会对其未来所能允许发展的新事物的种类和形成产生持久的影响。历史传统、文化习惯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样会产生重要的作用。在研究影响竞争力的因素时，蒲特奈姆（Putnam）（1993）^⑫提出了“社会资本”对于竞争力的影响。被蒲特奈姆（Putnam）所指的“社会资本”主要包涵了信任、伦理和社会关系网络、人文传统等方面，这些“社会资本”通过营造经济发展的社会环境而对经济和生产的效率产生影响。作为竞争力宏观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的工业竞争力，历史传统和人文环境也将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工业竞争力的发挥和提升。和谐的社会资本将会有有力地促进一个区域的工业企业的发展和生产效率的提高，从而提高区域工业的竞争能力。

3. 制度和政府因素。制度环境可以决定一个地区工业竞争力的性质，如投资环境、商业惯例、网络和合作倾向等。规范组织和运作的商会和行会有助于本地工业竞争力的提高。正如波特（Porter）（2000）在讨论地区间竞争优势时，所强调的制度规则、激励和伦理等可以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⑬ 戈登（Gordon）和切西尔（Cheshire）（1998）提出在考察环境对企业的影响时，指出制度环境会影响到一个城市里企业的生产效率、创新和商业发展的动力。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的作用同样十分重要。政府政策的好坏、调控能力的高低往往直接影响到经济的发展状况。对于发展中国家或正处于经济体制转型的国家而言，政府政策对于产业的空间布局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效果更加明显，例如政府对于重点产业、主导产业以及不发达地区、重点发展地区采取的政策优惠措施、鼓励扶持政策，而对某些产业采取限制性措施。宏观经济政策、政府的干预及其特定的政策导向将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工业的竞争力和经济的绩效。此外，政府能否为创业者营造一种安全、便利的创业条件，也将影响到当前企业的竞争力。此外，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政府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知识是提升劳动者人力资本的核心要素，同样，工业竞争中的知识能力则是在较长时期内提升和保持工业竞争力的关键。保护知识产权，就是“给天才之火浇上利益之油”，保护知识，就

是保护人才，就是保护了社会经济发展的“火种”，这种正向激励机制的建立既激发了创新者的内在创新热情，同时，社会的知识财富也得到了积累。

4. 企业及品牌。在现代工业社会中，社会财富是由一个个企业在微观层面上通过制造有价值的产品和提供有效服务来实现的。在现代经济活动中，企业成为最重要的参与主体。戈登（Gordon）和切西尔（Cheshire）曾指出：从整体上看，竞争力这一概念最适宜从企业的层面来理解。企业的市场占有率高低、企业的平均市场规模大小、当地工业产品在外地（国内其他地区和国外）的供需状况及其产品被消费者的认同度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当地的工业竞争力强与弱。企业的品牌就是企业的对外标识，企业的品牌就是企业的无形资产，品牌知名度和信赖度等同于企业的竞争力。

三、区域工业竞争力测评体系——以我国十大城市为例

（一）比较对象的选择

在对区域工业竞争力进行比较对象的选择上，我们认为应该考虑到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应该选择具有类似发展环境的地区，这里我们主要选取了东部沿海省份的十座城市为研究对象。第二个方面应该考虑的因素是应该考虑到具有类似的城市行政级别的城市。在目前中国的行政管理体制下，不同的行政级别就意味着对资源和政策的不同吸引能力和起点上的不平等。

正是基于以上两个方面考虑，我们选择了上海、杭州、南京、苏州、天津、青岛、厦门、宁波、广州和深圳这十座城市作为区域工业竞争力的比较对象。但是，必须强调的是在这 10 个城市中，既有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也有经济特区和一般的沿海城市，城市的行政级别存在差异，城市的地理位置也有不同，从比较意义上来说，他们既存在着可比性，也存在着不可比性。因此在我们的比较过程中，必须注意由这些城市性质上的差异（例如地理位置上是否临海、行政级别的高低）所导致的竞争力的差异。

（二）工业竞争力的测定方法

为了能够全面、客观地从定量的角度给出这十大区域的工业竞争力的强弱的定量结果，这里我们使用了两种不同的研究思路和测定方法。第一种研究思路是：通过对影响工业竞争力的因素的研究，我们发现可以将这些影响或构成因素按照由外及内分为四层，外层影响工业竞争力的因素是工业经济存在和发展的环境；第二层是工业生产的规模；第三层是工业经济的技术水平；最核心层则是制度层面上的，我们将其归为制度因素。针对不同的层次，我们设立不同的指标体系加以研究，并附以不同的权重，最后进行加权计算。我们将依照这种研究思路的测定方法称为：“环境—规模—技术—制度”加权测定法。第二种是：对经过标准化处理的数据，统一使用主成分和因子分析方法，这一研究方法是目前国内在进行竞争力定量研究中较为普遍使用的方法。对经过标准化处理的变量，主成分和因子分析可以用来考察诸多变量因素之间的关系，并将这些不同种类、不同性质的因素聚类到少数几个在统计上独立的因子，用这些经过聚类的因子来代表这些因素。然后再通过一系列的统计运算和加权求和，得出最后得分。通常得分数值越大意味着该地区的工业竞争力越强。

（三）工业竞争力测定的指标体系

我们对影响工业竞争力的因素进行了归类，为了测定工业竞争力的大小，我们首先构建了四个一级指标，分别是制度、技术、规模和环境。在每个一级指标下又设有二级指标。1. 对于影响到一级指标“制度”的二级指标，通过分析，我们认为，应该包括土地制度、金融制度、企业制度以及市场化程度等，具体的可以通过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存贷款额所占比重，除四大国有银行外的金融机构所占比重，民营企业经济成分所占的比重，非国有企业的数量及其比重。2. 构成一级指标“技术”的二级指标，包括企业的自主知识创新、新产品的开发，高新技术在生产中的引用和升级等构成了工业生产的技术水平。具体而言，包括当地每年的专利授权数量，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发明专利的数量、新产品数量、当地从外地引入的科技成果和高技术人才数量、当地输出的科技成果和高技术人才数量、技工人数、高校在校生人数、职业技术学校人数、每年外来技工人数、当地教育的总支出及其占到当地 GDP 的比重、海外归国创业人数、高级

经理人人数、熟练工人的人数、授权专利数量、劳动力的工资、高级经理人员的人数及报酬、当地的工资水平与其他地区的比较等。3. 一级指标“规模”下的二级指标，包括经济总量、市场份额、驰名品牌的数量、企业的数量、企业的生产规模、当地的消费群体规模、企业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企业的平均市场规模、当地工业产品在外地（国内其他地区和国外）的销量及产品形象、当地工业企业经营管理的科学化程度、工业结构的倾斜度以及产业的专门化率和集中度。此外，当地企业与区域外的经贸交往总量等也应该作为“规模”的二级指标。4.“环境”一级指标下的二级指标，包括区位环境^①（包括自然区位、资源区位、经济区位和政治区位、基础设施等）、人文环境、经济环境（包括金融环境）、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政府管理和服务的好坏、基础设施、对外经济联系、具体的可以通过企业创办的难易程度、行业准入的限制程度、政府监督管理的水平、政府的服务意识、地方法律法规的健全程度、对政府能力的满意度、当地的社会刑事犯罪率、治安状况、交通密度等来反映。

其中，当地从外地引入的科技成果和高技术人才数量、当地输出的科技成果和高技术人才数量、每年外来技工人数、行业准入的限制程度等指标，反映了一个区域与其他区域之间合作的程度，加入这些指标后度量出来的将会是广义上的竞争力。

根据这些因素对于工业竞争力影响的不同以及重要性的大小，我们对他们赋予不同的权重，这里，我们以 10% 为权重间距，以 10% 为数列首项，构建一个权重的等差数列：对工业竞争力的环境指数赋予的权重大小为 10%，规模经济指数的权重为 20%，生产的技术水平为 30%，制度指数的权重为 40%。则工业竞争力综合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text{工业竞争力综合指数} = 0.4 \times \text{制度指数} + 0.3 \times \text{技术指数} + 0.2 \times \text{规模经济指数} + 0.1 \times \text{经济环境指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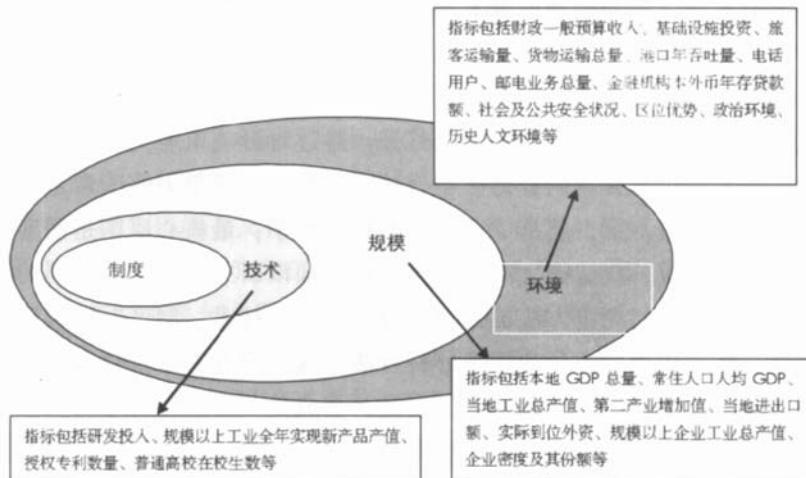


图 1 工业竞争力测定的“环境—规模—技术—制度”指标体系

我们知道，在对工业竞争力进行测定过程，很多指标是无法直接给出具体的数量值的，但是又必须量化。因此，可以借鉴国内外对竞争力研究中常用的方法，将在工业竞争力测定过程中所用到的数据分为主观数据和客观数据两种。主观数据主要是指通过现场调查，对于不同的访问结果给出不同的分数值。客观数据则主要是指能够通过中央或地方统计公报、统计年鉴可以查阅到的数据。通常客观数据都是依据约定俗成或事先制定的标准而得到的数据。这种划分类似于世界经济论坛(WEF) 在“全球竞争力项目”中对各国竞争力测定以及 IMD 在《世界竞争力报告》进行国际间竞争力比较时所采取的将数据分为硬性数据和调查数据，然后根据不同的权重综合处理的方法。

四、区域工业竞争力测定及评价

^① “区位环境”刻画的是十大城市工业竞争力的初始要素禀赋状况。

(一)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说明

本文中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源于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财政统计年鉴》、《中国金融统计年鉴》、各个城市的统计公报以及相关城市的统计局网站和统计信息网。依照上面的测定思路，我们最终选取了33个指标：^①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存贷款额所占比重，除四大国有银行外的金融机构所占比重，民营经济所占的比重，非国有企业的比重，当地GDP总量(亿元)，常住人口人均GDP，地方财政收入(亿元)，当地工业总产值(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亿元)，当地进出口总额(亿美元)，实际到位外资额(亿美元)，基础设施投资(亿元)，旅客运输量(亿人)(包括民航)，货物运输总量(亿吨)，港口年吞吐量(亿吨)，电话用户(万户)(包括固定和移动)，邮电业务总量(亿元)，金融机构本外币年存款额(亿元)，金融机构本外币年贷款额(亿元)，研发投入(亿元)，规模以上工业全年实现新产品产值(亿元)，所有获得专利授权的数量(件)，普通高校在校生数(万人)，规模以上企业工业总产值(亿元)，发明专利数量(项)，企业密度(家/人)，公共安全状况(刑事犯罪率)，当地从外地引入的科技成果(项)和高技术人才数量(人)，当地输出的科技成果(项)和高技术人才数量(人)，每年外来技工人数(人)，行业准入的限制程度。^②

(二) 数据处理

为了保证数据间的可比性和无量纲化比较的需要，对样本数据进行了标准化处理。主成分分析和因子分析过程借助于SPSS 13.0 计算机程序实现。

(三) 十大城市区域工业竞争力测定结果

1. “环境—规模—技术—制度”加权测定结果：

表2 2005年指数情况

城市	规模指标	规模指标排名	环境指标	环境指标排名	技术水平	技术水平排名	综合指数	最终排名
上海	7.78	1	15.9	1	4.01	1	7.39	1
苏州	4.93	2	3.64	7	1.12	6	2.73	5
深圳	4.63	3	4.81	6	2.34	2	3.34	4
青岛	1.61	7	7.41	4	0.84	8	2.37	6
天津	2.73	5	8.48	3	1.87	4	3.38	3
广州	3.35	4	9.37	2	2.12	3	3.84	2
厦门	1	10	1	10	0.23	10	0.62	10
宁波	1.90	8	5.89	5	0.51	9	2.00	7
南京	1.25	9	1.64	9	1.45	5	1.43	9
杭州	1.94	6	2.09	8	1.06	7	1.52	7

表3 2004年指数情况

城市	规模指标	规模指标排名	环境指标	环境指标排名	技术水平	技术水平排名	综合指数	最终排名
上海	7.59	1	10.85	1	3.99	1	6.39	1
苏州	4.59	3	3.17	5	1.85	3	2.81	4
深圳	4.70	2	3.94	3	1.57	5	2.99	3
青岛	1.22	8	2.22	8	0.77	8	1.38	8
天津	2.44	5	3.34	4	1.78	4	2.10	5
广州	2.71	4	7.64	2	2.12	2	3.35	2
厦门	1.12	9	0.45	10	0.18	10	0.49	10
宁波	1.33	7	2.16	9	0.33	9	1.00	9
南京	0.82	10	2.32	7	1.49	6	1.41	7
杭州	1.45	6	2.68	6	0.98	7	1.46	6

^①由于受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具体指标的实际操作性及时间的约束，在实际对工业竞争力进行测定过程中，我们只是选择了部分指标进行了计算。

^②对于“行业准入的限制程度”这一指标的量化，我们采取的是现场和问卷调查，对于不同的选项给出不同的分值，然后加权得到。

2. 主成分及因子分析法测定结果:

(1) 因子解释。从因子载荷矩阵可以看出, 因素 F1 (因子含义解释参见表 4) 中地方财政收入、当地工业总产值、当地进出口总额、实际到位外资额、规模以上工业全年实现新产品产值、规模以上企业工业总产值上具有大的载荷, 在这里因素 F1 可以理解为反映的是工业生产制造竞争力的强弱, 因此这里将 F1 命名为生产制造竞争力因子。指标金融机构本外币年存款额、金融机构本外币年贷款额在因素 F2 中有较大的载荷, 这两项指标是我们选取的反映金融因素的指标, 因此将 F2 命名为资金融通竞争力因子。对于因素 F3, 因为在基础设施投资、港口年吞吐量两项指标上的载荷较高, 这里将 F3 命名为临港设施竞争力因子。民营经济所占的比重、每年外来技工人数 (人)、行业准入的限制程度, 公共安全状况 (形式犯罪率)、企业密度、当地从外地引入的科技成果 (项) 和高技术人才数量 (人)、当地输出的科技成果 (项) 和高技术人才数量 (人) 由因素 F4 解释, 这些指标主要从本地环境、对外部人才的吸引力和非工产业等多角度反映了地区工业经济的发展环境, 因此, 我们将其称为宏观环境竞争力因子。因素 F5 有旅客运输量和货物运输总量两个高载荷指标, 因为其反映的是一个地区对外的交通运输状况, 所以我们将其命名为交通运输竞争力因子。

表 4 因子解释

因 子	F1	F2	F3	F4	F5
因子命名	生产制造竞争力因子	资金融通竞争力因子	临港设施竞争力因子	宏观环境竞争力因子	交通运输竞争力因子

(2) 因子得分。运用 SPSS 13.0 的因子得分功能分别对各个地区在五个主要因子上进行评分, 然后根据各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与四者累计的方差贡献率之比对得分进行加权汇总, 得到各地的总因子得分。按照总得分的高低, 我们可以得出十个地区的最终排名 (见表 5 和表 6)。

表 5 2005 年各城市因子得分及排名

城 市	F1	F1 排名	F2	F2 排名	F3	F3 排名	F4	F4 排名	F5	F5 排名	因子总得分	综合排名
上海	1.341	2	2.058	1	0.684	3	-0.078	5	-0.805	8	1.264	1
苏州	2.010	1	-0.950	9	-1.410	10	0.128	3	0.861	2	1.159	2
深圳	0.444	3	-0.742	8	1.409	2	1.814	1	-0.090	6	0.380	3
青岛	-0.242	5	-1.028	10	1.166	1	-1.553	10	0.140	4	-0.319	6
天津	-0.040	4	-0.147	5	0.351	5	-0.838	9	-1.159	10	-0.106	4
广州	-0.856	9	1.113	2	0.383	4	0.198	4	2.268	1	-0.299	5
厦门	-1.171	10	-0.353	6	-0.544	7	1.436	2	-0.845	9	-0.851	10
宁波	-0.325	6	-0.736	7	0.208	6	-0.546	8	0.215	3	-0.345	7
南京	-0.686	8	0.487	3	-1.309	9	-0.200	6	-0.579	7	-0.517	9
杭州	-0.476	7	0.299	4	-0.938	8	-0.362	7	-0.005	5	-0.366	8

表 6 2004 年各城市因子得分及排名

城 市	F1	F1 排名	F2	F2 排名	F3	F3 排名	F4	F4 排名	F5	F5 排名	因子总得分	综合排名
上海	1.456	2	1.828	1	0.996	1	0.260	3	-0.679	8	1.330	1
苏州	1.753	1	-0.882	8	-1.535	9	0.083	5	0.609	2	1.051	2
深圳	0.970	3	-1.096	10	0.950	2	0.613	2	0.118	5	0.659	3
青岛	-0.443	5	-0.769	7	0.808	3	-1.493	10	-0.190	6	-0.436	8
天津	-0.357	4	0.463	4	-0.064	7	-0.666	8	-1.516	10	-0.290	5
广州	-0.703	9	1.072	2	0.487	5	0.246	4	2.271	1	-0.234	4
厦门	-1.098	10	-0.589	6	0.122	6	2.252	1	-0.708	9	-0.759	10
宁波	-0.448	6	-0.928	9	0.674	4	-0.720	9	0.241	3	-0.414	7
南京	-0.626	8	0.683	3	-1.675	10	-0.114	6	-0.286	7	-0.450	9
杭州	-0.504	7	0.217	5	-0.762	8	-0.460	7	0.140	4	-0.407	6

我们这里不对绝对的名次作评价, 我们将 1、2、3 名统称为“强竞争力地区”, 将 4-8 名称为“较强竞争力地区”, 而 9、10 名我们将其归为“一般竞争力地区”。

当然, 因为我们选择这十个城市基本上都是东部沿海发达城市, 即使是其竞争力在比较中处于一般的位置, 但是相对于许多中西部的地区而言仍然是属于强竞争力地区。

根据“环境—规模—技术—制度”加权计算得出的结论，2004年上海、广州和深圳位居前“三甲”，属于强竞争力地区，宁波和厦门属于一般竞争力地区，南京、杭州、苏州、青岛这四个城市属于较强竞争力地区。2005年天津和宁波的工业竞争力明显提升，而深圳和南京的工业竞争力有所下降。2005年天津取代深圳成为强竞争力地区，而宁波超过南京进入较强竞争力地区。

根据主成分和因子分析方法得出的结论，上海、苏州和深圳这三个城市是属于强竞争力地区，南京和厦门属于一般竞争力地区，宁波、杭州、广州、天津和青岛这四个城市属于较强竞争力地区。

(四) 区域工业竞争力评价

通过十大城市工业竞争力的测定过程，我们可以看出，同样属于东部沿海的不同城市，在工业竞争力比较中出现了分层。值得强调的是由于我们这里采用了两种存在差别的测定方法，从而得出了有一定程度差异的结论。但是我们认为最终结果基本上还是反映出各个区域工业竞争力优势和不足。

具体而言，上海的工业竞争力综合排名第一，为强竞争力地区。在生产制造竞争力、资金融通竞争力、临港设施竞争力三个因子指标上，上海得分均为正值，且均排名前三。上海现实的工业经济生产能力强，与上海的中央所属的大中企业多有关。这一点可以从2004年和2005年两年的财政收入看出来，2004年上海的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为3596.96亿元，地方财政收入为1187.99亿元，地方财政收入只占一般预算收入的33.04%，不到1/3。2005年，上海的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为4095.80亿元，地方财政收入为1433.90亿元，地方财政收入占一般预算收入的35.01%，虽然较上年提高了1.97个百分点，但仍然处于1/3强的比重。而同期，99%以上的企业都是民营企业的宁波的情况是，2004年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为400.96亿元，地方财政收入为151.70亿元，地方财政收入与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之比为37.83%，2005年宁波地方财政收入为212.40亿元，一般财政预算收入为446.70亿元，二者之比为47.55%。上海在资金融通竞争力排名上2005年和2004年连续两年都名列第一，且在因子得分上都领先第二名较大，这表明上海的确当之无愧为中国的金融中心。

但是，从主成分和因子过程来看，上海在宏观环境竞争力、交通运输竞争力两项因子在十个区域排名中后。这是因为上海的港口资源丰富，但是由于开发得较早，且自然条件好的港区均已开发完毕。因此，上海的港口资源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上海在宏观环境竞争力这项因子上得分不高。政府的力量在上海较周边的杭州、宁波而言是强势。而且上海作为中国的经济中心、金融中心，人才济济，竞争激烈。在上海，人们会感到来自住房、就业、交通、医疗、教育等等方方面面的生存压力。

苏州在生产制造竞争力、交通运输竞争力、宏观环境竞争力排名上均位列前两名。这与苏州近年来大力引进外资，着力进行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营造良好的人文生活环境有关。但是，苏州在资金融通竞争力、临港设施竞争力与其他9个城市相比明显处于劣势地位，这在某种程度上与苏州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关。苏州，天然处于内陆地区，其主要的货物出口是向东通过上海、宁波等港口出海。在资金的流通上，上海对资金的融通功能可以很容易地覆盖到苏州。在这样的环境下发展的苏州，缺乏资金融通竞争力、临港设施竞争力就很容易理解了。但是从环境指标和技术水平指标两项排名上来看，苏州这两年有所下降。

深圳，我国的改革特区，其竞争优势主要表现在生产制造竞争力、临港设施竞争力、宏观环境竞争力。而其在资金融通竞争力、交通运输竞争力上却很一般。青岛的临港设施竞争力很强，排名第一。这与青岛作为北纬32度到北纬39度之间，我国重要的海上出口港口有关。但是，青岛的资金融通竞争力和宏观环境吸引力却属一般。天津是位处环渤海湾的城市，前几年由于在京津唐地区的发展中，没有找到自己的确切的功能定位。其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约束。从十一个城市的比较上看，天津的工业竞争力是处于中等的位置上，排在第四位，属于工业竞争力较强的地区。随着天津定位为环渤海湾地区经济中心以及滨海新区的开发，天津的发展速度将会进一步加快。

广州和天津同属于竞争力较强的地区。由于广州自身的发展已经受其发展空间的有限性的约束，严重地约束了其未来的发展。广州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政策特惠，以及毗邻香港的特殊地理位置环境，加上当时

中国极低的劳动力成本。使得抓住发展先机的广州在改革开放初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但是，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能源价格的上涨，“民工荒”、“油荒”、“电荒”……等各种类型的短缺和大量制造加工工业向越南、印度和长三角的转移，不断给处于快速发展中的广州亮起红灯。未来广州的发展最大的约束将是来源于自身。加快产业结构的转变，占据产业链中高端的位置，利用已有的产业技术优势进行技术创新，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将是未来广州发展的重要出路所在。

这里我们对于宁波的工业竞争力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因为宁波是我们选择的这十个城市中，相对来说是知名度最低的城市。但是知名度低其工业竞争力并不一定就弱，相反，宁波恰恰可能是这十座城市在“工业竞争力”比较中胜出的“黑马”。两种不同的测定方法给出的宁波工业竞争力大小的判断是一致的，宁波目前的工业竞争力属“较强竞争力地区”。依照主成分和因子分析，宁波在2005年和2004年连续两年的工业竞争力排名中都排在第7名的位置，属于较强竞争力地区。依照“环境-规模-技术-制度”加权计算方法，宁波在2005年的工业竞争力排名为第7，较2004年有较大提高。从2004年和2005年宁波的因子得分在不断提高，说明宁波的工业竞争力正在不断地提升，在“较强竞争力地区”的5个城市中，竞争力的提升速度位居第3，位于天津、青岛之后，但是高于杭州和广州。

[参考文献]

- [1] Gordon I.R.& Cheshire P.C. ‘Locational Advantage and the Lessons of Territorial Competition in Europe’ Paper Prepared for the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Theories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Lessons for Policies of Regional Economic Renewal and Growth’.Uddevalla,Sweden,14th- 16th June 1998.
- [2] Robert Putnam. ‘Making Democracy Work’.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
- [3] 迈克尔·波特. 国家竞争优势 [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2.
- [4]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中国工业发展报告 2005 [M].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4.
- [5] 郭克莎等. 差距与赶超: 中国工业与世界先进水平的比较研究 [M]. 北京: 中国城市出版社, 2001.
- [6] 顾海兵. 新范式宏观经济学 [M].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5.
- [7] Martin Kenney. ‘Locating global advantage: industry dynamics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M].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 [8] 李婉萍, 罗贤栋. 工业园区的竞争力分析 [M]. 北京: 中国纺织出版社, 2005.
- [9] 凌云. 中国先进制造业发展: 基于浙江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的实证研究 [M].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5.
- [10] 倪鹏飞主编. 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 No.1 推销: 让中国城市沸腾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 2005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Z].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2005.

责任编辑: 黄振荣

生态学视角的产业组织设立理论研究

◎ 彭璧玉

[摘要] 产业组织设立理论是组织生态学的重要研究领域。本文分析了影响产业组织设立的生态化过程和制度化过程。在生态化过程中，产业组织设立率与种群密度以及筹办者密度之间存在着倒U型关系；产业组织生态位重叠密度与产业组织设立率负相关；经历过竞争的产业组织更容易设立新的产业组织；在资源分割条件下，持续的市场集中必定会提高专业化产业组织的设立率。在制度化过程中，关系密度与产业组织设立率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而制度行动者的规制会直接限制或刺激产业组织的设立。

[关键词] 组织生态学 组织设立 生态化过程 制度化过程

(中图分类号) F27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7) 03-0057-06

在经典的产业经济学理论范畴中，与产业组织设立相关的讨论集中在市场结构—绩效的分析框架之中。Bain (1956) 认为，进入壁垒 (entry barriers) 是影响产业组织进入的关键因素，且进入壁垒越高，利润率越高。Mann (1966) 的研究也支持了 Bain 的结论。由此看来，进入壁垒越高的行业越具有投资吸引力，该行业的产业组织设立率也越高。但进入壁垒越高，产业组织设立的成本越大，障碍越多，产业组织设立的成功率越低。因此，在结构—绩效分析框架中，进入壁垒与产业组织设立之间的关系并未得到明确的描述和定义。发端于上个世纪 70 年代后期的产业组织生态学 (organizational ecology) 主要研究产业组织设立、产业组织演化和产业组织死亡等主题。彭璧玉 (2005, 2006)^{[1][2][3]} 介绍了产业组织生态学中的组织死亡理论，但国内尚未发现从组织种群角度系统地介绍产业组织设立理论的文献。本文遵循组织生态学的适应论范式来概括影响产业组织设立的种群环境因素。这些因素包括生态化过程和制度化过程两个基本的方面。

一、产业组织设立的生态化过程

产业组织设立的生态学方法强调对稀缺公共资源的竞争 (Hannan 和 Freeman, 1977) 和产业组织之间互利共生关系 (Barnett, 1990) 对产业组织设立率的影响。产业组织设立的生态化过程 (ecological process) 则主要分析组织种群密度、组织生态位、竞争经历、资源分割以及产业组织筹办者生态与产业组织设立率之间的相互关系。

(一) 密度依赖。Hannan 和 Freeman (1989) 以新制度理论和产业组织生态学为基础，提出了基于种群密度的产业组织设立率模型。该模型假定密度对产业组织设立率的影响反映了两个对立的过程：合法性和竞争性。当密度较低时，种群内的现有产业组织合法性水平较低，需要新产业组织的加入，因而此时产业组织设立率较高。但产业组织密度的提高同时强化了组织之间的竞争性，当密度超过一定的临界值后，产业组织设立率就会受到抑制。因此，产业组织设立率与产业组织种群密度之间存在非单调的倒 U 型关系：密度的初始提高会提高产业组织的设立率，但密度的进一步增大则会抑制产业组织设立率。

Hannan 和 Freeman (1988) 用 1836-1985 年美国劳动力工会的数据对密度依赖模型进行了检验，检验的结果强烈地支持了理论模型。与 Hannan 和 Freeman 的检验结果相一致的研究还包括 Barnett 和 Carroll

作者简介 彭璧玉，中山大学企业管理博士后流动站在站博士后，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 广州，510631）。

(1987) 对爱荷华州电话公司 (1900-1917) 设立率的分析、Mitchell (1987) 对医用影像业 (1959-1986 年) 组织设立率的研究、Carroll 和 Swaminathan (1989a) 对美国啤酒酿造业 (1633-1988 年) 设立率的调查、Carroll 和 Hannan (1989) 对 9 个报业种群 (1800-1975 年) 设立率的分析等。密度依赖的产业组织设立率模型还可应用到现存产业组织对新产品市场的进入分析 (Haveman, 1993)^{[4]P593-628}。现存产业组织决定进入一个新领域的过程与企业家决定投资一家新企业的过程是相似的。与产业组织设立率一样，市场进入率与市场密度之间呈现倒 U 型关系。当市场密度较低时，产业组织数量的增加会提高现存产业组织的合法性，从而会提高对该市场的进入率。相反，当市场密度较高时，拥挤效应和竞争效应起主要作用，公司数量的进一步增加将会降低市场进入率。Haveman (1994) 为这一模型提供了实证支持。

(二) 产业组织生态位。对富余生态位的进入或对已饱和生态位的入侵是产业组织设立的前提条件。产业组织种群生态位的宽度、生态位的重叠密度与非重叠密度等因素对潜在进入者的资源获取前景和竞争前景均会产生直接的影响。

1. 生态位形成 (*niche formation*)。新的产业组织生态位的形成会刺激新组织的设立。Abernathy 和 Clark (1985) 认为，三种特殊类型的环境变革会引致新生态位的形成。首先是新技术的选择和新设计的应用；其次是政府政策的调整；最后是消费偏好的改变。Delacroix 和 Solt (1988) 认为，加利福尼亚州葡萄酒产业的设立率就是由生态位形成而驱动的。在他们看来，葡萄酒业中的新生态位是由人们生活类型的改变而进化出来的，且与消费者的偏好有关。只要消费者改变偏好，随着市场生态位容量的扩大，采取专业化形式的产业组织就会获得比通用型产业组织更大的设立率。Swaminathan 和 Anand (1995) 对美国葡萄酒业的研究已经证明，新生态位的容量越大，专注于该生态位的专业化产业组织的设立率就越高。Delacroix 和 Solt (1988) 利用葡萄酒进口水平作为新生态位容量指标所进行的分析表明，美国酒类产品进口水平的提高对加利福尼亚州葡萄酒业的组织设立率具有正的影响效应。他们认为这是生态位形成提高产业组织设立率的有力证据。但新生态位的形成也可能是技术中断的结果。例如，半导体制造业中的组织设立就是由技术创新驱动的 (Brittain 和 Freeman, 1980)。Tushman 和 Anderson (1986) 认为，由技术变革而导致的产品替代会损毁现存公司的能力。诸如水泥 (1872)、定期航线 (1924) 和和平纸复印 (1959) 等新的产品种类的出现则要归结于基础技术的创新。

2. 产业组织生态位的重叠密度与非重叠密度。产业组织生态位的重叠密度 (*overlap density*) 是指在特定的资源集合体中，一个产业组织的生态位与产业组织种群中其他产业组织的生态位相互交错的程度。非重叠密度 (*nonoverlap density*) 是产业组织种群中未交替密度的集合。^{[5]P1378} 产业组织生态位重叠密度和非重叠密度直接影响着组织设立的可能性和成功率。重叠密度与产业组织设立率负相关，非重叠密度与产业组织设立率正相关。在拥挤的产业组织生态位内设立组织比在宽松的组织生态位内设立组织具有更小的成功率，因为高的产业组织生态位重叠密度意味着对资源的竞争更加激烈。

3. 产业组织生态位的非重叠强度。产业组织生态位的差异可用非重叠强度 (*nonoverlap intensity*) 来衡量。非重叠强度可以被定义为产业组织种群潜在竞争者成员中产业组织生态位不重叠的数量与产业组织生态位重叠数量的比率。产业组织生态位非重叠强度与产业组织设立率正相关。产业组织生态位的非重叠强度低 (差异程度低) 意味着产业组织之间使用更多的共同资源，因而竞争程度高。产业组织生态位的非重叠强度高能为组织之间的非竞争性活动提供合作的机会和激励。由于潜在竞争关系的存在，占有部分重叠生态位的产业组织之间有更强的合作动机。在这样的条件下，生态位重叠的产业组织之间可通过采取和平共存 (*live-and-let-live*) 战略而避免高强度的竞争，生态位不重叠的产业组织之间可通过共同解决问题、交换信息、分享顾客资源等方式开展合作。生态位部分重叠的产业组织之间的接触通过增强对彼此的了解而有利于它们之间隐含的和外显的合作机制的形成 (Oliver, 1991)。因此，高的非重叠强度 (高的产业组织生态位差异) 会降低竞争的潜势，增强合作的可能性，因而有利于促进产业组织的设立。

(三) 红皇后效应 (*red queen effect*) 和成功偏差 (*success bias*)。在自然界，物种间存在这样一种现

象，即后代与祖先、新物种与老物种灭绝的概率几乎是相同的。Vanvalen 用红皇后假说来解释这一现象。Vanvalen 发现，一个种群的对数形式的生存曲线是线性的，灭绝概率是相对恒定的。产业组织生态学中的红皇后效应理论是由 Barnett (1996) 提出的。该理论认为，如果产业组织失去了参与红皇后演化的机会，从长期来看对产业组织是非常不利的。竞争是推动产业组织成长的重要因素，产业组织如果想要保持长期良好的成长态势，就必须积极地参与竞争，竞争会促使组织更好地演化和发展。红皇后效应对产业组织设立、产业组织成长和产业组织死亡都具有重要的影响。

红皇后进化触发的一个重要的产业组织动态是产业组织成员对未来机会的评价方式会发生改变。一般而言，即使具有完全的信息，个体决策者仍然会存在过度自信偏差 (overconfidence bias) (Bazerman 和 Neale, 1986)，且这种偏差还会因为信息获取和解读过程中存在的确认偏差 (confirmation bias) 而加剧 (Koriat 等, 1980)。在成功的产业组织中，这种决策偏差更容易发生。Denrell (2003) 提出的成功偏差理论说明，成功产业组织的决策者通常会对产业组织成功的原因作出错误的推论。在红皇后进化过程中，产业组织通过竞争和学习而共同进化。在那些经过竞争而存活下来的成功产业组织中，产业组织成员会过分夸大组织的能力，特别是当产业组织刚刚经历过竞争时。而这种对产业组织能力的高估就会提高组织对新市场的进入率。Barnett 和 Pontikes (2005) 以美国 1951-1994 年间所有电子数字制造商和通用电脑系统制造商的资料为基础，研究了红皇后效应对产业组织设立的影响。他们将市场分为三种类型：大型机、中型机和小型机。结果表明，在竞争中存活下来的中型机制造商极可能进入小型机市场，其进入的概率是未经历竞争的产业组织的 18 倍，且这一效应完全是由最近的竞争经历引起的。

(四) 资源分割。资源分割 (resource partitioning) 理论试图解释在成熟的产业中同时出现的两种趋势：市场集中程度不断加强和产业组织密度不断提高 (Carroll 等, 2002)。该理论认为，许多产业组织种群最终会分割为双市场结构 (dual market structure)：数量较少的大型通用型组织占据着高度集中的市场中心，为数众多的小型专业化组织则集中在高密度的边缘区域 (Van Witteloostuiji 和 Boone, 2003)。

Carroll (1985) 认为，资源分割的过程容易在满足以下两个必要条件的产业中发生：第一，存在规模经济；第二，资源分布是单峰的、异质的（如顾客口味的分布），且存在一个明显的市场中心。^{[6] (P701-725)} 在这两个条件下，通用型的产业组织会将力量集中于市场的中心，并在密集的资源空间中央设立产业组织。在这样的市场条件下，处于市场中央的通用型产业组织之间产生基于规模的资源竞争。随着规模收益的增长，最激烈的竞争往往发生在最密集的或者最丰富的资源区域。结果是，在市场中心，只有最大的通用型产业组织才能存活并占据主导的地位。随着大型通用型产业组织对市场中心的占据，外围的资源就空闲出来了，这为专业化产业组织填充这一区域创造了条件。

资源分割模型假定，持续的市场集中必定会提高专业化产业组织的设立率。Carroll (1984) 根据美国酿酒业、报业、音乐唱片业和书籍出版业等四个行业的数据检验了这一假设。结果表明，在这些行业中，公司的总数随着市场集中程度的提高而增加，专业化公司的设立与大型公司的增长紧密相关。美国葡萄酒酿造业的发展证实了基于资源分割模型的产业组织设立理论。随着整个葡萄酒业的增长，一方面行业集中程度在不断提高；另一方面，小型的专业化产业组织——农庄酿酒商的设立率也在不断增长。1940 年，美国农庄酿酒商的数量是 722 家。早期的农庄酿酒商一般生产无差异的产品。到了 1967 年，由于种群内竞争的加剧和效率更高的大规模市场厂商的出现，农庄酿酒商的数量下降到 141 家。自此以后，农庄酿酒商又保持了较快的发展速度。1990 年底，共有 1099 家农庄酿酒商在运营，其中 1069 家是在 1969-1990 年间建立的。这些农庄酿酒商采取专业化战略生产小容量、高附加值的产品。

关于通用型公司的集中对专业化公司设立的影响，产业组织社会学家还提供了许多类似的实证结论。除了上述实例以外，被检验的产业组织形式包括报纸印刷 (Dobrev, 2000)、汽车制造 (Dobrev, Kim 和 Hannan, 2001)、微处理器制造 (Wade, 1996)、早期电话公司 (Barnett 和 Carroll, 1987)、医用影像制造商 (Mitchell, 1995)、葡萄酒酿造 (Swaminathan, 1995)、银行服务 (Freeman 和 Lomi, 1994)、旅客航空

旅行 (Seidel, 1997)、投资银行 (Park 和 Podolny, 2000)、法律服务 (Jaffee, 2000)、财务审计 (Boone, Brocheler 和 Carroll, 2000)、美国长片业 (John 和 Stephen, 2000) 等。这些研究均证明，大型通用化产业组织的集中提高了专业化产业组织的设立率。

(五) 筹办者生态。产业组织的筹办过程是一个信息搜寻和信息甄别过程，也是一个对产业组织设立风险不断评估的过程。Kuilman, Li (2006)^{[1] (P385-401)}认为，产业组织筹办者是否作出正式进入某一产业组织种群的决策，受到筹办期时间的长短、与现存产业组织的地理接近度、现存产业组织的数量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构成了筹办者生态 (organizers' ecology)。

1. 时长依赖 (duration dependence)。任何试图进入某一种群的产业组织都必须经过一段等待时间 (waiting times)，以便筹办者聚集资源，与相关社会行动者建立外部关系并提出提供特定产品和服务的诉求。产业组织设立的等待时间可能很长。Ruef (2006) 对美国医药学校 1766-1930 年间产业组织设立率的研究表明，产业组织设立的平均等待时间是 2 年；Schoonhoven 等 (1990) 报告，半导体公司的等待时间从 1 个月到 4 年不等，平均为 2 年。等待期的另一个特点是同时计划进入某一市场的筹划者很多，但由于市场承载力的限制，最终只有少数筹办者能将组织推进到运营阶段。Carroll 和 Hannan (2000) 对汽车制造商的研究表明，在 1885-1981 年间的 3845 家筹办企业中，只有 11% 能最终投产。

筹办时间的长短会影响到产业组织正式运营的可能性。Ruef (2006) 对医药学校筹办情况的研究表明，筹办期越长，组织成功进入产业组织种群的可能性就越高。筹办期超过 2 年的组织的进入成功率要大大超过筹办期低于 2 年的组织。但 Rao (2001) 对 1891-1912 年汽车制造业的研究却提出了相反的结论，即时长依赖的负效应。他认为长时间的筹办实际上会降低产业组织进入努力的成功率。Hannan 和 Freeman (1989) 认为，这是因为对产业组织结构和产业组织战略的设计缺乏足够的远见。在筹办阶段，对产业组织结构和产业组织战略的设计通常是与当时的环境相吻合的。

2. 筹办者密度。筹办者密度是指同时筹划进入某一市场的筹办者数量。筹办者密度对最终有多少筹办期产业组织能转化为正式运营的产业组织具有显著的影响。在筹办期初期，筹办者数量的增多有利于提高筹办期产业组织的合法性，有利于它们争取到更多的社会资源，因而有助于将筹办期内的产业组织转化为正式运营的产业组织。但随着筹办者数量的进一步增多，对产业组织资源的争夺逐步升级，竞争性效应就会超过合法性效应，筹建期产业组织转化为正式运营组织的可能性降低。Carroll 和 Hannan (2000) 对美国汽车制造商种群的研究表明，筹办者密度与产业组织种群进入率之间存在着倒 U 型的关系。

二、产业组织设立的制度化过程

产业组织设立的制度化过程 (institutional process) 强调合法性、社会支持等因素对产业组织设立率的影响 (Scott, 1995)。产业组织设立的制度化过程可通过关系密度、制度行动者的规制、产业组织之间的制度性同形和意识形态等因素反映出来。

(一) 关系密度。产业组织种群的成长往往伴随着产业组织制度根植性 (institutional embeddedness) 的加强 (Baum 和 Oliver, 1992)。关系密度 (relational density) 是衡量产业组织种群制度根植性的重要指标，它指产业组织种群成员之间正式关系的数量和产业组织种群环境中关键制度的数量 (Baum 和 Oliver, 1992)。关键制度指种群环境中的政府代理者和社区组织。关系密度与产业组织设立率之间存在倒 U 型关系。在种群成长的初始阶段，随着关系密度的提高，产业组织的设立率也会提高。由于制度能够提供社会支持、合法性和资源，使产业组织进入的条件更具吸引力，因此制度环境有利于产业组织的设立 (Oliver, 1998)。产业组织种群与其制度环境之间的强关系密度也意味着产业组织种群与产业组织规范是高度同形的 (Dimaggio 和 Powell, 1983)。但关系密度越高，产业组织设立者之间为争夺有限的制度性资源的竞争就越激烈，这又会抑制产业组织设立率。

(二) 制度行动者的规制。产业组织的设立需要有潜在的产业组织生态位。Delacroix 和 Solt (1988) 将生态位的形成归结为三个途径：新技术的发展、新资源的开采、利用现存技术获取资源的新方法的出

现。一些研究（如 Delacroix 和 Carroll, 1983）发现，制度环境会引发生态位的形成，从而影响产业组织的设立率。政府是重要的制度选手（institutional players），它可通过开辟新的产业组织生态位和修改制度内容等措施来支持新的产业组织形式。制度环境的改变对专业化组织的设立率有深刻的影响。由于制度环境的不同，美国各州农庄酿酒商亚种群的演化就存在很大的差异。有些州订立了有关农庄葡萄酒酿造厂的法律条文，这种立法有助于葡萄酒种群的产业组织设立。宾夕法尼亚州率先在 1968 年订立了这样的条款，其农庄酿酒商的数量由 1968 年的 1 家飙升到 1990 年的 52 家。纽约州 1976 年进行了类似的立法，在 1990 年的 80 家仍在运营的农庄酿酒商中，有 76 家是 1976-1990 年间设立的。有关农庄葡萄酒酿造厂的法律条文通常给小于特定规模的农庄酿酒商提供消费税优惠，并减少它们的注册费用。很多州还允许农庄酿酒商直接向消费者和酒店销售其产品，但这样的行为对大规模生产的葡萄酒酿造厂而言却是非法的，它们必须遵守基于制造商一批发商—零售商的三层销售体系。到 1990 年，美国有 25 个州采用了农庄葡萄酒酿酒商法律。这一立法对上个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美国农庄酿酒商的迅速发展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在 1941-1990 年间设立的 1711 家农庄酿酒商中，有多达 1409 家是在 1969 年或其后建立的。^{[8](653-691)}

（三）制度性同形。除了新创立产业组织之外，产业组织设立的概念还包括现存产业组织对新领域的进入。在这一点上，产业组织设立率与产业组织进入率具有相同的意义。与种群密度相对应，市场密度成了决定产业组织进入率的关键因素。Haveman (1993) 利用新制度理论中的模仿和模仿性变革这两个概念构建了市场密度依赖的产业组织进入率模型。^{[9](P126-141)}

1. 对新市场的进入率与市场密度之间存在倒 U 型关系。同一产业组织种群内，规模相似的组织在结构和战略方面也是相似的。它们依赖于同样的环境资源，具有相似的结构约束。因此，同一生态位中规模相似的产业组织之间的交互作用最为紧密（Hannan 和 Freeman, 1977）。在决定是否进入新市场时，产业组织会仔细留意与其规模相似的产业组织的行动，并模仿其战略（Scott, 1992）。一个特定产业组织进入新市场、采取多样化战略的可能性取决于同一种群中相似规模的产业组织的数量。现存市场中与潜在进入者规模相似的产业组织的存在会提高该市场的合法性，因此会提高产业组织种群中该等规模的产业组织的进入率。然而，当相似规模的产业组织数量进一步提高时，又会抑制该等规模的产业组织的进入率。

2. 对新市场的进入率与市场中高盈利产业组织的数量之间存在倒 U 型关系。成功产业组织的行动对其他产业组织有重要的影响，对成功产业组织的模仿是其他产业组织降低学习成本的重要手段。无论在哪个行业，最盈利的产业组织均被视为其他产业组织的模范（Burns 和 Wholey, 1993）。多样化通常被当作减少对低盈利市场和衰退市场依赖、增强盈利性的重要手段。在这样的环境下，产业组织将密切留意那些高盈利产业组织的多样化行为。一个新市场中高盈利产业组织的存在会提高种群中其他成员的市场合法性，使其对潜在的进入者更具吸引力。但随着新市场中高盈利产业组织数量的增长，该产业组织种群的进入吸引力将降低。

3. 对新市场进入率与该市场中大型产业组织的数量之间存在倒 U 型关系。不同规模的产业组织对产业组织种群有不同影响，大型产业组织容易充当种群中其他产业组织的角色模范。Mezias 和 Lant (1994) 指出，对产业组织种群中大型产业组织的模仿是一条成功的制度规则。在竞争、不确定、搜寻成本和环境变化的条件下，对大型产业组织行为进行模仿的产业组织有较高存活机率。对此现象的一个解释是，大规模与可见性（visibility）紧密相关（Scott, 1992）。可见性高的产业组织易被当作其他产业组织的角色模范。多样化通常被当作产业组织成长的途径，特别是当产业组织的初始市场受限时。

此外，规模相似的产业组织和成功产业组织这两个因素之间可能存在互动关系。一个成功产业组织更能模仿另一个成功产业组织的多样化行为，非成功产业组织由于受到资源的限制而难以施行模仿。衡量产业组织成功的两项重要指标：大规模和盈利性，都是以剩余资源为基础的，而剩余资源是进入新市场的基础（Bourgeois, 1981）。相应地，大型产业组织更容易模仿种群中的其他大型产业组织，高盈利产业组织更易模仿种群中的其他高盈利产业组织。所以，新市场中高盈利产业组织的数量对吸引其他高盈利产业组

织进入该市场有最强的效应，对适度盈利产业组织和不盈利产业组织进入率的效应没有这么明显；新市场中大型产业组织的数量对吸引其他大型产业组织进入该市场有最强的效应，对中型产业组织和小型产业组织进入率的效应没有这么明显。

(四) 意识形态。所有组织都会受到意识形态 (ideology) 制约。意识形态的分野会决定个体对待社会的基本模式，从而会从根本上影响到组织的行为。意识形态的相似性会影响组织种群间的相互依赖，对此已有两种不同的解释。意识形态亲和观认为，意识形态相似的组织之间彼此之间更愿意提供更多的帮助，存在更多的互利关系。而生态位重叠观则认为，意识形态相似的组织之间资源利用重合程度高，因而竞争关系更强。Simons 和 Ingram (2004) 提出了一个综合的观点，认为产业组织种群在资源空间中的位置是影响产业组织种群之间相互关系的关键因素。如果它们依赖于同样的关键资源，则意识形态相似性的主要效应是竞争效应，否则为互利效应。以色列的莫夏夫 (Moshav) 和集体农场 (Kibbutz) 是用来说明享有共同的意识形态和重要资源的产业组织种群之间竞争与合作双重关系的最好例证。以色列的集体农场具有以下特征：持久存在于战略要地、基于自我劳动（而不是雇用）的公共产品、公共消费包括集体抚养孩童。莫夏夫的意识形态建立在三个前提之下：基于自我劳动而实现的平等社会、基于产品和互助而实现的平等供给；犹太人通过农业而回到故土；家庭农场与营销组织、采购组织的合作，实现经济独立。莫夏夫被视为家庭的家庭，其创立者树立了高度的社会互动、团结、互助和平等的生存机会等理念。

Simons 和 Ingram (2004)^{[10](P33-45)} 对一个特定地区内莫夏夫和集体农场设立情况的研究表明，在莫夏夫和集体农场之间存在着竞争关系，且亚种群的意识形态相似性越大，竞争效应越强；莫夏夫、集体农场与农业公司之间也存在着竞争关系，但与信用合作社之间存在着互利关系。集体农场的密度对莫夏夫的设立具有消极的影响，莫夏夫的密度对集体农场的设立也具有消极的影响。相反，与莫夏夫和集体农场享有共同意识形态但依赖不同的资源基础的信用合作社的密度会提高莫夏夫和集体农场的设立率。意识形态相反的农业公司种群密度的提高降低了莫夏夫和集体农场的设立率。

[参考文献]

- [1] 彭璧玉. 生态学视角的组织死亡理论研究 [J]. 当代经济研究, 2005, (8).
- [2] 彭璧玉. 企业衰亡的生态化过程与制度化过程 [J]. 学术研究, 2006, (5).
- [3] 彭璧玉. 组织生态学理论述评 [J]. 经济学家, 2006, (5).
- [4] Haverman, Heather A. Follow the leader: Mimetic isomorphism and entry into new markets [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93, 4: 593- 628.
- [5] Baum, Joel A C; Oliver, Christine. Toward an institutional ecology of organizational founding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6, 5: 1378- 1392.
- [6] Christophe Boone, Arjen van Witteloostuijn. A unified theory of market partitioning: an integration of resource partitioning and sunk cost theories [J].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1994, 5: 701- 725.
- [7] Jeroen Kuilman, Jiatao Li. The Organizers' Ecology: An Empirical Study of Foreign Banks in Shanghai [J]. Organization Science. 2006, 17: 385- 401.
- [8] Swaminathan, Anand. The Proliferation of Specialist Organizations in the American Wine Industry, 1941- 1990 [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95, 40 (4): 653- 691.
- [9] Haverman, Heather A. Follow the Leader: Mimetic Isomorphism and Entry into New Markets [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93, 4: 126- 141.
- [10] Tal Simons, Paul Ingram. An Ecology of Ideology: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Four Populations [J].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2004, 13 (1): 33- 45.

责任编辑：黄振荣

吸收潜力、应用能力与企业绩效^{*}

◎ 湛正群

[摘要] 基于 Cohen 和 Levinthal 等人有关吸收能力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发展了吸收潜力概念,并探讨吸收潜力对企业的知识应用能力和绩效的影响。主要分析如下:(1)由学习导向、市场导向和合作经验构成的吸收潜力具有良好的建构效度;(2)吸收潜力、应用能力以及企业绩效两两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3)吸收潜力与应用能力之间存在替代效应。

[关键词] 吸收能力 吸收潜力 应用能力 绩效

(中图分类号) F27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03-0063-06

一、引言

自波特提出竞争优势以来,^[1]竞争优势理论的研究沿着两条线索发展:一条线索从外部环境入手,^{[1][2]}认为企业的竞争优势来源于在行业中的良好定位;另一条则从企业内部入手,^{[3][4]}认为企业的竞争优势来自于企业内部有价值的、稀缺的、难以模仿因而也是难以转移的资源。以知识为基础的企业观进一步发展了竞争优势理论,认为企业不仅是合约的集合体,而且更重要的是一个存储独特的生产性(包括技术的和组织的)知识的实体,并且这一实体能够在其自身的知识基础上进一步学习以获得成长;^[5]企业的竞争优势主要来自于知识特别是隐性知识。这一知识储备与不同的效率紧密相关,并通过一种路径依赖的方式来进行积累。因此,这不仅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有些企业可以获得竞争优势而另一些企业却不能,也有助于解释企业为何进行多元化和创新。^[6]知识基础观认为,一个能使自己置身于比竞争对手更快地创新知识的地位的企业就会获得竞争优势。然而,为了保持这一竞争优势,企业必须能够持续地吸收新知识以及将这些新知识以创新的形式加以应用。企业必须能识别环境中能引起新的知识需求的不确定性,必须加强其对内部以及外部的扫描行为;企业还必须是柔性的以应对和开发新的机会。^[7]组织必须有能力应用这种知识,由此而确保企业能获得竞争优势或者保持其竞争地位。^{[8][9]}因此,对于企业来说,最为重要的能力是能够迅速、准确、及时、有效地获得知识并在企业内加以运用的能力,这一能力,我们称之为知识吸收能力。

尽管知识吸收能力这一概念被众多学者所使用,但对于知识吸收能力具体如何构成,则没有定论。^[10]因此针对吸收能力建立理论模型并探讨其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是竞争优势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基于 Cohen 等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吸收潜力概念,并提出了一个吸收潜力、应用能力和企业绩效的关系模型,主要探讨吸收潜力、应用能力和企业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

二、概念界定与研究假设

(一) 概念界定

为了厘清吸收潜力和应用能力的构成,我们首先讨论吸收能力的概念。吸收能力(Absorptive Capacity)是指一个企业识别新的外部信息的价值,并加以消化和商业应用的能力。^[11]一个组织的吸收能力是建立在其成员的个人吸收能力的基础之上,但并不是个人知识的简单加总,而是具有路径依赖的特征,是基于企业内的认知结构的“个人吸收能力”的综合应用。^[12]这一认知结构包括先前的知识积累、学习技巧积

* 基金项目:广东哲学社科基金课题《企业家能力的资本化特征与治理研究》(课题号 050-04)。

作者简介 湛正群,中山大学管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博士(广东 广州, 510275)。

累、解决问题技巧积累等。先前的知识积累为学习新的知识提供了便利，而学习方面的技巧则能促进员工更好地理解和使用外部知识，解决问题的技巧积累则有助于创造新的知识。企业评估和使用外部知识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先前知识积累的函数，这些积累的知识既包括基本技能（例如一个共享的语言），也包括在本领域内的最新的技术和知识发展。^[7]

知识积累的路径依赖特性使得企业的认知结构对企业知识的消化和应用以及企业绩效产生重要的影响。企业的认知结构赋予企业识别新信息价值、消化并投入商业应用的能力。如果说认知结构赋予企业一个知识共享的情境，那么企业对知识的理解、消化和利用能力则为企业把这一知识积累商业化提供了实现的途径，通过对知识的消化和利用，企业才能将知识商业化并获得绩效。因此，企业的认知结构和知识的消化、利用能力是企业吸收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Cohen 和 Levinthal (1990) 把认知结构以及识别、消化和商业应用能力都纳入到吸收能力之中去。而后来很多学者仅仅使用识别、消化和应用能力三个构面来理解吸收能力（例如 Lane, Salk 和 Lyles, 2001）。^[8]

依照 Cohen 和 Levinthal 等人的思路，Lane 和 Lubatkin (1998) 把吸收能力细化为识别、评估、消化和应用四个组成部分，又把识别和评估能力纳入吸收潜力（或称潜在吸收能力），把消化和应用能力纳入实现能力，并对 69 个制药及生物科技的 R&D 联盟进行了实证研究。Zahra 和 George (2002) 则把吸收能力划分为以下四个层面：取得、消化、转换和利用，并进一步指出，吸收潜力包含经验（指先前的投资与知识）、投入（指密度、速度和方向）和消化（指了解）三个成分。简俊成和洪德清 (2003) 在 Cohen 和 Zahra 研究的基础之上，通过对台湾 142 个上柜企业的调查研究进一步发展吸收潜力，把吸收潜力分为学习投入、吸收经验和市场导向三个层面。^[9]

本文将吸收能力分为两个部分：吸收潜力和应用能力，吸收潜力主要是指企业的认知结构因素，这为应用能力即企业消化、利用新知识提供了基础。一个企业的认知结构可以具体反映在企业的市场导向、学习导向和经验积累三个方面。因为一个市场导向型的企业才会有积极去积累知识，创造新的价值；学习导向则有利于增进企业获取知识的广度和深度，并增进企业消化和应用知识的能力；在获取外部知识的过程中，合作与沟通是一个影响获得知识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因此合作经验的积累是非常重要的。既然吸收潜力是指企业的认知结构，所以，用市场导向、学习导向和合作经验三个方面来衡量吸收潜力非常合理。企业的知识应用能力主要包括消化能力和利用能力两个方面。所谓消化能力是对新知识的理解和已有知识进行整合的能力，是把新知识融入企业的能力；利用能力则是运用新知识或整合过的知识进行调整、开发并商业化的能力。

（二）研究假设

吸收潜力的三个组成部分对企业绩效都存在积极的影响。市场导向是指一个组织充分地生产出以及跨部门传播现在及未来客户需求的市场情报，并采取适当的响应行动。^[10] 市场导向使组织聚焦于持续地搜索目标顾客需求以及竞争者能力的信息，且应用这些信息来创造卓越的客户价值；它是整个组织的价值系统，是企业的重要资源，是学习型组织的重要文化基础。^[11] 本文认为具有市场导向的企业能广泛地熟悉顾客与竞争者，有助于对各种新知识的理解和运用。企业的吸收能力是具有路径依赖的，有赖于企业过去的知识和技巧的积累。^[12] 一个具有学习导向的企业将会关注如何从外部吸收知识，以及将企业内的个人的知识转化为组织的知识，这既是知识的积累，同时也是技巧的积累。学习导向有助于增进企业理解新的创意的能力，^[13] 能增进创造力和关注新的市场机会的能力，^[14] 同时也有助于通过促进问题解决来为知识的应用提供帮助。^[15] 在获取外部知识的过程中，合作与沟通是一个影响获得知识的至关重要的因素。Cohen 和 Levinthal (1990) 认为组织若广泛积极地发展内外的关系网络，这将有助于组织内的成员提升对其他知识和能力的警觉，从而提升个人的和组织的吸收能力。知识寻求者的经验水平将会限制其学习成效。^[16] 因此，合作经验将沟通系统和个人吸收能力强化，可提升企业间学习合作的效果。因此，吸收潜力能够增进企业对新知识的理解和运用，增进企业的创造力，提升企业间学习的效果，从而增进企业绩效。由此，本

文提出第一个假设：

假设 1 (H_1)：企业的吸收潜力越强，企业绩效就越好。

正如 Cohen 和 Levinthal (1990) 所指出的，认知结构赋予企业识别新信息价值、消化并投入商业应用的能力，换言之，吸收潜力为企业的应用能力提供了基础。因此，本文提出第二个假设：

假设 2 (H_2)：企业的吸收潜力越强，知识应用能力就越强。

从外部获得知识有时是可以直接使用的，但是更多的情况是需要根据企业自身的知识基础进行消化和整合之后才加以利用和商业化。^⑦ 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说，由于文化、知识基础等的不同，从外部获得的知识往往并不能完全与企业的需求相匹配，这些知识需要根据企业特定的社会、文化以及竞争环境来进行调整和整合，从而影响企业的战略决策。对于接受知识企业来说，可以有两种方式来促进外部知识在企业内部的整合和应用，从而提升企业绩效：一是分解和消化从外部获得的新知识；二是通过创新性应用来提升企业的竞争能力。^⑧ 由此，本文提出第三个假设：

假设 3 (H_3)：企业的知识应用能力越强，企业绩效就越好。

既然认知结构有助于企业知识应用能力的提升，而应用能力的增强有助于企业绩效的一生。本文认为，应用能力与吸收潜力和企业绩效之间还存在这样一种关系，即吸收潜力可以通过促进企业的应用能力，从而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因此，本文提出第四个假设：

假设 4 (H_4)：企业的吸收潜力能通过促进知识应用能力从而促进企业绩效。

三、假设检验

(一) 研究量表

本研究量表是综合前人的研究，在由 4 名企业管理人士进行评估和对 39 个企业进行预试的基础上形成的。本文的量表各个部分的来源分别是：市场导向量表来自 Kohli 和 Jaworski (1990)；^⑨ 学习导向和合作经验量表来自于简俊成和洪德清 (2003)；^⑩ 消化和应用力量表来自于 Cohen , Zahra 等人的研究。^{⑪⑫} 此外，本文采用了三个一般性的指标来衡量企业绩效，包括销售额、利润率水平和市场占有率，这三个指标在许多实证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使用。本文使用李克特七点量表来进行测试，本文使用的量表见表 1。

表 1 本研究量表

测量变量	指 标	参考来源
市场导向	(1) 市场调研以了解顾客需求；(2) 了解竞争对手发展动态；(3) 多部门合作履行营销方案。	Kohli 和 Jaworski (1990)
学习导向	(1) 公司积极进行获取知识的投资；(2) 经常派员学习最新的技术或产品、服务知识；(3) 有良好的培训机制来促进知识在企业内传播。	简俊成和洪德清 (2003)
合作经验	(1) 我们与其他企业或组织有丰富的合作经验；(2) 我们有擅长处理合作问题的专门人才；(3) 我们能妥善解决合作中产生的各种问题。	简俊成和洪德清 (2003)
消化能力	(1) 我们记录并存档许多关于产品开发和市场营销成败的信息；(2) 我们投入很多时间来分析项目成功的原因；(3) 我们投入很多时间来分析项目失败的原因。	Cohen 和 Levinthal, 1990 Zahra 和 George, 2002
利用能力	(1) 我们能不断改进旧有管理模式，提升效率；(2) 我们能不断提升产品/服务的品质；(3) 我们能迅速开发新产品/服务并推出市场。	Cohen 和 Levinthal, 1990 Zahra 和 George, 2002
绩效	销售额、利润率水平和市场占有率。	

(二) 样本描述

本研究的样本来自 2006 年 9 月至 11 月间对中国珠三角地区企业的问卷调查。样本来源主要有两个途径，其一是在广东多所高校的 EMBA 和 MBA 的课堂上收集，共发放 500 份问卷，回收 171 份；其二是根据广东某高新技术管委会提供的 200 个企业资料发放电子邮件问卷，共发放 200 份，催促后共收回 37 份。剔除全选同一答案和问题遗漏超过 10% 的问卷共 16 份，最后有效问卷为 192 份。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如表 2 所示。

表 2 样本基本情况

测项	分类	数量	测项	分类	数量
行业	制造业	70	被访者职位	董事长/总经理	8
	服务业	122		副总/总经理助理	14
企业规模	小型	30		部门总监/经理	148
	中型	54		基层管理人员	16
	大型	108		普通员工	6
企业性质	国有	98	被访者从业年限	1 年以下	7
	民营	29		1-3 年	20
	中外合资	22		4-6 年	92
	外商独资	43		7-10 年	60
企业年龄	5 年以下	25		11 年或以上	13
	6-10 年	66		1 年以下	18
	11-20 年	45		1-3 年	48
	21-50 年	41		4-6 年	83
	51 年或以上	15		7-10 年	37
被访者年龄	25 岁或以下	1	被访者本企业年资	11 年或以上	6
	26 岁-35 岁	177		大专或以下	1
	36 岁-45 岁	13		本科	130
	46 岁或以上	1		研究生	61

(三) 信度与效度分析

本文综合使用统计分析软件 SPSS12.0 和 LISREL8.72 来处理数据，主要使用 SPSS 软件来进行数据的整理，使用 LISREL 软件来进行分析。本文使用 S 和 K 系数来检验数据的正态性，^① 检验结果表明，各个题项的值 S 系数的绝对值均小于 0.65，K 系数的绝对值均小于 2，本研究样本数据符合正态性分布假设；数据的 VIF 值均低于 3，这说明也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本研究各个因素的信度和效度的各项指标如表 3 所示。

表 3 信度与效度

	题项	Cronbach's alpha (α)	一阶因子解释的方差 (%)	二阶因子模型的拟合指数 ^②
吸收潜力 (LAC)	9	0.898	--	$\chi^2(24) = 35.15; GFI=0.96$ $NNFI=0.99; CFI=0.99$ $SRMR=0.037; RMSEA=0.049$
	3	0.825	82.27	
	3	0.865	82.26	
合作经验 (CE)	3	0.862	84.05	$\chi^2(8) = 15.93; GFI=0.97$ $NNFI=0.98; CFI=0.99$ $SRMR=0.024; RMSEA=0.069$
	6	0.882	--	
	3	0.828	77.40	
利用能力 (EXP)	3	0.871	86.74	--
	3	0.891	80.04	
	全量表	0.942	--	

由表 3 可以看出，根据搜集的样本情况，本研究量表的信度 α 值均在 0.8 以上，具有良好的信度；同

^①当一个变量的数值分布符合正态分布时，Skewness 系数（简称 S 系数）与 Kurtosis 系数（简称 K 系数）应为 0。S 系数大于 0 时，称为正偏分布（顶端数据偏向右侧高分区），反之成为负偏分布；K 系数大于 0 时，成为高狭峰（分数过于集中），反之则为低阔峰（分数分布过于分散）。在结构方程模型的应用上，当 S 系数的绝对值大于 3 时，K 系数绝对值大于 10 时，被视为非正态。或使用 Z 分数来判断，如果 Z 分数大于 1.96（α 设定为 0.05），则该变量非正态分布。

^②绝对拟合指数 GFI 和相对拟合指数 NNFI,CFI 值在 0-1 之间，越大越好，以大于 0.9 为佳。近似误差指数 SRMR 和 RMSEA 则越小越好，其中：SRMR<0.8 时模型可以接受；SRMR<0.5 时拟合好；RMSEA<0.1 时拟合好；RMSEA<0.05 时拟合非常好；RMSEA<0.01 时拟合非常出色（这在经验研究中很少见）。

时各个一阶因子解释的方差均在 75% 以上，具有良好的内容解释效度，二阶因子模型的拟合指数表明，本研究各个因子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从图 1 可以看出本文的整体假设模型具有良好的建构效度。

为了降低指标数，本文将一阶因子的题项值合并后取均值，形成一个新的指标，将测量得到的因子（隐变量）转化为指标（显变量）。转化后的各个新的指标的均值、标准误和相关关系如表 4 所示。结果表明，各个合并指标之间相关关系的显著性水平很高，对数据进行正态性和多重共线性的检验表明，合并后的数据符合正态性假设，也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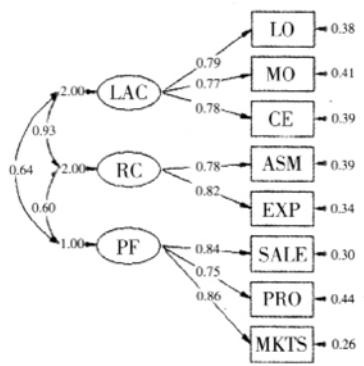
表 4 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均 值	标准误	LO	MO	CE	ASM	INO	SALE	PROF	MKTS
LO	4.5833	1.31178	1							
MO	4.4045	1.26482	.621**	1						
CE	4.5017	1.20112	.590**	.616**	1					
ASM	4.1111	1.17336	.570**	.553**	.590**	1				
EXP	4.5764	1.25834	.588**	.579**	.594**	.636**	1			
SALE	5.1875	1.24751	.413**	.317**	.357**	.324**	.399**	1		
PRO	4.9583	1.30978	.473**	.424**	.466**	.368**	.456**	.630**	1	
MKTS	5.0156	1.37470	.494**	.347**	.454**	.385**	.441**	.734**	.620**	1

** 相关性显著水平 0.01 (双尾检验)。

(四) 假设检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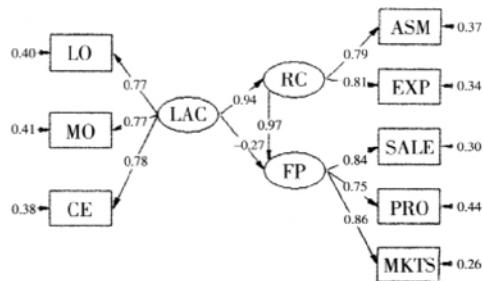
本文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对假设进行检验。本文的检验分为两个步骤进行：首先，检验吸收潜力、应用能力和企业绩效之间的相关关系，检验结果如图 1 所示，结果表明，吸收潜力、知识应用能力和企业绩效之间存在正的相关关系，假设 1、假设 2 和假设 3 都得到了有效的验证。



Chi-Square=23.52, df=17, P-value=0.13321, RMSEA=0.045

注： $\chi^2(17)=24.68$; GFI=0.97; NNFI=0.99; CFI=0.99; SRMR=0.040; RMSEA=0.045。

图 1 吸收潜力、应用能力与绩效之间的相关关系



Chi-Square=24.20, df=18, P-value=0.14855, RMSEA=0.042

注：SRMR=0.044; GFI=0.97; CFI=0.99; NNFI=0.99; $\chi^2(18)=25.35$; RMSEA=0.042。

图 2 应用能力对吸收潜力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影响

其次，为了检验应用能力对吸收潜力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的作用，本文将应用能力作为中介变量纳入观察，检查应用能力对吸收潜力和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影响，检验结果如图 2 所示。结果表明，当加入应用能力之后，吸收潜力对绩效的影响变为负值，这说明吸收潜力和应用能力之间在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上，存在替代关系，而非中介关系，假设 3 不成立。

四、结论

本研究以 192 家广东企业为对象，探讨了企业的吸收能力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主要的研究发现如下：(1) 根据样本数据，由市场导向、学习导向和合作经验组成的知识吸收潜力，具有良好的内容效度和建构效度；这说明使用这三个要素来说明企业的吸收潜力是可行的；(2) 吸收潜力、应用能力和企业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3) 吸收潜力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是考虑应用能力时，吸收潜力对企业绩效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本文认为，这说明吸收潜力和应用能力之间存在替代关系。

本文认为产生替代关系的主要原因可能来自于吸收能力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双重性。吸收能力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吸收外部知识并加以利

用，二是内部知识的创造。当一个企业具有极强的吸收潜力时，意味着其具有良好的市场导向和学习导向以及合作经验，意味着其能积极搜寻、探索和学习外部知识并善于在组织内部进行分享，这种认知结构有助于企业积极利用外部知识而不需要进行太多的知识挖掘和创造来提升企业绩效。另一方面，当一个企业具有很强的应用能力时，意味着其具有良好的消化能力和开发利用能力，这种能力可以使企业不需要太过于依赖外部的知识而进行自主创新，从而提升企业的绩效。

本研究结果表明，吸收能力对提升企业绩效具有积极的影响。吸收潜力对企业绩效的直接正面影响说明，建立一个市场导向和学习导向的组织文化能有效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吸收潜力和应用能力的替代性关系表明，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可以侧重于发展吸收潜力或者应用能力的其中之一，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当然，本研究的结果是基于对广东 192 家企业的截面调查，因此结果可能不能代表其他地区的企业的情形；同时，本文并没有将行业等因素纳入吸收能力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中考虑，有待于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细化。

[参考文献]

- [1] Porter, M.E., Competitive Advantages: Creating and Sustaining Superior Performance [M]. 1985,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2] Porter, M.E., Competitive Advantage: Creating and Sustaining Industries and Competitors [M]. 1980,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3] Barney, J.B., The Resource-Based Theory of the Firm [J]. Organization Science, 1996, 7 (5) : 469.
- [4] Wernerfelt, B., The Resource-Based View of the Firm: Ten Years After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5, 16: 171- 174.
- [5] Dosi, G., G. Winter, and D. Teece, Towards a Theory of Corporate Coherence, G. Dosi, G. R., and P.A. Toninelli, Editors. 1992, Clarendon Press: Oxford, UK.
- [6] Foss, N.J., Knowledge-Based Approaches to the Theory of the Firm: Some Critical Comments [J]. Organization Science, 1996, 7 (5) : 470- 476.
- [7] Cohen, W. and D. Levinthal, Absorptive Capacity: A New Perspective on Learning and Innovation [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90, 35: 128- 152.
- [8] Lane, P.J., J.E. Salk, and M.A. Lyles, Absorptive Capacity, Learning and Performance in International Joint Ventures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1, 22: 1139- 1161.
- [9] Zahra, S.A. and G. George, Absorptive Capacity: A Review, Reconceptualization and Extension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2, 27 (2) : 185- 203.
- [10] 简俊成, 洪德清. 外部知识转移之研究——以台湾上市上柜制造业公司为例 [J]. 管理学报 (台湾), 2003, 20 (5) : 929- 964.
- [11] Kohli, A.K. and B.J. Jaworski, Market Orientation: The Construct, Research Propositions, and Managerial Implications [J]. Journal of Marketing, 1990, 54 (April) : 1- 18.
- [12] Slater, S.F. and J.C. Narver, Market-Oriented Is More Than Being Customer-Led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9, 20 (12) : 1165- 1168.
- [13] Damanpour, F., Organizational Climates for Creativity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1, 34(SEP) : 555- 644.
- [14] Jean-Louis, D., L. Lise, and L. Ann, The Dynamics of Collective Leadership and Strategic Change in Pluralistic Organizations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1, 44 (4) : 809.
- [15] Senge, P.M., The Leaders' New Work. Building Learning Organizations [J]. Sloan Management Review, 1990, 32 (Fall) : 7- 24.
- [16] Simonin, B.L., Ambiguity and the Process of Knowledge Transfer in Strategic Alliances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9, 20: 595- 623.

责任编辑：黄振荣

基于利益冲突的公司治理理论演进及其新发展^{*}

◎ 刘少波

[摘要] 从利益冲突的角度而言，公司治理理论的关注重点经历了从股东—经理利益冲突、股东—利益相关者冲突和大股东一小股东利益冲突的转换，由此构成了公司治理理论的演进主线。本文对这一演进过程进行了梳理，并对其新发展作出评述。

[关键词] 公司治理 利益冲突 理论演进

(中图分类号) F27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7) 03-0069-06

尽管在亚当·斯密时代公司治理的某些问题就已存在并被理论所关注，但公司治理 (corporate governance) 作为一个学理层面的概念的出现，则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此后，公司治理问题受到理论界、企业、政府甚至一些国际组织的广泛关注，并已产生了大量公司治理的相关文献，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对公司治理的各种问题，提供了理论和经验论证。本文拟从利益冲突的角度，对公司治理理论的演进及新发展作一分析和评述。

一、基于股东—经理利益冲突的公司治理

现代企业理论认为，企业是对市场的替代。科斯 (1937) 认为，由于市场通过契约形式完成交易的过程存在交易费用，而将交易转移到企业内部则可以降低市场交易费用，因为企业可以依靠权威在其内部完成交易并因此节约某些市场运行成本。因此，企业产生和存在的原因，就在于企业的交易费用低于市场的交易费用；而企业规模的扩大，也就取决于在企业内部完成交易的边际交易费用等于同样的交易在市场完成的费用；企业的本质则是一组契约的组合，是一种节约交易费用的契约安排。企业组织的最初形式是个人业主制，即独资企业，此后经过漫长的演进，产生了以两权分离和专职支薪经理的出现为主要标志的现代公司制度。现代公司所具有的分工效应、对资本集中的巨大容纳空间及其内部市场的可塑性，极大地提升了企业组织的运作效率和发展空间，但与之俱来的是代理成本的产生和代理问题的存在。

亚当·斯密曾关注到早期的合股公司的代理问题，他对支薪经理能否忠实于股东利益深表怀疑，由于在亚当·斯密的时代，现代意义上的股份公司制度并未完全形成，因而斯密意义上的代理问题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推测。严格意义上的代理问题无疑要以股份公司的管理控制权与所有权的分离为前提，而系统考察现代股份公司两权分离的生成过程和现实状况的学者，则是斯密之后 150 年的 Berle 和 Means (1932)。他们通过对美国大公司的大量统计分析，发现与这些公司高速增长相伴的是公司股权的日益分散，由此导致“一般股东对于企业的各种活动全无权利”，公司的“控制权愈来愈与所有者分隔得更远，而最后落在经营者之手”。^[1]

由两权分离而来的问题是，在公司经营者自利化动机的作用下，经营者会充分利用其与股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这一天然屏障，去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从而损害股东的利益。在 Berle 和 Means 意义上的公司股权结构中，由于股权高度分散，小股东便没有足够的激励来监督管理者，^{[2][P42-64]}而失去来自股东监督的经营者便可以相对无约束地去追逐自己的利益。早期的公司治理文献主要在于研究股东和经理之间的利

* 本文是广东省人文社科重点基地重大项目 (04JDXM79001)、广东省社科规划项目 (06E09) 和暨南大学创新团队项目 (04SK2D03) 的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刘少波，暨南大学金融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 广州，510632）。

益冲突，在股东利益至上的理念下，目的在于找到一套机制或制度安排来确保经理对股东的“忠诚”。对此，一个理想的办法是在股东和经理之间签订一个完全契约，具体规定在所有可能情况下经理做什么和利润怎样分配。但由于任何契约都不可能毫无遗漏地关注到所有的现实细节和预测到未来的各种不确定性，同时，由于认知能力的有限、非对称信息及语言的模糊性等，因而完全契约是不可能的。于是，经理便有了在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行使上的很大空间。从这个角度讲，如何确保经理对股东的“忠诚”问题，实际上就可以具体化为公司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在股东和经理之间的有效配置问题。

在完全契约不可能的情况下，另一种实现经理对股东“忠诚”的办法，是股东与经理签订一个有更大自主权、长期的事前激励的契约以使后者的利益和前者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对此，一个最直接的办法是让管理者以一定的方式持有公司一定数量的股份。委托代理理论的主要代表 Jensen 和 Meckling^{[3] (P305-360)} 将管理者行为、代理成本与所有权结构纳入公司理论的研究体系，论证了管理者持股可以减少代理成本提高公司价值，且持股比例越大公司价值越高这一命题。

基于激励契约的经理持股，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经理利益与股东利益的联系，从而有利于降低代理成本和改善公司绩效。^①但是，对高度权利化的激励契约来说，更严重的问题是为经理产生了巨大的自交易机会，并因此损害股东的利益，从而认为激励契约可以完全解决代理问题同样是有疑问的。^{[4] (P737-783)}

当上述内部治理机制并不能完全解决代理问题时，^②对外部治理机制的关注就很自然。Denis 和 McConnell^{[5] (P1-36)} 指出，公司治理是企业内部机制和外部机制的总和，它们可以促使那些追逐个人利益的公司控制者所做出的决策能以公司所有者的利益最大化为原则。这一论断虽然并非毫无道理，但它更多的是体现出一种理论研究的愿望。从外部治理机制方面看，外部接管机制尤其是恶意接管，对经理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不惜损害股东利益的行为，无疑是最有约束力的一种外部机制，但一系列研究发现，在接管市场的运作中，经理同样存在谋求自身利益包括财务利益和经理私人控制权利益等行为，并因此而损害股东的财富。^③此外，法律保护也具有较强的约束力，其作用主要在于为中小股东提供一种法律装置，使其利益免遭大股东侵害。但法律制度是一种外生制度，属于通用公司治理范畴，目的在于诉求社会公正的价值目标，它难以规范剩余公司治理这类私人秩序层面的问题，包括股东与经理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至于市场竞争这类外部治理机制，其对解决代理问题的作用则更为有限。

二、基于利益相关者的公司治理

在基于股东—经理利益冲突的公司治理中，股东被假定为专用性资产的惟一投入者，同时也是风险主体，因而公司的所有权为股东拥有，其他的相关主体只拥有合同收益权。在这种理论逻辑支配下，传统的公司治理理论把内部治理结构抽象成股东与经理的委托代理关系。治理结构的效率标准就是股东利益最大化。20世纪60年代逐步发展起来的利益相关者理论(stakeholders theory)则认为，公司的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与股东的利益同样重要，公司治理的目的是既要充分实现股东的利益，也要有效确保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以使公司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最大化。

“利益相关者”这一概念最早见于1963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所的一份备忘录，指的是那些没有其支持，组织便不复存在的各种集团。Mitchell, Agle and Wood(1997年)归纳了27种利益相关者的定义。^{[6] (P129-130)}由此可见，何为利益相关者，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杨瑞龙、周业安^{[6] (P131)}将其归纳为三个层次：最宽泛的一个层次指的是所有能影响企业活动或被企业活动所影响的人或团体，包括股东、债权人、雇员、供应商、消费者、政府部门、相关社会组织和社会团体、周边的社会成员等等；稍窄一个层次指的是所有与企业有直接关系的人或团体，即排除了上一个层次中的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及社会团体、社会成员等；最窄的一个层次是所有在企业中投入了专用性资产的人或团体。但普遍认为，利益相关者的外延主要包括

①一些研究证明了经理报酬与业绩之间正相关。Shleifer 和 Vishny(1997)在《公司治理综述》一文中，提供了相关文献资料。

②公司内部治理机制还包括董事会、股权结构、财务信息披露等。本文限于篇幅，不一一涉及，但不影响这一判断。

③Shleifer 和 Vishny(1997)在《公司治理综述》一文中，提供了相关研究文献的研究结论。

(除股东外) 债权人、管理者、供应商、一般员工、消费者等。从公司治理的角度而言, 他们之所以成为公司利益的相关者, 首先在于他们都与股东一样, 对公司做了特殊的投资, 即投入了专用性资产。^① 当交易涉及到资产的专用性时, 因合约的不完备, 必然会因为不确定性引起当事人之间的利益纠纷, 因而需要选择恰当的治理机制来保护做出专用性投资的当事人的权益。其次, 在利益相关者投入了专用性资产的同时, 也意味着他们要对公司的经营承担相对应的风险。在 Blair^{[7][P12-77]} 看来, 股东只是拥有有限的责任, 一部分剩余风险已经转移给了债权人和其他人。既然承担了风险, 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就应当得到保护。再次, 其他利益相关者都以各自特有的方式, 为公司的发展和企业法人财产的保值增值做出了贡献。因此, 在公司治理中, 仅仅关注和强调股东利益是远远不够的, 甚至在约翰·凯和奥伯利·西尔伯斯通 (1995) 看来, 所有权并不是那么重要, 股东仅仅是一组对公司拥有利益者之中的一员, 没有理由认为股东的利益会或应该优于其他利益相关者。要在公司治理中充分关照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就意味着其他利益相关者也应当对公司拥有剩余索取权并实际参与到公司治理中的运作中, 从而有效率的公司治理结构应是利益相关者共同拥有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且两种权利相对应的“共同治理”模式。^{[6][P118-119]} Blair^{[8][P12-77]} 甚至主张, 由于股东只对公司负有限责任, 且其承担的风险可以通过投资的多样化来化解, 因而在公司治理改革中, 不应当把更多的权利和控制权交给股东, 公司管理层应从股东的压力中分离出来, 将更多的权利交给其他利益相关者。

利益相关者治理理论也得到了一些实证证据的支持。Freeman 和 Redd (1983) 经验地论证了利益相关者现象; Kotter 和 Heskett (1992) 在对“股东至上”还是“利益相关者至上”这两类公司业绩变化的长期研究中发现, 注重利益相关者价值的公司在观察期平均业绩增长了 682%, 而只注重传统股东价值的公司只增长了 166%。也许由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应用价值, 一些企业家也在强调重视利益相关者价值对保持公司成功的重要性。^②

如果撇开“股东利益至上”还是“利益相关者价值至上”的争论, 利益相关者治理理论与“股东一经理利益冲突”治理理论相比, 前者实际上揭示了一个新古典理论所完全忽视的问题, 即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在利益相关者理论范式内, 由于利益相关者众多, 他们的利益载体及实现利益的方式并不完全相同, 因而无论治理结构如何设置及优化, 单纯的公司业绩改进及其价值最大化, 实际上都不可能满足所有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取向; 换言之, 即使公司的目标并非定位于股东价值最大化而是公司价值最大化, 也不可能完成所有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实现, 即公司价值最大化与利益相关者价值最大化并不等价, 其中的“剩余价值”就应当通过公司的社会责任来体现, 正是这种“社会责任”使利益相关者的一些非经济利益得以实现, 并最终实现其利益最大化。从这个意义上说, 公司的社会责任也是公司存在和发展的一种内在规定。

三、基于大股东一小股东利益冲突的公司治理

基于股东一经理利益冲突和利益相关的治理理论, 考察的都是股权分散下的公司治理, 因而, 这两者存在的共同问题是: 未能关注到因股权结构差异而来的公司大股东^③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

Berle- Means 股权范式的局限在于: 一是将美国公司的股权结构绝对化, 二是没有关注到其他国家的股权结构状况。事实上, 即使在美国, 股权分散这一判断虽然总体成立, 但股权集中的公司也不鲜见。Eisenberg (1976)、Demsetz (1983)、Shleifer 和 Vishny (1986) 的研究均发现, 在美国由家庭和富裕的投资者集中持有股份的现象也比一般想象中的更加普遍; Holderness 和 Sheehan (1988a, b) 则发现了数百个股东持股超过 51% 的美国公众公司; 日本学者奥村宏 (中译, 1998) 发现股份向机构投资者集中的态势, 并因此形成了非传统意义上的大股东。在其他很多国家, 大股东的存在是普遍现象。Gorton 和

①Williamson (1985) 首次提出“资产专用性”概念。

②美国《经济学家》1996年2月10日题为“利益相关者的资本主义——不幸的资本主义家庭”的专栏文章。

③大股东也称为公司控股股东或控制性股东。

Schmid (1996) 的一项研究估计，约 80% 的德国大公司存在持股比例超过 25% 的非银行大股东；Prowse (1992)、Berglof 和 Perotti (1994)、OECD (1995) 的研究表明，以交叉持股和主银行持股为特征的大股东模式相当突出；La Porta 等 (2000a)、Claessens 等 (2000)、Faccio 和 Lang (2002) 的相关研究发现，在西欧、东南亚、中东、拉美和非洲国家，很多上市公司都存在大的控股股东，其中一种形式是金字塔式控股。总之，股份持有的高度集中和占有的控制性所有权是整个世界的规则。^{[4] (P737-783)}

大股东普遍存在的事实，使 Berle- Means 式的股权结构下的代理问题的解决似乎变得容易起来。因为在股权分散的情况下，任何一个股东依其股份从公司所能分配到的收益都可能不足以补偿其为监督经理行为以免其损害股东利益而支付的成本，从而“搭便车”是一种理性的选择。于是，经理便可以相对无约束地从事自利行为。在存在大股东的情况下，上述情形就会发生变化。Shleifer 和 Vishny^{[8] (P461-488)}指出，大股东有动力去收集信息并监督经理行为，因此避免了传统的“搭便车”问题；同时，大股东也有足够的投票控制权对经理施加压力，及通过代理权争夺或接管来替换经理人，因此，大股东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另一些文献也支持了这一结论：Kaplan 和 Minton (1994) 发现，大股东在促进董事会变革中发挥重要作用；Gorton 和 Schmid (1996) 发现银行大量持股改善了德国公司的业绩。基于这样的思路，Shleifer 和 Vishny (1997) 甚至断言，当大股东持有 51% 以上股权并因此对企业和经理层具有完全的控制权时，大股东因此解决了代理人问题。

当然，并非所有学者都对大股东在解决代理问题中的作用持有同样乐观的态度：Hart (1995) 指出，在一个大股东持股不到 100% 的情况下，代理问题也只会减轻而不会消失。

此外，近期的一些研究发现大股东对公司具有另一类正面作用，我们可称之为“放水养鱼”，即大股东基于可从公司获得更多利益考虑而对公司的支持 (propping) 行为或者说是向公司输送利益的行为。Friedman、Johnson 和 Mitton^{[9] (P732-750)}指出，为了降低融资成本并从上市公司源源不断地获取更多利益，控股股东具有强烈的动机向外部投资者做出承诺，包括用私有资源支持上市公司等。另有一些研究关注一家公司存在多个大股东的情况，即“相近持股比” (closely-held) 的股权结构问题。Pagano 和 Roell (1998)、Ke 等 (1999) 指出，公司存在多个大股东的好处有二，一是大股东的多元化能够对经理形成有效的监督；二是股东间的相互监督可以降低控制权私人收益。Nager 等 (2000)、Bennedsen 等 (2003) 发现多个大股东的存在对公司价值具有正面影响。但 Bennedsen 和 Wolfenzon (2000)、Gomes 和 Novaes (1999) 指出，股东间的相互冲突是“相近持股比”公司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应当可以说，相对集中的股权结构比分散的股权结构要有利于减轻代理问题，改进公司绩效。^①但是，正如两权分离在获得分工效率等积极效应的同时必须承受代理问题的负效应一样，大股东的存在作为解决代理问题的一种机制，在对公司治理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又衍生出另一种现象或另一类代理问题，即大股东与中小股东利益冲突或者说大股东对中小股东的侵害。La Porta、Lopez-de-Silanes、Shleifer 和 Vishny (以下简称 LLSV)^{[10] (P471-518)}指出，在大多数国家的大公司中，最主要的代理问题已不是 Jensen 和 Meekling (1976) 所证明的股东和经理的冲突，而是大股东和小股东的代理问题。大股东对中小股东的剥削已成为现代大公司治理的核心代理问题 (central agency problem)。于是，20 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有关公司治理的大多数文献几乎都在程度不同地关注着这个问题。

关于大股东侵害小股东利益问题的研究，是从上世纪 80 年代初陆续出现的对公司控制权溢价的研究中延伸而来的。当时学术界关注的重点还是股东与经理的利益冲突及其代理问题。由于股权分散、股东“搭便车”而导致控制权落入经理之手，经理必然会利用控制权进行营私，从而控制权是有价值的。当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股权分散在绝大多数国家并不是公司股权结构的主流模式，股权的相对集中及大股东的

^①但也有一些与此相左的观点。在 Demsetz (1983) 看来，股权结构是一个内生变量，反映了股东对公司的影响，不论是分散还是集中的股权结构，如果是由股东决定的，应该都可以使利润最大化，因此，公司价值与股权结构之间不应存在一种固定的关系。

存在是普遍现象时，特别是在大股东可以控制公司的经理层和经营活动的情况下，经济学家们又自觉不自觉地将公司的控制权与大股东联系起来，从而悄悄地完成了控制权运作由 Berle- Means 范式向大股东范式的演进。于是，近期在方面的文献几乎不再关注在大股东存在的情况下，公司控制权是否就必然意味着同时转移到大股东手上这一问题，或者将这一等同当作不拟探讨的前提。^① 在研究范式作了这样的悄然转变后，股东与经理的冲突及其代理问题被隐匿了，而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则变得鲜明而突兀起来，一系列实证现象并对之进行解说及探讨解决方案的研究便随之而来。

在相关研究中，大股东对小股东侵害的产生，基于两个前提：一是大股东为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具有侵害小股东的天性，二是大股东因掌握控股权而对公司具有控制权。大股东侵害小股东利益的方式是利用对公司的控制权谋求收益 (Grossman 和 Hart, 1988)，具体包括挪用或占用公司资金、利用关联交易将公司资源转移到自己旗下公司、为自己旗下公司提供担保等。Johnson、La Porta、Lopez- de- Silanes 和 Shleifer^{[11][P22-27]} 将控股股东获取控制权收益的行为比喻为“隧道效应”(tunneling)，意即以隐蔽的方式掏空公司。LLSV^{[12][P3-27]} 发现，这种现象在许多国家非常普遍。LLSV (1999)、Claessens、Djankov 和 Lang^{[13][P2741-2771]} 发现，在控股股东的控制权与其现金流权发生分离且分离程度越高时，大股东侵害小股东利益的欲望就越强，侵害程度就更加严重。

LLSV (1997, 1998, 1999, 2000a、b,2002) 的一系列研究，从法律保护的角度解释不同国家资本市场发展和大股东侵害小股东状况的差异，认为在法律保护相对完备的国家，大股东对小股东的侵害相对较弱；反之，在法律保护缺失或较弱的国家，这类现象就相当普遍且严重。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法律制度可以约束大股东的剥削手段并给外部投资者提供保护。同时，在法律保护较弱的国家，如果股权高度分散，外部投资者的权益则更容易为内部人所侵害从而更没有保障。

四、评述

基于股东一经理利益冲突的公司治理理论，深刻地揭示了股权高度分散下，因经理与股东的目标函数不一致及两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等因素导致的股东与经理之间的利益冲突，从内部机制和外部机制两个角度，提供了一套旨在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的激励兼容的制度安排。但是，无论是内部机制还是外部机制抑或是两者的结合，都难以消解股东与经理之间的代理问题。换言之，只要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不完全统一，股东与经理利益冲突意义上的代理问题，很可能就是一个难解甚至在一定意义上是一个无解的方程。因此，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亦将是一个长久的话题。

基于利益相关者的公司治理理论，以股东之外的利益相关者也投入了专用性资产并对公司承担相应的风险和对公司作出了相应的贡献为依据，揭示了利益相关者对公司存在和发展的意义，拓展了公司治理的内涵和外延，并把关注的重心转向股东以外的其他利益相关者。与单纯关注股东利益的治理理论相比，这无疑使公司治理问题更为接近它的本质过程。但是，这一理论在将公司治理边界进行充分放大并使问题复杂化的同时，又有点喧宾夺主式地过分抬高了其他利益相关者的重要性；而且，论者们始终无法统一的是对利益相关者的准确界定，因而也就无法提供一套真正保护和实现利益相关者利益的制度安排；更何况，这一理论并无助于解决经理的代理问题，此时，要求经理“为所有利益相关者服务”也可能导致经理不为任何人服务（张维迎，1996 年）。

基于大股东一小股东利益冲突的公司治理理论，以大量的统计资料表明 Berle- Means 股权范式只是少数国家的少数现象，普遍的情况则是股权的相对集中。这一理论敏锐地发现在股权相对集中的情况下，公司治理中的利益冲突主要已不是存在于股东与经理之间或股东与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而是存在于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即大股东对小股东利益的侵害或剥削。这一理论从控制权收益角度阐释大股东剥削问题，认为控制权收益是大股东利用控制权谋取私人收益，是一种超额收益，是大股东对中小股东利益的强

^① 国内一些学者甚至直接认定“经营者的利益与大股东的利益基本一致”（李志文、宋衍衡，2003）。

制剥夺，是一种“掏空”(tunneling)公司的行为。而大股东的剥削程度与一国对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法律保护状况密切相关。于是，这一视角的研究将公司治理理论逻辑地带入了“法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中，并因此转换了公司治理的研究重点，拓展了公司治理的研究视野，实现了公司治理理论的立体式构建。但是，如果按照现有研究对控制权收益的定性及其与大股东侵害的关系的界定，就必然导致一系列无法解释的理论与现实的问题：(1) 如果控制权收益就是大股东对小股东利益的侵害，则这种收益就只能是一种“状态依存收益”，因为它会随法律对小股东利益保护的强弱而消长。当法律保护很完善时，控制权收益就难以存在。但为何像美国这样法律保护较完善的国家，其控制权市场的争夺如此激烈？(2) 如果控制权收益表现为对公司外部投资者的剥夺，势必会损害公司长期发展的根基，最终使公司走向衰败并使控制权收益的获取难以为继。既然如此，大股东为什么要以“杀鸡取卵”这种损害其获得更多收益的方式谋取控制权收益；同时，从现实的情况看，大股东谋求控制权收益的行为为什么并未导致这类公司大量走向衰败？(3) 既然控制权收益就是大股东对中小股东的侵害，它就只能是一种超额收益，但在一个均衡的市场上，超额收益的存在是不可能具有长期性和系统性的，为什么会在均衡状态下长期存在超额收益？(4) 如果控制权收益是掌握控制权的大股东应当获得的收益，为什么这一过程会给大股东带来很大的风险，甚至难免遭受法律诉讼？

[参考文献]

- [1] Berle, Adolf, and Gardiner Means, 1932, *The Morde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 Macmillan, New York.
- [2] Grossman, S., and Hart D., Takeover Bids, the Free-rider Problem, and the Theory of Corporation [J].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1980, 11: 42- 64.
- [3] Jensen, M., and Meckling, W., 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 and Ownership Structure [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76, 10: 305- 360.
- [4] Shleifer, A., and Vishny, R., A Survey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J]. *Journal of Finance*, 1997, 52: 737- 783.
- [5] Denis, D., and Mcconnell, J.J., International Corporate Governance [J]. *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2003, 38: 1- 36.
- [6] 杨瑞龙, 周业安. 企业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及其应用 [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0.
- [7] Blair, Margaret, Rethinking Assumptions behind Corporate Governance [J]. *Challenge Nov. - Dec.*, 1995, 12- 77.
- [8] Shleifer, Ahreli, and Robert Vishny, Large Shareholders and Corporate Control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6, 94: 461- 488.
- [9] Friedman, E., Johnson, S., and Mitton, T., Propping and Tunneling [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 2003, 31: 732- 750.
- [10] La Porta, R., F.Lopez- de- Silanes, A.Shleifer, and Vishny, R., Corporate Ownership Around the World [J]. *Journal of Finance*, 1999, 54:471- 518.
- [11] Johnson, S., R.La Porta, F.Lopez- de- Silanes, and Shleifer, Tunneling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2000, 90:22- 27.
- [12] La Porta, R., F.Lopez- de- Silanes, A.Shleifer, and Vishny, R., Investor Protection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0a, 58: 3- 27.
- [13] Claessens, S., S.Djankov, J.Fan, and Lang, L., Disentangling the Incentive and Entrenchment Effects of Large Shareholdings [J]. *Journal of Finance*, 2002, 57: 2741- 2771.

责任编辑: 黄振荣

•社会学 人类学•

人生风险：社会境遇与多元治理

◎ 钟明华 龙柏林

[摘要] 风险社会是现代性批判的产物，是理解后工业社会的重要角度。人生风险是风险社会中人们生存境遇的真实表达，是可能发生的种种危险的总称。人生风险内涵的理解为探讨人生风险治理奠定了良好的认知基础，个人、民间社会、政府国家三大层面的分析构成人生风险的复合治理体系。

[关键词] 风险社会 人生风险 多元治理

(中图分类号) C9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7) 03-0075-05

人的生存与人的发展本身就是一对孪生姐妹。在人的发展成为当代学术中心话语的境况下，我们不妨反其道而行之，多来关注一下人的发展背后时刻在场的生存问题。可以说，SARS 危机、禽流感、食品安全等正在推动风险生存研究走向前台，“应当看到，风险概念和风险社会这一现代化的基本思想，使不可预见的后果可以预见，使我们本来无法控制的事情变得可以控制，而且这一基本思想连同所有与此相关的问题现在正被应用到越来越多的领域里。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现在人们想必很有可能还会把风险概念扩展到人生”；^{[1][P41]} 尽管人生风险能否完全控制还值得商榷，但在人生哲学的层面上接着讲述风险社会这一生存主题，应该说既有利于在理论上推进和丰富风险社会的研究，也有利于在实践上增进人生风险治理的自觉。

一、何谓风险社会

“在风险社会中，过去失去了它决定现在的权力。它的位置被未来取代了，因而，不存在的、想像的和虚拟的东西成为现在的经验和行动的‘原因’。我们在今天变得积极是为了避免、缓解或者预防明天或者后天的问题和危机——或者什么也不干。”^{[2][P35]} 未来决定现在的逻辑在当今已占据上风，研究风险社会绝非一项奢侈的课题，而是一项未雨绸缪的积极性思考内容。那么，什么是风险社会呢？

(一) 风险社会是对工业社会的一种决裂。在现代化行进的链条中，人们面临的风险并没有随着社会的推进而减少，相反，伴随着人类打开的未知领域越多，人们在实践中将面临的无法预测的事情越多，应对风险成了这个社会的一个重要的考量领域。正如吉登斯所言，“传统文化中并没有风险概念，因为他们并不需要这个概念。风险与冒险或者危险是不同的。风险指的是在与将来可能性关系中被评价的危险程度。它只是在将来的社会中被广泛使用——这个社会正好把将来看作是被征服或者被殖民的范围。风险暗示着一个企图主动与它的过去亦即现代工业文明的主要特征进行决裂的社会。”^{[3][P18-19]} 由此可见，风险社会是后工业社会的一种表达，强调的是现代性或现代化社会所面临的风险，如技术发展的风险、环境生态的损害、金融和房地产的隐忧、诸如“9·11”恐怖主义袭击、SARS 的流行等突发事件，这些风险因素的大量增加是现代工业社会高速发展和复杂性堆积的结果。不难看出，现代化的发展在繁荣的表象背后还拖着一个长长的阴影，即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不断扩散的不确定性，制造了无数的风险。因此，风险社会是在现代性批判进程中逐渐走向前台的一种后工业社会表达。

作者简介 钟明华，中山大学教育学院社科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龙柏林，中山大学教育学院社科系讲师、博士（广东 广州，510275）。

(二) 风险社会是风险逻辑占主宰地位的社会。无论是工业社会还是风险社会，财富生产与风险生产总是掺杂在一起的。在古典的工业社会里，财富生产的逻辑统治着风险生产的逻辑；而在风险社会里，则刚好相反，是风险生产的逻辑主宰财富生产的逻辑，关注的中心是现代化所产生的风险和后果。正如贝克所言，“风险和财富一样是要分配的东西，两者都构成地位——分别是风险地位和阶级地位。在每一种状况下，它们都关涉十分不同的利益和有关利益分配的不同争论。就社会财富来说，就是去处理人们所需求的稀缺物品如消费品、收入、教育机会和财产等等问题。相对来说，风险是以不可取的丰裕状况出现的现代化的附带问题。这些问题必须被消除或者否定并且加以再诠释。获取的主动逻辑对应着转嫁、规避、否认和再诠释的否定逻辑。”^{②1(P25)} 由此自然可以得出，风险转向意味着考虑的重心已变为对身边大量存在而又避之不及的风险如何进行公正的分担和有效的治理，风险社会的这种定位意味着它是对工业社会弊病和隐藏的代价进行“买单”的一种社会，是财富生产和风险分担交叠但更以风险分担作为舞台中心的社会。

(三) 风险社会是围绕风险展开的具有诸多特质的社会。现代风险正呈现出高度不确定性、全球波及性、突发性和超常规性等特征，而风险社会是围绕现代风险而建构起来的，这样就使风险社会具有区别于其他社会的特质：首先，风险社会是“被制造出来的风险”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吉登斯曾对现代风险的不确定性问题进行过区分，认为“解释上述问题的最好方法就是区分两种类型的风险。其中一种我称之为外部风险（external risk）。外部风险就是来自外部的、因为传统或者自然的不变性和固定性所带来的风险。我想把这种风险与被制造出来的风险（manufactured risk）区分开来。所谓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指的是由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风险，是指我们没有多少历史经验的情况下所产生的风险。”^{③1(P22)} 如果说传统工业社会乃至以前的社会，人们主要面临的是外部风险的挑战，那么现代风险社会则更多的是来自现代性链条中被制造出来的风险的威胁，是自身人为决策中引发的风险主导的社会。其次，风险社会是“飞去来器效应”风险分配逻辑的社会。有人曾形象地说过，贫困是等级制的，化学烟雾是民主的。现代风险伴随全球化互动与利益一体化的增强，在很大程度上已变为大家共同的分担，而不像传统工业社会财富分配那样能够清晰区分阶级身份和输赢双方。贝克曾这样谈到，“包含在全球化当中却又明显与其区别的是一种风险分配的模式，它拥有相当大的政治爆炸力。那些生产风险或从中得益的人迟早会受到风险的报应。风险在它的扩散中展示了一种社会性的‘飞去来器效应’，即使是富裕和有权势的人也不会逃脱它们”。^{④1(P39)} 由此看来，风险社会的风险分配将更多以民主的方式威胁整个人类的共同利益。再次，风险社会是“焦虑促动型团结”的风险应对社会。风险发作的突发性和超常规性等特征，意味着现代灾难所造成的结果往往是毁灭性或极具破坏性的，不像以往的社会那样有更多的学习机会和空间来应付；不仅如此，现代风险的发作很大程度上还流离于人的意识能力之外，诸如无法对风险进行准确预警、无法准确推算风险发生后所造成的影响、更无法准确推算如何赔偿等。特别是在风险责任主体模糊和缺位，抑或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出现的情况下，我们如何去解决这样一项棘手的风险难题呢？焦虑促动型团结或许是一副应对风险复杂病症的良方。因此风险社会将是在“我害怕”旗帜下团结起来人人参与应对风险的社会。

行文至此，可以对风险社会作一个总结性陈述：风险社会是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一种批判性反思的概念，是理解后工业社会的一副重要面孔，这副面孔是以风险逻辑为中心，通过风险生产、风险分配、风险治理等诸多特征得以丰富的脸谱。

二、人生风险的内涵分析

人是生活在现实社会生活环境中的人，风险社会的境况构成一个理解现代人生的重要社会平台。何谓人生风险？就是人们在风险社会生活过程中可能发生的种种危险的总称。

(一) 人生风险并不是完全消极意义上的事物，有些风险还带有积极的正面效应。吉登斯早就这样说到，“风险总是要规避的，但是积极的冒险精神正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和充满创新的社会中最积极的因素。生活在全球化的时代里意味着我们要面对更多的、各种各样的风险。我们在支持科学创新或者其他种

类的变革中，可能应该表现得更为积极些，而不能过于谨慎。毕竟，‘风险’一词（risk）的词根在古葡萄牙语中的意思是‘敢于’。”^{[3](P32)}所以，对人生风险的理解要做辩证的分析，不能先入为主地视风险为魔鬼怪兽而避而远之。在有些情况下，风险往往是以成本的方式参与人生创造的，是开辟成功新境界过程中必须付出的代价；当然，在另外的情况下，风险是人生追求成功的沉重乃至毁灭性的打击。

（二）人生风险并不是可以完全克服的，有些风险已超出人的能力控制范围。与前述认识紧密相关的是对于带有负面影响的风险，我们必须认识到人类理性和人们能力的有限性，绝不可浪漫式地构建应对风险的乌托邦设计。“分析的基点必须是：生活不可避免地会与危险相伴，这些危险不仅远离个人的能力，而且也远离更大的团体甚至国家的控制；更有甚者，这些危险对千百万人乃至整个人类来说都可能是高强度的和威胁生命的。”^{[4](P115)}既然如此，我们就必须调整人生与风险的较量坐标，只能将那些无法控制的风险造成的损害尽可能地控制在最低的程度，而不要奢望完全控制或彻底根除，这才是应对人生风险的一种理性回归。

（三）人生风险与其说会使心理生活更加不安全，倒不如说能让人生规划未雨绸缪。或许有人对人生风险的强调表示反感，理由是这样一方面会给那些接受风险挑战的人们带来心理上的紧张与生活上的不安全感，另一方面会无视和否定社会进步和人们生活质量不断提高这一事实。问题并非如此，人们遭遇的风险增多，心理紧张的边际效应就会逐渐降低，自然也就可以造就出应对人生风险的稳健心态，这是风险社会中人生风险与传统社会中人生风险的不同之处。与此同时，人生风险的强调也绝不是否定人们整体生活水平提高的事实，而是人们反思周遭生活继而追求更美好生活的理性表达，是人生自由程度不断提升之后的一种客观与全面的把握，是人生规划未雨绸缪的主体自觉。

（四）人生风险与其说是客观的事实，倒不如说是真实的虚拟。人生风险同样属于可能性范畴，但风险社会中人生风险导引的力度远远大于以往的传统社会，所以在现实生活里为了避免遭遇这样的毁灭性打击和灭顶之灾，人们更多地将其作为客观的事实来对付。但是，这仅仅是一种像灾害那样的比拟，而不是人生风险本身的真相。贝克曾说到，“风险与毁灭并不一样。风险并不是指已发生的损害，否则，所有的保险公司都要破产了。然而，风险确实有毁灭的危险。风险概念表述的是安全和毁灭之间一个特定的中间阶段的特性。在这个阶段，对有危险的风险的‘感知’决定了人的思想和行为。”^{[5](P137)}这个中间阶段具体到人生风险上，就是处在虚实之间的一个过渡状态，是一种真实的虚拟。这样理解，既有利于人们树立风险警惕意识，又有利于避免陷入风险主义的放大，从而在真实与虚拟之间把握应有的张力。

当然，对于人生风险的认识还会随着人生实践而不断深入，诸如人生风险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人生风险是一个科学的计算概念还是一个道德的推定范畴、人生风险是一个历史展开还是一个价值认定等，甚至还有人生风险在人的发展上的分析和人生风险自身的发展规律的探讨等，这些问题都有待深入的探讨与研究。

三、人生风险的多元治理

对人生风险的治理仅仅停留在简单应对的层面（如单纯依靠个人风险意识的提高来应对人生风险）是远远不够的，在风险社会的境况中，应对人生风险必须采取综合治理的方式。这项复杂的人生风险治理可从个人、民间社会、政府国家三大主体层面来进行探讨。

（一）人生风险的个体回应。人生风险是风险社会个人生活世界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必须积极应对的人生主题。首先，必须强化人生风险的意识与观念。正如对风险人生的提法还很陌生一样，人们的意识观念也一直是由进步主义的线性观念所主导，风险意识与风险观念之类的反思性观念显得非常缺乏。人们长期以来对风险意识与观念的培养缺乏一种内在的自觉，更多的是一种事不关己基础上的外在冷漠。与此同时，社会的风险程度却在不断增长，特别是从“杀生”转向“杀熟”的交易风险的出现、生态危机的加剧、下岗失业风险的涌现、SARS 危机和禽流感的大范围爆发，人们仿佛一夜醒来发觉人生风险无处不在，很多人就会束手无策乃至心理恐慌。所以，应对人生风险必须培养人们健康的风险应对心态与观念自

觉，建构应对人生风险的观念长城。其次，必须提高人生风险的应对能力。单纯拥有以上风险意识和观念是不够的，在个人主体层面更为重要的是要提高应对人生风险的能力。这种能力主要包括两大类：一类是提高认知理解能力。只有增强自身对于人生风险向现实危机转化的预见能力，才能储备足够的心理能量去积极面对；只有对风险具备一定的认知理解能力，才有可能对其进行内在的合理把握，将可以避免的人生风险尽量规避，将不可避免的人生风险的损害程度尽可能地降低。另一类是提高危机实战能力。一旦人生风险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也不必惊慌失措，而是要采取有效的应急预案和寻找化解出路，沉着冷静地加以应对。但这只是被动地应对，更为重要的是要发挥“狡兔三窟”的内在精神，告别单一人生经营的发展战略，走多元人生经营的抗风险之路。只有这样，应对人生风险才不会出现人生资本的严重“透支”，抗风险的实战能力才能得到真正的提高。

(二) 人生风险的社会应对。在市场经济和风险社会的境况中，“小政府大社会”的运作模式正在崛起，社会层面对人生风险的治理确实迎来了前所未有的作为空间。这个作为空间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首先，建立应对人生风险的社会组织。人生风险尽管是由个人来承担的，但不能简单地认为就只能由个人去单独应对，无数具有共同人生风险的个人走到一起自发形成的社会组织同样是应对人生风险的重要主体。譬如，在政治风险方面，出现应对恐怖活动、政局动荡等政治风险的亚政治组织；在经济风险方面，有应对交易市场风险的中介协会（如苹果协会、养鸡协会、蔬菜协会）；在科技风险方面，有应对生态污染和灾难的社会环保组织或绿色团体；在自然风险方面，有应对自然灾害和瘟疫的群众团体或互助组织等，这些社会组织的出现、发育和完善是民间社会不断成长的折射。在应对人生风险的过程中，它们既肩负着积极配合国家的法定责任，同时又发挥自己作为社会主体的道德义务，如发动捐助财物献爱心活动、组织志愿者义工活动等。其次，营造应对人生风险的风险文化。不妨将风险文化按照有形文化和无形文化的划分来进行简要探讨。在有形文化方面，主要是加强人生风险的制度文化建设与器物文化建设，如规章制度的建设、操作程序的完善、标识物的添置与提醒、责任追究制度的建设、信息采集与公布系统的创设、应对风险的相关纪律规定等。在无形文化方面，主要是教育和培养人们形成应对风险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生活理念、风险意识、精神状态，如可通过开设风险系列讲座、创办有关风险交流的社群网页、分享应对人生风险的成功故事等来进行培育。除此之外，还可在有形文化和无形文化之间架构协商沟通的桥梁，“协商论坛当然不是必定能够成功无疑的共识生产机器。它们既不能消灭冲突也不能消灭工业生产的不受控制的危险。然而，它们能够促成预防和警戒，有助于平衡不可避免的牺牲。它们能够使用矛盾情感并使之一体化，也能暴露出赢家和输家，使之公开化并因此改善政治行动的先决条件。”^{[6](P39)} 所以，协商论坛既有利于有形文化建设的合理化与科学化，也有利于培育人们对无形文化的内在认同与自觉，从而使有形文化与无形文化相得益彰，形成应对人生风险的整体合力。不仅如此，它还能以亚政治的形式积极推动和影响政府的行为，共同参与人生风险的治理与应对。

(三) 人生风险的政府治理。政府作为治理人生风险的重要层面，具有高度权威性、组织严密性、权威渗透性、暴力垄断性等特点，能够紧急动员社会力量和统一调拨社会资源，快速机动地制订方案去应对人生风险，因而理当成为各个层次治理人生风险的中心主体。首先，当人生风险尚未发生时，政府能够做的主要是如何规避和预防人生风险。可以说，传统的政府运转机制更多关注的是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创造进步，而对有关人生风险的规避与预防关注则不够。但伴随着人生风险的强劲冲击和现代性的反思自省，风险社会要求政府对人生风险进行有效的防治。一方面，从人生风险的源头入手，政府必须加强人生风险源头的提防和理解，把握人生风险的预防知识和规避技术，从而提高人生风险的规避预防的实际效果。另一方面，从人生风险的预警网络入手，政府必须加强人生风险预警网络建设，如风险预警机制、风险告知制度、风险前瞻考量、防灾体系的完善等，建立有序的制度和规范。总之，只有风险源头思考和预警网络建设相结合，才能提高人们对人生风险的预防与规避能力，增进人类的公共福祉。其次，一旦人生风险变为现实危险时，政府应该考虑如何控制和分摊人生风险。在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和体制市场化、流动

频繁化的当今社会，相当多的人生风险的扩散性趋势得以强化，然而，“在这个多元复杂性日益增强的时代，国家自身的变革往往滞后于时代的要求，从而直接或间接导致治理的失效”。^①由此观之，国家对人生风险的控制还比较稚嫩，还存在着不断完善的努力空间。这个努力空间包括三个方面。(1) 控制人生风险，对人生风险进行减少化处理。疾病的流行、金融危机的扩张、生态污染的蔓延、诚信危机的波及等都在提醒我们，政府必须加强风险控制的制度创新，决不可对人生风险熟视无睹、任其泛滥。也就是说，面对既已发生的人生风险，应尽量将其遏制在一定范围内，防止人生风险的损失产生叠加效应。(2) 分配人生风险，对人生风险进行公正化处理。“由于风险的分配和增长，某些人比其他人受到更多的影响，这就是说，社会风险地位应运而生了。在某些方面，这些现象伴随着阶级和阶层地位的不平等，但它们带来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分配逻辑。或早或晚，现代化的风险同样会冲击那些生产它们和得益于它们的人。”^② (P20-21)这就意味着，必须努力探寻秉持公正的风险分配逻辑。既要坚持风险创价和风险分摊的对等原则，不能由普通大众替风险制造者无故买单，否则这样的风险转嫁将违背风险处理的公正原则；又要坚持风险民主和风险承受的补偿原则，对那些民主扩散性的风险如生态灾难、化学烟雾、核泄露、饮用水污染等，这个时候就必须对风险受害者予以适当的补偿。(3) 分散人生风险，对人生风险进行人道化处理。在分散人生风险的人道处理方面，既可以直接通过志愿者吸纳来解决，“一部分与风险收益没有关系的人或群体，如果他们有一种吸纳风险的意愿，也可以成为吸纳风险的辅助者。这主要是通过捐献和慈善两种机制来实现。应该让有能力的社会主体主动吸纳社会风险成为一种‘软性’的义务”；^③也可以间接通过福利保险机制来解决，通过各种福利制度、人身保险、人寿保险、健康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人伤病赔偿保险、财产保险等形式，编织一张互助救济的弹性安全网，让全体社会成员获得风险生存的基本保障。总之，只有不断寻找差距，学习先进经验和推动本土创新，政府才能建构比较完善的人生风险控制分摊体系。

在一个开放的全球社会，人生风险的治理除了从个人、民间社会和政府国家这三大层面考虑之外，我们还必须凸显市场层面和国际组织层面的维度，这样才可以对跨国性之类的人生风险进行有效治理。并且，在单一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向多元网络治理模式变迁的过程中，各个治理主体之间还必须进行合作协商；只有这样，才能形成资源共享且比较有效的人生风险治理体系。

[参考文献]

- [1] [德] 乌尔里希·贝克，威廉姆斯. 关于风险社会的对话 [A]. 薛晓源，周战超主编. 全球化与风险社会 [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 [2] [德] 乌尔里希·贝克. 风险社会 [M]. 北京：译林出版社，2004.
- [3] [英] 安东尼·吉登斯. 失控的世界——全球化如何重塑我们的生活 [M].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 [4] [英] 安东尼·吉登斯. 现代性的后果 [M]. 北京：译林出版社，2000.
- [5] [德] 乌尔里希·贝克. 风险社会再思考 [A]. 薛晓源，周战超主编. 全球化与风险社会 [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 [6] [德] 乌尔里希·贝克等. 自反性现代化：现代社会秩序中的政治、传统和美学 [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 [7] 杨雪冬. 全球化、风险社会与复合治理 [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4).
- [8] 谢迪斌. 风险治理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J]. 教学与研究，2005，(6).

责任编辑：柏 桐

社会资本视域下的乡村治理

◎ 宋黔晖

[摘要] 社会资本是一个指向社会关系的结构范畴，其镶嵌与自主关系的不同维度、层次的组合产生不同含量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跨越国家和市民社会，而国家与市民社会又存在于其中的第三领域。把它作为一种解释范式运用到乡村治理研究中，根据农村自身社会资本镶嵌与自主关系的实际状况，发展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农村组织网络，是创建和维护农村社会资本，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手段。

[关键词] 社会资本 乡村治理 农村组织 社会和谐

(中图分类号) C912.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7) 03-0080-06

乡村治理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农村社会和谐非常关键的一个命题。社会资本是一个解释性非常广泛的概念，但是我们不能从它的广泛性中抽取作为结果和功能表现的方面，如关系网络、信任互惠等来简单地认识社会资本，而应该从社会关系结构范畴的角度分析社会资本的涵义和来源，从而在社会资本视域下思考乡村治理时，从社会资本“自上而下”“自下而上”良性互动的镶嵌与自主关系中来寻找治理方案，发展农村组织网络。

一、社会资本：一个指向社会关系的结构范畴

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已为各学科中的社会科学家所广泛认可，它被认为是用来解释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等现象的一个关键性因素。什么是社会资本？布尔迪厄把它定义为“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那些资源是同某种持久性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的，这一网络是大家共同熟悉的、得到公认的，而且是一种体制化关系的网络。”^{[1](P202)} 科尔曼认为它“包括社会结构的某些方面，而且有利于处于同一结构中的个人的某些行动；和其他形式的资本一样，社会资本也是生产性的，使某些目的的实现成为可能，而在缺少它的时候，这些目的不会实现”。^{[2](P345)} 而普特南则把它定义为“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协调和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益”。^{[3](155-156)}

可见，社会资本是一个解释性非常广泛的概念，基本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首先，社会资本由公民的主要与信任、互惠和合作有关的一系列态度和价值观构成。把个体从缺乏社会良心和社会责任感的、自利的和自我中心主义的算计者，转变成对社会关系有共同假设和共同利益的共同体的一员，从而形成将社会捆绑在一起的粘合剂。其次，社会资本作为社会关系网络包括非正式组织和正式组织。再次，社会资本的规范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最后，社会资本的积极功能，包括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促进信任互惠价值观念的产生等。但是我们不能从它的广泛性中抽取作为结果和功能表现的方面，如仅从关系网络、信任互惠等来简单地认识和分析社会资本。爱德华和弗雷就认为社会资本存在于个人与团体的关系中而不属于个人本身，它是一个结构范畴而不是社会心理范畴。它作为一种新解释范式的重要价值在于“引起了人们对社会关系的重要方面的注意”。^{[4](P365)}

正是由于社会资本概念涉及的广泛性，被一些学者批评为“资本过剩”，巴隆和汉南认为社会学家“开始把社会生活的每个特征都从实质上归为资本的一种形式”。^[5] 针对各种批评，武考克认为社会资本存在不同的形态或维度。他以社会关系为基点展开对社会资本的分析，认为镶嵌（embeddedness）和自主（autonomy）的社会关系是社会资本的不同形态。二者在宏观和微观层面的不同表现形态以及它们之间“自

作者简介 宋黔晖，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博士（广东 广州，510410）。

上而下”、“自下而上”的不同组合，构成社会资本的整体分析框架。武考克对包括国家-社会关系在内的社会资本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研究。他把社会资本分成四个层次、维度：微观层次上把镶嵌（如社群内的关系）称为整合（integration），把自主（如社群外的关系）称为链合（linkage）；宏观层次上把镶嵌称为协作（synergy），把自主（如制度的统一、权限与能力）称为组织整合（organization integrity）。进而，武考克排列了社会资本的这四种变量的不同结合可能出现的16种“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困境”，其两个极端是“无政府主义的个人主义”和“仁慈的自主”。在他看来，“自下而上”的发展可能出现的困境是：非道德的家庭主义表现为社会出现整合但是没有链合（如转型中的俄罗斯、南亚、意大利南部、撒哈拉以南非洲）；非道德的个人主义表现为社会既缺少整合又缺少链合（如乌干达Ik部落）；在现代化进程中个人有较多自由和机会，但是缺乏为其提供指导、支持和认同的稳定的社群基础，社会出现有链合却没有整合的状态（如最近的中东欧地区、美国城市中的贫困社群）；等等。而“自上而下”的发展则可能出现如下困境：崩溃的国家既没有组织整合也没有协作（如索马里）；无赖、掠夺性的国家拥有一个低层次的组织整合，但是协作程度很小；弱小的国家拥有高组织整合与团结，但是协作性低（如印度和后共产主义国家）；等等。武考克得出结论：国家的结构，以及它介入公民社会和公共生活的本质与程度，与社会组织共同构成了决定一个国家发展成败的关键因素。社会不同层次上的社会组织之中及之间的关系勾画出了可持续的、合理的增长及公正、可参与的治理前景。

彼得·伊文斯认为社会资本不是存在于市民社会领域，而是存在于跨越公私界限的持续关系中。在网络中形成的社会资本既不属于公共领域，也不属于私人领域，而是填补了二者的空隙。他将社会资本的协作互补和镶嵌作为国家-社会协作的表现方式，有助于推进社会的有序发展。“互补”指公共和私人领域之间一种常规的概念化的相互支持的关系。它们之间有明确的劳动分工，有以财产权为基础的不同制度范围。“镶嵌”指将市民和公共官员跨越公私领域相联系的关系。互补和嵌入相互支持，互补创造了可以建立政府和公民之间合作的客观基础，嵌入则产生了实现潜在的共同利益的规范和互动的基础。^[6]普特南也认为，“社会资本通过国家和市场发挥作用，并且与它们形成互动关系，并没有替代它们。”^[7]科利尔区分了“政府社会资本”和“民间社会资本”，前者指影响人们互利合作能力的政府制度，如契约、法治和政府允许的公民自由范围等，后者则包含共同价值、规范、非正式沟通网络以及社团成员资格等。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都通过克服集体行动困境来帮助解决社会秩序问题。^[8]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社会资本属于既跨越国家和市民社会，而国家与市民社会又存在于其中的第三领域。把它作为一种解释范式运用到乡村治理中，有助于超越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的理论框架，给我们一些新的启示。

二、社会资本与乡村治理

当前关于乡村治理的研究讨论涉及治理主体、治理内容、治理方式等方面。关于治理主体，涉及乡镇组织、农民组织、宗族力量等讨论。对于乡镇的主体角色，既有主张强化国家权力的“强乡论”，也有主张取消乡镇一级建制的“取消论”，还有“乡派村治”的观点。对于农民组织，有观点认为让民间组织承担部分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是现代乡村治理格局的必然要求。同时农村组织中自发形成的乡规民约也成为农村秩序的来源。张静通过大量考察发现：在日常生活中，当国家法律和乡规民约形成冲突的时候，如果后者得到多数农民的支持，常常是胜多败少，原因是它的基层秩序的基石地位，村民日常生活中的保护和惩罚都以它为根据。^[9]也有观点认为农村社会稳定与黑恶势力侵入、农村基层政权与农民有组织维权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于建嵘认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处于剧烈变革之中，虽然没有出现政治真空，但在新旧体制交替和社会转型中，乡村社会的控制体系也出现了一些漏洞，管理不够严密，一些地方基层组织有的瘫痪，有的不够健全，这就给黑恶势力的产生提供了有利条件。^[10]宗族不但对村民选举发挥重要作用，也在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等方面发挥着作用，但也必须认识到它的负面作用。肖唐镖认为：宗族在乡村选举与治理中的作用程度虽然有所不同，但其作用性质却都有着双重的特

点，既有负面的消极作用，也有正面的积极作用，在一定条件下能提升选举的竞争性和公平性，并成为农民抗拒不法侵害而保障自身权利的武器。^[10]王天意特别指出，以宗族为主的农村传统组织在村治中很容易发生变异，亦可以“支撑起乡村黑恶势力的支持网”。^[11]

关于治理方式，针对当前农村社会普遍存在的无序状态，如乡镇关系紧张、农民原子化、边缘化等问题，为了实现乡村秩序，一种主张认为由于农民的“善分不善和”，缺乏组织化能力，需要通过行政嵌入的“国家主导型”方法，自上而下，通过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外在力量来建立秩序。重构当前乡村秩序的希望只能来自于制度建设，传统不仅不好而且也无可避免地衰落了。新生的以代表制民主为典型的由能人到法治的制度建设空间正在长成。邹谠更强调扩大国家功能的“正当性”与“正义性”。他认为，国家开始在一定程度侵入和占领某些社会领域行使某些功能的时候，常常是因为社会本身不能有效地提供“公共好处”(public good)。^{[12] (P225)}另一种主张认为人民公社解体以后，“国家仍试图改造农民传统的生活理念却无力安排村民的一切政治经济生活”；^[13]国家介入基层社会的成本过大，没有必要；^[14]应该通过社会内部自身力量形成秩序，发挥传统在保持乡村秩序中的作用，善待宗族、宗教和习惯法等等。

虽然在实践中二者并没有严格的界限，但两种主张都存在治理的真空地带。在“行政嵌入”的方式中，乡村由于缺乏对国家及其经纪（地方行政）进行监督和抵制的合作能力，地方行政可能以牺牲乡村社会未来发展的基本潜力来达到自己的短期目的，牟取私利。在“内部自生”的方式中，会出现内部过于紧密而抵制、挤压国家政权的情况。村民自治实行以后宗族势力操纵村委会选举的案例不在少数，尤其在社会关联度低、农民合作能力低的乡村，更加容易出现乡村治理的不良循环。比如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一种情况是农民缺乏合作能力而不能内生提供公共物品，乡村凭行政强力干预为农民提供公共物品，其间乡村会凭借行政强力为自己牟取私利，从而损害农民利益。另一种情况是不允许乡村插手村庄公共物品供给，由农民自己合作来解决公共物品供给问题。但在农民合作解决不了的情况下，乡村不能不插手，随即便会出现监督缺位的状况。农民利益在两种治理方式下都没有得到合理的保障。

为此，有研究者主张把国家与农民的关系看作是一种“动态的实践过程”而不是一种静态的结构，通过把握“实践形态”或“实践形态的权力关系”来准确认识当代中国农村的社会生活。^[15]张静通过对华北西村村民要求用“官治”抵抗“自治”的案例考查，指出目前乡村治理研究中的主流框架——“自治与官治”、“国家与农民”互相否定的关系并不能解释中国基层社会的现状。^[16]景跃进提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是消除‘乡政村治’内在紧张的根本出路”。^[17]

从这些讨论中我们发现，乡村治理的研究已经形成一个共识：治理虽然需要权威，但这个权威并非一定是政府机关；治理的主体既可以是公共机构，也可以是私人机构，还可以是公共机构和私人机构的合作。治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的合作、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的合作。^[18]

前述认为，我们不能简单地因为社会资本能够培养信任互惠惯例、促进组织和谐等正向功能，而认为依靠社会资本可以获得乡村秩序。这些仅仅是社会资本的结果，重要的在于要认识到社会资本的来源。如武考克所言，“信任和互惠、公平与合作的规范是通过特定的社会关系的结合来培育的”。^[19]所以从结构范畴来理解的社会资本不失为研究乡村治理的一种新范式。

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分析，社会资本镶嵌和自主在宏观和微观层面有四种表现形式，微观层次上的整合（integration 社群内的关系）与链合（linkage 社群外的关系），宏观层次上的协作（synergy 国家-社会关系）与组织整合（organization integrity 制度的统一、权限与能力），以及它们相互构成的“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16种模式，我们需从这些关系中去寻找社会资本的来源，缺少哪一个，都不能得出适当的发展策略。自上而下的努力通常需要引入、支持“自下而上”的发展并使其制度化，不能囿于“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积极的结果应该是依据占据上风的镶嵌和自主的社会关系的程度来实现。成功的自下而上，需要把链合与整合相结合，即建立广泛的社群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以整合形态存在的社群要不断增加超社群制度的链合；成功的自上而下，需要伊文斯所说的“镶嵌的自主”，既有强大的内部关系，又有确保

这种联系的制度建设。武考克提出要获得理想的治理成果必须拥有四种社会联系：一是在本地社群内；二是在本地社群与那些拥有和外界及公民社会更广泛的社会联系的组织之间；三是在公民社会和宏观层次的机构之间；四是在共同的地区机构之间。确立正确的社会关系并不断积累、动态调整是成功的关键。

许多关于农村发展的研究成果表明，对于当地的经济增长来说，由当地基层协会组成的富有生命力的网络与物质投入、适合的技术或者价格手段一样必要。埃莉诺·奥斯特诺姆已经研究了在管理牧场、供水设施等公共资源时，当地社会资本的存量成为有些措施成功与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协作（synergy）模式下，政府与农民之间的互补（complement），即政府提供必要的资金、规划、设备、技术支持等，促使了生产性交往关系的产生，但如果缺乏嵌入（embededness）即政府官员的直接介入，农民社群对政府、对项目的接纳等，合作也难以实现。可以说，协作意味着公共和私人参与者共同参与生产的过程。公共机构的官员紧紧地嵌入到农村社区中，便产生了跨越公私界限的社会资本。以伊文斯提及的微观金融制度为例，这个孟加拉国的绿色银行，拥有 200 多万贫穷借贷者，大多数是妇女，偿还率达到 97%。作为自上而下的组织形式，它的成功在于提供服务的社群外的行动创立者赢得了村民的信任（高协作），并且帮助借贷人超越其社群内关系进入新的社群外关系（高链合），促使他们适应更加复杂的经济交换行为。

在社会资本视域下分析我国的乡村治理，同样需要在国家与农村社会之间、农村内部形成血缘、地缘、业缘等关系与它们与外部结成的关系之间形成高度的整合与链合，通过“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互动，才能实现乡村社会的和谐局面。

三、发展农村组织网络创建社会资本

一般而言，社团组织作为社会资本产生的前提和基础，充分体现了社会资本的积极意义：促进了社会信任、互惠价值规范的产生，提高了集体行动能力，减少了网络机会主义的产生等等。如普特南指出的，“在市民组织中的参与培养了人们合作的技巧以及对于集体努力的共享责任感”。^[19] 托克维尔指出，各种年龄、各种条件和各种气质的美国人都不断组建各种协会，并预言，如果缺乏这种参与倾向，民主社会就会软弱无力，就会马上陷入野蛮状态。法国学者 H·孟德拉斯在分析法国农业问题时指出，“仅仅把农业劳动者作为个人来进行分析会完全扭曲人们的看法。虽然互识社会已经被广泛摧毁，但它仍然极大地影响着个体的行为，以致人们不能在非中西把个体与他所处的社会分隔开来。个体在这个社会中具有很大的自由，但这种自由恰恰是只有与团体、习惯和束缚相联系才能被理解，因为它必然以某种方式与这些团体、习惯和束缚保持协调一致。”^{[20] (P174)} 尽管个人主义支配着整个农业生活，农民往往哀叹“农民没有足够的团结”，但就各种农业组织（联合会、合作社、信用社、互助会）而言，农民承认“需要这些组织”。^{[20] (P196)} 他认为，参加农业组织和相信各种形式的集体活动的效用，无疑是今天法国农业中的一个进步主义的特征。

德国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托马斯·海贝勒教授也认为，“长期的实地考察使我发现，目前中国农村居民与当地政府之间的矛盾特别大。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农村居民目前还没有形成能够真正代表其自身利益的组织或渠道来表达自身的利益，并疏导冲突。在不存在社会利益组织的地方，团体的愿望和要求也就不能得到表达，其结果是矛盾和冲突以其他的形式——突发的不满、犯罪或者破坏性行为——表现出来。为了缓和社会矛盾，有必要允许利益协会存在。从长远来看，利益组织和协会的存在是社会民主的一个重要表现，也是必然的现象。”^[21]

针对我国目前农村社会问题中突出的农民边缘化、生活贫穷、乡镇关系紧张、组织化缺失等问题，如黄宗智所说的“在某种程度上，农民家庭现在离群孤立，一个个单独地站在国家权力机构面前。”^{[22] (P322)} 那么，发展农村社会组织是创建和维护农村社会资本，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手段。但从指向社会结构范畴的社会资本范式出发，我们认为社会资本来源于跨社群联系（整合）、社群内部联系（链合）、国家-社会关系（组织协作）、国家与有凝聚力的团体的联系（组织整合）等四种社会联系的建立，农村社团组织要以建立这些社会联系为目标，才能创建社会资本。这就需要根据乡村现实的社会结构状况，全面分析农村组织不同维度、不同层次的社会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的不同组合，制定适宜的农村组织发

展策略。严格意义上讲，就是发展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农村组织网络。微观层面有村庄内部形成的团体如宗族、村老年协会、文艺队等（体现整合关系），也包括与村庄外部形成的跨社群网络，如合作社、农协会、项目合作组等（体现链合关系）。宏观层面既有乡镇组织、地方组织、中央农村组织等政府组织，也有各种盈利型组织和非盈利型组织（体现高度协作），还需要高度的组织整合。多种组织主体相互依存，通过“参与”，“谈判”和“协调”等合作的方式来解决冲突，实现一种良好和谐的乡村秩序，真正达到乡村治理的目标。

从微观层面来看，在社会关联度高的村庄，村民一致的行动能力足以抑制许多敢于触犯村民群体利益的行为，使村庄获得良好秩序。但同时如果这种内部的高度关联（整合）不走向链合，不与外部（地域外、行业外、血缘外等）发生协作关系，就会出现“社群的过剩”，成为“非道德的家庭主义”，用小团体的局部利益破坏整个社区的发展。比如宗族势力的过于强大会阻止群体接受外部环境的有益影响，并会极大地引发对非群体成员的不信任、偏狭甚至仇恨和暴力。而对于社会关联度低的村庄，也不能认为它们没有社会资本的“先前禀赋”而无路可走。运用来自外部联系的制度建设、组织变革等“软技术”，也有可能形成社会资本，促进乡村秩序的建立。如于建嵘提出：“为了重建农村社会秩序，在进行利益整合的同时，需要对农村政治资源进行重新配置，其中最为现实的对策就是将具有对抗性的地方权威纳入到农村基层政权体制的运行之中。”^[23]辛秋水认为“组合竞选制”是在根本上打破农村大宗族、家族或权势垄断和操纵的有力举措，它可以缓解本社区内各个门户、家族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优化村委会班子并增强其凝聚力。^[24]

从宏观层面来看，国家层面正式组织的介入和国家组织成员的参与，有助于制度的建设和实施，以及形成国家与农村社会、农民之间的信任关系。健全的公共制度通过重新分配权利、支持地方自发性组织的去中心化和开放，对于地方社会资本的建立和发展目标的实现均有贡献。政府组织引导下的创造行动会增加社会资本，将流动的农民与公共机构联系起来，提高政府的效率。二者的结合是发展的强有力工具。同时，国家、政府组织、政府项目的给予者自身在接受者中的被信任度和被接受度、二者共同培养更加公正平等的社会环境的水平等也是必须考虑的因素。社会关联度低的村庄本身的组织整合已经很低，如果缺乏国家协作和制度嵌入，将处于“无政府状态”，如果国家过度干预，就会出现腐败、破坏公有和私有财产等“掠夺性国家”。而在社会关联度高、组织整合程度高的村庄，如果缺乏国家的参与和制度约束，该村庄容易出现黑恶势力的掌控，导致公共服务管理水平低下，弱势群体得不到保护。

目前有学者关于农村组织的实践调查也证明了发展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农村组织网络对于提高乡村治理能力，维护乡村秩序的重要作用。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系教授 Lily Tsai 在中国几个地方的村庄实地调查发现，在各种村民自发组织比较有能力，并且这些自发组织在村庄公共事务中发挥作用比较好的村庄，村委会、党支部等正式组织的问责性也明显增强。在积极互动过程中，彼此间的约束制衡机制自动生成，这两种组织对于村民都更加负责，村庄公共事务处理得更让村民满意。刘老石认为，新乡村建设最好的切入手段是综合切入，包括民间组织、知识分子、社区带头人、志愿者和基层政府共同作用，形成混合优势。他举例山东鱼台县的姜庄村原来就是干群关系非常紧张的一个村，后来在外来的大学生的帮助下，在当地一个带头人的带领下，建立了自己的社区文艺队，逐渐以文艺活动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很好的公共生活氛围，建立了合作社、老年人协会、妇女协会、养兔协会、养猪协会、图书馆，原来的干群关系也得到了改善，干部愿意参与当地的建设，开始筹建农村互助金融。这样，各种组织互相影响，形成了一个崭新的乡村局面。

综上所述，社会资本属于既跨越国家和市民社会，而国家与市民社会又存在于其中的第三领域。把它作为一种解释范式运用到乡村治理研究中，根据农村自身社会资本镶嵌与自主关系的实际状况，发展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农村组织网络，是创建和维护农村社会资本，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手段。

[参考文献]

- [1] [法] 皮埃尔·布尔迪厄. 布尔迪厄访谈录：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 [2] [美] 詹姆斯·科尔曼. 社会理论的结构（上册）[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
- [3] [美] 罗伯特·D·普特南. 繁荣的社群——社会资本与公共生活 [A]. 李惠斌，杨雪冬主编. 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 [C].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 [4] [美] 爱德华·弗雷. 超越普特南的公民社会与社会资本 [A]. 李惠斌，杨雪冬主编. 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 [C].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 [5] [美] 迈克尔·武考克. 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一种理论综合与政策构架 [A]. 李惠斌，杨雪冬主编. 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 [C].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 [6] Peter Evans. Government Action, Social Capital, and Development: Reviewing the Evidence on Synergy [J]. World Development, Vol 24, No.6, 1996.
- [7] [美] 斯蒂芬·克拉克. 增长与贫困 [A]. 曹荣湘选编. 走出囚徒困境——社会资本与制度分析 [M]. 上海：三联书店，2003.
- [8] 张静. 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 [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 [9] 于建嵘. 农村黑恶势力和基层政权退化——湘南调查 [J]. 战略与管理，2003, (5).
- [10] 肖唐镖. 农村宗族势力与国家权力的互动关系 [J]. 探索与争鸣，1998, (7).
- [11] 王天意. 宗族的功能及其历史的变迁 [J]. 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05, (2).
- [12] 邹谠. 二十世纪中国政治 [M]. 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
- [13] 萧楼，王小军. 互构村庄：权力转换机制与村庄治理结构 [J]. 开放时代，2001, (3).
- [14] 吴重庆. 孙村的路：“国家—社会”关系格局中的民间权威 [J]. 开放时代，2000, (1).
- [15] 孙立平. “过程—事件分析”与当代中国国家—农民关系的实践形态 [A]. 清华社会学评论（特辑）[M]. 厦门：鹭江出版社，2000.
- [16] 张静. 村庄自治与国家政权建设——华北西村案例分析 [A].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编. 中国社会学（第1卷）(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 [17] 景跃进.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下的村民自治 [J]. 中国书评，1998, (5).
- [18] 俞可平. 治理和善治：一种新的政治分析框架 [J]. 新华文摘，2001, (12).
- [19] Robert D. Putnam, with Robert Leonardi and Raffaella Y. Nanetti.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 in Modern Italy [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 [20] [法] H·孟德拉斯. 农民的终结 [M]. 李培林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 [21] 吴志成. 中国公民社会：现在与未来——与德国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托马斯·海贝勒教授学术对谈 [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 (3).
- [22] [美] 黄宗智. 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 [M]. 北京：中华书局.
- [23] 于建嵘. 湖南农村群体性事件的调查和分析 [Z]. “于建嵘博客”，2005-08-25.
- [24] 辛秋水. 村民自治与“组合竞选制” [Z]. 中国乡村网，2002-12-25.

责任编辑：柏桐

全球化的人类学：珠江三角洲乡村研究的新视野

◎ 邹琼

[摘要] 当代的珠江三角洲在全球化格局中占有重要而特殊的位置，是边陲的中心，20多年来发生了巨大的变迁。珠三角因其地理和发展历史的特殊性，形成了研究意义上的独特性，要理解这种变化，全球化的人类学为这一地区的乡村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维度。本文尝试用全球化的角度讨论当代珠三角乡村社会研究的新意义，在此基础上从问题意识出发，重新思考人类学乡村社会研究中的一些概念。

[关键词] 珠江三角洲 乡村社会 全球化 人类学

(中图分类号) C9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7) 03-0086-06

一、全球化的人类学

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全球化日益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关键概念。学者们对于全球化有不同的认识和理解，经济学关注物品和资本的流动，政治学关注跨界的冲突与政策建构等，社会学和人类学则关注在经济全球化之下，多元性的文化世界如何维持下去？^{①②③④}被人们引用较多的有安东尼·吉登斯的全球化定义，他延用了S.Hall“想象空间”的概念基础，提出了“时空伸延”(time-space distanciation)的概念，指用来联系在场与缺场的时间和空间被组织的状态。传统的简单社会中人们的社会生活联系离不开面对面的环境，而现代性的发展则表现为社会生活对时间和空间的跨越。因此吉登斯将全球化定义为：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关系的强化，这种关系以这样一种方式将彼此相距遥远的地域连接起来，即此地所发生的事件可能是由许多英里以外的异地事件而引起的，反之亦然。^{⑤⑥⑦⑧⑨⑩}戴维·哈维则把全球化视为“时空浓缩”(time-space compression)，即指由于技术与经济变迁从而使人们的组织和活动不再容易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时间在资本的循环流动周期中被重组了，空间则同时缩小了。

不论如何对全球化进行定义，都不能否认这是一个复杂而矛盾的社会发展过程。全球化同时也是一个不平衡的过程，其中隐藏了性别、种族、阶级、贫困等许多悖论话语，文化的同质性和异质性在其中相互博弈。人类学作为一种有着跨文化研究传统的学科，在当今的全球化格局中能够提供独特的视角。从人类学的角度看，在吉登斯等人的时空概念中全球化包含了如下一些基本的因素：一是基于交通和信息的世界发展模式的条件之上的全球性互动行为和过程的发展；二是世界性的联系与互动的加强意味着跨界的联系存在着规律性而非分散性或随意性；三是社会文化和政治经济的伸展可以使世界上某个地方与其他相隔甚远的地方间发生联系；四是全球化也包含了全球与地方之间一系列日渐增多的牵连关系，地方发展不得不受制于全球的影响。^{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⑲⑳}与其他学科总是倾向于研究大范围的经济、政治或文化过程不一样的是，人类学更关注全球与地方的连结，也就是指全球过程是如何存在于特定社会的具体事实中，如何影响这些社会中人们的生命历程与历史文化积累。全球化的人类学与全球化的方地性和关联性本质有关，它不急于仅仅描述资本、人口或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全球流行趋势，而是更努力地理解当特定地区的人们越来越多地卷入全球性的、广泛的社会过程中时他们的生活经验、命运变化和情感体验。人类学更多地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和行为实践保持持续、稳定的关注，也即关注作为全球化过程主体因素的不同文化中人们的调适。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人类学的对象也应被视作全球化过程的产物。尽管人类学家在一般的印象中总是

作者简介 邹琼，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博士生，东莞理工学院政法系讲师（广东 东莞，523000）。

在偏远的乡村经历“孤独的田野生涯”，但进入21世纪以来，几乎再没有什么孑然独立的世外桃源了，与世界的文化联系随处可见。而且，作为全球体系之中的地方或族群，常常在文化上表现出双重的特点，即同质性与异质性的二元特点。^{[4] (P313)}因此，即使在人类学最传统的乡村社区研究领域也无法回避对全球化的回应，发生在当地社区中的各类事件都可能追溯到某些时空距离之外的因素的影响。我们完全可以设定，一个乡村工业区里小小的玩具工厂中老板和工人们的生活和生产，与美国流行文化的风向是相关的。与此同时，“东莞塞车，全球缺货”的说法也告诉我们这种追溯是可逆的。在这样的条件之下，人类学对地方社会的观照必然要加入全球化的维度。在新的社会形势发展之下，原有的传统社会人类学的国家—社会二元结构框架解释力度有所减弱，应该建构一个三维的研究框架，即在其中加入全球化的维度。在这里全球化不仅仅是作为研究的背景而出现，而是作为一个研究维度而存在。吉登斯提供了全球化维度的四个方面：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民族国家体系、国际劳动分工和世界军事体系，^{[2] (P58)}来作为现代性研究的参考，但在人类学的研究范畴中，这些宏观架构还需要与地方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达到解释的效果。人类学研究引入全球化的维度还有可能建构一种更具普遍性的比较框架，在全球化的平台上，珠江三角洲乡村的变迁可以与墨西哥尤卡坦的乡村城市连续统模式，^[5]或与纽约的流浪者社区^[6]进行跨越时空的比较。

二、当代^①珠江三角洲乡村研究的全球化意义

一般来说，进行中国社会研究的学者们习惯上把研究区域划分为华北研究、华南研究、东南研究、西北西南研究等，对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研究以往大多是作为华南^②研究的一部分，主要是因为在与中原文化的比较当中，把华南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来表达中心与周边的格局成为一个必然。然而在我们今天看到的华南社会，这种整体性似乎已经被全球化的浪潮冲破了，全球化的那种不平衡的发展过程在华南地区照样延伸开来，珠江三角洲地区与华南其他地区似乎也形成了某种中心与周边的格局。

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地区成为大陆承受全球化第一波的地方，财富迅速积累，人口剧增，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城市化进程加快，整个社会形貌与其他华南地区都有了较大的差别。从社会变迁的角度来看，珠三角地区在人类学的研究中已经具有作为一种较为特殊的、独立的研究对象的意义。这种独立性主要表现在：一是珠三角地理形态的一致性。珠江三角洲位于广东省大陆的南部，是西江、北江、东江下游的冲积平原，范围包括西、北江思贤滘以下的西北江三角洲和东江石龙以下的东江三角洲。行政区域涉及广东省的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门、中山、东莞、南海、顺德、增城、花都、从化、番禺、三水、鹤山、新会、高明、斗门、台山、开平、恩平等20多个市县及香港九龙半岛和澳门半岛，流域面积26820平方公里，占珠江流域总面积的5.91%。这一带区域具有一致的地貌特征、气候水文特征。二是珠三角发展历史的独特性。珠江三角洲是中国大陆最早卷入全球化浪潮中的地区，从1978年第一家外资的“三来一补”企业在虎门建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引入就已标志着这一地区跻身于全球化的经济秩序之中，全球化所带来的物品的流动、人口的流动、资本、形象与观念的流动在这一地区日渐成为普遍的现象，珠三角的社会变迁也逐渐完成了由内发性模式向全球性的外发性模式的过渡。这个昔日的渔米之乡已经成为了新兴的泛都市区。^{[8] (P5)}乡村城市化、城中村、工业区等等这些与全球化密切相关的乡村新现象如今在珠三角已经成为常态，在城市化程度高的城市郊区、农村甚至还产生了村落的终结^[9]的假设。

资本的全球流动是全球化的最主要和最明显的特征。外资在珠三角地区显示出了均衡的村镇倾向，与之相一致的是以村镇为主导的快速城镇化。在珠三角地区，外资的分布已呈现出以村镇为主的倾向。大量外来劳动密集型的轻型产品制造业落户在村镇，加速了乡村工业化和乡村—城市转型的步伐。外资的涌入，在广大农村地区兴建外资企业，不但吸收了当地农村剩余劳动力，而且为大量来自区外、省外的迁移人口创造了就业机会，将村庄变成一个工业和非农人口的新的聚集地。同时也导致乡村工业化和村庄自然

①本文中“当代”主要指从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到现在的时间范围。

②麻国庆教授对华南作的定义：华南主要包括广东、广西、福建、台湾、香港等地，研究重点集中在广东境内。^{[7] (P1)}

城镇化同步进行，使农村景观迅速向城市景观转变，从而形成了一种“外向型城镇化”模式。^{[10] (P19-20)}

珠三角乡村研究的全球意义还表现在这一地区内各种不同族群的互动、竞争与融合的过程中。在珠三角，除了居住历史较久远的广府人、客家人和水上居民以及瑶、苗等一些少数民族族群外，随着改革开放后打工经济热潮而涌入的来自全国各地的“新客家人”群体，对当地社区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同时，国家政策的进一步开放，与海外联系的增加，不仅使海外华人与珠三角的侨乡地区联系更紧密，而且还有了数量日益增多的常住或是通勤的港澳台人群体和外国人人群体。不同族群的文化之间，地方文化与全球文化之间在这里构成了一个多元而复杂的文化体系。要理解这一体系里的各种现象就必须理解其中同时具有的地方化和去地方化的双重趋向。

回顾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珠江三角洲乡村研究，人类学在这一区域的研究日益增多，值得注意的是，海外学者所做的当代珠三角乡村研究与国内学者的研究存在着某些差异。前者多数以传统的特定社区分析的方法来讨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变迁，后者则越来越倾向于超越乡土社会之上的都市人类学的研究。以萧凤霞的《华南的代理人与受害者》为例，这是对新会环城区（环城公社）所做的民族志田野研究，她在其中梳理了环城地区从明清时期到上世纪 80 年代的社会文化的变迁过程，这个变迁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49 年以前的传统社会时期，49 年到 70 年代末的革命时期，以及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初的所谓后革命时期（postrevolution）。研究了社会历史变迁的三个方面：农村社会经济组织的变迁，国家和各种农村精英以及普通农民之间在权力领域内联系的变迁，农村居民对权力与权威观念的代际差异的变迁。主要探讨的是国家权力在向地方渗透的过程中地方权力结构和权力角色的变化，国家政权与地方自治之间维持的某种微妙的平衡的实质。49 年以前这个地区作为周边地域的中心，有自身很有活力的社会和经济的运行机制，49 年以后的文化革命时期乡村地区原有的文化和政治经济结构被彻底改变，乡村社区日益细胞化，而改革开放后，国家权力一定程度上回缩，农村社区的自治空间得以一定程度上伸展，在这样一段历史时空中，这个华南乡村社会中精英农民（农村干部）和普通农民的位置、作用和相互关系的变迁。^{[11] (P6-7)} 波特夫妇在东莞茶山增埗社区所做的调查，同样是描述和比较了当地社区的历史变迁过程，所划分的阶段与萧凤霞的三个阶段基本吻合，主要探讨了不同时期农村社会的经济、政治是如何运转的，比较了生产队合作制与家庭承包制对生育意愿、家庭经济发展和妇女地位的不同作用。与此类似的还有华生（Jamed L.Watson）的新界调查等。

本土研究者的研究则大致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的取向：一是历时性的取向研究。主要探讨乡村社会的变迁过程，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的特点如何等，比如一些对以往乡村研究的追踪调查，大多是在原有的研究框架之内，运用社会变迁理论解释当代的新现象，如孙庆忠对南景村的调查等。还有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兴起的历史人类学（社会史）研究，更是关注明清以来珠江三角洲的开发、商业化、宗族与土地制等多元话题。^① 一是共时性的取向研究。主要探讨乡村社会中各项制度是如何运行的，乡村社会内部的社会关系怎样互动等，更关心的是乡村社区在全球化和城市化的潮流中和超越乡村意义之上的现状、原因和策略等，如折晓叶做的深圳“超级村庄”的研究，将村庄看成一个合作经济组织。这种新型农村社区的出现是农民为了顺应新的形势（全球性的市场）建立合作组织的一种企图，她认为超级村庄的出现，是农民以个体进入市场以后发现自己无法应对市场的风险，因而需要村庄提供保障后的自我选择。村庄经过工业化之后，自身成为一种非农经济力量，村庄也是一个重要的区域关系载体。^{[12] (P355)} 还有的研究者则比较倾向于对社区的进行结构—功能分析，或是通过一些过程—事件途径分析的研究，或是通过社区分析进而了解其背后的社会结构，比如对石牌村^[13] 的研究。大多数具体的实证研究是两种取向相结合的，研究者希望通过当代珠三角乡村社区的调查，以发现其中的“乡土性问题”，并通过具体个案演绎出这个边陲的中心

^① 有关 20 世纪华南社会史的讨论，可参见黄志繁《二十世纪华南农村社会史研究》一文，见网页 <http://www.agri-history.net/rural/20century%20rural.htm>。

地区变迁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机制的法则。海外研究者与本土研究者在兴趣点上的差异，可能是由于与田野中“他者”的距离不同而导致目的意识不同的结果：前者面对的是传统的人类学的田野，是纯粹的“他者”，与在非洲的部落社会或大洋洲的岛屿社会的田野类似；后者则承继着费孝通先生“富民”的人类学研究思路。

三、思考与问题

要应用新的全球化的维度研究珠江三角洲乡村地区，就要对这个地区各种新的社会因素与现象进行再思考，尤其是对人类学所关注的以下一些核心概念进行思考。在思考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了一些新问题。

(一) 重新思考家庭和宗族。从葛学溥的家族主义类型到弗里德曼的宗族模型，再到华生等人的新界研究对弗里德曼模型的修正，宗族是传统华南乡村研究的核心概念之一。近30年的阶级革命对于旧传统的颠覆作用是巨大的，国家权力深深地扎根于乡村，这一时期宗族的概念几乎完全被废止。改革开放后，国家权力逐渐从乡村回缩，乡村政治空间的缓和使得一些残存的宗族力量得以延息、生长，但这时的农村宗族与革命前的宗族有所不同，已不再是原型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了。有的学者描述了改革开放后宗族复兴的现象，认为这种宗族活动的复苏与全球化之间存在复杂关系，这些复苏活动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种形式的认同的建构，是对全球化进程之吊诡式的反应和回响。^{[14] (P93)} 也有学者认为文革后传统仪式与宗族组织的再出现并非旧传统的复兴，因为新出现的仪式和组织从形式到内容都受到了政府的监控和管理，年轻一代对这些东西的认同也发生了改变。^{[11] (P10)} 当代珠三角乡村中所见的宗族组织和仪式表现确实是传统的复兴吗？或者说是传统宗族残余的再造？很多乡村中兴起修祠堂和修族谱的活动，这些活动是农民对原有家族体制和亲属网络的回归吗？从另外的角度看，我们可以认为，这种与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同时产生的修族谱的热情，可能是村民们经历了革命文化的同质性的洗礼后，出于对全球化带来的地方性危机的内在恐惧，转而在本地社区中通过对宗族的重新追溯寻求自我认同的活动。这种地方性危机主要是因为市场有着天然的消解传统关系和社会秩序的倾向，因此宗族的“复兴”可以理解为社区“再地方化”的一种反应，在这里，宗族是与归属、定位、认同、安全、信任、忠诚相关联的，农民们在现代性的伸展(stretch out)过程中重塑社会认同，这也是全球化悖论的一个表现。

当代珠三角乡村中的家庭和宗族结构与形式都有了变化，核心家庭的比例大大增加，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类型正从传统的家族社会网络向核心家庭社会网络转变。作为现代化民主制度表现的村民委员会直选的政治活动与新形式的宗族力量之间会产生什么样的关联，这些关联会导致家庭和宗族形态发生什么变化？有什么新的特点？能否在新的民族志基础上进一步修正以前的宗族模型甚或提炼出一种新的模型呢？在全球化维度下，我们有必要思索这些新问题。

(二) 重新思考性别。早期的珠江三角洲乡村研究没有把妇女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视角，从社会性别角度去分析这一地区的农村社会可能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与全球的女权主义运动浪潮相联系。有学者用“性别不平等的内衍和革命”来形容华南妇女地位在传统与现代两种情境中的状态。^{[15] (P243)} 今天我们能看到性别的意识形态遍及社会关系的各个层面，因此珠三角乡村社会的性别也应放到当代的政治经济语境和全球化框架中去重新思考，传统和现代对于性别角色与性别分工在界定上的巨大差异是怎样碰撞或融合的？例如珠三角的一个特殊的女性群体“出嫁女”的出现，就是全球化带来的村庄集体(股份)制经济发展的产物。农村的女孩未嫁时可以享有一份村中集体经济的分红(富裕的村庄每人每年的分红达数万元)，一旦嫁给外村的人，该份福利立刻中止，而娶入一个女性的村庄却并不会由于迁入一个新人而多分给新人一份，因此，村庄的集体经济所有制与地域观念和父系继承观念的紧密结合，使出嫁女成了现代化乡村经济格局与传统性别结构双重作用下独特的边缘群体。富裕村庄中女性的婚姻成为一个令人焦虑的问题，爱情不得不在地域与利益圈定的范围里左冲右突。

另外，与性别相关的婚姻的变化中人口流动的特征十分明显，全球化经济给珠三角的乡村地区带来了工业区的形态和大量的外来人口，也使原来相对封闭的乡村通婚范围扩大，跨地区、跨省份婚姻和越来越

常见的“外来媳妇本地郎”的现象中蕴含了什么样的性别意义？这在原来村落当中的性别互动中增加了什么样的变量？不同社会位置的人们如何通过性别来体验和构建经济、亲属关系和仪式？在与外来人口的互动中通婚圈半径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些变化与乡村社区的开放与发展之间存在着规律吗？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进一步去思考。

(三) 重新思考权力。权力、权力结构、权力话语，这些概念越来越成为人类学田野研究中的关键词，人类学家语境中的权力多数受福柯的影响，认为权力指操纵一个体系的能力，存在于任何不平衡的社会状态中。乡村研究虽然关注的是微观社区的具体生活，但对具体生活的理解离不开相关的制度性场域和国家情境。对于乡村权力的研究，大多数研究者是在国家—社会框架内寻找权力的阶梯结构。比如萧凤霞的新会研究中把农村干部这个群体视为“国家的代理人”，是与传统社会的乡绅阶层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乡村变迁过程中的核心。^{[11][29]}她认为农村干部虽然在农村社会中的调停者的角色地位颇类似于传统的乡绅，甚至在一些充当国家与地方连结纽带方面的做法也相近，但是由于整个社会结构和文化内涵发生了变化，这个群体的内部构成与乡绅阶层已不同。而后者在杜赞奇对1949年以前的华北乡村社会研究中被称之为“政治经纪人”。^{[16][28]}大多数的研究或者是在这个框架内解释乡村权力的构成与博弈，或者是用不同的田野资料印证或是修改这一框架，发展出一些新的权力范畴概念，如“政权经营者”，^[17]“谋利型政权经营者”^[18]等。

进入21世纪以来，华南乡村社会的变迁十分剧烈，特别是珠三角一带的农村地区越来越直接地融入全球化进程之中。全球化是一个整体性的社会变迁过程，它在极大地影响各国经济生活的同时，也对各国的政治生活发生着日益深刻的影响。它同样以各种方式影响着进入这个全球化链条中的每个地区的权力格局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在珠三角地区，这种改变会导致什么样的乡村权力新格局？在这样的情境中农村社会是如何整合的？谁在支配和控制着农民的生活？农民通过哪些途径与国家联系在一起？不同的利益群体会采取怎样的生存策略？怎样回答与解决这些问题，是我们当下亟需研讨的课题。比如现在广东省各市都在推进的“村改居”工程，要求配合加快城市化发展的进程，在一定时期内成建制地把大批村委会改成居委会，农村村民改成城市居民（不论是身份上的还是权益上的）。“村改居”工程不应仅被当作一项单纯的政府政策来理解，它的出现和推广都与全球化的影响相联系。全球化促进资本、劳动力日益集中，城市化速度成为全球化的风向标之一。城市化的发展必然要求越来越多的农业地区转为城市用地，这种必然要求成为政府决策者的观念的一部分，最终以政策的形式向农村社会推进，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和社会的整合度进一步加强了。这种整合与改革开放前以革命的或运动的形式推进的整合不同，它是与全球化在国家到社会各个层面的文化、观念甚或伦理等全方位的变迁同时发生的过程中产生的。这项政策对农村社会的改变将是巨大的，可以说是经济全球化对地方政治形态的一种重构，其后果现在还难以预料。

四、结语

总之，所需要问的问题不仅止于此，但提问是一种思考方式，问题意识可以指导我们沿着某种路径去思考文化与社会。当代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有着复杂的时空位置：在全球化格局中，中国处于边陲地位（第三世界），华南在中国的传统区位模式中居于周边，珠江三角洲则在华南地区成为中心部分，但同时，它又是直接整合入全球的经济秩序之中。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对珠三角乡村社会变迁的研究即是当代社会进入全球体系过程的窗口式的研究。费孝通先生曾指出，在全球化的时代，人类学是大有可为的学科。人类学善于把握全球与地方的关联性，对地方日常生活的关注能够产生与众不同的问题意识，同时，也需要在更多的、翔实的民族志的基础上突破旧有范式，重新思考田野定位，尽力去理解全球化浪潮中珠江三角洲乡村地方生活中蕴含的本质。

[参考文献]

- [1] 麻国庆. 费孝通先生的第三篇文章：全球化与地方社会 [J]. 开放时代, 2005, (4).

- [2] 安东尼·吉登斯. 现代性的后果 [M]. 上海: 译林出版社, 2000.
- [3] Jonathon Xavier Inda and Renato Rosaldo. The Anthropology of Globalization [M].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2002.
- [4] 麻国庆. 走进他者的世界 [M].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1.
- [5] Redfield, Robert. Tepoztlán: A Mexican Village [M].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30.
- [6] Passaro, Joanne. The Unequal Homeless: Men on the Streets, Women in their Place [M].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 [7] 麻国庆. 作为方法的华南: 中心和周边的时空转换 [J]. 思想战线, 2006, (4).
- [8] 周大鸣. 泛都市区与珠江三角洲未来发展方向 [J].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 2003, (2).
- [9] 李培林. 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 [10] 桑东升. 珠江三角洲地区乡村—城市转型研究 [J]. 城市规划汇刊, 2003, (4).
- [11] Helen F. Sui. Agents and Victims in South China: Accomplices in Rural Revolution [M].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 [12] 折晓叶. 村庄的再造——一个“超级村庄”的社会变迁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 [13] 郑孟煊. 城市化中的石牌村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 [14] 范可. 旧有的关怀、新的课题: 全球化时代里的宗族组织 [J]. 开放时代, 2006, (2).
- [15] 乔健. 性别不平等的内衍和革命: 中国的经验 [A]. 华南婚姻制度与妇女地位 [M]. 南宁: 广西民族出版社, 1994.
- [16] 杜赞奇. 文化、权力与国家 [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4.
- [17] 张静. 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 [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0.
- [18] 杨善华, 苏红. 从“代理型政权经营者”到“谋利型政权经营者” [J]. 社会学研究, 2002, (1).

责任编辑: 杨向艳

试论解决当前我国社会乞讨问题的对策^{*}

◎ 王保庆

[摘要] 本文把乞讨现象放在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宏观背景下，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别寻求解决对策，对于关注弱势群体，维护社会稳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都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 乞讨 乞丐 社会问题 对策研究

(中图分类号) C9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7) 03-0092-06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性成就，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但也存在一些影响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健康发展的社会问题。乞讨问题就是比较突出的一例。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解决乞讨问题作了初步思考，以期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有所帮助。

一、宏观思考

(一) 大力发展经济

大力发展经济是解决乞丐问题的根本对策。而由于农村是乞丐的主要流出地，因此，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又是解决乞丐问题的重中之重。

乞丐潮的重新泛起，来得太突然、太凶猛，而且是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经济大力向前发展的社会大背景下形成的。问题就在于：农村经济的衰退可以引发乞丐潮，农村经济的发展为什么同样引发乞丐潮？80年代以来的乞讨现象的重新抬头，其真实的内容就是农村的隐性失业在城市的公开化。在中国城乡隔离的二元体制下，大量剩余劳动力蛰伏在单一的种植业部门。封闭的格局一经打破，大量农村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少数人无以为生，便极有可能沦为乞丐。因此，做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安置与转移工作，解决其就业问题，是防止乞丐生成的关键。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就已经指出：“要积极鼓励和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向非农业转移和地区间的有序流动。”如果说让农民回到土地上是一场伟大的革命，那么，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同样是一场伟大的革命。而要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就要靠农村和城市推拉的合力来实现。

一要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增加农业内部和农村地区就业，开发农业的深度和广度，大力发展畜牧、水产、蔬菜、水果等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和优质专用农产品生产，科技兴农，改造低产田，增加经济作物，大力发展林、牧、渔业，加快农产品质量标准和检验检测体系建设，大力发展战略化经营。继续抓好水利、公路，农村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继续推进粮棉流通体制改革和农村稳定体制改革，减轻农民负担。

二要加快城镇经济建设步伐，加速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积极支持并引导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把小城镇的发展同乡镇企业的改造、提高结合起来，以城镇化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实现城乡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调整城乡收入分配格局，消除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就业的各种制度性障碍，增加农民的就业机会，增加农民收入。将西部大开发战略与就业目标紧密结合，进一步扩大以工代赈的规模，将扶贫和

* 本论文是王保庆博士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我国城区乞讨群体现状调查及对策研究”的子课题，课题批准号为：04CRK001。

作者简介 王保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博士后研究人员（北京，100703）。

就业有机地结合起来，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开辟新的就业途径。

三要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城市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中枢。上世纪 80 年代特别是 90 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就集中地体现在城市的发展上，其社会经济发展的许多重要指标都在全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如 1996 年我国全部城市的第二、三产业生产总值占全国 70.2% 和 83.0%，工业总产值占 76.0%，固定资产投资占 46.1%，房地产开发投资占 93.2%。因而城市的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量是很大的。尽管城市每年都有相当数量的新增劳动力以及近些年日渐增多的下岗待业人员，但是面对进城流动人口的低成本劳动力，他们在城市非正规部门和正规部门的非正式职位上都明显缺乏竞争力，于是那些以脏、累、险和低收入、少福利为特征的大量的就业岗位便成为吸纳流动人口的强劲拉力。与此同时，随着城市改革的深入，粮食、住房、燃料等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已纳入商品化轨道，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的市场化和社会化的程度也在提高，这些又为不具备正式城市居民身份的流动人口在城市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最起码的条件。另外，90 年代以后，不少城市允许具备一定条件的流动人口（如在城市购置商品房、携带一定数量的资金、具有专门知识和技能的外来人口等）可通过一定的程序办理与正式城市居民近似的一种特殊户口（如所谓“蓝印户口”）以至转为正式城市户口。所有这些都促进了 80 年代尤其是 90 年代以来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迅速增长。正如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所说：“农民——这是中国工人的前身。将来还要有几千万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工厂。如果中国需要建设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1] (P107)}

（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1. 社会保障政策应适应我国国情。制定我国的社会保障政策必须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社会的基本特点和实际情况，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水平和各方面的承受能力出发。在现阶段制定社会保障政策应坚持“高水平、广覆盖、多层次、低成本”的基本思路。高水平，即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水平出发，国家只能承担最基本的社会保障，对保障对象的保障形式、项目设置、待遇标准、资金筹集方式等的确定，都应以能够保障基本生活为出发点。广覆盖，即打破所有制的区别，先覆盖城镇各类从业人员，逐步扩大到农村，最终扩大到全体劳动者。这是社会保障必须遵循的普遍性原则。多层次，即社会保障的方式和途径必须多形式、多层次、多渠道，在开展社会保险即基本保险的同时，必须充分调动社会成员及社会各方面的力量，通过发展企业补充保险、商业保险，积极开展社会援助，鼓励进行个人储蓄积累保险等多种形式，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低成本，即建立集中统一的社会保障机构，尽量降低管理成本。

2. 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法律体系。国家可以通过立法，推动建立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从“家庭自我保障”和“完善救济”发展到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正是各国政府用法律手段强制推行的结果。相对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实际需要，我国社会保障立法工作还严重滞后。从大的方面来讲，我国的社会保障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和优抚安置等内容，我们必须尽快制定社会保障法，社会救济法和优抚安置法。这些不同的法律法规制度，还可以进一步细化其内容，制定更具体的法律法规。同时，在加强社会保障立法的同时，还要加强社会保障制度与其他部门立法相衔接，以增加社会保障制度执行的严肃性。

3. 切实解决城市化进程中新型城镇人口的社会保障问题和农村社会保障问题。今后几十年间，中国每年将有一千多万农村人口转变为城镇人口。如何将数量如此巨大的新型城镇人口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是中国社会保障现代化进程中必须解决的大问题，由于失业、医疗、工伤、生育、最低社会保障等项目不要求连续性，因此可以在现行城镇社会保障制度的框架内，将新增城镇人口直接纳入保障体系。考虑到这部分人口的特殊性，可在最初的三五年过渡期内，其各项保险的缴费率和补偿标准同原城镇居民有所差别，过渡期满后实行并轨。养老保险要求连续性和积累，解决的办法目前来看可以有：对因征地而转为城镇居民的农村人口，实行“以土地换保障”的原则，从征地补偿费中划出一部分（数量由测算后制订标

准) 为其建立个人账户。对因非征地原因转为城镇居民的农村劳动人口, 可由本人补缴积累建立个人账户, 或在放弃土地的前提下, 由原行政村为其补缴积累建立个人账户。总之, 我们应当主动、积极、创造性地探讨, 把社会保障现代化和农村城市化进程有机结合起来。

(三) 抓好计划生育工作, 促进“两种生产”的平衡

当前我国社会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继续增加和膨胀, 主要是新中国成立最初的 20 多年人口政策的失误造成的。这种失误可以理解为我国工业化的过程或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过程, 与人口模式的转型过程没有同步, 也就是说“两种生产”的失衡问题。社会的人口生产, 从基本模式来讲, 一般都遵循如下规律: 由高生育、高死亡、低增长的模式, 过渡到高生育、低死亡、高增长的模式, 之后再过渡到低生育、低死亡、低增产的模式。这是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都曾经历的过程。这种过程是和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转变完全同步的。具体的讲, 即是: 当这些国家处于农业社会阶段时, 其人口生产模式即为第一种; 当这些国家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时, 特别是当工业革命与工业化大力进行时, 这些国家的人口生产模式便转为第二种; 当这些国家的工业化完成并进一步向所谓“后工业社会”发展时, 它们的人口生产模式便转为第三种。这样一来, 发达国家便始终处于社会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协调的状态, 没有发生过像我国或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普遍存在的人口压力。

我国人口生产模式的转变完全不同于发达国家。当工业化还谈不上什么起步时, 我国人口生产的模式便已由第一种过渡到了第二种, 并且还由于人口政策在 20 世纪 50、60 年代的重大失误而造成了人口的急剧膨胀。这样, 当 80 年代我们的工业化、现代化开始向新的高度进军时, 全国, 特别是农村, 已积聚了令人吃惊的庞大的人口, 而我国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却远未完成。于是, 人口模式也不可能由第二种向第三种转变, 人口压力也就越来越大。当前的“民工潮”, 正是这一压力加剧的表现。因此, 必须坚持不懈地在农村贯彻我国的基本国策——计划生育政策, 以促进“两种生产”的平衡, 实现我国经济的良性发展。

(四) 加强流动人口的控制和管理, 尤其是农民工的引导和管理

首先, 要加强政府对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的宏观指导, 协调克服“民工潮”的盲目性和无序性。其次, 要综合运用各种管理手段, 建立和完善相应的管理法规和机构网络, 保障“民工潮”的合理流动和布局。再次, 要逐步改革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 为劳动力在地区间、产业间和城乡间的自由流动和形成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创造条件。最后, 要运用政府和民间各种渠道, 扩大对外劳务输出市场, 积极开拓国际劳务输出的门路。

(五) 完善社会支持体系

对弱势群体的扶助, 包括物质上的救济、生活上的服务、精神上的慰藉、道义上的声援等。在现阶段, 政府在保护弱势群体、制定有关社会政策方面处于主导地位, 政府通过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 保障弱势群体最基本的生存条件。但弱势群体还无法得到社会保障制度的全面支撑, 政府把弱势群体完全包揽下来既是不可能的, 也是不现实的, 这就需要有政府之外的社会力量向弱势群体提供支持。社会支持就是一定社会网络运用一定的物质和精神手段对社会弱者进行无偿帮助的一种选择性社会行为。尤其在我国社会转型急剧加速的特殊历史时期, 随着传统家庭支持功能的下降、劳动力过剩和隐性失业的显性化、结构性失业的加剧、人口老龄化的压力以及收入差距的拉大, 关于老年人、残疾人、失业人员、孤儿、高校贫困生等社会弱者的支持问题已日益凸现出来, 仅仅对原有的社会保障体系进行零敲碎打的改革已远远不能解决问题, 原有的社会保障体系已明显不能适应社会转型的现实要求。在这种现实情况下, 如果用社会保障取代社会支持, 就会使社会弱者的支持问题极度激化。这一点已被西方发达国家发展早期阶段的教训所证实。其实, 一个社会只有当它的社会支持系统整体结构完整而且能充分地发挥各部分功能时, 才能真正解决对社会弱者的支持问题。目前, 由各种非政府组织、社区、人际关系网络以及志愿者组成的社会支持系统正在显示帮助和支持弱势群体的强大功能, 并构成为社会安全网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六）普及科学文化知识，提高农民素质

教育农民，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有利于广大农民的脱贫致富和乞丐问题的解决。事实证明，教育落后，农民文化素质较低，不仅影响他们对谋生方式的优化选择，也是农业实现转型的巨大障碍，毛泽东早就说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时下“治贫先治愚”、“脱贫先脱盲”的文化“扶贫”就是通过教育农民，使其变成新的文化人，从而增强自我发展能力，实现根本性脱贫。具体来说，就是要使贫困人口养成开放创新的思维方式，确立崇尚竞争、讲求效率、尊重科学、推崇创业奋斗的价值观念，培养健康、文明、科学的生活方式，培育出新型的民族文化。

二、微观治理

由于当前我国的乞讨现象主要是长期城乡二元体制在社会转型期的负面效应所致，因此要从根本上遏制当前乞讨现象的发展势头，必须采取调节社会结构，大力发展经济，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治本之策，最终提高社会的整体效益，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要做到这一点，则必须等到中国社会转型的完成和现代化的初步建立后才能实现，这需要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因此，在转型时期解决乞丐问题还必须以治标形式表现出来。

（一）甄别身份，区别对待

1. 对原生乞丐，按照《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及《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做好救助管理工作。

2003年6月20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了81号令，公布《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救助管理办法》)，并于8月1日施行，同时1982年国务院发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以下简称《收容遣送办法》)废止。与《收容遣送办法》相比，《救助管理办法》是一种制度的进步，是将强制性收容遣送改为关爱性的救助管理，把过去允许收取一定费用变为无偿救助，并明确了受助对象是在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对救助对象、救助方式、救助内容、救助期限，以及如何处理受助人员的违法违规行为等都有明确规定。其中针对救助工作人员的“八不准”职业规范，非常有助于政府树立人文关怀和福利关怀的崭新形象。

2. 对职业乞丐实施软控制和硬控制相结合的策略，同时解决相关法律、制度缺位的问题。

生活无着落的流浪乞讨人员是救助管理的对象，但是流浪乞讨人员的构成确实是复杂的，有资料表明，在流浪乞讨人员中有各种违法行为的占15%，而80%的乞丐基本上是职业乞丐。对确实违法者的惩处已超出了《救助管理办法》要处理的问题范围。因此，以乞讨为生财手段的好逸恶劳的职业乞丐，属于特殊教育对象，既流浪乞讨又无理上访或偷蒙拐骗从事违法活动者，属于社会治安管理对象，少数犯罪逃逸或流窜者，属于刑事惩治对象。因此，对职业乞丐要区别对待，做到软控制和硬控制相结合。

软控制即文化控制，它侧重于人的思想教育方面，目的是要将社会对个人的外部要求内化为人的自我内心尺度。针对职业乞丐的好逸恶劳观念和急于致富的心态以及不劳而获的寄生思想，社会应大力宣传正确的劳动观，鼓励人们自食其力，树立劳动光荣的观念，关心他们的生活，同情他们的处境，从各方面感化他们，注重培养他们自尊、自爱、自强、自立的人生观，从根本上遏制屡收屡改、屡送屡返的恶性循环现象。软控制一般包括法制思想的教育，道德品质的教育以及职业技能的培训等。硬控制，即要针对乞丐群体中存在的一些犯罪现象，由公安司法部门进行有的放矢的打击。

此外，对于乞丐群体中特有的、隐藏着的违背社会道德和规范的丑恶现象，如经营乞丐现象、以欺骗行乞、租童乞讨、人为制造残疾乞丐等现象，暂时还没有专门的法律法规对其进行规范，处于一种“制度真空”状态，解决“制度缺位”问题必须抓紧制定和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通过制度化的手段来遏制和防范此类现象的出现和蔓延。

（二）做好流浪乞讨儿童的救助管理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保护未成年人，是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

团体、企事业单位、城乡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和其他成年公民的共同责任。”可见，对流浪乞讨儿童的社会支持，是全社会方方面面都必须参与的大事。具体来说，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 完善相关法律框架和司法保护服务体系。

对流浪乞讨儿童可针对性地进行立法。如修改和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虽然该法第二十九条规定流浪儿童问题由民政部门管辖，但是这些规定过于笼统，难以操作。况且，该法实施已经十多年，国家和社会现实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修改和完善该法的任务也应当提到立法的议事日程。法律在明确规定民政部门在流浪乞讨儿童的救助、安置以及教育方面的责任外，还需在社会保护的内容中加入有关保护流浪乞讨儿童的条款，如社区发现流浪乞讨儿童应当先行收留并及时与民政部门联系移交等事宜。此外，可考虑制定专门的《流浪乞讨儿童保护条例》。

2. 积极建立专门的儿童救助保护机构。

对于那些在社会上长期流浪、无家可归早已失去正常生活、学习条件和安全保障的少年儿童，应及时采取保护性措施，以防止其感染违法犯罪行为。具体可在流浪乞讨儿童较为集中的大中城市尝试设立“流浪乞讨儿童教育保护中心”。中心工作的重点是要改变流浪乞讨儿童原有的社会规范、价值观念以及行为方式，让他们接受为社会所规定的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社会规范、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目前，全国已建立流浪乞讨儿童救助机构近130个，各地机构应该互相联系，彼此形成网络，在全国设立流浪乞讨儿童的信息查询系统，便于快速为流浪乞讨儿童找到原来的家庭。

3. 鼓励建立多形式、多渠道的救援机构。

各级政府在尽量增加投入的同时，应大力倡导民间参与，可鼓励民间非营利性的慈善机构成立相应救援组织，作为一种有效的补充。政府给予救援组织各种应有的优惠和荣誉，在社会上形成一个关心流浪儿童的个体、民间组织和政府组织的联系网络。此外，街头帮教工作也是可行而且必要的。在这里，我们所说的“街头帮教工作”是指具有一定专业技能的帮教人员（包括志愿者），以街头流浪的儿童为服务对象，在他（她）们聚集的地方为其提供一定的专业服务，如心理咨询、饮用水、玩具、特色教育等。街头帮教工作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充分利用各种社会资源为这些处于弱势的儿童营造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使他（她）们能回归家庭、学校、社会，得以健康成长，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三）加大社会控制力度，加强社会治安预防建设

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就是市场化的进程，在体制改革、新旧体制转换、逐步建立新体制的过程中，社会管理制度随之发生显著变化，如政治气氛的宽松、人员流动限制的放松等，给整个社会带来空前的灵活性，给公众带来广阔的活动空间，“管制真空”也随之产生和扩大。在社会治安的管理中，传统的控制机制如基层党政机关、治保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软弱、涣散，对其管辖范围内的成员不足以发挥充分的强制作用；同时，相当多的流动人口处于无人管理的失控状态，对他们的具体流向、流量都难以掌握和控制，而流动性必将使人失去稳定的人际纽带，既缺少必要的人际扶助依靠，也失去人际间无意识的相互监督所形成的道德感、廉耻感，乞讨现象就趁机滋生蔓延开来。这正体现了“在长期封闭的计划体制下，生产力的低下与社会程序的稳定同存；在开放的市场经济中，勃勃的经济活力又与社会的无序共生。”^{[2][P356]} 乞讨作为一种社会失范行为，其出现也有社会体制性和结构性的原因，更大程度上是一种“相对剥夺”的产物。这就是解释在社会生产力水平大幅度提高的今天，乞讨现象反而愈演愈烈的根源所在。

因而，在社会管理难度加大、新的社会控制机制尚不健全、不完善的今天，尤其需要加强社会治安预防建设，组织各种切实有效的联防系统网络。建立有针对性的治安网络，是一个系统性、专业性很强的事务，城市联防组织的更新是一个极为急迫的任务，没有这样的更新，就难以保证治安网络的延续。因此，当前应对乞丐问题大量出现的有效对策之一便是在乞丐的流出和流入地——农村和城市都加大社会控制力度，建立联防系统网络，防范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的流荡，进而导致流民乞丐化和乞丐犯罪化现象。

(四) 进一步规范流浪乞讨管理的盲点

根据《救助管理办法》，只有流浪乞讨人员请求并表示愿意接受救助的，救助站才可实施救助。新的救助管理机制凸显了法制化和人性化的特点，是我国政治文明和依法治国的一大进步。但由于《办法》强调“自愿受助”，对于拒绝政府救助的流浪乞讨人员的管理尚缺乏法律依据和执法手段，使其成为一个新的管理盲区。

2003年下半年以来，一些大中城市繁华路段的流浪乞讨人员数量大增，强讨恶要现象突出，组织利用未成年人进行乞讨和从事非法活动的情况明显增加，且绝大多数流浪乞讨人员不愿意接受救助。针对社会上出现的新问题，各地先后制定了一些切实可行的配套规定，南京、深圳及福州就是几个范例。江苏省南京市《关于加强对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今年3月1日起正式实施。针对重点区域流浪乞讨人员数量多、管理难的现象，南京将在车站、码头、繁华街道等地设立流浪乞讨人员救助重点区域，切实维护好南京的窗口形象。深圳市政府今年1月发布关于依法维护公共场所秩序的通告，其中特别规定，强行乞讨要受治安处罚。福建省公安厅目前出台《关于依法妥善处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问题加强治安管理的指导性意见》，要求流浪乞讨问题比较突出地区的当地政府或有关部门联合发布通知，对流浪乞讨的区域和时间予以限制，同时具体规定对八类非正常乞讨行为将予以严肃查处。

总之，当代中国乞丐的大量出现，已构成一种影响社会成员健康生活、妨碍社会协调发展、引起社会大众普遍关注的社会失调现象，一个客观存在的影响相当数量人群的公共麻烦，一个违背社会主导价值原则和社会规范的社会问题。因此，完善社会救助制度和相关法规，消除乞丐大量滋生的现象，是人类社会一项造福子代后代的神圣事业，是有待理论工作者和政府部门深入探究的严肃课题，也是新形势下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现实需要和题中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 [1]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 [2] 周良伦, 白灰黑.求利行为与犯罪控制——对社会转型时期利益分配的思考 [A].康树华主编.中国现阶段市场经济与犯罪控制 [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3.

责任编辑: 柏桐

•历史学•

鸦片战争前后研究边疆和域外史地的学者群

◎ 章永俊

[摘要] 在第一次边疆和域外史地研究高潮期，史地研究学者约有48家之多。除著名的徐松、张穆、何秋涛三大家之外，还有诸如俞正燮、张澍、龚自珍、林则徐、魏源、沈垚等一大批研究学者，形成了一个以研究边疆史地为主体，进而推及域外史地等领域的学者群体。从社会身份上看，该群体成员大致可分三类：一是学者型官吏；二是官吏型学者；三是相对纯粹型学者。这些人士的识见有高低之分，成就有大小之别，甚至学术所崇多有歧异，但他们为边疆和域外史地研究的兴起和蓬勃发展都作出了各自的贡献。本文拟对鸦片战争前后的三类史地学者及其学术成就作一简述。

[关键词] 鸦片战争前后 边疆和域外史地研究 学者群体 学术成就

(中图分类号) K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7) 03-0098-07

鸦片战争前后，^①边疆和域外史地研究形成第一次研究高潮。关于这一论题，学术界从爱国主义史学思想之角度进行研究，已有不少成果。有关该领域的其他专题研究，诸如时代特点、史地学者的学风特征及世界意识等，也不乏研究成果。^②但从已有成果看，将这一时期史地学者的学术成就放在其个人特定社会身份中来考察，则尚无专文论述。

在第一次研究高潮期，史地研究学者约有48家之多。^③除著名的徐松、张穆、何秋涛三大家之外，还有诸如俞正燮、张澍、龚自珍、林则徐、魏源、沈垚等一大批学者，形成了一个以研究边疆史地为主体，进而推及域外史地等领域的学者群体。从社会身份上看，该群体成员大致可分三类：第一类是学者型官吏，他们大都是中过进士的清廷重臣，身为封疆大吏，兼为学者；第二类是官吏型学者，他们主要为中下级官吏或僚佐；第三类是相对纯粹型学者，其中有的是穷儒，以教书为生。^④这些人士的识见有高低之分，成就有大小之别，甚至学术所崇也多有歧异，但他们为边疆史地研究的兴起和蓬勃发展都作出了各自的贡献。鸦片战争前后，史地学者著作层出不穷。当时，有关西北史地的著作多达120多种。^⑤另据统计，到1861年，已有22部关于世界地理的著作问世。^⑥而从清军入关至19世纪初，中国的世界史地著作不过十数种，陈伦炯的《海国闻见录》和谢清高的《海录》是受到时人评价较高、内容亦较准确的代表作。《海国闻见录》成书于雍正八年（1730年），仅万余字；《海录》晚于《海国闻见录》近百年，成书于1820年，也不足2万字。《海录》是新航路开辟后中国人亲自游历西方、并留下文字记录而在国内流传的第一部著作。19世纪以前的史地著述呈现出零散、随笔杂录的特征，这与鸦片战争前后成系统、有目的的史地撰述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本文拟对鸦片战争前后的三类学者及其学术成就作一简述。

一、学者型官吏

学者型官吏的代表人物有林则徐、姚莹、徐继畲等。林则徐（1785-1850年），谥文忠，福建侯官人，

作者简介 章永俊，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北京，100101）。

① 该文“鸦片战争前后”时间断限大致为18世纪末至19世纪50年代左右，即嘉、道、咸时期。

② 这一论题的研究状况、意义及价值，拙文《近二十年鸦片战争时期中国边疆史地学研究述评》（《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3期）等亦有相关论述。

③ 有些史地学者的划分标准具有模糊性，如姚莹、何秋涛等。

④ 此数字由《小方壶斋舆地丛钞》、《贩书偶记》、《皇朝藩属舆地丛书》、《清史稿·艺文志及补编》、《辞海·历史地理》、《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等资料得出。

历任东河河道总督、江苏巡抚、湖广总督、钦差大臣、两广总督、署理陕甘总督、云贵总督等职。应当说，林则徐不是一位以著书立说为主的学者，其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处理政务时所写的奏稿、公牍及其日记、诗文、书札中。林则徐编撰的《四洲志》，叙述了世界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地理概况，开创了中国近代研究西方之先河，影响至深。

姚莹在鸦片战争前，曾任广东、福建、台湾等地的地方官。鸦片战争时期，姚莹任台湾兵备道。姚莹写出了一系列边疆史地著作。早期主要有《识小录》、《东槎纪略》，鸦片战争以后写就的《康𬨎纪行》尤其成为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作品。道光十三年（1833 年）完稿的《识小录》是姚莹在广东时期研究中外史地著作的札记。书中概述了蒙古、新疆、西藏的历史、地理、民族分布和宗教信仰，并对中俄边界沿革和走向，边防哨卡的设置和驻军作了记述。姚莹由研究边疆史地，进而考察了相邻诸国如俄罗斯、廓尔喀（尼泊尔）等的历史、地理、民情风俗。书中还摘录了一些有关英国、德国等欧洲国家的资料。姚莹于道光九年（1829 年）撰成的《东槎纪略》5 卷，记载有关台湾山川形势、民情风俗及涉台兵事、政事，反映了姚莹对台湾事务的关注，也显示出他对台湾作为国家东南之海上屏障的重视和远见。《南京条约》签订后，姚莹被投降派诬为“冒功欺罔”，遭到革职投狱。道光二十四年（1844 年），他以同知直隶州知州衔贬逐到四川成都效用，旋又两次奉命入藏“抚谕”，先后到达乍雅（乍丫）、察木多（今昌都）等地。《康𬨎纪行》16 卷就是姚莹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 年）至二十六年（1846 年）“待罪山城”，“奉使途中”的札记汇编。姚莹是有感于士人“仅详于西北陆路，其西南海外有未详也”^[3]而著《康𬨎纪行》一书的。该书忠实地记述了川、藏地区的山川地理、民情风俗等内容，记载了有关英、法、俄、印度、廓尔喀、哲孟雄等国的历史、地理知识，考证了天主教、回教、佛教的源流，绘制了世界地图及中国西南边疆地图。《康𬨎纪行》于 1848 年刊刻问世。后来他又编写了《英吉利国志》、《英吉利纪略》。这种谈瀛海故实以谋御外的心态与实践，显示了国人冲破传统史学的封闭状态，走向世界的趋势。姚莹对西北史地亦有研究，这方面的撰述如《内旗外旗之别》、《喀尔喀内附始末》、《俄罗斯通市始末》、《库伦》、《卡伦形势》、《土尔扈特》、《新疆两路形势》等，显示出他对西北塞防的关注。

徐继畲历经五度寒暑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 年）撰成《瀛环志略》，该书共 10 卷，运用地图 42 幅，对当时世界近 80 个国家和地区的地理位置、历史变迁、经济文化及风土人情均有比较全面的介绍，而对亚洲、欧洲、北美洲的记述尤为详细。徐继畲何以要撰述此书？道光二十四年七月，他曾在《瀛环考略》稿本中留下一段涉及写作动机的文字：“方今圣泽覃敷，海外诸国鳞集仰流，帆檣萃集，其疆土之广狭，道里之远近，任边事者，势难已于咨询。此说虽略，聊以为嚆矢云尔。”^[4]这里清楚地揭示了徐氏著书与时势变化的密切关系。1841 年冬，徐继畲在写给家乡老友的信中说：“二百年全盛之国威，乃为七万里外之逆夷所困，至使文武将帅接踵死绥，而曾不能挫逆夷之毫末，兴言及此，令人发指眦裂，泣下沾衣。”^[5]此外，作为参与办理“夷务”的官员，徐继畲在实践中深感以往文献记载“其说恢诡，其文瑰异，考之事实，或不尽然”，^[6]不能适应实际的需要。徐继畲编纂《瀛环志略》的直接动因，则得自于一个偶然的机遇。道光二十三年末（1844 年 1 月），徐氏在厦门会晤了英国首任驻厦门领事记里布（H.Gribble），商谈有关开放口岸的具体事项。在他们会谈时担任翻译的是一个美国传教士，名叫雅裨理（D.Abeel），徐继畲称他为“西国多闻之士”，此人正是使徐氏对世界史地产生兴趣的关键人物。雅裨理所叙述的世界地理、历史和政治知识，在客观上促成了《瀛环志略》这部中国人研究和探索域外史地名著的问世。早期维新派人士王韬对徐继畲及其《瀛环志略》有过非常精辟而中肯的评论，他说：“中丞之作是书，殆有深思远虑也乎？其时罢兵议款，互市通商，海寓晏安，相习无事，而内外诸大臣，皆深以言西事为讳，徒事粉饰，弥缝苟且于目前；有告之者，则斥为妄。而沿海疆圉，晏然无所设备，所谓諰远情，师长技者，茫无所知也，况询以海外舆图乎？中丞官闽峤、膺方面之寄，蒿目时艰，无所措手，即欲有所展布，以上答主知而

^[1] 《瀛环考略》卷上，该书共 2 卷，原藏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现存台湾。

^[2] 《瀛环考略》卷上。

下扶时局；而拘文牵义者动以成法为不可逾，旧章为不可改，稍有更法，辄多掣肘。中丞内惑于时变，外切于边防，隐愤抑郁而有是书，故言之不觉其深切著明也。呜呼！古人著述，大抵皆为忧患而作，顾使中丞不得行之于事，而徒见之于言为足惜也。”^④以上王韬的评论，反映了徐继畲撰著《瀛环志略》的意图，其核心是鸦片战争之后，有感于民族危机深重，试图藉此唤醒国人，共谋御侮图强之策。

二、官吏型学者

所谓官吏型学者，是指这些人不是为文而文，为诗而诗，而是有所为而发。他们一般是中小官吏，有些人仕途遭遇曲折。他们以边疆史地研究作为参与社会兴革和学术理论之论证。祁韵士、徐松、龚自珍、魏源、张澍、夏燮即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

祁韵士（1751-1815年），字鹤皋，山西寿阳人，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进士，历任国史馆纂修及户部主事等职。他精通满蒙文字，是研究西北史地较早的学者。祁韵士利用任国史馆纂修的机会阅读了大量内府备书及内府所藏满蒙文字的红本，获得了外界一般学者无法看到也无法看懂的史料，终以8年之功，完成了《蒙古回部王公表传》（120卷）的编纂工作。嘉庆十年（1805年），他被遣戍伊犁，3年后被赦回来以后，就一直致力于西北史地研究。有关祁韵士西北史地方面的著作主要有：《藩部要略》18卷及表4卷、《伊犁总统事略》12卷、《西陲要略》4卷、《西域释地》1卷。《伊犁总统事略》是祁韵士遭戍伊犁时，奉松筠之托而编撰的，后由徐松续修完成，由松筠署名奏进。该书凝聚着他涉历万里、博访周咨的辛劳结晶。祁韵士还根据调查所得的材料，撰成《西陲要略》与《西域释地》。前者考古证今，记述新疆山川道里、城池沿革、卡伦军台、职官、驻兵、屯田、水利及少数民族的风俗源流等，均翔实客观；后者则是祁韵士对西域具体地名的考释。此外，祁韵士谪戍期间还写有诗文《西陲百咏》1卷及《万里行程记》1卷等。祁韵士在西北史地方面所作的开拓性工作，为后来的研究者打下了一定的学术基础，实乃西北史地学的奠基人。

徐松（1781-1848年），字星伯，北京大兴人，祖籍浙江上虞。嘉庆年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曾担任全唐文馆提调兼总纂、内阁中书、礼部主事、榆林知府等职。其经历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嘉庆十七年32岁以前，仕途顺利，任职京师；嘉庆十七至二十五年（1812-1820年）32岁至40岁时遭戍新疆，遭戍期是6年，往返近9年；40岁以后重回京师，整理平生手稿。徐松早年在全唐文馆借纂辑《全唐文》之机，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宋中兴礼书》24册，《宋会要》500卷，又从各种文献中选录科举史料、地理图志，如《宋三司条例考》1卷、《河南志》3卷，表现出超人的学识。徐松的代表作是《新疆识略》、《西域水道记》。嘉庆十九年（1814年），伊犁将军松筠请徐松负责重修祁韵士所纂述的《伊犁总统事略》，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松筠将修成后的史地著作上呈道光帝，赐名为《新疆识略》，付武英殿刊行。《新疆识略》共12卷，另有卷首1卷，约略25万字。书中首列新疆总图和南北两路、伊犁各图，附有叙说。次为官制、兵额、屯务、营务、库储、财赋、厂务、边卫、外裔等。凡山川道里、地名沿革、城垣建置、险要控扼、军政设施、钱粮兵籍、边防卡伦等，皆有记载，对研究新疆的历史地理及社会状况很有意义。御制序文称该书“援古证今，成书十二卷，有图有叙。论河山之襟带，城廓之控制，兵、食、财赋之储积，田野畜牧之繁滋，条分件系，颠末详胪，成宪旧章，洵称该备”。^⑤该书有道光元年（1821年）武英殿刊本，光绪甲午（1894年）上海积山书局石印本。徐松还于道光元年（1821年）撰成《西域水道记》5卷，约近10万字。该书仿照《水经注》的体例，将新疆划分为罗布淖尔（今罗布泊）、哈喇淖尔（今哈拉湖）、巴里坤湖（今巴里坤湖）等11个湖区，并以湖泊为纲，叙述湖区所受之水道，旁及流域之交通、物产、城邑建置沿革、历史掌故、民族分布等情况，并附有地图。梁启超曾评价该书乃“最为精心结撰之作”。^⑥有关徐松西北史地的著作还有《新斠注地理志集释》、《汉书西域传补注》、《元史西北地理考》、《西夏地理考》、《长春真人西游记跋》等。《西夏地理考》未刻，《汉书西域传补注》于道光九年由阳湖张琦序而刻之。此外，他还撰有《新疆赋》，用辞赋的体裁描述新疆的秀丽山川，颂扬清初的统一大业，

^④ 参见御制《新疆识略》序。

诸凡新疆南北两路的山川城邑、历史沿革、置官设屯、物产情况都荟萃其中。该赋与乾嘉年间驻藏大臣和泰庵所撰的《西藏赋》及其自注，可相互媲美。徐松既着力研究西北边疆史地，又“喜延誉后进”，^{[7](P134)}在他的影响下，道咸年间研究西北史地的人愈来愈多。就西北史地研究的实地调查与具体成就而言，徐松可以说是一位学术带头人。

边疆史地研究是龚自珍学术实践活动的重要方面，也是他自称的“天地东西南北之学”研究。^{[8](P25)}从龚自珍的著述看，他主要致力于西北和东南的研究。由于《东南罢番舶议》一书已散佚，因此有关他的东南海防思想仅能从其文集言论中钩析探究。龚自珍的西北史地研究著作主要有《西域置行省议》、《拟进上蒙古图志表文》、《上镇守吐鲁番领队大臣宝公书》、《上国史馆总裁提调总纂书》、《北路安插议》、《御试安边绥远疏》等。《西域置行省议》率先提出在新疆设置行省的建议。^{[8](PP105-112)}《上国史馆总裁提调总纂书》论述了西北塞外诸部世系源流及山川形势，并就西北诸地的经纬度数订正《大清一统志》之疏漏。^{[8](PP312-318)}《北路安插议》探讨了西北设行省后，如何安排土尔扈特人的问题。^{[8](P112)}《御试安边绥远疏》批评了以往的羁縻政策，认为边政的长治久安之策是“以边安边”，即在天山南路开垦农田，保证供应，在天山北路训练精兵，达到“足食足兵”、“常则不仰给于内地十七省”。龚自珍对蒙古史也颇有研究，著有《蒙古像教志序》、《蒙古水地志序》、《蒙古台卡志序》、《蒙古声类表序》、《蒙古寄爵表序》等文，这是为一部后来未及完成的大型史地著作《蒙古图志》作准备的。龚自珍的西北史地研究在学术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清嘉、道年间，中国社会急剧地发生着变化。龚自珍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末世向近代社会转换时期的代表人物，一方面，继承了明末清初顾炎武、顾祖禹等人舆地之学的经世致用精神；另一方面，他开启了西北史地及蒙古史研究的新风气。随后，出现了张穆的《蒙古游牧记》、何秋涛的《朔方备乘》、魏源的《元史新编》、《海国图志》等史地著作。

魏源的史地研究成果尤为丰富，他的著作主要有《海国图志》、《圣武记》、《道光洋艘征抚记》等。关于《海国图志》的版本，一般认为魏源于 1842 年完成 50 卷，1847 年扩充为 60 卷，1852 年又扩充为 100 卷。《海国图志》主要有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是撰述部分，包括《筹海篇》及各总叙、后评及文中夹注，体现了魏源反侵略思想中的抗敌策略；另一部分是根据当时所能得到的资料介绍外国史地情况，包括南洋、印度、非洲、欧洲、南北美洲，这是全书的主体部分。魏源在书中除了介绍、考订世界各国历史沿革、政治、经济、文化、宗教、风习等情况外，另特设《筹海篇》2 卷，《筹海总论》4 卷，这是其他各种世界地理著作所没有的。在《海国图志》百卷本中，魏源用了近 1/5 的篇幅专门记述西方近代科技及其成就，这在以往的历史撰述中也是罕见的。魏源也注意西北史地之学，他所写的《圣武记》中有一部分是对蒙古、回部及与俄罗斯关系的叙述。他根据的材料是：“借观史馆秘阁官书，及士大夫私家著述、故老传说。”^[9]他所著的《元史新编》也涉及一部分西北地理。魏源还致力于元史研究，编有《西北疆域沿革图》，撰写了《元代征西域考》、《元代西北疆域考》。他在晚年还广集正史材料，并征引《元朝秘史》、《蒙古源流》、《元典章》和元人文集，撰成《元史新编》。其引证之浩繁，记载之正确，确实做到了事增于前而文省于旧，对后来史家治蒙元史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元史新编》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 年）开始撰写，至咸丰三年（1853 年）完成，凡 95 卷，其中本纪 14 卷，列传 42 卷，表 7 卷，志 32 卷，除列传中《元末群盗》、《释老传》、《遗逸传》有目无传外，其余均完整。该书直到光绪末季始由其族孙魏光焘刊刻问世。

张澍（1781-1847 年），^①号介侯，甘肃武威人，嘉庆年间进士，选庶吉士，充实录馆纂修，后历任贵州玉屏、四川屏山、江西永新等县知县及临江通判等职。他“博览经史”、“游迹半天下”，尤其“留心关、陇文献”，^{[7](P13408)}撰有《五凉旧闻》、《续敦煌实录》、《姓氏五书》，辑有《二酉堂丛书》，均为研究西北史地之作。张澍在 32 岁主讲兰山书院时，即完成《五凉旧闻》40 卷。该书又名《河西旧事》，是记载五凉历史

^①有关张澍生平及其著述，参考赵彊生：《寄陇居文集》，齐鲁书社 1981 年版，第 291-300 页。另案：牟实库《记张介侯未刊遗稿》，据李鼎文《张澍生平及其作品》一文，谓张澍生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 年），见《文献》第 16 辑，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3 年版。

的专著，研究范围上溯西汉，下涉隋、唐、宋、元，对研究河西文化之源流大有裨益。《续敦煌实录》3卷，记述敦煌人物，计张氏家族一卷，索氏家族一卷，宋氏、汜氏、令狐氏合为一卷。该书张澍生前未刻。《姓氏五书》300余卷，“五书”分别为：《姓韵》、《辽金元三史姓氏录》（附西夏）、《姓氏寻源》、《姓氏辨误》、《古今姓氏书目考证》。钱仪吉称赞该书既博且精。^[10]姓氏的形成既与血缘有关，又与地域有关。在民族冲突与民族融合的过程中，胡、汉姓氏常发生纠缠。因此，西北姓氏之学实与西北民族关系息息相关，弄清西北姓氏之纠缠，有助于研究西北民族冲突融合之历史。张澍有关姓氏研究的著作，是他西北史地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二酉堂丛书》是有关河西之学著述的辑佚，辑有汉魏至五凉、隋唐学者（亦有诗人）七人著作的残章断句。七人指：皇甫规、张奂、段颖、周生烈、侯瑾、阴铿与李益。这七人中除皇甫规家居黄河之东，其余均为河西人（非武威即敦煌）。此外，《丛书》还辑有河西与五凉文献七种，具体是：《三秦记》、《凉州异物志》、《西河旧事》、段龟龙《凉州记》、谕归《西河记》、段国《沙州记》及阚骃的《十三州志》。这些书全由辑佚而来，对研究魏晋南北朝至唐宋时期河西地区的历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夏燮于道光元年（1821年）中举人，任青阳训导。鸦片战争时，任直隶临城训导。1850年冬，“需次京邸”，三年后“摄安仁篆”。^[11]1860年秋，他加入了两江总督曾国藩的幕府。不久，出任江西永宁、宜黄等县知县。夏燮一生著述颇丰，除编写《明通鉴》外，还撰有《粤氛纪事》、《中西纪事》、《五服释例》、《述韵》、《校汉书八表》等多种，编辑明人文集数种，另有文集、史著未能刊行。《粤氛纪事》13卷，同治八年（1869年）刊刻。该书为纪事本末体，记载了太平天国及清军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上起咸丰元年（1851年），下迄咸丰十年（1860年），以省分篇，以粤西起事、两楚破兵、浔皖失援、长江铤险、西江反噬、七闽用兵等专题分卷。作者认为西方列强入侵和清朝官吏腐败，是太平军起义并迅速蔓延的主要原因，并对团练给予了高度评价。《中西纪事》是一部叙述两次鸦片战争的专史著述。夏燮编撰《中西纪事》，是出于忧愤时势而作史，以期达到史学经世之目的。夏燮对明史亦颇有研究，所著《明通鉴》凡90卷，又前编4卷，附编6卷。该书对明代朝廷纪纲、礼乐、刑政、天文、历法、河道、漕运及营兵、练饷、折色、加赋等“有关一朝治乱之源者”，均有较详细的记载，反映了明代社会矛盾的加深过程，力图系统总结明王朝兴衰的经验教训，以期为现实社会提供借鉴。夏燮所著《明通鉴》是继司马光《资治通鉴》和毕沅《续资治通鉴》之后所作的明代编年史。夏燮除著有该书外，在明史研究方面尚有《明史纲目考证》、《明史考异》、《忠节吴次尾先生年谱》，及校勘明《陶安学士集》、吴应箕《楼山堂集》等书。他是近代研究明史颇有成就的学者。夏燮身处动荡、学术思潮开始转变的时代，他所撰写的史学著作，都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三、相对纯粹型学者

相对纯粹型学者一般是仕途受阻或官职卑微，遂以治学为其毕生之志向者。这类典型人物如张穆、沈垚、俞正燮、梁廷枏、何秋涛等。道光十二年（1832年），张穆以优贡生考取正白旗官学教习。十九年（1839年）应顺天乡试，因冒犯监考被斥，从此遂绝举业，潜心著述，度过短暂的一生。他编有《元裔表》及《外藩碑目》，前者为蒙古史专书，后者专收西北民族地区碑文。此外还撰有《魏延昌地形志》、《俄罗斯事补辑》、《蒙古游牧记》等史地著作。《蒙古游牧记》是一部历经20年，由张穆呕心沥血撰写，又由何秋涛精心补辑的史地名著，凡16卷。该书以蒙古历史上各盟旗为单位，用史志体，而自为之注，考证了蒙古古今舆地及山川城镇的沿革，对蒙古诸部历史发展有较多的记述。标目都赘以“游牧所在”字样，以明其详于“方域”之旨。

沈垚（1798-1840年），字敦三，号子敦，浙江乌程（今吴兴）人，早年师从金石史专家施国祁，后来研究西北史地。他“性沉默，足不越关塞，好指画绝域山川”。^{[12] (P134)}道光十五年（1835年），沈垚以优贡生入京，屡试不第，遂以教书和代人撰书为生。他曾为徐宝善补修《一统志》，为姚元之撰修《道光九域志》，为沈涛修《畿辅金石录》、《辽金元碑考证》等，但大多未完成。沈垚生平著作多有关西北史地，主要有《六镇释》、《西游记金山以东释》1卷、《新疆私议》1卷。《六镇释》对宋以来诸家纷言不一的北魏国防

六镇名称及方位作了较准确的考释。沈垚对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也很有研究。据北宋《崇文总目》记载，郦注已佚 5 卷，沈垚从《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等书中钩稽《水经注》的佚文，并加考订，撰写了《漳北滹南诸水考》，^[12] 为摸清漳河以北、滹水（今河北定县以上唐河）之南一带的古今水道，为开展农田水利建设提供了借鉴。沈垚在《新疆私议》中，历举汉以来经营西域的史实，说明新疆安定对我国国防和领土统一的意义至为重大。他还针对当时新疆的局势，提出了加强边政建设，开发水利，实行屯田等巩固边防的措施。该书实际上是运用丰富的史地知识，向清政府献计献策，带有明显的经世意图。沈垚西北史地作品还有《葱岭南北河考》、《元史地理志释》、《西北地名杂考》、《西域小记》等。虽然他没有亲历塞外边陲，仅从书本知识上加以分析，但所下结论都像是身历其境一样。沈垚愤世嫉俗，好讥切时政，终生不得志，最后贫病交加而死。“张穆哀其遗著，为《落帆楼稿》。”^{[13] (P134)}

俞正燮记述中俄关系的主要著作是《俄罗斯佐领考》、《俄罗斯事辑》及《俄罗斯长编稿跋》。《俄罗斯佐领考》写成于嘉庆十一年（1806 年）三月，他根据《八旗通志》等记载，考证了俄罗斯人被编入佐领的人数、时间，说明清初“总得罗刹近百人”，^[13] 与俄罗斯关系极为密切。《俄罗斯事辑》未注明写作时间，该文考订、记述了俄罗斯的疆域、历史，着重记述了清初俄罗斯“东南略地，夺雅克萨、尼布楚地”^[13] 及清政府自卫反击，两国划定边界的情况。《俄罗斯长编稿跋》写于嘉庆十一年（1806 年）八月，俞氏生前未刻，后由张穆检出，刻入《癸巳存稿》。民族关系之研究是边疆史地研究的重要内容，俞正燮这方面的著作主要有：《驻扎大臣原始》、《喀尔喀伊犁》、《阿拉善》、《蒙古》、《书〈西域闻见录〉后》、《〈异域录〉题辞》及《缅甸东北两路地形考》等。《驻扎大臣原始》写成于嘉庆二十年（1815 年）正月，该篇长达 1.7 万字，是《癸巳类稿》及《癸巳存稿》中字数最多的一篇。该文钩稽了清代前中期边疆民族关系中的重大事件，分析了清政府在边疆地区设置驻扎大臣的原因，并阐述了嘉庆十一年冬各地驻扎大臣的分布情况。全文条理清晰，言之有据，充分显示了俞正燮的良史之笔。俞正燮撰写《缅甸东北两路地形考》，同样显示了他对祖国西南边疆的关注和重视。俞正燮对清代边疆史地及民族关系的记载与考订，为后来魏源撰《圣武记》、张穆撰《蒙古游牧记》、何秋涛撰《朔方备乘》提供了素材和借鉴。

梁廷枏一生仕途不顺，道光十四年（1834 年）39 岁时始中副榜贡生，嗣后历任澄海县训导，越华、粤秀书院监院，广东海防书局总纂等职。梁廷枏在史学、文学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因其学术成就，晚年被咸丰帝赐为内阁中书。他的著作甚丰，大多收入《藤花亭十种》、《藤花亭十五种》。他撰有《夷氛闻记》，主编有《粤海关志》，编有《南汉书》18 卷。他还从大量的史料中辑出南汉的各种逸闻杂事，编成《南汉丛录》2 卷及《南汉文学略》4 卷。此外，他还有《海国四说》于 1846 年初刊，后经修订，在咸丰时复刊。1835 年，梁廷枏入海防书局参加纂修《广东海防汇览》；1837 年，他主持编修《粤海关志》，这使他对世界各国历史地理有所了解，尤其是《粤海关志》，使他对西洋情事有了许多较为真切的接触。世界五大洲说，明末清初虽已传入，但信之者甚少。《清朝文献通考》更是认为所谓的五大洲邈无实据，“语涉诞诬”。梁廷枏则通过有关事实、图册的研究，认为五大洲的说法，“明列为图，实指其地”，并非全无根据。《海国四说》由《耶稣教难入中国说》、《合省国说》、《兰仑偶说》、《粤道贡国说》四种组成。《合省国说》于 1844 年出版，凡 3 卷，是中国人编写的第一部系统的美国通志。《兰仑偶说》共 4 卷，成书约在 1845 年下半年，由《英吉利国记》扩充而成。《粤道贡国说》于 1844 年成书，凡 6 卷，该书实为 1840 年以前经由广州而进行的中外贸易志。《耶稣教难入中国说》于 1844 年出版，该书以 2/3 以上的篇幅介绍了耶稣教及其传入中国的历史。《南京条约》签订以后，耶稣教在华传播有愈演愈烈之势，梁氏作此书，并将之置于《海国四说》卷首，表明他对外来宗教的高度关注和警惕。熊月之指出，道咸年间，在吸收、介绍新的世界知识的著名学者中，时代转折烙印最为清晰，地域特色最为明显的是梁廷枏。^{[14] (P226)}

何秋涛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 年）中举，时年 20 岁，次年中进士，授为刑部主事。《朔方备乘》是他边疆史地研究的代表作。《朔方备乘》原名《北徼汇编》，初为 6 卷，后增至 80 卷，另有凡例目录 1 卷。进入 19 世纪 50 年代以后，中国边疆形势日趋危机，何秋涛“益究心经世之务”，^[15] 他深感北徼研究之必

要，遂潜心研究边疆史地。咸丰八年（1858年），兵部尚书陈孚恩以何秋涛“通达时务，晓畅戎机”^[16]向咸丰帝举荐。何秋涛呈上所著的《北徼汇编》，咸丰十年（1860年）被赐名为《朔方备乘》。该书集中反映了何秋涛研究“北徼”问题的史地学思想。《凡例》中写有“八备”，实际上起了全书思想总纲的作用。何秋涛自谓：“是书备用之处有八：一曰宣圣德以服远人，二曰述武功以著韬略，三曰明曲直以示威信，四曰志险要以昭边禁，五曰列中国镇戍以固封圉，六曰详遐荒地理以备出奇，七曰征前事以具法戒，八曰集夷务以烛情伪。”^[17]从这8点用处来看，其编著该书的主要意图在于宣扬国家一统，了解边疆形势，加强边防建设，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探索盛衰之由，集中反映了何秋涛的经世精神。《朔方备乘》取材内容丰富，考证范围广泛。何秋涛在《凡例》中指出该书之取材和性质时说：“是书取材之处有四：一曰本钦定之书，以正传讹；二曰据历代正史，以证古迹；三曰汇中外舆图，以订山川；四曰搜裨官外纪，以资考核。”书中列有文献研究20卷，约占“正文”内容1/3，其中“考订诸书”15卷：艾儒略《职方外纪》、张鹏翮《奉使俄罗斯行程录》（亦名《漠北日记》）、图理琛《异域录》（上、下）、方式济《龙沙纪略》、松筠《绥服纪略》、俞正燮《俄罗斯佐领考》和《俄罗斯事辑》、张穆《俄罗斯事补辑》和《月齋簽記》、林则徐译《俄罗斯国总记》、魏源《俄罗斯国盟聘记》、《海国图志》和《元代北方疆域考》、姚莹《康輶纪行》；“辨正诸书”5卷：椿园《西域闻见录》、赵翼《檐曝杂记》、俞正燮《癸巳存稿》、徐继畲《瀛环志略》及“群书正误”。可以看出，何秋涛吸收了鸦片战争时期中外史地研究的已有成果，为其可信的考证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就研究范围来看，该书不囿于蒙古与西北史地，而是围绕着中国北疆和俄罗斯，并叙及东北边疆直至北冰洋之地。对汉、唐、辽、金、元历代北徼用兵以及清初中俄交涉，亦有记述。在时间和空间的记述上，这部巨著都大大超过前人，堪称为近代边疆史地研究的杰作。^{[18] [P394]}何秋涛在中国近代边疆史地研究中占有突出的地位，近人史著多辟有章节述及其事迹及影响。梁启超称赞《朔方备乘》“有组织、有别裁，虽今日读之，尚不失为一名著也。”^{[6] [P390]}著名史学家白寿彝先生在论述何秋涛的学术成就时，将他与林则徐、魏源、张穆并论，称他们“开创了新的研究风气，开拓了新的领域，反映了时代变动在文化领域里的脉搏。他们的影响是相当大的。”^{[19] [P402]}

[参考文献]

- [1] 胡斯振. 西北学刍议 [J]. 西北史地, 1985, (1).
- [2] (美)费正清. 剑桥晚清史(下卷)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 [3] 姚莹. 康輶纪行·自叙 [M]. 同治六年 (1867年) 桐城姚氏刻本.
- [4] 徐继畲. 松龛全集·文集(卷3) [C]. 山右丛书初编 [Z]. 山西省文献委员会印.
- [5] 王韬. 弊园文录外编(卷9) [M]. 光绪九年 (1883年) 著者铅印.
- [6] 梁启超.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M]. 上海: 东方出版社, 1996.
- [7] 柯劭忞等. 清史稿(卷486)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 [8] 龚自珍. 龚自珍全集 [C].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 [9] 魏源. 圣武记·叙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 [10] 冯国瑞. 张介侯先生年谱 [M].
- [11] 夏燮. 中西纪事 [M]. 长沙: 岳麓书社, 1988.
- [12] 沈垚. 落帆楼文集(卷3) [C]. 吴兴刘氏嘉业堂刊本.
- [13] 俞正燮. 癸巳类稿(卷9) [M]. 俄罗斯佐领考 [M]. 道光十三年 (1833年) 求日益斋刻本.
- [14] 熊月之. 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 [15] 缪荃孙. 续碑传集 (卷20): 刑部员外郎何君墓表 [M]. 宣统二年 (1910年) 江楚编译局刻本.
- [16] 李鸿章. 朔方备乘(卷首) [M]. 光绪七年 (1881年) 稟辅志局刻本.
- [17] 何秋涛. 朔方备乘·凡例三十则 [M]. 光绪七年 (1881年) 稟辅志局刻本.
- [18] 尹达. 中国史学发展史 [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5.
- [19] 白寿彝. 中国通史纲要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责任编辑:郭秀文

略论中国历史上的口传历史时期

◎ 丁 波

[摘要] 中国历史初期，口耳相传是人们传播知识、接受知识的主要方式，这段时期可以称作口传历史时期。口传时代知识传播者最初是巫师，后来经历了由巫到史的转变。先民口耳相传的内容主要是部族的世系，为了便于记忆，口耳相传的内容多采用韵文，由于口耳相传的特点，在文献最初形成的时候，同样的素材往往会有不同的版本。

[关键词] 口耳相传 巫师 韵文 文献

(中图分类号) K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7) 03-0105-07

一、口传历史时期

语言的出现较文字更早，口耳相传理所当然地要比成文记事更早。但在人类初始阶段，口耳相传的内容并非传说，而是当时所发生的事情，由于没有办法记录下来，只能凭着记忆一代一代地传述。

现代文化人类学、民俗学及社会学的研究成果表明，在人类社会初期，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过一个口头传播知识的时期（在当今尚存的无文字落后民族地区，口耳相传的方式仍然被广泛使用），它包括前文字社会和文字产生初期的人类社会。学术界对人类社会初期口耳相传这种现象的关注，最早是在比较文学领域，代表人物是北美学者米尔曼·帕里和艾伯特·洛德。20世纪30年代，他们从对荷马史诗研究入手，提出了口头程式理论，对口头传播的特点从文学的角度进行了分析。这一理论现已拓展到对活态口头传统的探究中。

在我国，清代史学家章学诚也已比较敏锐地注意到了我国历史初期的口传现象。他在论述上古三代与后世历史知识传播方式的不同时，指出：“三代盛时，各守人官物曲之世氏，是以相传以口耳，而孔、孟以前，未尝得见其书也。”（《文史通义·诗教上》）故而“后世竹帛之功，胜于口耳；而古人声音之传，胜于文字；则古今时异，而理势亦殊也。”（《文史通义·诗教下》）章学诚将文字著述取代口耳相传的原因，归为“官守师传之道废”，有其偏颇之处，但生活于300多年前的他，就已经注意到中国上古社会先民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播历史知识有其独到之处。近现代学者陈梦家也认为：“古代历史，端赖神话口传，神话口传，遂分衍化；由于口传一事，言人人殊，故一事分化为数事，各异面目由于人与神与兽之间分界不清，故人史与神话相杂；由于神道设教，人史赖神话以传，故人史皆神话。有此三故，古史因具重复性与神话性。……故虞、夏、商三系本于一种传说。”^①

流传下来的先秦时代的文献，关于口头传说时代的记载十分罕见。从一些现存的落后少数民族地区的材料中，可以找到一些我们先民在口传时代的影子。佚名的《彝诗史话》叙述了书写工具和物质载体产生前后的诗歌状况，其中有“古时的人间，诗歌有人吟，却无纸来记，无纸可记诗……在那古时候，如若无纸笔，用什么写诗，用什么写歌；至于写历史，就更加困难了。后来人世间，世间有知识，知识到处传。世间的男女，他们有知识，有了知识后……那些智者们，他们造出笔，他们造出纸，纸笔造出了，人世间的事，凡事可记事，故事可写了。”^②（P288）这段彝族古歌，以纸笔的发明为界限，纸笔的发明要比文字晚得多，因为没有纸和笔，所有的诗、歌及历史，就只能在人们之间通过口头吟唱的方式流传，我们可以想

作者简介 丁波，商务印书馆著作编辑室编辑、历史学博士（北京，100102）。

象，在前文字社会，历史的传播更是完全依赖口头传诵了。

同时，由于文字形成初期的不完善及社会发展进程缓慢等因素限制，在文字形成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口耳相传的方式仍然是社会知识传播的主要途径。当然，无论在前文字社会或文字形成以后的时期，除了口耳相传，同时也存在着其他的知识传授形式，如中国古代的结绳记事，就是先民记事的一种方式。关于早期社会中存在的结绳记事的方式，摩尔根有形象的描述。据他介绍，在北美易洛魁人中，有一些古老的贝珠带，按照他们的说法，关于联盟的组织和原则已传述给这些贝珠带，因此便把这些贝珠带加以宣读或解释一番。一位巫师（不一定是首领中的人）将这些贝珠带一条接着一条拿起来，在两组首领之间来回踱着，同时宣读这些贝珠带上所记录的事情。按照印第安人的观念，这些贝珠带通过一位讲解人就能把当年传述给它的章程、条规和事例原原本本复述出来，只有贝珠带是这些章程等等的唯一记录。他们把紫贝珠带和白贝珠带合股编成一条绳，或者用各种颜色不同的贝珠织成有图案的带子。其运用的原则就是把某一种特殊的事情同某一串特殊的贝珠或某一个特殊的图案联系起来。这样，就能对事件作出有系统的排列，也能记得准确了。这种贝珠绳和贝带是易洛魁人唯一可以目睹的史册。但是，它们需要一些训练有素的讲解人，这些讲解人能够根据各串或各种图案将其所隐含的记录表白出来。^{[3] (P137-138)} 从摩尔根的介绍中不难看出，易洛魁人的巫师主要是依靠口头传诵的形式来传播历史知识，贝珠带只是他们采取的一种辅助手段，如果没有巫师的讲解，贝珠带记事的意义也就不存在了。

在文字产生的最初期，文字被掌握和使用的范围是极有限的。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是祭司掌握的，楔形文字总共有 500 多个符号，况且有些字符还有几种不同的意义，要掌握它极为困难，因此神庙内设有专门训练写字的学校，青少年在这里要花几年时间来学习楔形文字。而真正能够到神庙里学习的青少年又不是很多，他们即使学会了楔形文字，受字符数量的限制，也不能大范围地使用。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比我国的甲骨文大约早 1700 年左右。甲骨文的出现，已经是汉字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了。从甲骨、兽骨到竹简、木牍，都是不易书写的材料，而这些书写材料的使用又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自上古至公元后 3 或 4 世纪，竹简、木牍一直是中国主要的书写材料。^{[4] (P60)} 由于竹木笨重且难以制作，势必限制文字书写的发展，这就为口头传诵历史知识留下一个广阔的舞台。

因此，在前文字社会和文字产生初期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口头传诵历史知识是历史传播的一种主要方式。章学诚以战国为口传与文字著述的分界。战国诸子勃兴，诸子对上古一些口头传诵的历史有过不同程度的整理，在这个意义上，章学诚的认识有其合理性。但章学诚忽略了一点，战国诸子在整理上古历史的时候，材料中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口头传诵，其整理结果又往往是在师徒之间口传心授，在这个意义上，战国时代包括之后的几百年间，历史的口头传诵仍然是一种普遍的现象。

本文主要对中国早期社会中历史的口传现象进行分析。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以章学诚所说的三代及之前的前文字社会口传现象为主进行分析，统称其为口传历史时期。战国时期及以后的口传现象，就不赘述了。

二、口传历史时期的历史传播者：由巫到史

在口传历史时期，最早的历史传播者是巫师。巫史不分是人类文化史上一个必经的发展阶段，在人类的童年时期，巫师不但是天然的部落行政长官，同时也是唯一有资格传播部落文化的人，一些文化要传给部落子弟，一些文化则只能传给自己职位的继承人。“最初掌握历史的人，是氏族长、家长。满族有一句谚语：‘老人不讲古，小的失了谱。’其中的古，就是故事、历史、古规，如果老人经常讲古，代代继承，就能维护氏族的规范，否则氏族规范遭破坏，连氏族的谱系都会搞乱，婚姻、家庭关系也会被破坏。广西瑶族极其重视对青少年的教育，但无文字，老人就以诗歌的生动形式，把瑶族的历史故事、英雄传说、农业生产、习惯风俗编起来，在过节、娱乐、婚丧等时候诵唱。”“除了老人、氏族长而外，掌握历史知识的人就属巫师了。”^{[5] (P332)}

从现存的一些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的材料看，最初的巫师没有经典，是以口授经典的方式保存知识

的。彝族古代存在一个文化阶层——毕摩，他是彝族文化的中坚。所谓的毕摩，就是彝族原始宗教活动的主持者，他作为彝族自源文字的创制者和执掌者，掌握着诸如历史、文学、语言、哲学、天文、历法、地理等知识，身系一族之本位文化，是彝族社会的知识阶层和彝族文化的集大成者。作为民族文化的集大成者，毕摩在纸笔形成前主要依靠口头传播历史知识。“最初的巫师并没有经典，而是口说经，如永宁纳西族的达巴、佤族的巫师就是如此。”^{[2](P25)}从纳西族、佤族、彝族巫师的情况看，在口传历史时期，巫师作为最早的历史传播者，他们主要是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播历史知识。因为处于社会发展的最初阶段，在口传历史时期，社会知识的积累尚不充分，最初的历史知识也十分简单。宋兆麟根据对永宁纳西族、佤族、凉山彝族、云南白族、广西瑶族等的巫师所做的调查，指出各族巫师掌握的历史多是关于民族历史、谱系的。以广西瑶族的巫师为例，他们具备的历史知识，“其中包括人类起源等神话、创世纪史诗、英雄史诗；掌握氏族部落迁徙历史和原因；通晓各氏族和家庭谱系以便确定是否通婚；能够背诵各氏族间的仇杀事件；掌握氏族部落的首领和其他人物事件，以及所供奉的神谱。”^{[5](P332)}这些历史知识通过巫师们的口耳相传，在各民族之间历代相传，成为各民族早期历史的主体。在先民的历史知识中，家族的世系是最重要的内容。漆侠指出，“我国古代和周边各族，也同样都有自己的口头传说的历史。口头传说历史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是，以父系为中心的父家长世代传承的情况。”^[6]

巫师必须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播历史知识，这对巫师本身的素质有很高的要求，所以巫师多由见多识广的部落长老担任，即使在部落文明晚期，已逐渐转变为部落联盟首领的君主仍然被看作是知识的集大成者，中国历史上黄帝的例子就特别明显。黄帝是部落时代晚期的首领，作为部落联盟的首领，他已经不完全等同于部落长老，更接近于后世的君主。在太史公的笔下，黄帝天赋极高，他“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他作为部落联盟的首领，“治五气”，“迎日推策”，“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财物。”（《史记·五帝本纪》）据《世本》等的记载，皇帝任用雍父杵臼，其鼓、货狄作舟，挥作弓，夷牟作矢，伯余作衣裳，胡曹作冕，大挠作干支，伶伦造乐器，夷作鼓，仓颉造字等等，进行了一系列物质文化生活方面的创造。从仓颉造字的说法来看，黄帝时代作为文明时代的开始是可以成立的，黄帝也无愧于“人文始祖”之称，中国的人文文化都可在这样一个部落联盟首领身上找到源头。这其中肯定有后人的牵强附会，但它传递出来的信息告诉我们，在人类社会初期，部落首领是各种知识的掌握者，所以后人才会把所有的发明都归在他们身上，从春秋战国直到汉代，还有人不断将学术的源头追溯到黄帝，如汉代的黄老之学和后来出现的《黄帝内经》，都以黄帝为始祖。

巫师除了必须具备先天的素质外，也要接受严格的训练。巫师训练的内容，“包括掌握各种神话、历史传说；熟练精通各种祷词、咒语和经典；能主持祭祀、占卜和释兆；会施行各种巫术技能；掌握巫舞；会运用巫医；了解一定的天文、地理知识；熟悉各种鬼神形象、特点和职守等。”他们所掌握的这些知识，都是用来在具体的巫术活动中口头诵唱和表演的。同时，巫师之间知识的传授，本身就是以言传身授的方式进行的，“具体有两种方法：一是口头方式，即言传，平时由老巫师进行讲授；二是身授，即学巫者跟老巫师一起从事祭祀、占卜和巫术活动，既可观察又能协助，久而久之就掌握巫师本领了。”^{[5](P53)}这种传授历史知识的方式，是人类社会口传现象最具典型意义的例子。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有理由相信，巫师是我国口传历史时期最早的历史传播者。

巫师之后，口传历史时期的历史传播者就主要是“史”了。我国古史中，巫史的分离大概是在商代。商代时史官已经出现，这是学术界较为认可的看法，陈梦家根据甲骨卜辞总结商代职官为三大类：臣正、武官和史官。其中史官类包括：尹、多尹、又尹、某尹；乍册；卜某、多卜；工、多工、我工；史、北史、卿史、御史、朕御史、我御史、北御史、某御史；吏、大吏、我吏、上吏、东吏、西吏。^{[7](P32)}在史官中，陈梦家事实上是分为尹、卜、工、史及吏五类。按照陈梦家的这种观点，史官在商代社会已算得上是十分兴盛了，且其中许多职官（如尹、作册等）的地位已经很高。但需要注意的是，陈梦家对商代史官

的描述是建立在对卜辞的解读上，在先秦文献中，关于商代的历史记载，“史”出现得很少，这就是说，甲骨卜辞与文献所反映出来的商代史官是有差异的。之所以出现这种差异，是因为商代巫与史的交替尚未完成，巫、史共同存在于殷商的宗教祭祀中，故在不同的文献中，史与巫出现的频率也就不同。

就人类文明的普遍规律而言，巫是人类社会最早出现的宗教神职人员，继巫之后出现的宗教神职人员，都与巫有着种种渊源关系。商代，在巫之外，宗教神职系统中也出现了史官群体。西周初，巫已退出了宗教神职的上层，史官群体代之而起，成为宗教神职系统的主要职官。巫、史演变表现为这样一种链条：巫—巫史并列—史。当然巫与史的交替，并不意味着巫的消失。就商代的情况看，巫、史的交替表面上是围绕着权力的转移而展开的，它反映的却是政治文明发展的一种趋势，即神职人员的职官化。而随着神职人员的职官化，口传历史时期的历史传播者，也逐渐成为政府职官系统中的成员。“史”的重要职责之一是掌文字，但从最初的历史来看，掌文字的“史”在传播历史知识的时候，仍然主要依靠口耳相传，先秦时期活跃的“瞽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先秦史学研究中，“瞽史”之辨是一个长期存在争议的问题。关于瞽史的争论，郑玄认为瞽即大师，大师是瞽官之长。但他认为“史”不是单指太史。^① 韦昭认为瞽是大师，史为太史。孙诒让认为瞽为大师，史为大史。（《周礼注疏》卷 26）近代以来，将“瞽史”分为“瞽”与“史”，只得到了顾颉刚等少数学者的认同。顾颉刚在《左丘失明》一文中认为，瞽和史是两种人，这两种人都是侯王近侍，多谈论机会，自有各出所知以相熏染之可能，其术易甚相通。^② 徐中舒认为：“春秋时代我国学术文化虽有很高的发展，但有关历史的传习也还未能脱离这样的原始方式（只以口语传诵历史，以结绳刻木为辅）。当时有两种史官，即太史与瞽矇，他们所传述的历史，原以瞽矇传诵为主，而以太史的记录帮助记诵，因而就称为瞽史。”^③ 王树民认为：瞽与史存在职业分工，“直到近代，许多民间艺人还是由瞽者来作，他们演述的内容，一般的是以历史故事或当时动人听闻之事为主，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到启发。瞽者的听力和记忆力比普通人都要强些，最适宜作音乐和演述故事的工作，古代还没有文字的时候，或已有文字而书写条件十分困难，那时要想保存历史事件的具体情节，惟有利用瞽者这一特长，这样瞽和史就自然地结合起来了。远古时期的历史传说能够流传下来，应归功于瞽史的作用。”^④ 暂不论他们对“瞽史”的解读是否确切，但就目盲、靠口耳相传的“瞽”与“史”并列，并且有“瞽史”这样的著作，就不难说明，直到春秋时期，历史知识的传播仍然是口耳相传与文字记载并行不悖。文字记载最终取代口耳相传，应该是在汉代以后了。

三、口传历史时期历史知识传播的特点

由前文可知，巫师口耳相传的知识主要是：人类起源等神话、创世纪史诗、英雄史诗；氏族部落迁徙历史和原因；各氏族和家庭谱系；各氏族间的仇杀事件；氏族部落的首领和其他人物事件，以及所供奉的神谱等。如黔东南巫师所唱的丧葬风俗歌《焚巾曲》，其内容十分庞杂。它除了唱述死者的出生、成长及恋爱婚姻等情况外，还包括有洪水神话和兄妹结婚的原因以及民族的来源、民族的战争与迁徙，此外很多民俗及某些历史缩影。^⑤ 这表明，口头传说的内容主要是为了保存母系、父家长制时代氏族显贵们的家族历史，这种情况，不限于中国古代，世界其他诸族也同样如此，因而它具有普遍性的意义。口头传说的历史起源甚早，著名盲诗人荷马所歌唱的《伊里亚特》、《奥德塞》两篇史诗，就是有关古希腊英雄时代亦即父家长制时代的历史。史诗中所提到的一些情况，如古代城堡等，已被后来的考古发现所证实，因而这个传说的历史并非无稽之谈，其中不少是可信的。

从人类历史观念的形成和发展，以及从我国周边各族和中国古代社会历史演变情况来看，最原始的历史编纂形式是以氏族显贵人物为中心的编年史，是从父家长制转变为奴隶制，从口头传说转变为文字记

^① 《周礼注疏》卷 37 中郑玄注瞽史，瞽为大师，史为太史、小史，说明郑玄已不能确定“瞽史”的“史”究竟为大史还是小史。

载的历史。

口传历史时期，先民们主要是通过琅琅上口的韵文来传播和保存氏族世袭等方面的历史，这从最早的文字记载都是韵文可看出一些端倪。“上古之时，先有语言，后有文字。有声音，然后有点画；有谣谚，然后有诗歌。……观《列子》所载，有尧时谣，孟子之告齐王，首引夏谚，而《韩非子·六反篇》或引古谚，或引先圣谚，足征谣谚之作先于诗歌。厥后诗歌继兴，始著文字于竹帛。”^{[12](P227)}先民们采用韵文的形式来传播知识，主要因为韵文是有韵律、有节奏的形式，易于记忆，易于传诵，易于传播，能弥补古时没有文字的情况下口耳相传容易走样和淡忘的不足。

在先民们所采用的韵文中，最重要当属诗歌。“从历史和考古学的证据看，诗歌在各国都比散文出现较早。原始人凡遇值得留传的人物事迹或学问经验，都用诗的形式记载出来。这中间有些只是应用文，取诗的形式为便于记忆，并非内容必须诗的形式的。”^{[13](P1)}古诗最初的功能是记载性的、实用性的，而非情感性的。^[14]口传时代先民以诗歌记事，也可以在少数民族中找到一些影子，如瑶族：“作歌记实，是瑶族人民记载本民族历史的传统方式。他们的歌，从不同的角度记述了自己的历史：‘信歌’，记述了瑶族人民的迁徙史；‘历史歌’，记述着瑶族内部不同支系的来历，揭示了瑶族形成的进程；‘纪事歌’，记述了他们苦难的经历和辛酸的往事；而《桃源峒》、《梅山峒》和《千家峒》三首古歌，则记述了瑶族的最早源头，成为多数史学家确认瑶族源于‘长沙、武陵蛮’说的有力旁证。有些歌谣，如纪事歌《里八洞》所记述的‘里八洞’衰落史，比《连州志》所记的更为详尽。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纪事歌就是瑶族的历史文献。”^{[15](P8)}

文字出现初期，先民们采用琅琅上口的韵文来记载历史知识，其主要的目的是为了便于口头传播。我们今天所见到的以文字形式呈现出来的“诗”，在当时则是“乐”，是用来诵唱的。《诗》300篇全为乐歌。今存《诗经》中《雅》、《颂》各篇大都出于宫廷，不少篇章就是为某种需要配合祭祀、宴饮仪式而作的音乐，即使是从民间采集得来的《风》，也经过太师整理而配以音乐。据春秋战国有关文献记载，诗歌通常是借“乐”来传播的。如《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所记吴公子季札来聘于鲁，观于周乐，鲁襄王使乐工为之歌舞，所奏乐章和所观歌舞全是今存《诗经》的篇目。^[16]所以朱自清曾指出孔子时代，诗乐开始在分家。从前是诗以声为用；孔子论诗才偏重在诗义上去。^[17]春秋战国时期仍然有为数众多的韵文出现在各种文献中，“就韵文而言，在春秋时代，虽然没有集成的专书，但是像《诗经》一类的歌词，仍然散见于群经诸子之中。例如《左传》中之‘晋舆人诵’，‘宋城者讴’，‘鲁国人诵’，‘(宋)筑者讴’，‘郑舆人诵’，‘莱人歌’，‘齐人歌’，与《诗》之‘国风’的体裁几无二致。此外如《晋语》(二)中之‘暇豫歌’，《孔子世家》中之‘去鲁歌’，其词调亦无异《诗经》中之歌曲，惟更通俗而已。到战国时代，《孟子·离娄》的‘孺子歌’，《荀子》的《成相》与《赋》，《燕策》中的‘渡易水歌’”，^{[18](P382)}这些“诵”、“歌”之类的韵文和《诗经》广为先秦时代的贤达所征引和传诵，表明春秋战国时期，口头传播仍然是知识传播的重要手段。

口传历史时期，先民们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保存本民族的历史记忆，口耳相传中传播者在复述传说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对传说的内容有所编辑加工，所以同一素材的历史记忆，在不同的传播者中就有了不同的内容，这造成了同一史事在流传过程中就会产生不同的版本，我们以流传甚广的“赵氏孤儿”为例进行说明。

关于“赵氏孤儿”最早的版本出现在《左传》中：(成公五年)晋赵婴通于赵庄姬(按：庄姬，赵朔之妻，赵朔为赵盾之子，赵婴与赵庄姬是夫叔与侄媳通奸)。五年春，原、屏放诸齐。婴曰：“我在，故栾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忧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舍我，何害？”弗听。成公八年，晋赵庄姬为赵婴之亡故，谗之于晋侯，曰：“原、屏将为乱。”栾、郤为微。六月，晋讨赵同、赵括。武从庄姬氏畜于公宫，以其田与祁奚。韩厥言于晋侯曰：“成季之勋，宣孟之忠，而无后，为善者其惧矣……乃立武，而反其田焉。”(《左传》成公五年)

而到了《史记》中，司马迁在《晋世家》、《韩世家》中采用了《左传》的说法，在《赵世家》中则又提供了另外一种关于“赵氏孤儿”的版本：屠岸贾是晋灵公的宠臣，晋景公时出任晋国的司寇，他以治

“灵公之贼”为名，诛灭弑灵公的赵盾之后赵朔等赵氏家族成员，赵朔之妻是成公姊，她带着遗腹子躲在宫中，屠岸贾索于宫中，赵氏的门客程婴、公孙杵臼大义救主，公孙杵臼牺牲自己，程婴带着赵孤躲入山中，赵武长大后在韩厥的帮助下，赵孤（赵武）杀了屠岸贾，恢复了赵氏。^①

《左传》、《史记》之外，汉代学者刘向也提供了两种关于“赵氏孤儿”的传说，一见《新序·节士》，其中关于“赵氏孤儿”的叙述，与《史记·赵世家》的记载相似，它主要昭显程婴、公孙杵臼的义薄云天，于韩厥的事迹言之不多，二者只是在文字上有个别字词的不同。一见《说苑·复恩》，其中的记载，文字上《史记·赵世家》多相同，主题与《史记·韩世家》相同，突出的是韩厥不忘赵氏提拔之恩。

值得注意的是，正如《史记》在《赵世家》与《晋世家》同时保留了两种“赵氏孤儿”的说法一样，《说苑》对“赵氏孤儿”的记载，在《复恩篇》与《贵德篇》也是迥然不同。《贵德篇》中，智果谏智伯应防备祸患时说：“夫郤氏有车轘之难，赵有孟姬之谗，栾有叔祁之诉，范、中行有亟治之难，皆主所知也。”所谓的孟姬之谗，应是《左传》所谓的赵庄姬进谗言打击赵氏，这与《左传》的论调略同。

汉代之所以会出现多个关于“赵氏孤儿”的不同记载，是由先秦两汉历史口耳相传的特点决定的。^②因为口耳相传，所以先秦典籍的形成本身就是动态的，一种典籍最原始的面貌是什么样子？何时何人编成？汉代人都不十分清楚，他们也无法看到一部完整的典籍。^[19]所以，在汉代学者对前代文献进行整理时，同一史事往往就有不同的版本流传，《左传》、《史记》、《说苑》、《新序》中关于“赵氏孤儿”的不同记载，反映的就是这个特点。

先秦时期历史相传以口耳，到战国开始述旧闻而著于竹帛，《左传》中很多材料就来自“传闻”。^[20]春秋各国史官留下的编年记注，其中包括承告的材料，多为提纲式，如《春秋》体，而在这种提纲体外，“本事”另有传承形式，比如瞽矇的传诵，以及聆听这种传诵的国子学生。春秋战国之际，这些口耳相传的本事逐渐被记录为史记了，左丘明的工作，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次。^{[21] (P91-92)}

历秦汉，对先秦口耳相传之历史一直处于整理中。战国后，陆续有三代时典籍成书，儒家所谓的六经也开始出现。秦统一六国，焚书坑儒，非史官所藏之典籍多为秦火所烧，之后项羽火烧秦宫，焚书之余存，亦难免灰烬。然当时之书主要依赖口耳相传，秦始皇、项羽之火，于三代以来书籍的毁坏，并无史传所言之惨烈。

西汉政权中汉惠帝时首开大规模整理旧书籍的端绪，史称：“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讫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谓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汉书·艺文志》）政府既置写书之官，对口耳相传的典籍进行文字记录，但这些以文字书写的材料在民间流布不易，“朔初入长安，至公车上书，凡用三千奏牍，公车令两人共持举其书，仅能胜之。人主从上方读之，止，辄乙其处，读之二月乃尽。”（《史记·滑稽列传》）所以汉人“故欲学者皆口说，非师师相传，其学无由”，^{[22] (P39)}知识的流传仍然以口耳相传为主，《左传》的传布也不例外。

《左传》中主要的材料来自“传闻”，西汉初《左传》又无写定之本，不同的传本在记事上肯定存在差异。司马迁在写《史记》时也曾以口传史料为著述的重要来源，如写荆轲刺秦王，材料就是来自朋友相告：“公孙季公、董生与夏无且游，具知其事，为余道之如是。”（《史记·刺客列传》）写韩信，就亲临淮阴，从当地人那打听关于韩信的事，“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仍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余视其母冢良然！”（《史记·淮阴侯列传》）司马迁或许就是从文字记载材料和口耳相传的材料中，看到了关于赵氏孤儿不同的说法，本着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实录精神，为我们保留了两种关于赵氏孤儿不同的记载。

① 限于篇幅，这里并未全列引文，具体引文见《史记·赵世家》。

② 陈梦家说：古代历史，端赖神话口传，神话口传，遂分衍化；由于口传一事，言人人殊，故一事分化为数事。参阅《商代的神话与巫术》，《燕京学报》第20期。

汉代官方虽然设了书写之官，书写之官把在民间口耳相传的知识用文字记载下来。“在昔政府既置写书之官，而民间流布不易，故欲学者皆口说，非师师相传，其学无由，故最重家法。”可见口耳相传仍然是历史传播的重要手段，如儒家重要的典籍《孝经》在汉昭帝时仍然以口头传诵形式流传，“古文孝经者，孝昭帝时鲁国三老所献，建武时给事中议郎卫宏所校，皆口传，官无其说。”（《汉书·艺文志》）为什么口诵呢？如前文所述，文本的流传在当时是特别困难的。可以说，汉代的经今古文之争，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汉之前包括汉初，经典主要依赖口耳相传而无文字定本，也正是这个原因，中国传统学术一直强调“文”（文字材料）与“献”（口头传诵）并重。

[参考文献]

- [1] 陈梦家. 商代的神话与巫术 [J]. 燕京学报, 第 20 期.
- [2] 巴莫曲布嫫. 鹰灵与诗魂——彝族古代经籍诗学研究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 [3] 摩尔根. 古代社会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7.
- [4] 钱存训. 印刷发明前的中国书和文字记录 [M]. 北京: 印刷工业出版社, 1988.
- [5] 宋兆麟. 巫与巫术 [M].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1989.
- [6] 漆侠. 中国古代史记编纂形式探源 [J]. 中国史研究, 1993, (2).
- [7] 陈梦家. 殷墟卜辞综述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6.
- [8] 顾颉刚. 左丘失明 [A]. 史林杂识(初编) [Z].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 [9] 徐中舒. 《左传》的作者与成书年代 [A]. 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 [C]. 台北: 华世出版社, 1976.
- [10] 王树民. 中国史学的萌芽 [A]. 中国史学史纲要(附录)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 [11] 李廷贵主编. 苗族历史与文化 [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6.
- [12] 刘师培. 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 [C].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 [13] 朱光潜. 诗论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4.
- [14] 闻一多. 神话与诗·歌与诗 [A]. 闻一多全集(一) [C].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64.
- [15] 黄书光等. 瑶族文学史 [M].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8.
- [16] 陈水云. 先秦时期诗歌的传播 [J]. 社会科学辑刊, 1999, (1).
- [17] 可参阅朱自清. 诗言志辩 [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 [18] 剪伯赞. 先秦史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
- [19] 熊铁基. 汉代对先秦典籍的全面改造 [N]. 光明日报, 2005-07-19.
- [20] 过常宝. 《左传》源于史官传闻制度考 [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2004, (4).
- [21] 阎步克. 乐师与史官——传统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论集 [C].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0.
- [22] 郑鹤声等. 中国文献学概要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责任编辑：杨向艳

荀子、韩非的人性论：李斯悲剧根源

◎ 陈桐生

[摘要] 古今学者多将《史记·李斯列传》中的李斯人生悲剧归之于他贪恋富贵。其实，战国秦汉之际的历史人物都有各自的学术背景，不同的思想信仰会造就不同的人生选择。李斯人生悲剧的根源即存在于荀子、韩非的人性学说之中。他接受了荀子的性恶论而抛弃了荀子关于化性起伪的思想，处心积虑地追求功名利禄。在君臣关系上，他背弃荀子关于做谏、争、辅、拂之臣的思想，而服膺韩非关于君臣以利相交的人性学说，在决定秦王朝命运的沙丘之谋中做了赵高的俘虏，由此加速了秦王朝的覆灭，也酿成他自身的人生悲剧。

[关键词] 荀子 韩非 李斯 悲剧

(中图分类号) K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7) 03-0112-04

《史记·李斯列传》中的李斯是秦代一个大起大落的传奇人物，他以辅佐秦始皇统一中国而登上事业顶峰，最后以具五刑被腰斩于咸阳，思欲与家人牵黄犬游上蔡东门而不可得。古今学者都将李斯人生悲剧归结为他贪恋富贵，而贪恋富贵又出于他那“人生在所自处”的卑微阴暗的处世哲学。这些分析无疑都是正确的。本文想进一步指出，李斯的人生悲剧还有更深一层的学术根源，这就是荀子、韩非的人性论。

一、战国秦汉之际历史人物的学术背景

中国有着重视学术理论的悠久传统，学术思想渗透到人们的心灵深处，深刻地影响到人们的人生价值追求和行为方式。西周春秋时期学术思想相对单纯，主要体现在统治者制定的礼义。《国语》、《左传》中所描写的历史人物，其思想学术内涵大都在《诗》、《书》礼义范围之内，当然伴随着西周礼制日益陵迟，其中也有一些历史人物僭越礼义，而任凭膨胀的政治野心和无穷贪欲自然呈现。进入战国之后，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各种流派的学术思想体系相继被创造出来。当时社会各阶层的精英人物，差不多都会站到诸子某一家的理论旗帜之下，自觉地用这一家学说规范自己的思想行为，从而使各自的人格模式呈现出明显的学派化倾向。我们读《战国策》和战国子书，会明显地感觉到战国历史人物的思想内涵与春秋以前大不相同，他们都有非常独特的人格特征，有各自的价值追求和不同的行为方式，而他们的人格现象差不多都能够从他们所服膺的诸子思想学说中得到解释。这种用百家学说指导思想言行的现象一直延续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特别需要强调的是，除极少数人口是心非、言行不一之外，战国秦汉之际的人们都非常真诚，好是真诚的好，坏是真诚的坏，他们信仰、服膺某一种思想学说，就坚决、真诚地按照这种学说行事，言行相符，表里如一。像墨家人物信仰兼爱，他们在行动中也真的能够做到为他人赴汤蹈火，死不旋踵；以杨朱为代表的道家人物倡导为我，宣称拔一毛而为天下，势所不为，他们也就用这一套理论游说世人；擅长于国际战略的纵横策士，赤裸裸地表白他们的人生追求是卿相富贵，而根本不顾天下的苍生和士人的社会责任，他们在现实政治生活也是朝秦暮楚，翻云覆雨；而主张法治的法家人物则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刻薄寡恩……。伟大的人，伟大得旗帜鲜明；无耻的人，也无耻得光明磊落；他们都是从理论到行动，将某一种思想学说化为各自的人格模式。总之，他们的人格是统一的，不存在后代某些人口若尧舜、行同桀纣的人格分裂现象。

李斯是由战国入秦学术色彩非常浓厚的历史人物。对李斯人格心理影响最大的主要有两大思想家：一个是他的老师荀子，另一个是他的同窗韩非。李斯对荀子思想学说有吸取也有扬弃，而对韩非的理论则完全信服。从这个意义上说，韩非对李斯的学术影响甚至比荀子的影响还要大。李斯与姚贾因出于嫉贤妒能

作者简介 陈桐生，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 广州，510420）。

的卑劣心理而合伙害死韩非，但他却将韩非学术思想完全付诸实施。李斯在历史关键时刻的人生选择基本上是按照韩非的人性理论行事，这最终导致他走向毁灭。

二、荀子性恶论与李斯趋利的人生选择

战国时期儒家人性论大体可分为三派：一派认为人性是中性的，无善无恶，就像水一样，决之东方则东流，决之西方则西流，这一派以《孟子》中所记载的告子为代表，《郭店楚墓竹简》中的《性自命出》、《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的《性情论》，也持这种观点；一派提倡性善论，认为人性中天生具备仁义礼智因素，关键在于后天的培养，只要致力于培养善性，人皆可以为尧、舜，这一派以孟子为代表；一派主张性恶论，这是以荀子为代表，其后荀门弟子韩非接受了乃师的性恶论，又有新的发展。

荀子认为，人的自然本性是追求利欲，所以人类的天性是丑恶的。《荀子·王霸》说：“夫人之情，目欲綦色，耳欲綦声，口欲綦味，鼻欲綦臭，心欲綦佚。此五綦者，人情之所必不免也。”《荀子·性恶》说：“若夫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偷佚，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后生之者也。”《荀子·荣辱》说：“凡人有所一同：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这是说，人类的感官天生具有趋利性，趋利避害是人类与生俱来、无待而然的自然天性。那么，天性就有贪欲的人为什么会有善举，为什么有的人会成为圣人呢？荀子有一个说法，叫做化性起伪。伪者，为也，意指后天的造作。化性起伪，就是通过后天的人为努力来感化、矫正、改变人类丑恶的自然天性。《荀子·礼论》说：“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之不能自美。性伪合，然后成圣人之名，一天下之功然后就也。”圣人在化性起伪中起到关键的作用，《荀子·性恶》说：“故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然则礼义法度者，是圣人之所生也。”如何化性起伪呢？荀子提出劝学，即通过学习《诗》《书》礼义，积礼义而为君子。移风易俗对于化性尤为重要，《荀子·儒效》说：“注错（措）习俗，所以化性也；并一而不二，所以成积也。习俗移志，安久移质。并一而不二，则通于神明，参于天地矣。”《荀子·性恶》有一个说法：“涂之人可以为禹。”《荀子·荣辱》也说：“尧、禹者，非生而具者也，夫起于变故，成于修为，待尽而后备者也。”荀子与孟子，一主性善，一主性恶；主性恶者倡导化性起伪，主性善者主张培养善性，最后殊途同归，分别得出“人皆可以为尧、舜”、“涂之人可以为禹”的结论。

李斯对荀子的性恶论只接受了前半截，即认为趋利是人的天性，却抛弃了乃师关于化性起伪、终为圣人的思想。《史记·李斯列传》载：“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学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国皆弱，无可为建功者，欲西入秦。辞于荀卿曰：‘斯闻得时无怠，今万乘方争时，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处卑贱之位而计不为者，此禽鹿视肉，人面而能彊行者耳。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将西说秦王矣。’”这是李斯内心情感的真实显露，生活在战国后期的李斯，看准了当时正处于风云际会、布衣驰骛的历史时刻，发愤要做一番解穷脱困、平步青云的伟业。他说，人生最大的耻辱莫过于卑贱，最大的悲哀莫过于穷困。一个人如果自托无为，不能改变自身卑贱困苦的处境，那就无异于人面禽鹿。可见他是将谋取功名利禄作为人类区别于禽兽的本质特征。李斯辞别乃师时所说的这些话，是荀子人性好利思想的传述。这表明李斯从出师门那一天起，就没有打算要化性，根本没有想到要做一名圣人。他满脑子想的都是功名富贵，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从此，李斯就一直“得时无怠”，抓紧一切获取功名利禄的时机。他向秦王进献歼灭山东诸侯的计策：“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离其君臣之计，秦王乃使其良将随其后。”（《史记·李斯列传》）通过采用种种阴谋手段，李斯最终辅佐秦王一统天下，而他也登上丞相之重位。秦统一天下之后，李斯揣摩秦始皇的心理，为持禄保宠而频出新招。他从荀子学《诗》《书》《礼》《易》，但他当权后却视《诗》《书》为死敌，一心迎合秦始皇以酷刑治国的专制意图，建议秦始皇焚烧《诗》《书》百家之语，禁止天下民众议政，实施灭绝文化的愚民政策；他陪同秦始皇巡游天下，所到之处为秦始皇刻石颂功；他将韩非的专制理论付诸实施，以严刑峻法作为治国的手段，将

全国变成一个大监狱。经过几十年处心积虑的惨淡经营，李斯本人在布衣驰骋、实现人的趋利本性方面达到了“富贵极矣”的地步：“斯长男由为三川守，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诸公子。”（《史记·李斯列传》）身居“高处不胜寒”的境地，李斯在感激、陶醉、庆幸之余，似乎有一种隐隐约约的无名恐惧：“物极则衰，吾未知所税驾也！”（《史记·李斯列传》）在事业达到顶峰的时候，他所害怕的是盛极而衰，失去富贵，而根本不思考如何改恶从善。他的一言一行淋漓尽致地体现了荀子的性恶学说，但他却将荀子化性起伪的理论抛到九霄云外。他一生中也有两次劝谏，一次是秦王下令逐客，他写了一篇有名的《谏逐客书》，成功地避免了自己成为逐客；另一次是给秦二世上《督责书》，同样是出于自保。天下苍生的利益，士的社会责任，李斯是从来不考虑的，他心中只有自己。司马迁在《史记·李斯列传》中批评李斯“知六艺之归，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严威酷刑”，这其中的学术原因，就在于李斯从荀子那里所接受的半截子人性论。

三、韩非君臣关系学说与李斯人生悲剧

沙丘之谋是决定秦王朝和李斯个人命运的重大历史事件，李斯在这次事件中扮演了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关键角色。在这个性命攸关的历史时刻，最终支配李斯行动的不是荀子的臣道思想，而是他的同学韩非的人性论以及由此而来的君臣关系学说。

荀子虽然讲性恶，但他最后的落脚点是要引导人们做圣人，他曾经专门作了一篇《臣道》，主张人臣不要谄谀逢迎，贪图禄位，而要做谏、争、辅、拂之臣。他将人臣的忠诚划分为以德复君、以德辅君、以是谏非三个层次，要求人臣在大节上做忠臣，用道德仁义辅佐君主。我们虽不能说荀子这些思想对李斯丝毫不起影响，但在做忠臣与维护自身利益两者之间作出最后选择的时候，李斯否定了荀子而接受了韩非的君臣学说。

韩非继承了荀子人性欲利的思想，而进一步将其落实到人际关系之中。韩非认为，社会各阶层人们的行为都一无例外地被利所支配。《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利之所在民归之，名之所彰士死之。”《韩非子·备内》说：“故王良爱马，越王勾践爱人，为战与驰。医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之亲也，利所加也。故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他认为人们都是从利己的角度来处理人际关系。《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庸客致力而疾耘耕者，尽巧而正畦陌者，非爱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钱布且易云也。”这是说农民努力耕耘，是为了图得主人的一顿美餐和一笔高酬金。《韩非子·六反》说：“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父母为什么会重男轻女呢？这是因为父母“虑其后便，计其之长利也”。这是说父子关系也是出于利己之心，尽管他们之间有着血缘亲情。韩非感叹说：“故父母之于子也，犹用计算之心以相待也，而况无父母之泽乎？”《韩非子·内储说下》载：“卫人有夫妻祷铸者而祝曰：‘使我无故，得百束布。’其夫曰：‘何少也？’对曰：‘益是，子将以买妾。’”这表明夫妻之间也要计较利害得失。韩非不相信荀子关于做忠臣的教诲，他认为君臣之间都是为了各自的利益而互相算计。《韩非子·饰邪》说：“君以计畜臣，臣以计事君，君臣之交，计也。害身而利国，臣不为也；富（害）国而利臣，君不行也。臣之情，害身无利；君之情，害国无亲。君臣也者，以计合者也。”《韩非子·难一》进一步将君臣关系比做市场上买卖关系，他引用田鯤的话说：“主卖官爵，臣卖智力。”又说：“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重爵禄以与臣市。君臣之际，非父子之亲也，计数之所出也。”君主将爵禄卖给大臣，大臣将自己的智慧卖给君主，君臣之间都是赤裸裸的利益交换，都是精明的利害算计，没有任何情感恩义可言。就是韩非这些人性理论，给李斯处理大是大非问题以决定性的影响。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病死于沙丘，留下遗诏要嫡长子扶苏与丧会咸阳而葬，这实际上是将后事托付给扶苏。平心而论，如果没有赵高惊天的阴谋，那么李斯也会忠实地执行秦始皇的遗诏。假设扶苏即位，那么李斯的人生结局不外三种：一是李斯继续发挥他善于揣摩逢迎的手段，得以持禄保宠；二是削职为民；三是受谴赐死。从扶苏直谏秦始皇滥杀来看，李斯第二种结局可能性最大。但是赵高篡权的图谋击碎

了这些假设。《史记·李斯列传》详细地记载了沙丘之谋：

高乃谓丞相斯曰：“上崩，赐长子书，与丧会咸阳而立为嗣。书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赐长子书及符玺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与高之口耳。事将何如？”斯曰：“安得亡国之言！此非人臣所当议也！”高曰：“君侯自料能孰与蒙恬？功高孰与蒙恬？谋远不失孰与蒙恬？无怨于天下孰与蒙恬？长子旧而信之孰与蒙恬？”斯曰：“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而君责之何深也？”高曰：“高固内官之厮役也，幸得以刀笔之文进入秦宫，管事二十余年，未尝见秦免罢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诛亡。皇帝二十余子，皆君之所知。长子刚毅而勇武，信人而奋士，即位必用蒙恬为丞相，君侯终不怀通侯之印归于乡里，明矣。高受诏教习胡亥，使学以法事数年矣，未尝见过失。慈仁笃厚，轻财重士，辩于心而讷于口，尽礼敬士，秦之诸子未有及此者，可以为嗣。君计而定之。”斯曰：“君反其位！斯奉主之诏，听天之命，何虑之可定也？”高曰：“安可危也，危可安也。安危不定，何以贵圣？”斯曰：“斯，上蔡闾巷布衣也，上幸擢为丞相，封为通侯，子孙皆至尊位重禄者，故将以存亡安危属臣也。岂可负哉！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几，孝子不勤劳而见危，人臣各守其职而已矣。君其勿复言，将令斯得罪。”高曰：“盖闻圣人迁徙无常，就变而从时，见末而知本，观指而睹归。物固有之，安得常法哉！方今天下之权命悬于胡亥，高能得志焉。且夫从外制中谓之惑，从下制上谓之贼。故秋霜降者草花落，水动摇者万物作，此必然之效也。君何见之晚？”斯曰：“吾闻晋易太子，三世不安；齐桓兄弟争位，身死为戮；纣杀亲戚，不听谏者，国为丘墟，遂危社稷；三者逆天，宗庙不血食。斯其犹人哉，安足为谋！”高曰：“上下合同，可以长久；中外若一，事无表里。君听臣之计，即长有封侯，世世称孤，必有乔、松之寿，孔、墨之智。今释此而不从，祸及子孙，足以为寒心。善者因祸为福，君何处焉？”斯乃仰天而叹，垂泪太息曰：“嗟乎！独遭乱世，既以不能死，安托命哉！”于是斯乃听高。

从李斯与赵高这一番交谈可以看出，李斯最初多少还有一些做忠臣孝子的念头，但这一点念头实在抵挡不住赵高对利害关系鞭辟入里的剖析。赵高五个“孰与蒙恬”的发问，像一枝枝连环利箭，一直穿透李斯的灵魂。赵高所描述的扶苏为帝、蒙恬为相、李斯被诛死的恐怖前景，更对李斯心灵具有无比的震慑力，而赵高许诺的拥立胡亥则长有封侯、世世称孤的愿景，无疑正是李斯一贯的人生追求，也是李斯在后秦始皇时代最大的愿望。所以，尽管李斯深知废嫡立庶、更易太子会给秦王朝带来严重的灾难性后果，但他最终还是俯首做了赵高的俘虏。秦始皇之死，对李斯来说确实是一次人生危机，但对秦王朝而言则是一次自我更新的机遇。李斯在历史关键时刻的行为表明，他最终抛弃了荀子关于做谏、争、辅、拂之臣的思想，不惜牺牲秦王朝的利益换得一己之私利，这就是韩非“臣以计事君”、“害身而利国，臣不为也”思想的体现。李斯害死了韩非，但他在治国时用的是韩非思想，在人生的关键时刻，他所用的还是韩非思想。

由于李斯放弃原则立场，赵高擅自废立的阴谋得以成功实现。秦王朝政治因此失去了改弦更张的机会，在赵高、胡亥倒行逆施、滥施淫威之下，本来就已经高度尖锐的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秦王朝由此加快了灭亡的步伐。后来的事实表明，沙丘之谋还只是赵高阴谋的起点，他还有更大的篡位自立的政治野心。胡亥、李斯都不过是他达到险恶目的、用完就丢的道具。在赵高如此险恶的布局之下，李斯的悲剧命运在所难免。赵高只不过是个宫廷小丑，论智慧和才能，李斯都远在赵高之上，为什么沙丘事件以后，李斯步步被动、沦为赵高掌中玩物呢？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赵高准确地把握了李斯极端利己、热衷功名利禄的致命弱点。

李斯人生悲剧的学术根源，存在于荀、韩人性学说之中，他片面地吸取了荀子的性恶论，特别是信奉韩非关于君臣以利相交的思想，他在秦王朝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个人的功利目的，他绝不是秦王朝的忠臣。司马迁在《史记·李斯列传》中说：“人皆以斯极忠而被五刑死，察其实，乃与俗议之异。”太史公的目光是深刻的。

责任编辑：杨向艳

•审美文化•

论生态审美体验

◎ 盖光

[摘要] 生态审美呈现人的复合性生命体验形式。生态审美体验从人与自然生态的互动共生条件下活化生态生命体验，以促发人的生态性生存，这既是对人的现实生存的关注，更是对未来生存的关怀。生态审美体验视和谐性为人的根本生存方式，视爱意生存为人类文明的生存结构，并强调人应该在自身与自然的双重解放中走向人的生态性生存。

[关键词] 生态审美体验 生态性生命体验 生态性生存 解放意识

(中图分类号) I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7) 03-0116-05

一、生态审美体验与生命体验、生态体验的关系

就人的生命活动而言，体验具有几重意义：一是现实意义，人总是在现实生存中，呈现感性与意志目的、情感想象相交织的体验形式；二是反思意义，人需要在体验中反思和把握生命存在的意义与价值，要解除自身的生存困境，获取平衡利欲性生存的方法；三是未来意义，体验离不开目的性，人总是面对未来而巡礼对终极性的生命追索，期望寻求人的终极存在的意义。审美活动的体验性不仅具有生命体验的一般性质，并且在这多重意义的综合效应中，审美更把人对生命活动的终极追寻视为自由与和谐的体验，以呈现“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庄子·知北游》）的生态体验。

人的生命体验，既肯定着感性、物种性的生命形式，并视之为生命活动的基础，更肯定自己的社会和精神生命的体验，并将其作为人类区别于自然生物，体现人之所以为人的主要方式。人不局限于现实生存，还要将自己的生命活动推向更高的层次，不仅意识到而且努力去追寻生命存在的更高形式。这就需要人们在现实的生存活动中时时感悟、关注和体验着终极性生存状态，并将这种体验和关怀注入审美元素。如果我们将生物种类的生命存在形式作为生命单元的话，人类作为物种的生命的存在形态可视为种性体验，那么以类存在及社会性为依归的生命形式可视为类性体验。这两种生命体验形式都具有现实性、客观性。人还有精神的、审美的生命体验形式，在这种体验中人还要超越现实的生命形式，追思更高意义的、精神的及自由存在的生命体验超性体验。所谓超性之“超”，一方面要超越感性生命的禁锢及欲望、功利约束，又要超越人的社会性存在的规范与制约，以提升自觉的，从精神生命活动的意义上，融入人的精神的、审美的自由境界，另一方面，还包含融合、融通及解放的意味，而解放既内含躯体的解放，也含精神的解放，既有对人类自身的解放，也有对自然的解放。超性体验呈现了人的生命体验的自主性、能动性。这复合性生命体验形式的整合及有机融合，构成了人的生态体验形式。

人的种性体验与自然生态及自然事物错综交织在一起，人与自然的对立与交合主要体现在其中。人在重生命体验中有欢娱，更有焦躁，因为这是由感性生存表现的生命体验情境，其欢娱与焦躁实际就是对感性需求及欲望满足程度的表征。人类在自我中心的生存状态中所表现的对自然的征服与改造，以及需要满足与否，都可以带来种性体验中的欢娱与焦虑。由类性体验到超性体验的过程，呈现人的自为性的生命存在状态，并显示对种性体验的超越。人们在超性体验中所产生的体验感受，往往是精神的恬适、灵魂的宁静，乃至无为，既显示和谐性生存，也呈现爱意。但这种和谐与爱意不仅是对人的，还是对自然的。这

作者简介 盖光，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山东 淄博，255049）。

同时就内存着一种向自然存在状态的回归，或者说是融通人与自然生态的和谐关系，即将神性体验中所表现的对自然的对立感、征服欲进行沉淀和消融，以归复那种自然与无为的和谐状态，以展示生态性体验域界中人与自然的生态共生、共存、共荣。

生态审美体验首先呈现包容性，既包容上述的复合体验形式，又凸显超性体验。我们在生态审美体验的逻辑的、超越性律动中把握人的生存结构，既肯定神性存在及神性体验对生命存在的支撑力，也肯定类性体验中的社会组织结构，更显示了在超性体验中感悟或理解人类存在的本质。生态审美体验促成人们不断地以和谐、爱意意识去关注生命，不仅是关注人的生命，还关注自然生态中的生命存在，关注人类赖以生存的生命共同体，以其在对人与自然的生命关注中整体地提高人的生存质量。生态审美体验始终深度地求解人与自然的生态共生性的存在本质，祈望在这种共生性的生命体验中，能够全面展示人类和谐、自由的生命活力，展示人的生生不息、永不歇息的生命创生力。

二、生态审美体验与人的和谐性生存

从生态审美体验的视角审视现实存在的人，则人不可能总是趋利性的。利益、功利所解决的问题，更多的是物质肌体的本能性存在。人的生存能力是多方位的，尽管利益追寻可以解决人的基本生存，但支撑利益的则是人的更多的生存能力，是人的多重能力全面、自由地发挥。弗罗姆说：“人只有充分表现了自己，当他充分利用了他的能量时，人才会生存。如果他不这样做，如果他的生活只是由占有和使用而不是由生存所构成，那么，他就是退化的；他变成了一件东西；他的生命就无意义。”^{⑪(P18)} 生态审美体验所关注的更是生命意义的转换生成。转换生命的意义需要不断转换利益取向，而不断追求人类“充分利用了他自己的能量”的方式，以提升人的生存质量，促成人的和谐性生存。

生态审美体验促成和谐性生存，表明人类是主动的、有意识、有目的的存在物。人类能够从事全面的生产，全面关注对象与自身，能够在全面的生产活动中深刻地认识自身与自然、社会乃至与人自身的多重关系。人类活动的全面性必然呈现系统整体化的生态性活动方式。人类的生态性活动方式不仅要和谐地调适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更要和谐地结构人类生态系统，并且将人类生态性生存的和谐与自由反馈于自然生态系统。这种反馈也表明，没有人类生态的和谐，就不可能有人与自然生态的和谐。人的系统整体化的活动方式也印证了马克思的话：“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⑫(P97)} 我们通过生态系统和谐结构的把握而理解马克思所说的内在尺度，这是创生人类生态的和谐与自由关系的尺度；美的规律作为人类活动的自由自觉的行为，也是和谐性创生活动的规律，即创生人与自然生态的和谐统一的规律，更是和谐性地创生人类生态性生存的规律。

生态之链上交织的事物总是处于相互依存的关系中，呈现共栖、共生、互生、化生，或者是“生生”化的生态关联。对人的生存体验来说，人们体味这种相互依存关系中的共生及其生命创生，需要把自己的生存活动不断升华为审美活动。人类从事审美活动的本真状态应该是生命的创生，而创生必是趋于和谐，体现和谐性的创生与创生性的和谐，必然融合生态审美化的创生性体验。生态审美化的创生性体验不同于创造性体验。创造性体验是致力于发现生存活动中的无，或者说是无中生有与有中生无；生态审美化的创生是经由生命体验而使生命更加富有活力，更加展示出生命机能的勃勃生机，并始终不脱离具体的、活生生的生命存在形式，但这些生命的存在形式、生命的机能、生命的活力和生机必须是在生态系统的运行中得到展示。创造性体验往往注重人类自身的活动，它服务的对象主要是人类自己，往往以人的存在超越自然生态关系，以肯定人类自身主体性之一极，而以否定性态度对待对象一极，并在二元对立的状态中去征服、改造自然对象，求得自然为人类服务，以获得人类所应有的生存资源，促进人类自身的发展。从终极趋向上来把握，创造性体验以构造人类中心而去促成人类生命体验的和谐及自由生存，但同时会解构人与自然生态关系的和谐，消解人与自然生态的血脉。生态审美化的创生是以生态世界观、整体性存在观和系统性活动观为导向，将人类放在超越自身，在更大的有机整体的视域中去思考与把握，或者说是在生态和

谐关系中去把握人类的生存和生命体验形式。

由生态审美体验之和而运行的美的规律，并不是同一性、趋同性的，而是呈现多样性，是由生物多样性体现出的多样统一。生态审美体验所突出的就是生命存在的这种和而不同的样态。就和的本有意义而言，一方面和必须重生，生不是虚幻的，而是实在的，是在多样生命活动的状态中体现出来的。自然生态是多样统一的，是生物多样性的存在，生物多样性也是生命个体及生物类群的多样性。生命的存在是宇宙天地间的大美，生命的多样化更使其能够永久流行，即不断地运演生生不息的大美之规律。另一方面，和是多样统一的和，而不是整一性、同一性的和。生态审美体验之和必然是多样生命体在施展不同的生命机能和技能的条件下，发挥自身的生命能量、展示生命活动形式而形成的多样统一的和。《左传·昭公二十年》中记述齐侯与晏子讨论“和与同异乎？”时，以晏子之口曰：“异。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单之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国语·郑语》中也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同体之和，无之以味，无味则无美；百物之和即为多样之和，即为“土与金木水火”多样共生共存而成的和。

和之味与和之百物都是实在的，但其本身并不就是美，只能是美的载体。审美体验必然是以实在之物、感性实在的自然对象为载体。审美体验的和谐结构需要在味之和与百物之和中彰显其内在的魅力。生态作为生命的存在状态，实际也是多样生命体之间交和、共生、共荣的状态，任何生命体面对的都是实实在在的对象，以及实实在在的需要。以需要而生的生命实在，作为生命现实的状态，即可称为“实态”。生态之和的美味也必然在多样生命体的交和、共生中发散出来，多样生命体共生、共荣就成为生态美味的基础。但美还表现实与虚的多样统一，因为生命存在本身就是实与虚的多样体验。美是人类生命活动的境界性展示，而境界其实就是实与虚的有机转换。审美体验需要伴随着强烈的情感体验，需要飞动着无尽的想象，情感与想象尽管是由现实之实态引发，但其本身却是虚的、模糊的，因此，审美更需要有这种“虚态”，虚态召唤着实态的“返魅”，因为虚态中内蕴着生存的意义和目的，孕育着人的生态性生存的未来景象。实态与虚态的和谐构成及有机转换既是生命全面能力的展示，更是彰显审美境界的魅力。

三、生态审美体验与人的爱意生存

和谐性生存进入人的现实境域，就必然体现爱，并将爱意生存视为人类文明的重要内容。生态审美体验要穿越有限的时间，表现人类生生不息，永不歇息的生命创生力，要活化人的生态性生存体验，还必须融入进对爱意文明的体验。生态审美内存着人类之爱，并以对人的自我生命之爱为中介，生成对生态世界中与多样生物体间的生命之爱。人与自然的生态关联的纽带是生命，更是生命之爱。没有对生命的爱，也不可能有对自然之爱，因为人的生命存在之本，也是爱之本。爱是人类精神所在，但爱的支撑却是生命机能，是生命的能量。爱并不是一种虚设，而是生命的实在；爱还形成情感能量的流动节律，形成感悟不同生命体实在的链条。爱的人类精神，实际就是人类的宇宙精神，也应该是人类深切感悟的，以及实实在在体验生命存在的生态精神。儒家讲仁者爱人，事实上，爱人、爱物与爱己应该是同体的。利益及功利性的关己，并非是爱己，人只有蕴聚肉体与精神/灵魂上全面的爱，与爱人、爱物、爱自然之整体相交融的爱，才是真正地爱己。孟子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启悟人们把一切对自己的爱，推及对他人与他物的爱，并进而呈现本质的爱。

生态审美显现爱的价值，爱的价值促发人对于自然的回归，实际是对生命价值的回归。现代物质主义的泛化似乎是极尽对人类肉身肌体及物质生活方式的关爱，尽管单向度的物质性之爱可以在时空限度内得到欲望与需要的满足，但却往往会走向人类生存的反面。这必然会带来人的精神生存空间的狭小，以及生存的焦虑、精神的恐慌、信仰的缺失及归途的迷惘。对于从事生态性生存及不断寻求精神审美的灵性之境的人来说，极度地索取物质性之爱，实际上是在注塑着一种异化的人格。现代人走出自我生存的禁锢，解构生存的悖论，调整异化人格的生存机理，其最为基础的环节，就是认同爱。这就要求去关爱生命，生态合理性地认同生命的价值，并致力于找寻调适物质性的肌体之爱与精神之爱的生态融合的方法。马尔库塞

认为，现代西方社会的精神病态就是出自于爱的缺乏，高度的物质文明挤压了人的精神生存的空间，带来了人的精神生活的极度压抑与空乏，以及痛失家园与爱的失却的悲凉感。美国生态学家比尔·麦克基本在《自然的终结》一书所作的十周年纪念版的序中颇为感慨地说：“我们的这个家园，为我们所祝福的大块的岩石和天空，我们诞生于其中的生物共同体，变成了一天比一天简单、充满了更多暴力的地方，季节的节奏正在被改变和打破。我们没有创造这个世界，但是我们正在忙于削弱它。太阳还在升起，月亮还有圆缺，但是，从它们那里看我们的地球，意味着某些事情与从前已经大不一样了，它比从前少了些什么。这蜂鸣般的、鲜花盛开的、神秘的、严酷的、可爱的，有高山、大海、城市、森林的地球，有鱼、狼、小虫和人的地球，有碳、氢和氮的地球——在我们的时代已经变得不再均衡了，这里更多的是我们。这是我挥之不去的悲伤。”^{③ (P18)}

生态审美之爱的内涵不同于生态伦理意义上对自然的道德与权利的认同，实际上这也是一种超越道德性的解困。生态伦理性的关照自然，是在权利话语系统中承认自然存在的价值合理性，并且强调人对于自然必须具有道德性的认同与关爱。但权利话语与道德体认也会产生道德困境，进而产生人的生存权利和自然存在权利的悖论。生态伦理的道德困境及悖论，就在于忽视了生命精神的根基，其权利的植入往往是外在的。而生态审美的观照恰恰在于首先是肯定生命存在的权利，构筑人的生态性生存体验形式。生态审美可以引领生态伦理走出困境，突破悖论。事实上，在权利话语中人们应该承认的不仅仅是事物实体性存在的权利，更重要的是生命存在的权利。生命应该是一切存在的根本。我们如果要承认自然存在的权利，承认生物多样性的权利，首先必须承认生命存在的权利。我们构筑权利话语首先应该确立物种生命存在的权利，确立生物多样性存在的权利，同时在物种的权利认同中表现对生命的关爱，视生命存在为美的存在。人类肩负着关爱生命的伟大责任，肩负着关爱宇宙自然及生物多样性中所有生命存在的伟大使命，肩负着从生态审美的视域中激励自身，积极主动地、合理有效地融合无限多样存在的生命体，使之能够和谐自由地交往与互换生命能量的伟大使命。在生态审美的氛围中，爱与美是同体的，是生态性生命存在的一体两面，爱在于激发生命的激情，美在于促动及展示生命动势的内在韵律，展示生命之美的价值。爱与美的生命节律直接彰显为生态性生命存在的节律，爱的价值与美的价值就直接践行着生态审美价值。

人类的爱作为人的生命价值的内在机能，不同于生物本能的爱。生物性的爱，不论是生物物种之间的爱，还是物种内部的爱，尽管都呈现生命现象，是生命存在的生态性表现，但作为生物共同体中本能的生存状态，它却难以用生命的激情来促发，更不可能以主体的审美情感来归位。生物性之爱的结果充其量也就是物质肌体性的生存满足，或者是种类的繁衍，都难以像人类那样，以主体精神和意志而表现爱的价值。人类对爱的价值认同与践行，以及对生态性生命之爱的程度，其实是人类文明程度的最直接展示。

四、生态审美体验与解放意识：走向生态性生存

生态审美促成人类对生命之爱意的体验，爱不仅是现实的，更是趋向未来的。生态审美体验必然要激活人类之爱意，通过活化生态性生存机能而追寻人类未来的自我关怀。一切未来性关注，都必须立足于人类现实的爱意生存，必然从现实出发，通过创造生态性生存氛围而体现一种解放意识。

解放意识本质上指向人的解放。人的解放既是现实的，也是未来的，但只有盘活人在现实中的解放，才能明晰未来的解放。马克思说：“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④ (P443)}从事生态性生存体验的人，还给自己的就应该是与自然和谐共存的世界。那么，解放就理应在生态存在关系中体现出人的生存本质，使人们在和谐共存的世界中，多方面地获得自由的生命体验。

第一，人与自然生态关系的解放。人不仅需要自身的解放，同时还要显示对自然生态的解放，这是通过人自身的解放而反馈于自然的解放，并且，人的精神—文化性生存的本性决定了这种解放。因为人认识对象，首先要认识自身，人是以对自身的认识和体验为中介，进而认识和体验自然。在人与自然生态和谐共存的自由体验关系中，人认识和体验对自然的解放，也必须以认识和体验对自身的解放为中介。人解放自身，前提是需要解构两种依赖：一是解构人们由于对自然存在的模糊认识而生成的依赖和膜拜，以构建

人的主体自由精神；二是解构人们对欲望性存在状态的依赖，解构那种被利益扭曲的灵魂，而朝向对自然生态合理性的认同。对自然的解放，就是复归自然生态的本真，合理地确认自然生态对人生存的意义和价值。

第二，人在社会生态关系中的解放。这一重解放的含义所涉及的前提条件是自然权利的认同与社会生态关系中个体生存权利的认同，后者是前者的中介。个体生存权利的获得促使无数的生命个体要不断寻求自主化、主动性的生存。一方面个体要超越依附性的存在关系，谋求自由生存权利，并祈望个体生命创造力能够得到有效的发挥；另一方面，个体需要合理地调适在社会生态中存在的关系，使个体的自由与生命力的发挥建立在与多样存在的生命个体的社会共生关系中。人在社会共生关系中的解放，还不是最彻底的解放。彻底的解放必须是回归自然的，因为人的生态性生存需要在生态关联的整体构成中呈现，人在社会共生关系中的解放只是向自然生态回归的中介，是人在生命共同体中与生物多样性建立共生关系的中介。

第三，精神心灵生态的解放。人作为精神文化存在物，首先应解放精神心灵。精神心灵的解放，需要人以洁净、关爱、自由的心去感悟自然，理解自然，体验自然生态，需要在社会—精神—文化的同体建构中以心与自然相连。审美化地关注自然就是以灵魂感悟和体验自然，这就必然是在生态审美化地对待自然中获得心灵的解放。波德莱尔《恶之花》中的一首《感应》诗说：“自然是座圣殿，廊柱栩栩如生，时不时隐隐约约在窃窃私语；穿越象征的森林，人过大庙宇，林海用亲切的目光观察人生。”这首诗曾被称为象征主义的宣言，诗人祈望着人要全身心投入而感应自然，同时也体悟着自然对人类行为的观察。

第四，生态审美化的解放。生态审美化的解放是人的本真性、自由性的解放，既内存着人的生态性生存状态的解放，也包含着人的社会本性的解放。席勒曾经谈到，要想把感性的人变为理性的人，首先必须将其转换为审美的人。审美的人必然是感性与理性和谐统一的人，也是超越利益驱动，解构功利性为先的人。真正意义上的审美的人就必然是被解放的人，也同样会是生态性生存的人。人只有在审美和生态性的体验中才能真正体悟到解放的真义，进而体味到生命的真义。

生态审美体验呈现人类最高的自由活动方式，不是实体性地建立人与自然的生态联系，不只是将自然物作为获取生存滋养的源泉，而是作为共生的资源。人们体认自然的内在价值，并不是希求对自然的利用与改造，而是与自然的心灵感应。只有在这种“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倪于物”的精神体验方式中，并以此而体现生态审美体验的深层机理，人们才能够不断地解欲、消欲、去欲，使这种体验的过程成为激发情感力、解放想象力的过程，成为解放人的主体能力的过程。我们从生态关系中理解的这种主体能力，就应该是人调协生态关系的能力，是追求和谐生存的能力，是锻造生态生存的能力。生态审美体验中关注人的自我解放，必然会带来对自然的解放。人们审美化地运行着生态生存节律，必然呈现人的精神自由状态，这不仅在主体间交往关系中是自由的，在社会生态关系中是自由的，在与自然的生态关系中也是自由的。被这多重自由所解放的人，会自由自觉地去善待自然，发现自然的美，通过自然美态的体验反观自身，从而建构新形态下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解放自然同时也是解放在利益、占有、欲望困扰下的非自由性的人类自身，并且是变非自由性的人而为生态自由的、审美自由性的人，是生态性生存的人。这正如马尔库塞说的：“自然的解放，就是重新恢复自然中促动生命的力量，就是重新恢复在那种徒劳于永无休止的竞争中不可能存在的感性的审美性能，正是这些审美的性能揭示出自由的崭新的性质。”^{[5] (P122)}

[参考文献]

- [1] [美] 埃里希·弗罗姆.生命之爱 [M].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2001.
-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3] [美] 比尔·麦克基本. 自然的终结·十周年纪念作者序 [M].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
-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 [5] [德] 马尔库塞.审美之维 [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陶原珂 王法敏

试论颓废的现代性^{*}

◎ 陈瑞红 吕佩爱

[摘要] 颓废，作为19世纪文化艺术中的一个重要主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方资本主义理性主义暴政下的现代文化危机。它是一种艺术风格，也是一种生活姿态。它是艺术家借以逃避现代生活的矛盾、痛苦和精神荒芜的解救之道，客观上体现了艺术家在现代性语境中对抗资产阶级理性主义的审美立场。无论是作为一种美学理想，还是作为一种文化样态，颓废概念都无法回避其现代性的实质。

[关键词] 颓废 颓废主义 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 I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7) 03-0121-04

颓废 (decadence)，就其深深植根于时间的破坏性、存在的有限性以及几乎与生俱来的死亡意识之中而言，是人类社会生活所无法回避的一个方面，几乎所有的古代民族都熟悉这种或那种形式的颓废神话。然而，尽管颓废的概念相当古老，与颓废有关的词语在欧洲语言中的流行，却是19世纪中期以后的事。

在现代文艺批评中，最先对艺术上的“颓废风格”(style of decadence)予以描述和界定的，是法国反浪漫派的保守批评家德西雷·尼扎尔。在《关于颓废时期拉丁诗人道德与批评的研究》(1834)一书中，尼扎尔表面上论述的是罗马颓废时期的诗歌，但他批评的实际目标却无疑是当时的浪漫主义思潮。而且，在《1836年的M·维克多·雨果》一文中，尼扎尔也曾明确谈到这位浪漫主义作家作品中的颓废特征：

在他那里，想象力取代了一切；只有想象力在运思和表演：它是一位统治着不受约束之物的女皇。在他的作品中理性无立足之地。没有实际的或可运用的概念，没有或几乎没有现实生活；没有哲学，没有道德。^{[1][P172]}

尼扎尔的观点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后来者关于颓废的界说。1868年，戈蒂耶在为波德莱尔的《恶之花》——这部现代颓废派的“圣经”——所写的序言里，对颓废风格做出了更为经典的论述：

被不恰当地称为颓废的风格无非是艺术达到了极端成熟的地步，这种成熟乃老迈文明西斜的太阳所致：一种精细复杂的风格，充满着细微变化和研究探索，不断将言语的边界向后推，借用所有的技术词汇，从所有的色盘中着色并在所有的键盘上获取音符，奋力呈现思想中不可表现、形式轮廓中模糊而难以把握的东西，凝神谛听以传译出神经官能症的幽微密语，腐朽激情的临终表白，以及正在走向疯狂的强迫症的幻觉。^{[2][P176]}

在这里，戈蒂耶不仅对艺术中的颓废风格进行了描述和界定，还特别强调了艺术上的颓废风格与文明的过度成熟乃至衰落之间的关系。他已隐约地意识到波德莱尔的诗歌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崭新的美学元素——即致力于表现意识的幽深、感官的细微、激情的风暴乃至幻觉的错乱颠倒等等——与西方社会和文明的现代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80年代，有相当一部分诗人、作家自觉追随颓废风格，法国诗人魏尔伦的十四行诗《衰竭》(1883)是这一时期颓废诗歌的代表作。诗人对颓废概念也曾作过一段迷乱而又精彩的描绘：

* 本文倾向于认为，西方文明的“现代”时期应该包括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以及从启蒙运动至今的两个历史时段。现代时期所经历的多个社会层面的发展和进步，诸如自然科学的伟大发现、工业化、都市化、交通和通讯的发展、人口迁徙、市场经济、宗教与世俗事物的分离、民族国家的形成等各种世界性的历史过程，通常被称为“现代化”。而现代化进程所培育出的、不同于过去的种种观念、风格、表征等等则被松散地集合到了“现代性”的名称下。也就是说，“现代性”是用来描述和界定现代时期社会文化特性、精神体验和历史形态的总体概念。

作者简介 陈瑞红，南京农业大学人文学院讲师（江苏 南京，210095）；吕佩爱，华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上海，200062）。

我喜欢颓废这个词，它闪耀着姹紫澄金的微光。它表达了最高的文明的种种精细思想，它是高超的文学化，是一个可以感受深刻欢乐的灵魂。它摆脱了喷吐的烈焰和熠熠生辉的宝石，使人联想起妓女的胭脂红，想起马戏团的杂耍，想起气喘吁吁的古代斗士，想起野兽的窜跳，想起赛马会上人们消耗的热情，这种热情在渴求自身的迸发，这种负荷把热情消耗殆尽，正如入侵之敌吹响的号角。”^{④(P166)}

魏尔伦的概念，更多地着眼于颓废文艺的内容层面。从上述描绘可以见出，颓废的魅力很大程度上来自官能快感的耽迷沉沦所产生的令人亢奋、五彩斑斓的样式。或者反过来说，官能快感的耽迷沉沦在世纪末的特殊语境中，被诗人赋予了一种审美化的奇异色彩。

1884年，法国作家于斯曼发表了著名的颓废主义小说《逆流》。这部小说被认为是一部“关于颓废趣味和癖好的百科全书”。小说的主人公让·弗洛雷萨·德·艾散特是一位“西方没落的虚构的——神秘的——英雄”。他资质聪敏，但在经过早年的放荡生活之后，却对生活中普通的娱乐失去了兴趣，并和当时由日益上升的资产阶级所主宰的社会格格不入。德·艾散特断定文明的本质就在于永远远离自然和现实生活，他受着各种违反自然的、新异的美的吸引，他的想象力和幻觉力发达得近乎病态。基于主人公这种反常的感知模式，书中对种种细节的描绘，充满了各种病态的感官印象的恣意堆砌、交叉和幻化。随着《逆流》的出版，当时法国文坛上的颓废欣快症一时达于极端，一场名为“颓废主义”的文艺运动，以1886年安纳托尔·巴茹创办《颓废者》杂志为标志，在欧洲展开。

英国唯美主义作家奥斯卡·王尔德与这场颓废主义运动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他不仅是法国颓废主义思想传入英国的直接媒介之一，而且是英国颓废主义的最重要代表。19世纪90年代的英国，在王尔德周围形成了包括欧内斯特·道森、奥布里·比亚兹莱、阿瑟·西蒙斯、乔治·摩尔等人在内的颓废主义的文艺圈子。对于颓废派来说，颓废的概念不仅意味着艺术上的颓废风格，还意味着一种纵恣沉沦的非理性生活姿态。波德莱尔的放浪生活是人所共知的，魏尔伦、兰波、王尔德等人更是任凭自己沉迷于各种放纵、危险乃至邪恶的人生冒险之中去。艺术家在创作中对于各种颓废形式的探索，与他们对生活世界的感受和把握以及生活态度是密切相关的。其实，现代文艺中的颓废主义运动所暴露出来的，乃是现代西方文化的衰颓、矛盾、病症和问题。

不仅戈蒂耶与布尔热从不同的侧面论及颓废的现代性问题，颓废派自身对此也有着相当自觉的认识。如波德莱尔认为：“晚期拉丁颓废”是“惟一适合于表现现代诗歌世界所理解并感觉到的那种激情”。^{⑤(P176)} 巴茹在《颓废者》杂志的宣言中则声称：“不承认我们处身其中的颓废状态将是迟钝至极的……宗教，习俗，正义，样样都在衰朽……在一种衰落文明的腐蚀活动之下，社会分崩离析……”^{⑥(P188)} 巴茹也意识到，这种文化的衰朽与科学的进步又是并行不悖的。颓废的文学即是与文化的衰朽与科学的进步这种时代的双面效应相协调的文学，而“颓废不过是对现代性的意识和对它的接受。”龚古尔兄弟在19世纪80年代早期，即被视为颓废者。他们也曾在《日记》中揭示进步与神经官能症的同一性：

自人类存在以来，它的进步、它的成就一直同感觉相类似。每一天，它都变得神经质，变得歇斯底里。而关于这种活动……你能肯定现代的忧郁不是源自于它？何以见得这个世纪的疯狂不是源于过度工作、运动、巨大努力和剧烈劳动，源于它的理智力量紧张得几近暴裂，源于每一领域中的过度生产？^{⑦(P180)}

作为英国颓废主义的主要成员之一，阿瑟·西蒙斯在《文学中的颓废运动》(1893)一文中，通过将古典艺术与现代文学加以对比指出：颓废乃是现代文学的基本特征。

颓废，是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一种无穷的探求的好奇，一种精致之上的过分精致，一种精神和道德上的反常。如果我们称为古典的艺术——它们具有完美的淳朴、完美的健全、完美的适度等品质——的确是优越的艺术，那么，能够代表今天的、有趣的、美的、新颖的文学，却确实是一种新的、美的、有趣的病。我们不再能吁求健康，而且健康本身也不希望被思虑。^{⑧(P64)}

由上述引文可以见出，进步的事实没有被否认，但敏感的诗人却怀着一种痛苦的失落、绝望和异化感来经验进步的后果，“高度的技术发展同一种深刻的颓废感显得极其融洽。”^{⑨(P167)} 而颓废，在颓废派那里已经被作为现代美学的当然的理想模式；要深入揭示此种美学理想与现代性的关系，还有必要引入德国哲

学家尼采的观点。

尼采是 19 世纪真正从文化、哲学层面探讨颓废概念的一位关键人物。尼采认为，现代文化的症结就在于生命本能的衰竭或者说生活意志的丧失，这种“现代衰弱症”即是“颓废”。尼采认为，西方的宗教、道德和哲学等都是人的颓废形式；与这种种颓废形式相反的运动则是艺术。^{[4] (P348)} 按照尼采的观点推论，西方文明的颓废过程早在希腊时代即已开始：以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为知识学和理性哲学在希腊文明中取得了胜利，审美的原则也被确立为“理解然后美”。^{[4] (P54)} 由此，科学的精神毁灭了神话，放逐了音乐、诗和艺术，它以一种理念上的乐观主义，即相信人的理智万能，来否定生存意志中的恐惧和悲悯，否定生存意志本身。现代理性主义的绝对优势就是上述思想传统在西方文明中长期发展的结果。然而，也正是现代理性主义的绝对优势导致了文化的颓废、生命的蜕化。在《瓦格纳事件》中，尼采写道：

最使我殚精竭虑的问题，事实上就是颓废问题——我有这样做的理由。“善与恶”不过是这一问题的变种。只要看一看衰退的征象，就可以理解道德——就可以理解在它最神圣的名称和价值公式下面隐藏着什么：蜕化的生命，求毁灭的意志，极度的疲惫。^{[4] (P281-282)}

尼采对价值的重估、对道德的否定，很大程度上即基于上述思想。尼采的理论不仅为考察颓废问题的哲学文化根源提供了深广的理论背景，同时也使我们进一步见出，现代颓废现象与颓废主义文艺运动的实质，乃是理性主义暴政下现代文化危机的反映。

的确，早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即援引希腊文化资源对抗那贬抑、牺牲人的自然天性的基督教会文化，强调恢复人性、肉体、感觉、心灵和智慧的地位。这一时期对人的价值和此岸生活的肯定，激发了文学艺术的蓬勃发展，涌现出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塞万提斯、莎士比亚等一大批巨人。但是，随着理性主义精神在自然科学领域大获成功并取得哲学上的有力支持，审美感性因素在随后的 17-18 世纪却曾经遭到长时期的抑制和忽视。18 世纪的启蒙运动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启蒙理性的强光扫除了一切暧昧的、超验的、昏暗神秘的东西。“人类应当研究的是人”，^{[5] (P3)} 哲学的深邃目光重新转向了对此在和此岸的探询。此种“世俗哲学”渗透在一般文化的各个领域里，使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宗教、政治和科学等所塑成的世俗人生观的诸特征得以充分实现，现代社会质态和社会结构也由此基本生成。另一方面，启蒙运动又在世界图景和生活态度的合理化、世俗化建构的过程（即韦伯所谓的“脱魅”的过程）中，暴露出种种问题，如信仰的丧失、道德的堕落、商业的欺诈以及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与技术理性对人性的普遍压迫等等，使人们对启蒙主义所许诺的自由、幸福和充满爱的“理性王国”产生了种种疑虑。卢梭，从启蒙主义阵营的内部，率先洞见了时代的最不利的弊端和最令人悲痛的迷途。他指出：纯粹理性的启蒙运动听不见或窒息了天然感情的声音，因而达到它的无神论和利己主义的道德；知识的增长、人生的美化只是使人越来越不忠于他的天职和他的真正本性。他呼吁人们远离理智傲慢的矫揉造作，回到淳朴的天然感情中去，回到纯真的、生气勃勃的自我中去。^{[6] (P718-719)} 他的书信体小说《新爱洛伊丝》一反古典主义文学强调和讴歌理性的惯例，而把主人公难以扼制的真挚爱情作为一种高贵的道德品质来歌颂和赞美。青年歌德创作的书信、日记体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作为德国“狂飙突进”运动的代表作品之一，同样也是站在审美的立场上，抨击平庸、鄙陋、充满清规戒律的社会现实。卢梭与歌德的文学创作成为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的浪漫主义运动的先导。19 世纪以来，艺术审美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反抗，在德国古典美学、尤其是康德、席勒美学的支持下继续向前推进，到了 19 世纪后期的颓废主义、唯美主义那里，审美感性在与理性主义的对抗中终于占据了压倒优势，并走上了另一个极端，即非理性主义的极端。因此，颓废主义、唯美主义，既是对理性主义的反抗，同时也是理性主义推向极端之后所产生的后果。尼采并不欣赏、甚至竭力批判这些“颓废艺术家”以及他们的颓废主义文艺：

他们根本上虚无主义地对待生命，逃入形式美之中，逃入精选的事物之中，……“爱美”不一定是欣赏美和创造美的一种能力，它恰恰可以是对此无能的征象。^{[4] (P384)}

雨果、瓦格纳、德拉克罗瓦、波德莱尔以及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派等等，都受到尼采不同程度

度的抨击。相反，尼采期望能够通过对真正的悲剧精神——古代酒神精神的重新发现和弘扬，而建立起更加具有生命活力的真正的艺术。

如果说尼采对现代文化艺术中的各种颓废形态持一种严厉的批判态度；那么，各类颓废形态本身所蕴含的对抗性，则在阿多诺论斯宾格勒的文章中得到阐发。阿多诺认为，正是由于颓废的拒绝顺从和否定性，它才成为“更好的潜在可能性的庇护所”，能够释放出隐藏的乌托邦力量。^{[1](P227-228)}的确，无论是艺术上的逃避，还是生活中的纵恣沉沦，颓废本身就蕴含着对抗和否定的潜台词。这一点在奥斯卡·王尔德身上有着十分典型的体现。作为一位“随着百种火焰燃烧”^{[7](P246)}的颓废者、一位致力于颠覆传统价值秩序和伦理道德的艺术家，王尔德认为：“我有责任可怕地娱乐自己”，并且“我必须尽可能地向远处进发。”^{[8](P405)}他吸过含有鸦片成分的埃及香烟，服过用印度大麻提炼的麻药，但与毒品相比，苦艾酒喝得更经常更无度。王尔德追求醉狂以及幻象境界的心态是相当矛盾的：既有逃避现实生活的虚空、矛盾、痛苦、厌倦，借美感沉醉寻求此世救赎的意味，同时又处处流露出一种波德莱尔式的精神贵族的优越感和反叛先锋派的自豪。正如杰诺米·汉米尔顿·巴克雷（Jerome Hamilton Buckley）在其《维多利亚脾气》（1951）一书指出的那样：

颓废派意识到自己的特征，并为颓废这个称号颇感自豪。颓废派们感到痛苦的，或受影响而感到痛苦的，是迷惘的酒徒面对幻觉的宫殿一点点消失时的那种说不出的厌倦。^{[9](P228)}

也正是在此种意义上，卡林内斯库将颓废视为审美现代性对抗资产阶级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方面。艺术家们站在审美的立场上，对资产阶级理性主义以及它关于无限进步、民主、普遍享有“文明的舒适”等等的许诺，进行了颠覆，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种种许诺不过是意在蛊惑人心，遮蔽阶级压迫、经济危机、殖民战争以及精神异化、道德堕落等可怕的现实，而颓废——无论是美学上的还是道德上的——则是对这种蛊惑和遮蔽的反抗，只不过，这一反抗采取了消极的方式。因此，一方面是现代性和进步的概念，另一方面是颓废的概念，两者只有在最粗浅的理解中才会相互排斥。进步和颓废的概念是如此紧密地互相包含，以至于如果我们想做出概括，就会得到一个悖论式的结论：进步即颓废，反之，颓废即进步。^{[1](P166)}

综上所述，19世纪欧洲文化艺术中的颓废概念，是一个具有积极与消极多面效应、艺术与文化多重内涵的复杂概念。它既是一种艺术风格，也表现为一种生活姿态；既是艺术家借以逃避现代生活的矛盾、痛苦和精神荒芜的解救之道，又在客观上体现了艺术家对抗资产阶级现代性的不妥协的审美性立场。但无论是作为一种美学理想，还是作为一种文化样态，这一颓废概念都无法回避其现代性的实质。

【参考文献】

- [1] 马泰·卡林内斯库. 现代性的五副面孔 [M]. 顾爱彬, 李瑞华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 [2] 转引自威廉·冈特. 美的历险 [M]. 肖聿, 凌君译.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87.
- [3] Beckson, Karl. The Oscar Wilde Encyclopedia [M]. New York: AMS Press, 1995.
- [4] 尼采. 悲剧的诞生: 尼采美学文选 [C]. 周国平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86.
- [5] E·卡西尔. 启蒙哲学 [M]. 顾伟铭译.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6.
- [6] 文德尔班. 哲学史教程(下卷) [M]. 罗达仁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 [7] 奥斯卡·王尔德. 王尔德全集(第5卷) [M]. 赵武平主编. 北京: 中国文学出版社, 2000.
- [8] Ellmann, Richard. Oscar Wilde [M]. London: Penguin Group, 1988.
- [9] Jerome Hamilton Buckley. The Victorian Temper: a Study in Literary Culture [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51.

责任编辑：陶原珂

•文学 语言学•

中国戏剧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变化与发展

◎ 刘平

[摘要] 中国戏剧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变化，与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密切相关。其原因，一是政治上的激发，二是戏剧人的觉醒，三是观众的选择。其变化与发展分两个阶段：戏曲改良时期和新剧（话剧）的产生。二者相互影响、学习、借鉴，逐步形成民族化的艺术形式。建国后，政治的需要向戏曲提出更高要求，现代戏应运而生。艺术不得不向政治靠拢，其发展受到束缚与限制。改革开放时期，戏剧创作获得了向本体回归的机遇。

[关键词] 中国戏剧 现代化 民族化 本体化

〔中图分类号〕 I207.3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03-0125-07

一、促使中国戏剧现代化的种种因素

中国戏剧的现代化进程开始于20世纪初，与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密切相关。它有着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种种背景，是在当时社会动荡、政治腐败、经济衰退以及文化老化的进程中开始的。促使中国戏剧现代化的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政治上的激发。

自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凭借船坚利炮轰开中国多年闭关锁国的大门，使整个封建王朝在帝国主义的政治逼迫、经济压迫和文化侵略面前，出现了一片混乱景象。而清朝统治者的腐败、无能，更加剧了国势的衰败和民不聊生。他们“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宁赠友邦，勿与家奴”等无耻的言论，激起全国民众的唾骂。在当时的报章杂志上，到处可以看到革命志士对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危局的沉痛陈述。他们奔走呼号、宣传鼓动，要求政治上自强，国格上独立，人格上自尊。为此，他们不仅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瓜分中国的罪行，也与清朝统治者的腐败与怯懦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他们认为，挽救中国的唯一出路是革命。有人说：“非躬执大簪以扫除其故家污俗，而望禹域之自完也，岂可得乎！”（章太炎：《正仇满论》）有人说：“暴动而后能有所创立，有所成就”（《新湖南》）。有人说：“外拒白种，内覆满洲”（《童子世界》：《为外人之奴隶与为满洲政府之奴隶无别》）这种政治上的理想与要求，极大地刺激着戏剧界发生变化。

（二）戏剧人的觉醒。

革命志士的革命激情也影响到戏剧界，促使戏剧人逐步觉醒。此前，很多戏剧艺人虽然戏演得好，但思想意识上并不十分明确，加之有的人文水平低，一贯不怎么关心政治。他们觉得只要自己的“玩意儿”好能够得到人们尤其是统治者赏识，就心满意足了。因此，尽管时局动荡，他们却仍然在演歌舞升平的戏。但是，当中国面临着被吞并、被灭亡的危险时，戏剧人再也平静不下去了。

1904年，《觉民》杂志发表灵石的文章《读〈黑奴吁天录〉》，文章谈到林琴南、魏允叔两先生翻译此书时的感人情景：“两人且泣且译，且译且泣；盖非仅悲黑人之苦况，实悲我四百兆黄人将为黑人续耳。”“嗟乎，我黄种国权衰落，亦云至矣。四百余州之土，尽在列强之势力范围；四万万之同胞，已隶白人之奴隶册籍。我黄人不必远征法、美之革命与独立，与日本之维新，即下而等诸黑人，能师其渴想自由之操，则乘时借势，一转移间，而为全球之望国矣。”为此，他有一个强烈的愿望：“我欲黄人，家家置一‘吁天录’”，“我愿读‘吁天录’者，人人发儿女之悲啼，洒英雄之热泪。我愿书场、茶肆、演小说以谋生

作者简介 刘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732）。

者，亦奉此‘吁天录’，竭其平生之长，以摹绘其酸楚之情状，残酷之手段，以唤醒我国民。”^④灵石的心情代表了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心情。1907年，中国的日本留学生在日本组织“春柳社”演戏，演出的第一个大戏就是《黑奴吁天录》，他们当时选择这部小说改编成戏，其心情与灵石读这本书的心情有着相似之处。据当年曾参加演出《黑奴吁天录》的欧阳予倩回忆，“春柳社所演的《黑奴吁天录》，根据林琴南的译本改编，编者曾孝谷为这部书所感动自不用说；当时日本留学生当中民族思想的高涨，也给了编者很多的启发和勇气。春柳社选择《黑奴吁天录》为第一次正式公演的节目，是适合于当时客观要求的。”^⑤

唤醒民众，强我国家。这是那个时代觉醒了的知识分子和革命志士的共同追求。那么，如何达到这样的目的呢？除了办报、出书、结社，他们都想到了演戏。天僇生在《剧场之教育》中说：“昔者法之败于德也，法人设剧场于巴黎，演德兵入都时之惨状，观者感泣而法以复兴；美之与英战也，摄英人暴状于影戏，随到传观，而美以独立。”他还说：“吾以为今日欲救吾国，当以输入国家思想为第一义；欲输入国家思想，当以广兴教育为第一义。然教育兴矣，其效力所及者，仅在中上社会，而下等社会无闻焉。欲无老无幼，无上无下，人人能有国家思想而受其感化力者，舍戏剧末由。盖戏剧者，学校之辅助品也。”^⑥佩忍（陈去病）在《论戏剧之有益》中说：“天下之祸亟矣，师儒之化导既不见为功，乡约之奉行又历久生厌，惟兹新戏最洽人情，易俗移风，于是焉在，庶几哉！一唱百和，大声疾呼，其于治也，殆庶几乎！”^⑦当时，他们是把戏剧的创作与演出作为一种宣传工具，配合着学校教育来完成宣传、鼓动任务的。

（三）观众的选择。

在一个时局动荡，国家命运、民族存亡以及个人前途都存在危机的时候，民众已经没有闲情雅致去欣赏那些歌舞升平的陈词旧调，他们很想从戏中听到有理想、有志气的鼓动性的激烈语言。他们也在寻找挽救国家、民族并能为自己找到出路的办法。此外，古典戏曲自身的特点也限制了一般观众的欣赏。胡适说：“传奇的大病在于太偏重乐曲一方面；在当日极盛时代固未尝不可供私家歌童乐部的演唱；但这种戏只可供上流人士的赏玩，不能成通俗的文学。况且剧本折数无限，大多数都是太长了，不能全演，故不能不割出每本戏中最精彩的几折，如《西厢记》的‘拷红’，如《长生殿》的‘闻铃’、‘惊变’等，其余的几折，往往无人过问了。割裂之后，文人学士虽可赏玩，但普遍一般社会更觉得无头无尾不能懂得。”^⑧昆曲的衰落也说明了这一点。就逼着那些戏剧人必须做出选择：是革新还是守旧。

由此而言，中国戏剧的弃旧图新不是愿意与否的问题，而是时代要求的大势所趋。

二、中国戏剧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变化

中国戏剧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变化，始终在寻找着如何反映时事政治，唤醒民众的有效途径。这种变化与寻找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戏曲改良的时期。因为戏曲要辅助学校教育进行宣传，传统戏曲无法承担这样的任务与使命，所以戏剧现代化的第一步就是改变戏曲的内容。清末戏曲界所进行的戏曲改良就是如此，即通过这样的办法促使新的戏曲产生。而倡导这种改良活动的不是戏曲家，而是革命家。

最早提倡新戏曲的人是梁启超，他创作了《劫灰梦》、《新罗马》、《侠情记》传奇三种。《劫灰梦》写于1902年，仅成楔子一出。内容描写庚子以后国内的情事。作者在剧中借主人公杜撰的口气说：“你看从前法国路易第十四的时候，那人心风俗，不是到了中国今日一样吗？幸亏有一个文人，叫做福禄特尔，做了许多戏本，竟把一国的人，从睡梦中唤了起来。想俺一介书生，无权无勇，又无学问，可以著书传世。不如把俺眼中所看着那几桩事情，俺心中所想着那几片道理，编成一部小小传奇，等那大人先生儿童走卒，茶前酒后，作一消遣，总比读那《西厢记》、《牡丹亭》强得些些，就算尽我自己一份的国民责任罢了。”由此可见梁启超创作戏曲的动机，与其说是为了创作新的戏曲，毋宁说是想通过戏曲创作来达到宣传的目的。他的《新罗马》传奇是根据《意大利建国三杰传》的事实创作的，原计划写作四十出，结果只写出八出。《侠情记》传奇是他据《新罗马》中的马尼他一出改写的。写意大利建国三杰之一的加里波在1832年的国内革命失败后，流亡到南美洲的乌嘉伊国。意大利女杰马尼他随全家也在此侨居，她听加里波讲述国

内革命斗争的情形，对他的英雄壮举十分倾慕。梁启超的这几部传奇，虽都没有完成，但内容、结构，在当时都是很大胆的尝试。杨世骥先生评论这个戏时说：“我们知道金、元以来的戏曲一向都是以本国的故事为题材的，而此剧‘熔铸西史，捉紫髯碧眼儿，被以优孟衣冠’在当时自然是第一次的发现；而传奇的习惯凡第一出必须以剧中的重要脚色——正生、正旦登场，此剧的正生为三杰之首的玛志尼，然第一出叙述也纳列强会议，显示意大利环境的险恶，第二、三两出叙意大利的竞争，直到第四出玛志尼方始露面，作者如此处置殆系一种有意的改革，而传奇旧有的体式从此遂不为人所重视了。”^⑨

继梁启超之后，新的戏曲很多。其中或直抒胸臆矛头直指专制政治，或隐喻讽刺托物言志，暗示国人。如军国民是一位“忧国热肠”的留东学生，“精娴音律，拟著曲界革命军十种，专以宣扬爱国心为主”。他的《爱国女儿》写爱国女儿谢锦琴约友赏花的故事。主人公“辫发西装”，不同凡响，其言论也足以表现一个激进新女性的个性。如玉瑟斋主人的《血海花》，写罗兰和夫人玛利依关心国事的事迹。其中有一段表达罗兰夫人反对专制的言论，慷慨激昂：“你看二千五百余万国民，个个皆婢膝奴颜，驯服那专制政体之下，我玛利依虽是女儿，亦有国民责任，难道跟着他们醉生梦死，偷息在这黑暗世界不成！”剧中无所顾及地发挥着反对专制的思想，这在当时满清黑暗政治之下，是极有煽动力量的。如祁黄楼主的《警黄钟》，采用寓言手法，写黄封国国王昏聩，朝政腐败，胡封国元帅辛鳌和元封国元帅孟毒乘机兴兵侵略，掠夺梨花、菜花，威逼黄蜂国议和，订立条约，长期租借部分领土。黄封国密部大臣乌里瓜和提都勾结外敌，出卖主权。太子琼英积极抗战，战胜了胡封侵略军。剧中以“蜂”为喻，策励国人“自强以御侮，团结以立国”。如惜秋、卿士、旅生、遁庐四人合著的《维新梦》，写顺天府宛平县书生徐自立有报国之志、治国之才，无奈朝野酣嬉、臣民泄沓，国事败坏达于极点。某日他在书房入睡，得知朝廷忽然改由外山王主政。外山王赏识他的才能，封他为巡环都尉，考察兴革利弊，力行新政。于是他在几年内，改革官制、废除八股、建筑铁路、开采矿产、训练新军、讲求外交，以至宣布立宪，使中国进步为一个富强的工业发达国家。正当他庆幸自己成功的时候，他从梦中惊醒。作者以“梦境”喻现实，所写徐自立兴办的事业，都是中国当务之急。只是在当时腐败政治之下，所谓维新云云，无非做梦罢了。有人评论说，“此剧虽不曾有提倡民主和仇满之类的色彩，而它的意义已超过那些维新党人的立场不止一筹之远了”。^⑩

像这样的新戏曲还有很多，如《孽海花》、《黄萧养回头》、《悬空猿》、《女豪侠》、《冥闹》、《叹老》、《轩亭血》、《邬烈士殉路》等等，都只是在原来基础上的改良，内容是新的，但形式并没有大的改变。

第二阶段是新剧的传入。曾经让国人精神上为之振奋的改良新戏曲，因为艺术上的不够成熟，随着时代的变化很快“成为过去”。在这个时候，西洋戏剧渐次输入中国并为剧坛所重视。

最先演出西洋戏剧的是上海的教会学校。据朱双云《新剧史》内篇分年记载：“光绪己亥（1902）十一月，上海基督教约翰书院创始演剧，徐汇公学踵而效之，然所演皆欧西故事，所操皆英法语言，苟非谙熟蟹行文字者，则相对茫然，莫名其妙。”徐汇公学当时演出的是《脱难记》。关于该剧的反映，浴血生在《小说丛话》中有记载：“泰西各国大学生每有编剧自演者，诚以此事握转移社会习俗之关键也。吾国素贱蓄优伶，盖目为执业中之下下者，数年间风气骤变，亦稍知其非。上海徐汇公学，法教士所建，肄业法文之良塾也。去岁编法剧《脱难记》，令生徒演之，余往观焉，声情激越，听者动容。”^⑪《脱难记》共分五出：第一出，露忠胆力救无辜；第二出，谋逃难泄露天机；第三出，害忠良天地不仁；第四出，逃关口奋不顾身；第五出，劫监囚报施不爽。这里的“出”应该是“幕”。从该剧幕的设置看，它完全不同于中国的戏曲，是“新剧所惯有的”结构。从这时起，西洋戏剧的体式渐次为中国剧坛所知，对中国旧有的戏剧体式产生了又一次冲击。由此，剧坛上产生了两种艺术形式：一是“改良新戏”；一是“新剧”，即后来的话剧。

所谓“改良新戏”，杨世骥认为，“最显著的便是把唱词废去了，并且增用了布景了。大约因为脚色的活动比较文雅，不必借用俚俗的唱词来表达剧情（或者是针对二黄戏而言，剧中没有鼓乐的繁响），因此又名之曰‘文明戏’”。他认为 1910 年（宣统庚戌），徐卓呆编译英国迈依林的《遗嘱》、《故乡》二剧（均载

《小说月报》第一卷),“当是改良新戏的嚆矢”。^③

所谓“新剧”(后称“文明戏”),即1907年春中国留学生在日本演出的《黑奴吁天录》等剧。1906年末,中国留学生有感于清政府的腐败,中国国际地位的低下,中国人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被人看不起,如郭沫若说的:“读的是西洋书,受的是东洋气”。这在留学生的心里激起了空前未有的民族独立思想。欧阳予倩说:“那时知识分子当中,不少有志之士为着挽回国家的颓运,为着民族的独立自由平等,奔走呼号,参加了那时的革命运动;有的是同声响应,以文字发抒其感慨。”^{④(P147)}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以李叔同、吴我尊等留学生在日本组织“春柳社”演戏,他们因为受到日本新派剧的影响,借演戏抒发心中的愤懑,宣传救国的思想。他们在演出《茶花女》后,所编演的第一个大戏就是根据美国斯托夫人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改编的话剧《黑奴吁天录》(据林纾、魏易的翻译本改编)。欧阳予倩参加了这个戏的演出,在剧中扮演小海雷。据他说,这个戏的改编与原小说的侧重点略有不同,“斯托的小说着重在基督教的人道主义,极力描写汤姆信教的虔诚。在春柳这个戏当中从头到尾没有涉及宗教思想。还有一点就是原书的结尾是解放黑奴,而这个戏的结尾却是黑人杀死几个奴贩子逃走了,以战斗的胜利闭幕。”这个戏演出后“在观众中获得很好的效果”,不仅是中国的留学生,也包括日本的观众。据说,“预定两天之观众为三千人,实际上却超过此数,如第二日看廊下都挤得人山人海。”^{⑤(P8)}有些出于“好奇心”来看戏的人,看戏后也完全改变了印象。日本著名戏剧家藤泽浅二郎亲自指导中国学生排戏,著名戏剧家如坪内逍遥、小山内薰、伊原青青园等都来看戏。著名戏剧评论家土肥春曙说:“一进到场内,先对其无比的盛况感到惊奇,诸事规矩井然惊人。坐下来打开说明书,登场诸氏对演艺的告白极为堂皇;其意气雄壮、抱负之大,实堪惊人。……一出一出演来演去,待至篇中最精彩的‘生离死别’之第三幕时,我不由得正襟危坐,对诸氏之演艺崇敬之念油然而生。同时,对我由一片好奇心所驱使而至此一事,不得不惭愧了。”^{⑥(P5)}春柳旧主(李涛痕)说,开演之前,“日本之大文豪、戏曲家及新闻记者,皆存好奇之心,及观《黑奴吁天录》之内容,莫不惊叹,又以为中国人演戏之能力,不图以至于斯也。如坪内逍遥博士,小山内薰君,伊原青青园君,与夫各报馆记者,皆有记载。……七月号之杂志,亦登载其事。早稻田文学,尤评论最多,凡二十余页,且云支那青年之演剧,足以见支那民族将来之进步”。^⑦此外,评论家们对该剧的舞美设计也评价很好。关于《黑奴吁天录》的编排结构,欧阳予倩说:“这个戏分五幕,每一幕之间没有幕外戏,整个戏全部用的是口语对话,没有朗诵,没有加唱,还没有独白、旁白,当时采取的是纯粹的话剧形式。”^⑧

新剧接受了欧洲戏剧分幕演出的形式。但上海后来演出的文明戏又加上了“幕外戏”,这是为照顾整个观众的习惯想出来的方法,因为换景的时间观众不耐烦等待,所以下幕之后,接着在幕外演一小段过场戏,把幕与幕之间的情节加以说明,连贯起来。这个做法在当时对于推广新剧是起了作用的。

自从有了新剧,尤其是新剧的演出在观众中的影响,使得中国的戏曲舞台也改了样子,上海建立了镜框式的舞台,挂上了幕,也用开幕闭幕的方式来分隔场子。旧戏场子分得多,就更不能没有幕外戏,所以就采取在舞台上挂一个二道幕,在幕前做过场戏,这是从文明戏的幕外戏的方法发展来的。然而,对于文明戏来说,因为幕外戏的使用,就使得分幕的方法不够谨严了。也就是说,最初的新剧(或文明戏)是先有了比较完整的话剧形式,后来逐渐地又同中国的戏剧传统结合起来了。

三、中国戏剧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

中国戏剧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

(一) 寻找戏剧的发展之路——关于戏剧民族化的讨论。

从1907年第一部新剧的诞生,至1916年前后,文明戏在中国剧坛上颇红火了一阵,影响到一些戏曲演员也来演出文明戏,他们觉得演文明戏比演戏曲容易得多。还有一些人是把演文明戏作为赚钱手段。一时间泥沙俱下,鱼目混珠。到后来创作上不认真,不写剧本,只有一张“幕表”贴在后台,任凭演员在台上自由发挥。内容多为家庭琐事,有的甚至比较庸俗,表演上敷衍了事。渐渐地,文明戏便衰落了。

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以胡适为代表的一批新文学的倡导者,为了促使新文学的诞生而

否定传统文学，传统的戏曲也是他们批判和否定的对象。从道理上说，他们说的未必没有道理，如胡适说：“文学的进化，每经过一个时代，往往带着前一个时代留下的许多无用的纪念品；这些纪念品在早先的幼稚时代本来是很有用的，后来渐渐地可以用不着他们了，但是因为人类守旧的惰性，故仍旧保存这些过去时代的纪念品。在社会学上，这种纪念品叫做‘遗形物’。”“现在中国戏剧有西洋的戏剧做直接比较参考的材料，若能有人虚心研究，取人之长，补我之短；扫除旧的种种‘遗形物’，采用西洋最近百年来继续发达的新观念，新方法，新形式，如此方可使中国戏剧有改良进步的希望。”^[9]而有些人一面承认自己对戏曲没有研究，是“门外汉”，但说起话来又是那样地“绝对”，如傅斯年和周作人。傅斯年说：“中国戏剧，全以不近人情为真，近于人情，反说无味”。^[10]周作人则认为“中国旧戏没有存在的价值”，“我们从世界发达上看来，不能不说中国戏是野蛮。至于建设一面，也只有行欧洲式的新戏一法”。^[11]从以上言论看，他们想提倡欧洲式的“新剧”是不错的，但完全否定传统戏曲又不免有些过激了。

在这方面，欧阳予倩和田汉的态度比较客观。欧阳予倩说：“中国旧戏，非不可存，惟恶习惯太多，非汰洗净尽不可。”^[12]田汉对戏剧界关于新、旧剧之争的问题有明确的看法。当时从事新剧运动的人，说演旧剧的没有生命，说旧剧快要消灭；演旧剧的人看不起新剧，说新剧还不成东西，还不能和旧剧竞争。田汉认为，“戏剧的新旧”不是这样分的，笼统地“说歌剧便是旧剧，话剧便是新剧，不能说公平，因为不独歌剧有新旧，话剧也有新旧”。比如文明戏，就被从事新戏剧运动的人看成“旧的话剧”了。歌剧也是如此，那种“完全承袭前人底死的形式而忘记了他底活的精神，便是旧剧。能够充分理解自己所演的人物底性格与情绪，而加以个性的、自由的解释的便是新剧”。他认为，欧阳予倩创作的戏曲《潘金莲》，可以“当作我们新国剧运动的第一步”。^[13]因此田汉主张，不要“做前人的叛徒”，“应该吸收前人的创造精神，而不从事模仿，更不应该走入魔道，迎合社会之低级趣味。我们应该使我们唱的歌剧，音乐的价值更高，思想的内容更富。尤其应该使他成为民众全体的东西，不应该成为专供某一阶级的消闲品”。^[14]田汉的观点在当时的戏剧界得到广泛地赞同，尤其得到了戏曲表演艺术家周信芳、欧阳予倩、高百岁等人支持。由此，中国戏剧便形成了戏曲与话剧分头发展的趋势，并在发展中互相影响、学习、借鉴。

比如，在抗日战争时期，田汉在话剧创作上，吸收、借鉴传统戏曲的一些表现手法，在话剧中加进歌曲，形成话剧创作的诗意图风格。如他创作的《回春之曲》、《秋声赋》、《丽人行》等作品。这种风格直到建国后焦菊隐先生还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导演手法上一直追求、光大着。在戏曲创作方面，田汉为使传统的戏曲适应抗战的需要，还采取“旧瓶装新酒”的方式，在传统戏曲的形式中加进新的内容，为宣传抗战的精神服务。如他创作的《江汉渔歌》、《新雁门关》、《新儿女英雄传》、《岳飞》等作品。田汉的做法，不仅影响了一大批京剧演员，也影响到很多地方戏如湘剧、汉剧、楚剧等戏曲艺人的行动。

到抗战中期，田汉已不满足于“旧瓶装新酒”了。1941年前后，田汉以《戏剧春秋》杂志为阵地，组织重庆、桂林的艺术家如郭沫若、茅盾、阳翰笙、胡风、老舍、陈白尘等开展戏剧民族化讨论。重点讨论了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和戏剧民族化形式等问题。田汉认为，“不仅可把新内容注进旧形式，也可把新形式注入旧形式”，“内容与形式高度统一的作品应该是我们所追求摸索的境界”。^[15]

随着戏剧的内容与形式讨论的展开，紧接着提出了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不仅在国统区，在解放区也讨论得很热烈，影响非常大。这些讨论从理论上澄清了戏剧改革中的一些问题，端正了戏剧改革的发展方向，并对后来的戏剧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如关于戏剧民族化的讨论与实践问题，一直伴随着整个戏剧创作发展的进程。

（二）戏曲随政治变化而改革——现代戏的诞生。

当政治的需要向戏曲提出更高的要求时，古代戏曲已肩负不起这样的重任，这样便产生了现代戏。现代戏的产生，是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毛泽东在《讲话》中明确提出了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描写人民大众生活等问题。他在《论联合政府》中还明确地说：“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在所有的文学艺术中，戏曲是中国农民最喜闻乐见的形式。

因此，毛泽东对戏曲改革一向给予极大的关注。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使戏曲让普通人民大众喜欢，能够为时事政治任务服务。1943年，延安中央党校业余文艺组织“大众艺术研究社”创作演出京剧《逼上梁山》，毛泽东于1944年看了这个戏，很高兴。他在给杨绍萱、齐燕铭的信中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在这封信中毛泽东还说：“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代的开端”。1944年，延安平剧院创作、演出了京剧《三打祝家庄》，同样受到毛泽东的重视。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在戏曲改革背景下，现代戏的创作也有了成果。最先出现的现代戏是抗战时期的作品，有秦腔《血泪仇》、《穷人恨》，眉户剧《十二把镰刀》，秧歌剧《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牛永贵挂彩》等。解放战争时期有京剧《九件衣》，越剧《祥林嫂》，歌剧《白毛女》、《王秀鸾》、《惯匪周子山》等。其中《血泪仇》、《兄妹开荒》、《祥林嫂》、《白毛女》等剧都产生了很好的影响。这些剧描写普通民众的生活，演出影响很大，极大地鼓舞了人民大众的斗争士气。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戏曲的创作非常重视。1949年，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全国第一次文代会的政治报告中明确地阐述了旧文艺的改造问题。他说：“要以歌颂人民反映人民的真实生活、教育人民的戏曲报答人民，要把人民的力量鼓舞得更雄伟，这就是戏曲改革的光荣任务。”1951年5月5日，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了《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明确指出：对旧戏曲“必须革除有重要毒害的思想内容”，“不应放任自流，而应采取积极改革的方针”。并为审定剧目提出了一个“统一的标准”，即：“戏曲应以发扬人民新的爱国主义精神，鼓舞人民在革命斗争与生产劳动中的英雄主义为首要任务。凡宣传反抗侵略、反抗压迫、爱祖国、爱自由、爱劳动、发扬人民正义及其善良性格的戏曲应予鼓励和推广，反之，凡鼓吹封建奴隶道德、鼓吹野蛮恐怖或猥亵淫毒行为、丑化与侮辱劳动人民的戏曲应加以反对。”“指示”中还指出：“地方戏尤其是民间小戏，形式较简单活泼，容易反映现代生活，并且也容易为群众接受，应特别加以重视。”此后，出现了评剧《刘巧儿》、眉户剧《梁秋燕》、湖南花鼓戏《刘海砍樵》、沪剧《罗汉钱》和评剧《小女婿》等比较有影响的现代戏。这些戏的创作，与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和当时社会上宣传“婚姻自主”的社会主义新风尚有着密切关系。当年，刘巧儿、小飞蛾、杨香草和田喜等艺术形象，都是当时家喻户晓的人物，在几代男女青年中产生了非常广泛的影响。

但是，由于政治过于干预戏剧创作，作品的政治性越来越强，艺术性却越来越弱。尤其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之后，在抓阶级斗争的年代，现代戏的创作倾向越来越靠近政治。一些新作如沪剧《星星之火》、扬剧《黄浦江激流》、粤剧《红花岗》、评剧《苦菜花》、江西采茶戏《红松林》、《安源大罢工》、京剧《红色风暴》和昆曲《红霞》等，基本上都是反映革命斗争的故事，把歌颂英雄主义和革命精神作为主流，作品的倾向性又向政治靠近了一步，作品的感化功能逐渐地被教育功能所代替。以至“文化大革命”时期出现了“三突出”的“革命样板戏”。这样的戏剧改革已偏离了戏剧的艺术创作轨道。

（三）改革开放时代——戏曲向本体回归。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随着政治上的拨乱反正，艺术家们多年来被压抑的激情得到释放，中国的戏剧改革也进入了正常的轨道，真正实现了“现代戏、传统戏、新编历史剧三者并举”的创作方针。话剧和戏曲摆脱政治的干预，出现了一批优秀作品。话剧有《桑树坪纪事》、《狗儿爷涅槃》、《商鞅》、《地质师》、《天下第一楼》、《沧海争流》、《同船过渡》、《父亲》等；戏曲中的新编历史剧有《曹操与杨修》、《徐九经升官记》、《狱卒平冤》、《画龙点睛》、《梅兰芳》、《秋风辞》、《凤氏彝兰》等；现代戏有汉剧《弹吉他的姑娘》、川剧《四姑娘》、《山杠爷》，京剧《骆驼祥子》、《华子良》，江西采茶戏《远山》，彩调戏《哪嗬咿嗬嗨》，评剧《风流寡妇》、《男妇女主任》，豫剧《香魂女》等等。不但剧目多，而且艺术质量普遍有了提高。这一时期的戏剧创作，不论是传统戏还是现代戏在艺术上都有了新的创造与发展。突出的特点是创作内容的多样化，艺术表现形式的戏曲化。传统戏曲恢复了原本的艺术创造，现代戏在新形式的创造上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解放后，戏曲如何表现现代生活的问题，在实践与理论上始终是戏曲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戏曲改革

的一个难题，它直接关系到现代戏创作的成败。早在 1949 年第一次文代会上，周恩来就在政治报告中谈到这一问题。他说：“凡是在群众中有基础的旧文艺，都应该重视它的改造，这种改造首先和主要的是内容的改造，但是伴随这种内容的改造而来的，对于形式也必须有适当的与逐步的改造，然后才能达到内容与形式的和谐统一。”但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尤其是在现代戏的创作中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

“以歌舞演故事”，是戏曲最重要的美学特征。但在现代戏的创作中，这一美学特征却在削弱，常常因为描写内容的关系而出现话剧化的倾向。现代戏在表现现代生活时还没有找到合适的艺术形式，没能像古代戏曲那样艺术地去表现生活。虽然《智取威虎山》中出现了“滑雪舞”、《沙家浜》中出现了“奔袭舞”、《杜鹃山》中出现了“夜行军”等戏曲舞蹈形式，但却无法从整体上改变这些戏的话剧化倾向。

新时期的现代戏在创作上努力向戏曲的本体回归，在艺术手法上既学戏曲的创作经验，同时也受到外国现代派戏剧创作手法的影响，结合所表现的内容创造出了一些新颖的表现形式。如汉剧《弹吉他的姑娘》。这个戏的内容描写一个在殡仪馆担任化装工的姑娘——园园的爱情遭遇，批判了对殡葬职业的种种世俗偏见，探索了人生的价值。在舞台表现形式上，编剧和导演进行了大胆探索与创新。一是对舞台形象整体的创造，不拘泥于生活外在形态的逼真，也不满足于某些戏里虚拟性动作的运用，而追求事物情、理的内在逻辑的真实，着重于传神、写意。二是充分发挥戏曲的特殊舞台时空观念的优势，寻求舞台时空变换的自由和心理时空的创造。最突出的一场戏是“电话圆舞曲”。园园姑娘的爱情由于职业的原因遭受多次挫折，可是，当组织上为她父母落实政策、退给园园一幢小楼和 12 万元存款后，那些抛弃园园的人又都打来求爱的电话，他们中有远洋轮二副林海涛，有业余舞蹈演员贾王子，还有真心爱着园园、迫于母命不得不疏远园园的白冰。导演把三个人打电话的场面同时展现在一个舞台上，和接电话的园园形成四重空间，让他们各持电话载歌载舞。此时舞台上出现的时空不是生活时空的艺术再现，而是心理时空的艺术表现。一个简单的舞台画面表达出了复杂、丰富的内容，收到了写实手法无法达到的艺术效果。

像这样的新形式创造，还有评剧《风流寡妇》中吴秋香和女儿及前夫两次赶马车的“马车舞”，时空流动，心理外化，既是艺术的，又是生活的。花鼓戏《八品官》中刘二驮妻过河去离婚的“驮妻舞”，艺术地展现了两个人的复杂心态。京剧《骆驼祥子》中的“洋车舞”，也舞出了人物的心情，同时也是人物命运的象征。豫剧《风流父子》中的“骑车舞”，也表现出了恋爱中的青年男女心里的甜蜜。这些新手法的创造与运用，不仅很好地表达了内容，而且也丰富、强化、突出了内容，突出了现代戏的艺术特点，促进了现代戏的艺术创造。

【参考文献】

- [1] 灵石. 读《黑奴吁天录》[J]. 觉民(第7期).
- [2] 欧阳予倩. 回忆春柳 [A]. 欧阳予倩全集(第6卷)[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0.
- [3] 杨世骥. 戏曲的更新 [A]. 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戏剧卷 [C].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 [4] 陈去病. 论戏剧之有益 [A]. 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戏剧卷 [C].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 [5] 胡适. 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 [J]. 新青年 (第 5 卷第 4 号), 1918- 10- 15.
- [6] 伊原青青园. 清国人之学生剧 [A]. 中村忠行编. 中国新剧史料 [C].
- [7] 土肥春喟. 清国人之学生剧 [A]. 中村忠行编. 中国新剧史料 [C].
- [8] 春柳旧主. 春柳社之过去谭 [J]. 春柳杂志 (第 2 期), 1919- 1- 1.
- [9] 傅斯年. 戏剧改良各面观 [J]. 新青年 (第 5 卷第 4 号), 1918- 10- 15.
- [10] 周作人. 论中国旧戏之应变 [J]. 新青年 (第 5 卷第 5 号), 1918- 11- 15.
- [11] 欧阳予倩. 予之戏剧改良观 [J]. 新青年 (第 5 卷第 4 号), 1918- 10- 15.
- [12] 田汉. 新国剧运动第一声 [N]. 上海: 梨园公报 (第 22、23 号), 1928- 11- 8.
- [13] 戏剧的民族形式座谈会 [A]. 茅盾、田汉等. 戏剧的民族形式问题 [M]. 桂林: 白虹书店, 1943.

责任编辑：陶原珂

晚清外交官廖恩焘的戏曲创作

◎ 夏晓虹

[摘要] 曾担任清政府驻古巴总领事的廖恩焘，不仅是职业外交官，也是晚清文学改良的积极参加者。廖恩焘以春梦生的笔名至少发表过三部戏曲。本文考证了廖氏编撰剧本的事实与戏曲改良之关系，分别论述了《团匪魁》、《维新梦》与《学海潮传奇》所表达的政治理念。通过对清廷假维新的揭露，对戊戌变法的同情与赞美，以及将古巴学生流血换取的国家独立视为中国未来的图景，廖恩焘用不同题材的剧作构成了彼此关联的三部曲。

[关键词] 廖恩焘 春梦生 《团匪魁》 《维新梦》 《学海潮》

(中图分类号) I20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7) 03-0132-10

留心辛亥革命史的人，会耳闻廖恩焘为廖仲恺之兄；粤语文学研究者喜谈其庄谐杂出的方言诗与新粤讴；对于中国近代史而言，廖恩焘更重要的身份是外交官；若从近代文学史着眼，则应补充其戏曲创作。

一、“春梦生”其人其剧

晚清时期，廖恩焘的外交经历主要与古巴有关。从1891年担任驻马丹萨（今译“马坦萨斯”）领事，后升任驻哈瓦那的古巴总领事，直到1907年解任，廖氏与古巴可谓关系深厚。就诗词创作而言，廖恩焘使用过诸多笔名，在《近代外交官廖恩焘诗歌考论》^①一文中，笔者曾作过专门辨析。然而“春梦生”，学界似无人知晓其与廖恩焘的关联，为此，廖氏曾经创作戏曲的一段史实也长久被掩埋。

对于“春梦生”为何许人，有过考证指认为曾入南社的周祥骏。^②此误会的发生，是由于周祥骏的后人向南京博物馆的研究人员王少华提供了署名“春梦生”的《团匪魁》，因此梁淑安才又扩大范围，将其他署名“春梦生”的剧本一概归入周氏名下。其实，被梁氏认作周撰的《维新梦》、《团匪魁》与《学海潮》的真正作者为廖恩焘。根据周祥骏家乡江苏睢宁县研究者为之撰写的传记可知，出生于1870年、1914年被杀的周氏，平生从未出国，更无论远赴美洲。^③而写作《维新梦》的“春梦生”，在《序》末却明确自记为“识于新世界”。此“新世界”当然不在本土，序文中已明言其“适客海外”。^④并且，依照晚清人的用语习惯，做地名解时，新世界乃特指美洲。这自然合于廖恩焘之经历而远于周。

《维新梦》是影射戊戌变法的时事剧，题材敏感，作者撰《序》时显然有所顾忌，因此故意闪烁其辞，不自标为作者，而假托另有其人。但语气间，又往往游移不定。忽而说“余复促其为此”、“而好事若余，索观太亟”，似乎只有从旁促成之功；忽而又以当事人的口气致歉：“匆匆脱稿，挂漏之处，在所不免，阅者谅焉。”如此设防，在周祥骏无此必要，对于时任清政府派驻古巴的总领事廖恩焘，却不为多事。实际上，其与写序者之为同一人，从剧本刊行时起，便从未发生过疑问。春梦生的《维新梦》序》中亦提及，撰此作者，“甫有西皮之唱，刺时人之善学皮毛者”。所言“西皮之唱”，应即是《新小说》第8号上刊出的《团匪魁》。该作编入“京调西皮”栏内，主人公“庸碌大夫”的下场诗，说的正是“心传妙法皮毛相”，

作者简介 夏晓虹，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北京，100871）。

^① 分见王少华《周祥骏的抗俄杂剧》（《文教资料简报》，1982年10期）、梁淑安与姚柯夫编著《中国近代传奇杂剧经眼录》106页（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左鹏军亦承袭了梁的错误，其《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所录传奇杂剧补述（日本《清末小说通讯》69号，2003年4月），也将《学海潮传奇》的作者“春梦生”注解为周祥骏。

与“刺时人之善学皮毛者”的概述亦切合。何况《团匪魁》与《维新梦》相同，都采用了京调，其发表在今知为廖恩焘所作的《新粤讴解心》间隙，^①也显示出编者有意识穿插编排的用心。

至于刊载在1904年《新民丛报》第46-48号合本以及49号上的《学海潮传奇》，其作者春梦生也只能是廖恩焘，而绝非周祥骏。因此剧取材于古巴历史，与周氏履历完全不相干。只有廖恩焘出手才是当行本色。有力的证据还有登在《新小说》第7号上的《(新出班本)黄萧养回头上套、京调维新梦成套(合刻)》广告。其中表彰已在《新小说》连载、署名“新广东武生”所作的广东班本《黄萧养回头》，“作者既洞悉中外，所演皆近今时事，而又熟于此道，善于结构，令人一看之，无不起爱国自强之心，故一出即大受欢迎，实班本革命界之巨子也”。以下便提到合刻本的另一剧作，于本文的论证亦至关紧要：

又《维新梦》一套，乃演戊戌变法前后时事，句句皆道实；而其结构之佳，腔调之熟，又不在《黄萧养回头》之下。作者为春梦生，即卅八、九号《新民丛报》《饮冰室诗话》所称之珠海梦余生其人也。^[4]

可见，写作京调《维新梦》的“春梦生”，即是谱写《新粤讴解心》的“珠海梦余生”，亦即时任驻古巴总领事的廖恩焘。这也证明了，广告之后，下一期《新小说》上出现的春梦生撰《团匪魁》，毫无疑问是出自廖恩焘之手。

总之，“春梦生”乃是廖恩焘1903-1904年编撰与发表曲本时的专用笔名，他以此名至少刊出了《团匪魁》、《维新梦》与《学海潮传奇》三部戏曲作品。

按说廖恩焘出身广东，喜爱粤讴，在《新小说》便发表了20多首《粤讴新解心》，其所撰剧本，顺理成章亦应为广东戏。不料其并不作此想。除《学海潮》用传奇（实为杂剧）体外，余外两出均以京调即现在所谓京剧谱之。对于剧种的选择，廖恩焘其实作过认真的考量。《〈维新梦〉序》中即坦陈：

初拟作为传奇，奈昆曲近成绝响。而沪上所演《铁公鸡》、《左公平西》之类，发扬蹈厉，感人实深，声色并传，雅俗共赏，亦别开演说一生面也。……京调与广东戏不同，传情惟肖，流行尤远。

这里，决定廖氏舍弃昆曲与粤剧、单单取中京戏的理由完全相同，一是着眼于艺术表演的“声色并传”与“传情惟肖”，一是顾及接受群体的“感人实深”、“雅俗共赏”与“流行尤远”。由于梁启超撰写的《劫灰梦传奇》，尤其是《新罗马传奇》在《新民丛报》陆续刊载，以戏曲改良的实绩先声夺人、大受瞩目，廖恩焘初拟创作时，才会首先属意昆曲。不过，比之梁启超的追摹《桃花扇》，廖氏显然更了解戏曲演出的实况，并有现场观剧经验。因此，廖氏势必要从少人观看的昆曲与粤剧，转向风头正健的京戏。

京戏的长处，又不只是在声腔、表演之繁缛与流传之广远，还在其重武生戏。这一点对于出身广东的廖恩焘等人尤为敏感。传统昆曲无武生行当，可以略过不提，晚清粤人对京戏与广东戏的比较则颇有意味。廖氏所述上海演出的《铁公鸡》与《左公平西》，不但均以清军扫灭太平天国及捻、回的时事入戏，而且，二剧都属于其时著名的京调武戏，《铁公鸡》更首开以真刀真枪在舞台上搬演的风气。其“发扬蹈厉”、振奋人心，同为广东惠州人的欧榘甲与廖氏的观感正相同。欧榘甲也对《铁公鸡》一戏印象极深，称其“述洪、杨与满清战争时事”，“于满清中兴国史外，稍存一公道信史，使汉人耳目，不至全为所蔽”。^[5]此说固然是由于欧氏其时正受到革命思潮的鼓荡，反满意识浓厚，故于所举武生剧目中，特重《铁公鸡》，但其因爱武戏而看好京戏的前提仍与廖恩焘一样。不过，武戏对于廖恩焘的意义不在于执笔追摹，更重要的是让他领略到京戏感发人心、雅俗共赏的创新优势。这也是欧榘甲对包括京戏在内的外江班演艺的评价：“盖外江班能变新腔，令人神旺，广东班徒拘旧曲，令人生厌，宜其败也。”^[6]由此引发的改良呼声，做法无非两途：或革新粤剧，或弃此他图。而无论何者，均以趋新为诉求。据此，廖恩焘选中当时仍为新腔的京调而放弃熟悉的广东戏，正表现出即使在戏曲形式上，廖氏亦希望予人焕然一新的面貌与感觉。

最重要的当然还是曲本的内容。有感于法国与日本戏剧演出能够迅速“激发国民爱国之精神”，以之

^①春梦生《(新串京调西皮)团匪魁》刊于《新小说》8号（1903年10月，实际出版于1904年2月以后），而《新粤讴解心》连载于该刊7、9-11、16号（1904-1905年）。

为楷模，欧榘甲也率先提出了“改班本”与“改乐器”齐头并进的戏曲改良主张。同在美洲的廖恩焘，对于欧氏发表在旧金山《文兴日报》上的《观戏记》自有阅读的便利，对欧文盛赞戏曲启蒙大众的功效为“胜于千万演说台多矣，胜于千万报章多矣”之说，也颇心领神会。其《〈维新梦〉序》中因此表白：“作者喜谈笔墨革命，欲于嬉笑怒骂，发启新思。”明确表达了期望运新思想于词曲之中的写作宗旨。而其以为戏曲可“别开演说一生面”，也明显与欧榘甲相同，有意把曲本改造成为启蒙的利器。

廖恩焘的一番心思，在《新小说》专为《黄萧养回头》与《维新梦》二戏合刊本所作的广告中，已得到明白宣示，这便是广告开头论述以戏曲开民智之重要性的一段文字：

欲开大多数人之智，改良班本其急务矣。举国中不读书、不看报之人十居其八、九，而未有不看戏者。欧西、日本多注重于是，故士大夫皆不惜纡尊降贵，亲演其事。而我国则鄙此道为下流，至不屑与平民伍。此强弱智愚之所由分也。迩来倡改良班本之议者颇不乏人，其有见乎此矣。^[4]

这段言简意赅的论说，与欧榘甲的《观戏记》如出一辙；所谓“迩来倡改良班本之议者”，欧氏正该是其中的首选。至于撰作《维新梦》等剧的廖恩焘，实为应声而起的同道。其以“笔墨革命”自期的剧作，因此也属于晚清戏曲改良催生出的果实。

二、开场：《团匪魁》

在已知廖恩焘的三种剧作中，《团匪魁》^[5]最早完成，像是一次试手，为《维新梦》的登场作好了铺垫。从结构上看，《团匪魁》犹如一出讽刺活报剧。时间设定在写作当下，针砭现实之义一目了然。上场人物只两位：一由“外”“白面”扮官员，一由“丑”饰演其门生，显见均为反面角色。剧情也很简单，即官员教导学生如何混迹官场，变乱新政。二人的自报家门都采用了其时通行的政治讽喻方式。“外”的道白是：

老夫卢才，本是外黄人氏，寄居老大国土。他家治乱，本不关心。争奈身受国恩，官拜庸碌大夫之职。自愧顽冥，多遭指骂。只得遮人耳目，聊窃皮毛。

此“卢才”为“奴才”的谐音。“外黄”者，本可作两种理解，一为非黄种人，一为非黄帝之子孙，即非汉人。这里偏重在第二义，以影射满族权臣。黄帝信仰与晚清民族主义思潮的关联，已有学者作过充分论证。廖恩焘此时显然也受到感染，故认为满族建立的政权乃是窃取了汉人的国土，因此其人为“寄居”。满清政府的种种卖国行为，也被解释为“他家治乱，本不关心”。而这个受到讥讽的“庸碌大夫”本属于顽固党，因遭内外攻击，不得已才假作维新。

另一位丑角报名为贾二毛，“贾”者“假”也，“二毛”则是清末对信仰西方宗教或为洋人办事的中国人的称呼。此人与其恩师的顽固守旧貌似反差极大：“金丝眼镜雪茄烟，新词满口唱平权。”不过，上场诗的末两句泄露了底细，他原来是“自命英雄识时务，洋文不识识洋钱”。正由于一心为钱才是贾二毛趋向维新的真正动力，因而，见利忘义、见风使舵便成为其行事的准则。其先前曾入义和团，“在大师兄坛下，当了一名教徒；只因京城失守，无处栖身”，便又反身投靠侵略者，自称“投在外国府内，多蒙德公爷垂怜”。最终，这位得到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赏识的反复小人，又被推荐到卢才门下，“混得一身荣耀”。

一以守旧为根性，一以逐利为目的，晚清庚子事变以后清廷被迫施行的新政掌握在这两种人手里，才是最让廖恩焘担心、焦虑之处。如此新政，其不会有实质的改变，无济于事，已可预料。因此，《团匪魁》将写作主题设定为“刺时人之善学皮毛者”，戏文中对此也不断陈说，均表现了廖恩焘对“满洲政府变法维新”的失望与批判。虽然濡染上民族主义的色彩，廖恩焘的基本立场却与康有为、梁启超所代表的改良派趋同。卢才一开口便唱道：

我本是、义和团、一罪魁，逐康梁、议废立、功业巍巍。老佛爷、西迁、心胆碎，算万幸、四百兆、才得銮回。我本该、终守旧、怕人作对，无奈何、假维新、火救燃眉。

因此，他的各项新政举措，无一不是维新其表，专制其里。作者让其自述的种种“功绩”，包括开学堂、废八股、办教案、练新军，主持外交、赔款、开招待宴会，派大臣出洋谢罪、参加万国博览会，这一

切全都是为了“巴结好、洋大人、免得淘气，那时节、野蛮手、狐假虎威”。这种专制政权的维持，甚至可以以国家利益与国土的丧失为代价。尤其令廖恩焘震惊的是，清政府的“卖山河”竟然可以做到“东三省、发祥地、任尔分肥”。1903年4月，俄国提出长期侵占满洲的无理要求，民间社会随即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拒俄运动，但清政府却置自己的发祥地与祖坟于不顾，无所作为。这也让包括廖恩焘在内的晚清知识者对清廷彻底丧失了信心与希望。可想而知，依仗这些旧官僚举办的新政，当然只能是徒有虚名。这恰如戏文中卢才教诲贾二毛的一段训词：

只要你、事事多侥幸，只要你、民教善调停；只要你、英法大餐吃得进，洋奴鬼仆、待作上宾。公事含糊、不要紧，七天礼拜、数得清。盗贼如毛、办甚么巡警，只要你乡团民勇、改扮作巡丁。兴商劝工、有甚么效应，只要你、奏折上、开报几个章程。学堂林立、已遍十八省，只要你、善堂书院、改换个花名。借一个洋字招牌、怕甚么官来问，趁的是洋债未了、铲个地皮平。

这一对清廷新政的指控，正与梁启超的判断相同。其时梁氏在《新民丛报》不断撰文，抨击满清政府的所作所为不过是只换门面的“伪改革”。在思想最激进的时候，他开出的新政药方是彻底破坏：“必取数千年横暴混浊之政体，破碎而薑粉之”。⁷¹ 廖恩焘也在《粤讴新解心》中与之同声相应：“估话学人地富国强兵，边一件最紧要？维新政策，总要把旧弊一笔勾销。”⁷² 这话也应该看作是其写作《团匪魁》，表达对种种假维新的真厌恶所得出的正面结论。而令廖恩焘担忧的不只是如卢才这批老朽造成了“今日之老大中国”（梁启超语），更可怕的是其将自身的腐败习性传染给年青一辈，必将断送中国自新的一线生机。戏本中的贾二毛因此在出场之际并非全然不可救药，相反，其人倒还有几分革新的抱负：

自幼儿、进书房、书包抱定，读时文、和试帖、为的功名。那晓得、二千年、大梦初醒，旧日的、顽固性、一概不行。自由钟、敲不住、风云革命，由不得、铁石人、亦讲维新。本来是、西洋人、事事可敬，争奈我、老大国、无此精神。创海军、设船政、心血耗尽，讲甚么、矿路事、不如让人。我有心、报不平、把洋人灭尽，恨只恨、红灯照、神术无灵。自那年、讲了和、一蹶不振，守旧鬼、黑暗里、惭对文明。

贾二毛原有的这一点豪情却遭致卢才的一大通教训，卢也不做他言，专从个人利害说法：“你须要、见机早、处处留心，你难道、真流血、不顾性命？”“说西法、都不过、口头酬应，谁叫你、饮冰室、当作新闻？”此言一出，贾氏当即心领神会，改弦易辙，“且放下、新思想、去擢高科”。其下场诗所谓“堕落青年爱国魂”，正道出了廖恩焘对此辈的愤慨。对清廷的新政如何评价，学界现在已有不同的声音。不过，由于同时设置了揭露“假维新”与抨击“堕落青年”两个主题，以《团匪魁》之形制短小，在贾二毛这个人物的处理上便不免粗糙。如此一个有志青年，在接受卢才的训导之前，何以从先前的“守旧鬼、黑暗里、惭对文明”，突然发生“到不如、索性儿、把鬼来混，亦免得、世界上、指摘纷纷”的巨大转变，前后判若两人，因唱词急转直下，交代不清，实在让人难以理解。

这里，该提到周祥骏后人提供的文本。虽然《团匪魁》的初刊本并非周祥骏所作，但仔细对比周本与廖恩焘的原本，还是可以发现一些有意思修改。最明显的当属政治立场的转换，廖氏赞同康、梁的维新改良主张，戏本中屡有表现；而凡遇此处，周祥骏已全改过。如前引庸碌大夫卢才（周本易名为“卢财”）登场所唱的戏词中“逐康梁、议废立、功业巍巍”一句，周本即改作“害洋人、杀新党、功业巍巍”。也就是说，廖本所有的赞赏康、梁的口吻，在周本中已剔除无遗，周氏之倾心革命亦清晰可见。

更大的改变则发生在次要人物贾二毛身上。不仅为强化其丑角身份以增加观者的恶感，故意将人名另换为“生胡卢”（本作“笑声”解之“胡卢”，在此又引申为“可笑”，并暗用“胡卢提”之“糊涂”义）；而且，周本也大段删改了上引贾二毛的慷慨陈词，仅代之以如下二句：“自幼儿读时文功名如命，那晓得大局变沉梦初醒。本来是西洋人事事可敬，由不得糊涂虫也讲维新。”以下便直接廖本的原有唱词：

虽然是真和假难逃公论，一时间且遮盖博个虚名。在头上第一件把青丝剪尽，在身上脱下了旧日衫裙。高领头窄袖口多般【们】干净，再学上三两句浅白洋文。洋行中当买办吃穿不尽，装体面就冒充

[充作] 出洋学生。每 [再] 不然讲“福音”教堂来进，那怕那 [你] 恶官府谁敢欺凌。管什么瓜分事身家性命，只要我气扬扬混过今生 [如今]。^[9]

如此改易，从人物形象的完整性而言，周本确实好过廖本；但因损失了毒害青年一大主题，^① 剧本也显得更为单薄。由于周祥骏《团匪魁》改写本的传世，造成了廖恩焘所有戏曲著作权的丧失，可谓廖氏一时之不幸；但也正因为周本的存在，使得后人阅读廖本时，多出一种同时代人的眼光，得以进行比较分析，又可从中窥见晚清戏剧流变的痕迹，亦为研究者的大幸。

三、正戏：《维新梦》

经过《团匪魁》的小试身手，廖恩焘对京调剧本的写作显然已信心十足。再续作《维新梦》^[10] 时，序言中便径以“此作排场板拍，一一入扣，知音者当共赏之”而自豪。并且，在廖氏所撰三戏中，此本也确实最为用力，堪称代表作。

《维新梦》的剧情十分简单，乃演述百日维新事。登场人物皆与现实中人物对应，兹表列如下：

《维新梦》人物索引表

帝	光绪皇帝	余志清	徐致靖
张愫（东海先生）	康有为（号长素，广东南海人）	余人杰	徐仁铸、徐仁镜
任当世	梁启超（号任公）	黄朝	王照
张博	康广仁（号幼博）	黄武	王五
洪士孚（大学士）	翁同龢（协办大学士）	武后	慈禧太后
章虹眠（户部侍郎）	张荫桓（号红棉老人，户部侍郎）	庸碌（燕南节度使）	荣禄（直隶总督）
檀赐桐	谭嗣同	侯三捷	袁世凯
娄广地	刘光第	江异（工部尚书）	刚毅 (曾任工部尚书，时任兵部尚书)
阳遂	杨锐	回得步（礼部尚书）	怀塔布（礼部尚书）
凌淑	林旭	皮旦	李莲英
羊耆寿	杨深秀		

其影射名多用谐音，间亦截取别号，又有对仗法，如“袁（猿）世凯”对“侯（猴）三捷”。作者在序中谦称：“奈当日事未能一一省记，适客海外，又无书可藉稽考。”因而，此戏所用之材源值得考证。

1900年11月，康有为在《清议报》发表了一首题为《闻菽园欲为政变小说诗以速之》的长诗。此诗之有名，不只在其以诗歌的语言，重复了康在《日本书目志》中先已阐发的以小说启蒙大众的思想，此即该诗开头数语所道：“我游上海考书肆，问书何者销流多？经史不如八股盛，八股无如小说何。郑声不倦雅乐睡，人情所好圣不呵”。^[11] 而且，其中还透露出戊戌政变作为一个小说题材，已经在海外的维新人士中引起关注。康有为诗作提到：“去年卓如欲述作，荏苒不成失灵药。”可知梁启超曾属意于此。两年后，梁开始写作《新中国未来记》，又在《小说丛话》中引录康诗，感慨：“吾《未来记》果能成，此亦一影事也。”^[12] 不过，依据今所见《新中国未来记》的结构布局，即使作者有意把戊戌变法史事放入小说，亦不过是其拟想中的新中国成立史中之一页。这也许因为梁启超在数年的构思中，已改变了初衷。而1900年，避居新加坡的康有为，又听说其居停主人、当地著名的华侨维新人士邱炜菱（号菽园）有写作“政变小说”的计划，很是欣喜，既期许以“闻君董狐托小说，以敌八股功最深”，“以君妙笔为写生，海潮大声起木铎”，又催促其赶快完工，“五日为期连画诺”，免得又如梁启超一般“荏苒不成”。可这一次康有为的期待仍再次落空，起码至廖恩焘的《维新梦》成稿之1903年，无论梁启超还是邱炜菱，均未能拿出小说体的戊戌变法史。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廖恩焘撰著《维新梦》，也可以说是代完康有为心愿的补阙之举。

其实，廖恩焘之采用曲本体裁，亦应该是受到了康有为的启示。因为晚清对于小说文类的理解，原是

^①周本剧终下场词已去掉“堕落青年爱国魂”，而只保留了廖本中“心（周本改为“新”）传妙法皮毛相，莫叫新人笑旧人”二句。

包括戏曲在内，因而康氏催促邱炜菱速作“政变小说”的诗中，便有“或托乐府或稗官”的两可之说。邱氏如何考虑，现未见其草稿，不得而知；廖氏却出以乐府，且自信是可以上场搬演的京调，其合于康有为“庶俾四万万国民，茶余睡醒用戏谑”的期待，亦无疑问。即使《〈维新梦〉序》所表达的对“雅俗共赏”的特别推重，其实也与康诗中“衿缨市井皆快睹，上达下达真妙音”若合符节。

而从政变发生、流亡海外之后，康有为本有多篇诗作咏写变法失败事，如《戊戌八月国变纪事四首》、《戊戌八月国变纪事八首》、《闻菽园欲为政变小说诗以速之》、《六哀诗》等。凡此诸作，均刊载在梁启超主编的《清议报》与《新民丛报》上，应为廖恩焘所曾见。那一种喷薄而出、椎心刺骨的悲痛与愤恨，极富感染力；对于怀抱理想的维新志士，更易伤心动情。实际上，按照廖氏的说法，其剧作之命名，“用东海诗句意也”。^[1]此即“历历维新梦，分明百日中”，乃是康有为出亡后发表的第一组诗作《戊戌八月国变纪事四首》的起首两句。在《维新梦》剧终，黄武（王五）送六烈士赴刑后，悲伤痛悼，亦大呼：

苍天呀！呵呵苍天！历历维新梦，分明百日中。前途看飘忽，后起孰英雄？怎不叫人痛哭？

其移用康诗为百日维新作结，相当贴切。不止此也，康有为1889年所吟《出都作》，也为《维新梦》所采择。戏中演章虹眠（张荫桓）将皇帝书写的衣带诏交与张愫（康有为），告知后党欲行废立之谋，张有四句唱词：“沧海飞波百怪横，唐衢痛哭万人惊。国民有血朝官狠，上帝无言鬼子狞。”全篇即是从《出都作》其二前半化出，后两句原作“高峰突出诸山妒，上帝无言百鬼狞”，为切合剧情而作了改动。据此，康有为对廖作影响之深已分明可见。

就戏词而言，梁启超在《新民丛报》陆续刊载的《饮冰室诗话》亦不容忽视，在《维新梦》中痕迹更深。两相对照，如夏曾佑“帝杀黑龙才士隐，书飞赤鸟太平迟”之句，改自皇帝口中道出；黄遵宪的“世界群龙见首时”一语，后三字易为“方见首”，便成为洪士孚（翁同龢）的台词。最明显的是梁启超发明诗界革命当“以旧风格含新意境”之说时，尝举麦孟华之“圣军未决蔷薇战，党祸惊闻瓜蔓抄”、“微闻黄祸锄非种，欲为苍生赋《大招》”与自家“青年心死秋梧悴，老国魂归蜀道难”三联，以作示范，诸诗语亦全为戏中人借用。出自章虹眠之口的“圣军”一联，已略改前句为“圣军未战蔷薇道”；康有为弟子麦孟华的“微闻”一韵，亦被其师的戏中角色张愫所袭用；梁自许的“平生得意之句”，则径由其化身任当世现场唱出。即使最后黄武结束全本的下场词“剩好头颅酬死友，去留肝胆两昆仑”，一为唐才常句，一为谭嗣同句，也均见诸同一期杂志刊出的《饮冰室诗话》。

《维新梦》对《饮冰室诗话》的借重，又不单在诗句，亦有史实。如上举黄武二言，将唐才常向“刎颈交”谭嗣同剖白之言，移花接木着落在黄武身上，以及经其口说出的谭嗣同名作，亦有《诗话》为本：

谭浏阳狱中绝笔诗，……曰：“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所谓“两昆仑”者，其一指南海，其一乃侠客大刀王五，浏阳作《吴铁樵传》中所称“王正谊”者是也。王五为幽燕大侠，以保镖为业。其势力范围，北及山海关，南及清江浦。生平专以锄强扶弱为事。浏阳少年尝从之受剑术，以道义相期许。戊戌之变，浏阳与谋夺门迎辟，事未就而浏阳被逮。王五怀此志不衰。庚子八月，有所布画，忽为义和团所戕，赍志以殁。呜呼！王五真男儿，不负浏阳矣。^[13]

由此可知，《维新梦》以黄武为终场人物，本是大有深意，其所寄托的变法虽一时失败，维新志士并未放弃希望与努力的寓意，不仅是为康、梁代言心事，也实在是为自己抒写心声。

不过，对于廖恩焘编写《维新梦》来说，最重要且最易得的参考书，实为梁启超撰著的《戊戌政变记》。此作先在《清议报》连载，1899年5月又由该报馆出版了单行本。梁著以“局中人”身份，记述变法经过与政变原委，在当时屡次再版，影响极大。因此，《维新梦》演出的重大关目，如翁同龢被免去大学士职，开缺回籍；王照上变法折，遭顽固派弹劾，引发光绪帝革去礼部六堂官职；擢用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为四章京，直接参与新政事宜；光绪帝交由杨锐等传出密诏；谭嗣同保荐袁世凯及袁向荣禄告密；康有为、梁启超出亡与六烈士遇难；凡此种种，均可在《戊戌政变记》中寻到根据。

出于戏曲表演的便利与加强戏剧冲突的需要，廖恩焘在写作时，也对事件的前后及事实略有调整。例

如罢免翁同龢原本发生在戊戌变法之初的 6 月 15 日（农历四月二十七日），戏中却移至政变爆发前夕，不仅迟于王照上书，更在袁世凯告密之后。如此安排，正可以有力地印证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的论断：

康有为等召见，尚在二十八日；一切新政之行，皆在二十八日以后。而二十七日翁同龢见逐，荣禄督师，西后见大臣，篡废之谋已伏。……此实幽废皇上、诛捕帝党之先声。而案源不在八月六日（引者按：即 9 月 21 日，政变发生之日），而在四月二十七日也。^[14]

照此说来，我们也不妨把《维新梦》看作是以戏曲形式表演的一部《戊戌政变记》。

照康有为对“政变小说”的期望，有所谓“或述前事或后觉”，《维新梦》对此也作出了回应。剧本不只谱写了戊戌变法的全过程，同时也为后来事埋下伏笔。戏中一再称道作为维新领袖的康有为与梁启超，二人之存亡俨然已成为维新事业能否终获成功的关键。因此，劝说二人出亡的理由便是：“你须要、为后来、留一道光明线，同拼一死、亦是罔然。”而被章虹眠称颂为“可算得、新中国、第一个少年”的任当世，也立时醒悟，表示要与其师张謇一同流亡日本，继续奋斗：

海外同胞、声相应，大唱勤王、起义兵；再不然、立说著书、把维新来论，唤醒那、世界上、爱国精神。

此处所言正是康、梁出逃海外后用心致力的两桩大事，1900 年的自立军起义与《清议报》、《新民丛报》的接续出版。如此，也难怪廖恩焘在结尾处会假借黄武之口说出：“但愿张、任二公，奋起爱国的精神，早早成就你维新的事业，下舒民望，上慰忠魂，亦不负这一场流血了。”其所表达的对康、梁寄望之殷、托付之重，也充分映照出廖氏本人的志士情怀。

与全力称颂维新派（帝党）相对应，《维新梦》对顽固派即后党人物也表现出最大的愤恨。其叱骂矛头甚至直指慈禧太后，洪士孚的一段唱：“自古来、为党祸、朝朝都有，因变法、战玄黄、贻害到清流。商妲己、倾覆了、独夫纣，还有个、褒姒女、灭却宗周。天有意、召女戎、颠倒宇宙，哪有个、临朝吕武、不贻骂到千秋？”此言比之康有为的“更无敬业卒，空讨武曌文”，^[15] 以及梁启超最激烈的“王气欲沉山鬼啸，女权无限井蛙尊”，^[16] 其鄙视、羞辱程度，只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绝对不可能出自翁同龢之口。即使由驻外使节廖恩焘说出，在慈禧掌朝之际，也需要足够的胆量。出于与康、梁同样的痛恨旧党断送变法大业，廖恩焘也将其对真守旧的批判从《团匪魁》延续到《维新梦》。前戏中的“庸碌大夫”，进入后戏，已落实为慈禧的亲信荣禄，其带兵入京，捉拿新党，百日维新最后便毁于其手中。假如按照写作的时间顺序，将《维新梦》看作是《团匪魁》的后设情境，那么，我们可以发现，就庸碌而言，后出之作显然有意将前戏的维新假面彻底撕破，而还原其人“专制心雄压万夫”的顽固本色。自然，其以残暴手段对付新党，仍然是为了“长保禄位”、“甘效奴才犬马劳”。这一点倒与《团匪魁》中的庸碌一般无二。

尽管对于戊戌变法，廖恩焘也许没有留下直接的记述与评说，但有此一部《维新梦》，已足以表明其为维新同人、康梁同党的政治身份了。

四、尾声：《学海潮》

今所知廖恩焘写于晚清的三部剧作中，最晚出的是《学海潮传奇》，这也是唯一一部显示了其驻外使节背景与知识的戏曲创作。该剧演述的是古巴故事，却全无传统文人搜奇志怪之思。作者的出发点与落脚处均在中国现实，故不妨将其作为晚清戏曲改良中外国题材的样本来看待。与其他两部曲本刊登在《新小说》不同，《学海潮》发表于《新民丛报》。^[17] 正是在该刊第 10 号上，梁启超开始连载其表现意大利建国史、“捉紫髯碧眼儿，被以优孟衣冠”的名作《新罗马传奇》。随后，25 号杂志又刊出了麦仲华以法国罗兰夫人为主角编写的《血海花传奇》。这一在《新民丛报》形成的“以中国戏演外国事”^[18] 的戏曲编撰新风尚，也明显影响到廖恩焘的写作，《新罗马传奇》更直接成为《学海潮》取法的楷模。何况，梁、麦二作均未完稿，惟有《学海潮》刊出了全篇，因此在同类题材中，《学》剧显然更具代表性。

《学海潮传奇》取材于古巴历史。为使读者能够明了剧情，廖恩焘专门撰写了一篇《叙事》，介绍剧本赖以展开的史实。由所述“西历一千九百〇三年十一月二十七号，为古巴学生流血之纪念日”一语，可知

其创作时间在此之后。更大的可能性是，受到此次纪念哈瓦那大学医学院学生流血活动的感染与启发，廖氏才有意将其事迹迅速谱写成传奇。按照《叙事》的记述：这一发生在 1871 年 11 月 27 日的学生流血事件，起因是由于西班牙人报馆主笔加但农“袭祖传专制之谬论，日肆攻讦”，激成民变。其率驻防军与古巴人交战，被杀。“由此仇益深，而驻防人时思一报其前耻”。正好有人以加但农墓被毁见告，指称医学院学生所为，当局于是收押了四十人。驻防军闻讯，包围了总督署，索要犯人。西班牙驻古巴总督罗百士遁逃，统领驻防军的将军坚大拿处决了八名学生，其他人因出赎金，改判徒刑。而受命执行死刑的军官高德微拉仗义执言：“吾不能杀无辜，宁断吾刃！”因以刀研石，致刀折断。再换人行刑，改为枪决。不久后，加但农之子前来探察，发现其父坟墓毫无损坏，乃知实为冤案。

廖作即据此敷演成四出（折）一楔子的杂剧脚本。“楔子一出”末扮费德力·高（即高德微拉）的灵魂，由今思昔，以领起下文。其自述生前为“西班牙上将，名防家贼，暗护民权”。如此表白虽然有拔高其人思想境界之嫌，作者却不无暗托心事之意。廖恩焘任官清廷的特殊身份与戏中的高德微拉正相合，以之为代言人并无不妥。戏演古巴独立后，在学生成牺牲纪念日，因高氏“当日有功民社”，遂将其墓葬由山地古巴（今古巴圣地亚哥）迁往海湾城（即哈瓦那），以表敬慕。启用这位与古巴历史有着特殊关联的西班牙军官作为开场人物，除了在剧作结构上代替作者开宗明义的考虑，也有利于揭示反抗西班牙殖民者的古巴独立运动是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正义事业，不仅有本土民众支持，在西班牙正直人士中也博得了同情。

第一出“文妖”，丑扮加但农，宣说其如何一意孤行，以专制谬说对抗自由平等的新思潮；又把言论付诸行动，直接参与镇压古巴民众反对西班牙暴政的起义。第二出“党狱”，副净扮古巴总督罗百士，叙述加但农死后，民气高涨，故罗氏获报加但农墓被毁，便立即下令抓捕与墓地相邻的医学院学生，一以压制革命思想的流播，一以为生财之道。第三出“市哄”则以净扮驻防军统领坚大拿，因得知罗百士有意收取赎金、释放学生，故率军围攻总督署，吓跑了罗氏，推翻原案，“将为首学生八人间斩”。末出“流血”，改以生扮高德微拉，演其“自念尚有人心，何肯助纣为虐”，因此“拔剑研地”，不肯枉杀无辜；并预言，八人之死将迅疾引发革命风潮。统观《学海潮传奇》全剧，所叙虽为古巴前史，却处处关合着晚清中国国情。这在廖恩焘本是有意为之。就编写时间看，根据前文所述，可知其应撰于 1904 年 2 月出版的《维新梦》完稿后不久，故思绪仍有承接。《叙事》即明言：

我戊戌、庚子，去今几何年矣，能无余悲？能无厚望？用绎其事，纪以传奇，愿为有心人道焉。

将此情移注笔下，《学海潮》的出场人物尽管多半籍隶西班牙，却与中国并不隔膜。“楔子”中高德微拉的灵魂唱出的第一曲 [蝶恋花] “故国江山无恙否？辽鹤归来，城市都非旧”，便令人想起廖恩焘的诗句“未归辽鹤家何在”。^[19]由此，那位西班牙军将亦恍如廖氏本人，渴望祖国独立之日重临故土，感受新兴国家的新气象。而“西班牙老大君主国一个博士”加但农，上场吟出的四句诗也完全落在中国情境：“填胸八股臭文章，制造专门奴隶场。杀人如草那见血，只凭信口说雌黄。”接下来的自报家门更是语带双关：

想我国祖传专制，鞭策群雄。恨自美起民权，法创革命，世界一变，人心动摇。自由平等之论，出自游学中人；荒唐悖逆之思，遍及上下社会。我家领土遥远，群焉思动。是我在古巴，大张旗鼓，力矫邪说，专为压制土人起见。有的是驻防官军，清门世仆，狼狈为奸，谁敢不服？本非我家土地，治乱何必关心？乐得藉手他人，威福尽我作用。（《文妖》）

此段自陈，与《团匪魁》中的卢才所言正好有一比，亦同《维新梦》中武后（慈禧太后）的道白“本非我家天下，治乱何必关心”如出一辙。甚至加但农的“驻防官军，清门世仆”之语，在讲述古巴政情的同时，也足以唤起中国读者的经验，从而与清廷驻防各地的八旗军队及其以奴才自称的大臣们挂上钩。

尽管在整出戏中，八名医学院学生只是过场人物，并无一言半语，但其被杀的意义却得到了充分张扬。作者显然借助了戊戌六君子问斩的记忆，将《维新梦》结束的法场描述“菜市愁云哀惨惨”直接嫁接到古巴，让前来监斩的高德微拉同样也唱出了“菜市云愁”的词句。不只如此，高氏所谓“好叫我一笑掀

髦，横刀仰天”（《流血》），暗中套用了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的意象，《学海潮》通篇更是深深打上了谭氏的思想印记。经过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的尽情渲染，谭嗣同壮快的遗言——“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20]——对廖氏来说已成至理名言，并积淀成为其剧作的主旋律。既然变法成功必先经过流血阶段，那么，压迫达到极点，血流愈多，革命爆发愈早，改革亦能够尽快实现。而在廖恩焘眼中，古巴独立便是此理念最有力的证明：

有道是经一度流血，便高一度风潮。几百年寄人篱下的人民，也居然成就个完全自主之国了。这也是那般民贼，与那些文妖相迫而成的。（楔子一出）

在此意义上，戏中统治者所有的倒行逆施，都反转来成为革命成功的加速器。此意日后再经梁启超提炼，返回到中国现实，便形成为“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21]的著名论断。

如同先前的两部剧作，廖恩焘在《学海潮》中一以贯之地倾吐了其对专制的憎恶与对自由的敬仰。而《自由钟》不仅作为廖氏参与诗界革命的力作《粤讴新解心》的开篇首唱，并且成为其所有戏文中不可缺少的音符。这“打破了世界迷团”“敲不住”的“自由钟”，同样也在《学海潮》中响起。^[22]对于自由必将战胜专制，廖恩焘坚信不疑，借戏中人高德微拉之口说出：

人类无终古不平之等，世界无千年不替之朝。你权贵专横，亦不过激动改革的机关，酿成破坏的结果罢。（《流血》）

与上述专制独裁只作成革命媒蘖的观念相衔接，此意也表述为：“自来革命之举，都是禁锢民权、束缚自由而起。你想十九世纪而后，那里还有你专制政体容足之地？不过替那新时代作个过渡罢了。”（楔子一出）如此反复申说，足见自由平等思想实已深入廖氏骨髓，成为其人生的基本信念。这自然得益于廖恩焘长期的海外阅历。而选择学生作为流血事件的主角，也同样来自晚清国情的刺激。在各地新式学堂纷纷建立、海外留学蔚为风气的背景下，自由、民权等新理念也日见流行，尤以留学生思想更为激进。预见到其后果的顽固派中人刚毅，因此有“学堂为养汉奸之地”^[23]的一时“名言”。将其置换到古巴的剧情中，《学海潮》中的哈瓦那大学医学院的学生也尽成为留学生，总督罗百士得报加但农坟墓被毁，便立即怒道：“胆大留学生！尔生成奴种，竟敢侵犯天朝的威严！”（《党狱》）高德微拉代替作者阐发“禁锢民权、束缚自由”与“革命”的关系，也必提到：“况且民智之开，首在学界。风潮之起，岂是禁得来的？”（楔子一出）沿袭梁启超《少年中国说》中以“少年”为中国未来之希望的论说，廖恩焘在此剧中，也从正面回应了《团匪魁》对“堕落青年爱国心”的控诉，末出高德微拉之言因而均以青年为对象，显得语重心长：

天下事只在人为，莫因一时流血，便堕落了青年志气。……你学生们乃是国民的先觉，须要轰轰烈烈振起后来的精神，留一个大大的纪念。

剧终的一曲 [煞尾] 更是完全撇开了用作传声筒的这位西班牙军官，而让作者本人的感情尽情释放：

白人休笑黄人贱，我一生主义唱平权。愿天下的少年啊，你珍重前途万万千。（《流血》）

最终，廖恩焘这位“黄人”还是按捺不住地从“白人”高德微拉的优孟衣冠中脱身而出，直截了当地表达了他对少年中国的祝福。

回到梁启超，不难看出，《学海潮》在构思、词语上模仿《新罗马传奇》的痕迹也相当明显。“楔子一出”中，高德微拉的灵魂“古装执拂上”，与《新罗马》的开场人物但丁“古貌仙装上”相仿佛。而其时高氏辞世不出30年，不比但丁距梁启超写作之日已过去600余年，因此，高之着古装实无根据。二人开口所唱又都是一只 [蝶恋花]，且均在发端处使用了辽鹤典故。高德微拉的曲词已见前引，但丁名下句为：“辽鹤千年再来处。城郭人民，花锦明如许。”梁剧中，但丁听说饮冰室主人编了一部《新罗马传奇》，现在上海爱国戏园开演，因此赶去观看。廖戏里，高德微拉也借口“国民追念遗徽，立碑纪念，当年情事，

^[1] 第一出中，迷信专制的“文妖”加但农如此表达他对自由平等的仇视：“我便把自由钟，孽海来抛；《民约论》，鬼火来烧。”

都演上舞台了”，亦“不免驾起祥云，前去一观则个”。此外，梁剧先有《党狱》一出，描述意大利男、女烧炭党人为争自由、民权，不惜流血牺牲，其一再重复的唱词“坦荡荡横刀向天笑，颤巍巍旁人何用惊”，^[23]英雄声口也与高德微拉一般无二。不过，廖作毕竟另有人物与事件作底，而且情节集中，主题明确，整个剧本一气呵成，自有其胜出处。

总体而言，《学海潮传奇》虽然以外国题材影写戊戌、庚子年间的中国时事，但其亦可被视为一部指示未来的作品，即将古巴今日的独立庆典当作异日中国的美好图景来表现。由此，廖恩焘的三出戏曲于内在理路上便具有了延续性：揭露假维新，赞美真变法，展示经由流血而换取的国家独立。

【参考文献】

- [1] 夏晓虹. 近代外交官廖恩焘诗歌考论 [J]. 中国文化 (第 23 期), 2006.
- [2] 陈剑彤. 周祥骏 [A]. 柳无忌、殷安如编. 南社人物传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 [3] 春梦生. 《维新梦》序 [A]. 维新梦 [M]. 黄萧养回头 维新梦合刻 [Z]. 横滨: 新小说社, 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廿三日 (1904 年 2 月 8 日).
- [4] (新出版本)黄萧养回头上套、京调维新梦成套(合刻) [J]. 新小说 (7 号广告), 1903-9 (1904 年 1 月后出版).
- [5] 无涯生. 观戏记(原刊旧金山《文兴日报》) [M]. 清议报全编(卷25附录一) [Z]. 横滨: 新民社, 1903.
- [6] 春梦生. (新串京调西皮) 团匪魁 [J]. 新小说 (8 号), 1903-10 (1904 年 2 月后出版).
- [7] 中国之新民. 新民说·论进步 [J]. 新民丛报 (11 号), 1902-7.
- [8] 外江佬. 粤讴新解心四章(学界风潮) [J]. 新小说 (9 号), 1904-8.
- [9] 周祥骏(春梦生). 团匪魁(京调西皮) [J]. 文教资料简报, 1982, (10).
- [10] 春梦生. 维新梦 [M]. 黄萧养回头 维新梦合刻 [Z]. 横滨: 新小说社, 1904-2.
- [11] 更生. 闻菽园欲为政变小说诗以速之 [J]. 清议报 (63 册), 1900-11.
- [12] 梁启超 (饮冰). 小说丛话 [J]. 新小说 (7 号), 1903-9 (1904 年 1 月后出刊).
- [13] 饮冰子. 饮冰室诗话 [J]. 新民丛报 (12 号), 1902-7.
- [14] 梁启超. 新政诏书恭跋 [A]. 戊戌政变记(第1篇第2章) [M]. 横滨: 清议报社, 1899.
- [15] 更生. 戊戌八月国变纪事四首(其四) [J]. 清议报 (1 册), 1898-12.
- [16] 梁启超. 书感四首寄星洲寓公仍用前韵 (其一, 1900 年作) [A]. 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45下) [M]. 上海: 中华书局, 1936.
- [17] 春梦生. 学海潮传奇 [J]. 新民丛报 (46-48 号合本、49 号), 1904 年 2、6 月 (合本的出版时间延后).
- [18] 扒虱谈虎客 (韩文举). 《新罗马传奇》“楔子一出”批注 [J]. 新民丛报 (10 号), 1902-6.
- [19] 忓余生. 纪古巴乱事有感 (其十, 饮冰室诗话引录) [J]. 新民丛报 (85 号), 1906-8 (同年 10 月后出刊).
- [20] 梁启超. 戊戌政变记(谭嗣同传) [J]. 清议报 (4 册), 1899-1.
- [21] 饮冰. 现政府与革命党 [J]. 新民丛报 (89 号), 1906-10 (1907 年 3 月以后出刊).
- [22] 中国之新民. 敬告当道者 [J]. 新民丛报 (18 号), 1902-10.
- [23] 饮冰室主人. 新罗马传奇 (“楔子一出”、第三出 “党狱”) [J]. 新民丛报 (10、12 号), 1902 年 6、7 月.

责任编辑: 王法敏 陶原珂

献疑于以民俗学为禁忌的作风

——就中国戏剧的发生等问题答解玉峰先生

◎ [日] 田仲一成

[摘要] 中国戏剧与世界各国的戏剧一样，是从乡村祭祀产生出来的。祭祀戏剧经过历史时间的推移然后才进化、上升为观赏性戏剧，中国戏剧便经历了从祭祀仪式演进为宋元观赏性戏剧的历史过程，这一说法有文献的依据，而且符合科学的普遍逻辑。宋元时期，北方戏剧比南方戏剧更富有祭祀性。王国维视元杂剧为一代之文学，就是因为他重视悲剧，而元杂剧的悲剧性之所以产生，则需从当时镇魂祭祀的环境来说明。同样，明代流行以妇女为主角的家庭戏或女性冤魂戏，也和江南大宗族重视节妇的政策有关。如果把祭祀戏剧和观赏性戏剧的连续性打断，只把观赏性戏剧看作真戏剧，就无法说明戏剧的起源等带有普遍性的根本问题。从祭祀的自然环境和人间环境来看，戏剧一脉相承的结构也是从祭祀仪式发展而来的。传统的“中国学”（“汉学”）重视文献研究和高雅的文人文化，忽视或回避民俗学、基层社会的研究，不利于与世界学术的对话交流。

[关键词] 祭祀戏剧 观赏性戏剧 戏剧结构 民俗学 中国学（汉学）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7) 03-0142-05

本文批驳一个青年学者的有关中国戏曲的观点，并对“中国学”（“汉学”）研究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我的专业是研究中国戏曲史的。1981年以来，出版过以下6本关于中国戏剧的著作：1.《中国祭祀演剧研究》(日文，东京大学出版会，1981年)；2.《中国的宗族与演剧》(日文，东京大学出版会，1985年。中译本《中国的宗族与戏剧》，钱杭、任余白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3.《中国乡村祭祀研究》(日文，东京大学出版会，1989年)；4.《中国巫系演剧研究》(日文，东京大学出版会，1993年)；5.《中国演剧史》(日文，东京大学出版会，1998年。中译本《中国戏剧史》，云贵彬、于允译，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年)；6.《明清戏曲》(日文，东京创文社，2000年。中译本《明清的戏曲》，云贵彬、王勋译，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通过这些著作，我主张中国戏剧与世界各国的戏剧一样，是从乡村祭祀产生出来的。对此，南京大学中文系解玉峰先生似乎怀有疑义，在《戏史辨》第四辑(胡忌主编，中国戏剧出版社，2004年)上，他就发表过一篇文章《献疑于另类的中国戏剧史——读田仲一成〈中国戏剧史〉》，全面地批评拙作《中国演剧史》(中译本《中国戏剧史》)。等到2006年6月，他重新出版一本新书《二十世纪中国戏剧史研究》时，把这篇文章收入在内，题目改为《巫风傩影中的迷失》。又登在网络上，传播对我的批评。拙作《中国演剧史》(中译本《中国戏剧史》)代表我一系列研究总结性的看法。我觉得解氏批判我的文章里反映出中国传统学人研究“中国学”的狭隘偏见，因此，有必要研讨这个问题。

一、解玉峰先生主张的内容和其含有问题

1. 否定所谓观赏性戏剧起源于祭祀戏剧的观点。他说：

田仲教授《中国戏剧史》一书存在的最大的问题便是混淆了仪式性戏剧和观赏性戏剧这两类戏剧的差异。

“仪式性戏剧”(或“祭祀戏剧”),其主要的功能是祈求平安福祉。而“观赏性戏剧”则是以娱乐观众为其主要目的。

作者简介 田仲一成，东洋文库研究员、日本学士院会员、东京大学名誉教授。

起自宋元的中国民族戏剧，是在华夏民族特有的审美观念之下逐步形成和完善的，它与“祭祀戏剧”有艺术与非艺术的本质性差异。正因为如此，祭祀戏剧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因为历史时间的推移进化、上升成为“观赏性戏剧”。

我们无法假想，从巫师傩神的狂魔乱舞中可以产生一个高雅端庄的梅兰芳！^④

仪式性戏剧和观赏性戏剧这两类戏剧，我并不混淆。仪式性戏剧在前面走，观赏性戏剧跟在它后面走。古老的戏剧，祭祀的因素强，观赏性弱。较新的戏剧，祭祀的因素弱，观赏性强。但是，所有的古代戏剧都离不开祭祀因素。到近代戏剧，才有了脱离祭祀因素的条件。这是我的看法。

解氏言说的核心，是他不了解祭祀戏剧经过历史时间的推移进化、上升为观赏性戏剧这个理论。这是戏剧起源于巫术的理论问题，而且是世界各国戏剧史上到处可以看到的最为普遍的历史问题。我在拙作里详细地解说了这一理论，并提出相当多的文献上的证据，来说明在中国从祭祀仪式演进为宋元观赏性戏剧的历史过程。而祭祀仪式在什么条件之下能够蜕变为观赏性戏剧，这个问题也解释过。世界上有的民族只有祭祀歌唱或跳舞，没有观赏性戏剧，只有特定国家有这类戏剧。这是问题的关键之所在。我指出，农村迅速地进入商业社会的历史阶段后，才有把祭祀戏剧推动为观赏性戏剧的条件。解氏不能反驳我提出的这类理论，而且对于我为了证明这一演进过程而提出的许多证据，一个也没能反驳。但从主观的观点否定其结论，只是一句话而已：“我们无法假想，从巫师傩神的狂魔乱舞中可以产生一个高雅端庄的梅兰芳！”这里，学者应有的科学性，一丝都看不到。

另外，宋元南戏作品中，保存祭祀仪式痕迹的例子为数不少。北宋末期《东京梦华录》提到的开封《目连救母》杂剧，也是例子之一。欧阳江琳《试论明代南戏的仪式表演》^⑤举出许多例子，如成化本《白兔记》第3出、第7出，《胭脂记》第34出，凌本《琵琶记》“感格坟成”出，《白蛇记》第20出，《商辂三元记》第16出，《东窗记》第15出，《四喜记》第7出，以及《金钗记》、《荆钗记》等等。最有名的昆曲，汤显祖《牡丹亭还魂记》也属于鬼戏。祭祀戏剧和观赏戏剧的过渡，文献上并不难找到。解氏的说法，是不成立的。

2. 看不起少数民族文化而过份表扬中华民族文化。解氏指昆曲为自己可以为之自豪的戏剧，却看不起少数民族的宗教文化。他说：

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为“人类口头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并在首批19个项目中荣登榜首，其所以获此殊荣，不仅仅因为它是“遗产”，更是因为它是华夏民族的“文化”遗产；就此一点而言，其与今日非洲土著的宗教仪式活动有天壤之别。^⑥

昆曲虽然被评定为世界遗产，但这一联合国这种政治团体的评价，不是属于学术性的评价。解氏据此看不起非洲文化，反映出他缺乏学者应有的宏观眼界。

3. 否定逻辑的必然性和普遍性，否定科学。解氏提出很奇怪的说法，否定学问的基础——逻辑和其普遍性：

田仲先生所以选择乡村的“祭祀戏剧”作为其考察中国戏剧的视点，因为从日本、西欧的戏剧发生看，“戏剧发生于祭祀礼仪的视点，是合乎逻辑、普遍适用的视点”。

假如“戏剧发生于祭祀”，是日本、西方的普遍“逻辑”，但这种“逻辑”是否同样也适用于中国戏剧？换言之，从“戏剧发生于祭祀”的“逻辑”出发以重新构建中国戏剧史，是否可能会造成对中国戏剧的误读？^⑦

近代科学和学问，都站在普遍的逻辑上，这是科学的基础。在科学普遍的逻辑上，中国也不会例外。其实，中国戏剧，从祭祀性歌舞出发，慢慢演进为科白戏剧，是适合普遍逻辑的。解氏不能反驳拙作主张的逻辑性，干脆否定逻辑本身。这种偏狭固陋的偏见，不利于将来的“中国学”研究。

4. 缺乏研究的方法。设定一个假说、检查证据、鉴证这个假说是否符合客观实际，引出结论，结果打破先入观念的限制性，这是科学研究的大道。我先设定祭祀戏剧的假说，进而探讨证据，是依靠这种学

术研究的方法来做的。但是解氏批评我这种方法，他说：

正是因为带着这样一种主题先行的假想——从“祭祀戏剧”的角度描述中国戏剧的发生、发展、和演变，田仲教授的《中国戏剧史》在一些具体问题的分析论证方面，出现了许多难以周延之处。

如田仲教授的《中国戏剧史》真正进入中国戏剧史的讨论不是始自宋代的南戏，而是始自元代的杂剧。《张协状元》等《永乐大典》所保存的现存最早的南戏剧本则完全不在讨论之内。¹¹

解氏指出的中国戏剧的起点问题，即宋代南戏和元杂剧的前后问题，至今还没有明证可以决定其前后。至少，《元刊本杂剧三十种》是早于《永乐大典》的，而且《张协状元》也含有浓厚的鬼魅性、祭祀性。这一问题，我认为是北方戏剧和南方戏剧的前后的问题。北方是小姓杂居、乡民较为平等的社会，有利于保留原始祭祀戏剧。与此相反，南方是大姓垄断，乡民被大姓压住，原始戏剧早就蜕变为文人戏剧。因此，北方戏剧比南方戏剧更富有祭祀性。拙作所以从元杂剧开始论述，其原因正在于此，这在方法上毫无问题。

5. 过份崇拜王国维学说，却忽略了王国维近代艺术思想。接着上引的文章，解氏批评我对元杂剧的看法说：

因为在田仲教授看来，元杂剧与“祭祀戏剧”的关系比之其与南戏更为直接，元杂剧是最早从祭祀仪式中演变出来的一类戏剧。具体而言，《关张双赴西蜀梦》、《地藏王证东窗事犯》等“英灵镇魂剧”和《窦娥冤》、《汉宫秋》、《梧桐雨》等“女性冤魂剧”，都是从乡村的孤魂祭祀中产生的，《岳孔目借铁拐李还魂》、《散家财天赐老生儿》、《西厢记》等起源于宗族的祭祀，《诈妮子调风月》、《诸宫调风月紫云亭》等“风月剧”，《黑旋风双献功》、《好酒赵元与上皇》等“强人侠士剧”，则产生于市场(勾栏:解氏失解，我指野台而言)。

元剧被称为“一代之文学”，元剧家多是借元剧的抒写，呈现其才情，表露其心迹。把作为“一代之文学”的元曲杂剧的产生，完全归因于镇抚孤魂野鬼或希求宗族繁荣等现实的功利需要，显然是失之轻率的。¹²

这里所说的意见，不是理论上的商榷，只不过是解氏的印象。把元杂剧看作“一代之文学”的是王国维，但他盲从王氏的评语。我不能了解他把我的学说称作“轻率”的意思。解氏似乎用这贬词来表达表面上的看法，但他本身只能依靠王氏的评价来看元剧文章的艺术性，而不能体会到元剧家的深层心理。王国维之所以把元杂剧看作一代之文学，其原因在于他特别尊重悲剧的缘故，这是受到欧洲近代文艺思想影响的看法。但他的《宋元戏曲考》没有说明元杂剧的悲剧性是怎样产生出来的，我说明了这一点，是从镇魂祭祀的环境来说明的。解氏不能了解王氏想法的过程，只盲从其结论，评他为“轻率”，却为恰当。

6. 缺乏对于围绕戏剧的社会环境的了解。明代戏剧里，最流行的是以妇女为主角的家庭戏。我认为，江南大宗族重视节妇的政策产生或推动了这类局势。解氏批评这个看法，说：

早期南戏中曾经常见的英雄传奇类、公案故事类剧目逐渐减少，戏剧题材转以婚姻爱情类为多。这可以说传奇内部结构使然。

田仲教授《中国戏剧史》在解释这一现象时，不是从艺术本身着眼，而是归之于江南乡村女性自杀、冤死比此前多，对这些女性冤魂的镇抚成为必要，于是南戏的婚恋戏开始盛行，由此导致了“江南戏剧剧目内容构成由以英雄为中心转向为以女性冤魂剧为中心”。这种匪夷所思的论断，在《中国戏剧史》一书中可以说所在多有。¹³

解氏引用我文章较多，但他对此的反驳太简单，只是“这可以说传奇内部结构使然”和“这种匪夷所思的论断”两句而已。而且这里没有提出具体的证据，又没有具体的辩论，是属于印象批评之类。所谓“传奇内部结构使然”是什么意思，应该更具体地说明。女性冤魂戏剧盛行的地区是江南大宗族社会，其他傍边小姓杂居的地区仍然流行英雄戏，看不到女性冤魂剧。就全国来说，江南是一个例外的节妇烈妇多出的地区。若非从戏剧本身之外的更为广泛的角度来看，这大约不可能发现。解氏只看文学，缺乏看重社

会的视点，难怪不能理解我的想法。

7. 忽略傩戏在戏剧史上的重要性。如上文所引那样（“其与今日非洲土著的宗教仪式活动有天壤之别”），解氏忽略戏剧里的宗教因素，他也不能理解傩戏在中国戏剧史上的重要性。他说：

不论是贵州的“傩戏”，还是贵州的“地戏”，或者中国其他地区的现存的与民间宗教祭祀密切相关的“祭祀戏剧”，都是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和研究的。但我们没有必要把它们推举到一种不适宜的高度，过份夸大其对中国戏剧史的意义。^四

这里可以看到传统中国戏曲学的观点。把祭祀戏剧和观赏性戏剧的连续性打断，只把观赏性戏剧看作真戏剧，把研究对象限制在观赏性戏剧。眼界太窄小，无法说明戏剧起源等普遍性根本问题。

二、祭祀仪式与一伏一起的戏剧结构

放弃祭祀戏剧或傩戏的观点，又能不能说明中国戏剧表演形式或戏曲文学的结构是从哪里来的呢？为了深化讨论，这里再次对这个问题进行论述。

戏剧表演中的所谓“形式”，主要指表演者装扮剧中人物，通过演唱或舞蹈来展开故事情节。其核心部分，可分为三：一是人物的拟态（装做别人），二是人物之间的对舞、对唱、对白，三是故事的起伏。关于前两点，自然明白，不用多说。第三点（故事的起伏）最为重要，如果离开祭祀仪式的角度，就不能说明。

一般来说，戏剧这种艺术形式有比较明显的特点。就是主人公先向下方下降（陷入悲惨的境遇），然后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慢慢儿向上方上升（克服困难的问题），最后得到最终的胜利（团圆）。诗词没有这样的关目结构，小说虽然有起伏，但不一定以团圆结局。据此可以得知，戏剧情节非一伏一起式的结构不可。如果缺乏这类一伏一起，就不像戏剧了。那么，这类戏剧所独有的一伏一起的形式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认为，这还是起源于村民做迎神活动的时节和环境。

1. 自然环境。原始祭祀的时节，无非是冬春之交。这是有原因的。原始人不知自然之规律，也不知时节的循环性，因此，在冬天时很害怕春天不一定自然而至，觉得应该用力气邀请她来。所以村民举行祭祀，一方面邀请神灵，献给祭品，要他赶走冬天以诱引春天，一方面他们自己也打鼓跳舞，发出大声，叫醒地下睡觉的春天，使她再来或促进她再来。村民跟神灵连在一起，与冬天斗争，打胜冬天，春天才可以出来，那时才有东西吃，才有条件养孩子了。人类学者把这种冬春交替时的祭祀解释为“死而复生”的咒术。赶出冬天死去，邀请春天再生，祭祀就是演出死而复活的仪礼。这种死而复活的过程很像是一种“先下降，后升起”的戏剧结构。那么，就可以说，自然和祭祀，每逢冬春之交都演出一种死而复活的“戏剧”。后来人们要求戏剧内容也具有这样一伏一起的死而复活、克服痛苦而获得欢喜的结构。这并不是偶然的，戏剧故事之所以具有一伏一起的结构，就是这种环境所造出来的。

2. 人间环境。跟自然环境一样，人类群体也有死而复活的过程和促进这个过程的咒术。在欣欣向荣的春季，万物由死亡转向再生，对于人类群体来说也是如此。人类也趁此应该由死转生，就是说，让群体中老化的部分下台，邀请群体中年轻有力气的部分上台。人类群体为了维持其生命，应该培养接班人。老人死故是难免的，没有年轻人接老人的事业，群体就容易消灭，所以把年轻人锻炼为成人（壮丁）是群体最吃紧的事。但是年轻人不一定都有资格成为老人的接班人，其中应该有选择。羸弱的男孩经不起锻炼，不算壮丁。先锻炼年轻人，受得过这锻炼的人，才被看做成人，就是“有资格作为群体的成员而负责于维持群体而可以受到神灵的祝福”。这里也可以看到死而复活的观念，就是说，“少年作为旧的年轻人死了，而作为新的成人（丁）再生出来”。这是人类学者所谓的“通过仪礼”。这种锻炼少年、祝福他们成为壮丁的行为，应该在神灵降临保护之下才能举行。经得起锻炼而成为壮丁的男人才有资格跟女人结婚，准备产生下一代的孩子，因此，也是在冬春之交村人举行迎神祭祀时同时实施的。可以说，春天祭祀时，自然方面演出死而复活的活动，人类群体方面也演出死而复活的活动。两方面都有“一伏一起，克服痛苦而获得喜悦”的戏剧性的现象。两者在彼此交感之下，一起举行这种“复活仪礼”，以促进或培养以后的戏剧产

生的环境。在日本学术界，这个观点是由日本文学专家西乡信纲教授第一次提出来的。他在其论文《镇魂论》（1957）里指出：“在日本的庆典祭祀活动中，年轻人等候着神灵的来临，成群结队地固守在深山里，素食寡欲，经过种种肉体考验之后，就可以接受作为群体成员的祝福了。在这里，的确可以发现‘经受并克服困难而得到喜悦’这样戏剧表演形式的萌芽。”^③这种老人考验少年后做成人仪式的习惯，在世界各民族里并不少见。在中国乡村祭祀里，春节流行舞狮、舞龙等由年轻壮丁做的组织性练功活动，表面来看是崇拜神灵的祭祀活动，但实际上是以防卫乡村为目的的对于乡村不可或缺的重要任务，是年轻一代从老一辈人受到吃苦锻炼的集体性工作。这是年轻一代的责任。因此，这些舞狮、舞龙的演出，在经过苦练才能学会这一点上，可以看做相当于日本成人仪式的“通过典礼”，而代表了乡村的生命力。而且，过关而成为壮丁的男青年，此时便可跟女人结婚，春节在农村至今还是结婚的季节。这反映出原始的死而复活的“通过仪式”。

如此，自然和人类，每逢春天，通过送冬迎春的季节祭祀，演出死而复活的仪式，就是一起一伏的戏剧性的活动。这以后便演变为戏剧。

三、对“中国学”的一点看法

中国本身的“中国学”，即所谓“汉学”，其正统性研究由大学教授们承担，研究方法基本上集中于文献，而忽视或回避民俗学、人类学及基层社会的研究。其想法大约如下：1. 中华民族是文明的，保有很多文字文献，据此研究便十份够了；2. 民俗学是研究无文字民族的文化时可以运用的方法，不适合于以中华民族为对象的研究；3. 人类学是研究落后民族的社会组织的学问，中华民族的社会组织（村落、宗族、家族等）历史悠久、文献丰富，阐明其结构，用不着人类学者田野调查的帮助。

基于这样的观点，中国的“中国学”学者不喜欢人类学。解玉峰先生对我站在人类学的角度研究中国戏剧史的批评，其深层心理也是这样。但是，这种拒绝人类学的看法，其眼界定为高级文化，不能达到下层文化或基层文化，自然而然地陷入于窄小的文人世界。1983年以后，中国各地陆续发现傩戏，但大学方面很少有人会感受到这类发现的影响，大多数学者都忽略了它的重大意义，仍然墨守王国维所云戏剧为“以歌舞演故事”这一狭隘的定义，无视潜藏在戏剧后面的祭祀因素。欧洲、日本1920年代已开始田野考察，把祭祀跟戏剧结合起来研究戏剧史。因此，我认为中国的“中国学”研究也应该扩大眼界，如果仍站在以中国文人文化为唯一独尊的观念立场上，不注意国内的民俗文化，不注意国外民俗学、人类学研究的新进展，外国人将无法与之彼此展开讨论，这不利于世界“中国学”的对话交流。这就是我的结论。

[参考文献]

- [1] 解玉峰. 献疑于另类的中国戏剧史——读田仲一成《中国戏剧史》[A]. 胡忌主编. 戏史辨（第4辑）[C].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4.
- [2] 欧阳江琳. 试论明代南戏的仪式表演 [A]. 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编.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第10辑）[C].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
- [3] [日] 西乡信纲. 镇魂论 [A]. 诗的发生——在文学上应有的原始和古代的意义 [M]. 东京：东京未来社，1964.

责任编辑：王法敏

南音《目连救母》的道德叙事

◎ 朱恒夫

[摘要] 美国柏克利大学东亚图书馆收藏的全本南音《目连救母》，为清朝广东省省城丹桂堂刻本，说唱结合，以唱为主，句式皆为七字句，格律严谨。全本分四卷，共有64段，据郑之珍《目连救母劝善戏文》本改编而成，但也有一定的差异。南音《目连救母》形象地图解了封建社会的伦理体系，突出地塑造了一个至圣者目连的形象，不但是一部研究目连故事的有价值资料，也是研究南音的重要资料，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 南音 《目连救母》 劝善戏文 郑之珍 罗卜 伦理体系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7) 03-0147-04

目连救母故事自从晋朝产生的《佛说盂兰盆经》发轫之后，经历过多种文艺形式，宋杂剧、金院本、南戏、传奇、傩戏、许多地方戏以及说经、变文、宝卷、马头调、琴书等，都曾做过它的载体，而不同文艺形式的目连故事之间，又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它们共同构建了庞大的目连故事体系。近20多年来，学术界对目连故事的发展过程和承载它的许多文艺形式进行过深入探讨，然而，仍有相当多的材料未被发现，也有一些目连故事的表现形式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南音《目连救母》就是遗漏的目连故事资料。笔者2003年到美国柏克利大学访学，在其东亚图书馆发现了全本南音《目连救母》，它的内容虽然由郑之珍的《目连救母劝善戏文》改编而来，但仍有独特之处，无论就其表现形式还是故事情节而言，无疑是目连故事群中的一种，有着一定的学术价值。因此，有必要将它介绍给学术界并做一些探讨性的工作。

一、南音《目连救母》简况

南音是流行于广东、福建、台湾等地区的一种说唱曲艺，是在木鱼、龙舟等曲艺艺术的基础上，吸收扬州弹词等曲种的音乐发展而成。南音的唱词基本上为七字句，唱时音乐性较强，句格、声韵较为严谨，行腔婉约、悠扬，旋律优美，善于表现不同的思想感情。南音《目连救母》的封面的小标题为“机板正字，好唱南音”，正题为“罗卜挑经全本”，并附有广告语“本局精印南音曲本、龙舟歌曲、小说杂书……”，书脊题为“新刻罗卜挑经救母全本，省城丹桂堂版”。由南音《目连救母》的内容情节来看，它与明代万历年间郑之珍编撰的《目连救母劝善戏文》一脉相承，虽然不能断定它直接由郑本改编而来，但可以肯定地说，原本一定是郑本系统的戏曲本。

南音《目连救母》分为四卷，64段，约为3万字。其卷一的目录为：

傅相祝寿 凌云卖身 傅相施食 兄弟求济 夫妻求济 孝媳叹更 孝妇求济 二官下界 行使白铜
雷打十恶 傅相升仙 罗卜守孝 翠莲施钗 施钗误命 金氏悬梁 刘贾破戒。

卷二的目录为：

刘氏开荤 刘氏破斋 天诛刘贾 观音试卜 神试罗卜 玉皇出文 和尚思凡 尼姑思凡 尼姑下山
花园发誓 勾提生魂 地方带提 刘氏归阴 乡台叹苦 刘氏回煞 罗卜挑经。

卷三的目录为：

猿精把截 狐精缠卜 神救罗卜 狐精截路 猿精大战 猿精借宝 马康退兵 金星收伏 二精变战
目连脱凡 目连会佛 佛祖赐禅 刘氏起界 一殿发落 二殿治罪 三殿审究 四殿受苦 五殿定罪。

作者简介 朱恒夫，同济大学文法学院教授（上海，2000092）。

卷四的目录为：

六殿逢母 六殿会卜 七殿冥王 八殿平政 九殿都王 十殿转轮 刘氏受畜 见佛教母 赛英归阴
婆媳相会 哀佛教母 母妻得会 同游天界 全家共乐。

南音本也有一些郑本没有的内容，如《二精变战》，在猿精与众神将大战，因它变化多端而难以捕捉时，齐天大圣主动请缨，他“驾起云中见得真，看见白猿云里躲，变成孤雁无人闻。齐天大圣忙来变，变成鸦鸟去追寻。飞上云中寻着他，想他难脱老猴人。白猿听得鸦鹰到，就知危险即忙奔。……大圣见他现本相，待吾亦现本原身。火眼金睛百慧生，金丝毛映神光闪，手持铁棍吓惊人。白猿得见他模样，知是齐天大圣身。心内已知无好意，事到头来只得行……”郑本只有一个白猿精，被四大神将收伏，做了目连开路的先锋，而南音本又添上一个齐天大圣，并让齐天大圣收伏白猿精，实是一个猴精战胜了另一个猴精。这一情节有可能是受了小说《西游记》的影响，但这样做并非是为了热闹，而是有着很深的涵意的。即一个人的道德修养，外力的作用虽有但不是决定性的，关键的是自身要战胜内心的魔障，自觉地完善自己的德性。为何要有两个猿精，实际上它们代表着一个人道德的正反两个方面，两个猿精的战斗，其寓意就是一个人内心正与邪、真与假、善与恶的较量。从这些方面的内容来看，南音本的思想内容在某些地方超过了郑本。

二、形象地图解了全套的伦理体系

南音本中的人物虽然很多，但只有少数人物贯穿着整个故事，大部分人物只是短暂地一现。作者为何要安排那么多人物出场？其根本的原因在于，作者的目的不只是向人们讲述目连救母故事，而是凭借着这个故事宣传彼时社会的健康的伦理道德体系，以有助于提高社会的文明与稳定社会的秩序。许多人认为目连救母的故事反映了中国佛教的孝亲的观念，即当先祖因在阳间犯下了罪恶，死后被罚入地狱，受到百般折磨之后，这时做子女的也应该设法将他们从地狱中解救出来。这种观念是对体现儒家思想的二十四孝故事的一种补充，因为二十四孝故事所讲的都只是在父母活着或刚死的时候，如何地奉养父母、驯从父母，或怎样地厚葬父母，至于父母的灵魂堕入地狱之后，该如何地行孝，这样的问题从未涉及，目连救母的故事则引导着人们将孝亲精神施及阴间地府。

这一看法无疑是深刻而正确的，然而，仍未能全面地概括整个目连救母故事的思想，至少对南音本来说，是无法涵盖的。南音《目连救母》表现的是彼时社会的整个伦理体系，并通过形象化的故事一一进行诠释。目连救母故事虽然染上了浓重的佛教色彩，但所表现的伦理体系却仍是儒家的。

仁是儒家思想的基础，也是儒家伦理体系的根本。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一定是仁厚慈善的，只要有能力，他会慷慨地帮助一切困难的人，真诚地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幸福地生活着。南音本将这一伦理要素置于首位，并让目连的父亲傅相以仁的形象出现在故事中。当凌云的双亲去世而无钱办理丧事之时，傅相听说后，“取出白银三两重，赠与凌云孝子身，‘火速归家葬父母，表吾微意若何能。’”（《凌云卖身》）何氏兄弟落魄街头，靠乞讨为生，傅相馈赠本钱，让他们从头做起，并叮咛道：“切莫赌嫖和浪荡，不负尊堂祖上亲，老夫微意休言少，将来本少利钱多。”（《兄弟求济》）这样的施舍事例，南音本列举了很多，目的是通过多次渲染，让听众或读者对傅相仁慈的品德生出敬仰之心。仁是一种品格，但更是实践的表现，仁爱之人应具有仁爱的能力，故而作者将傅相定位为家产丰饶的富人。当然，富人傅相的形象，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提示着世上有能力施行仁爱的人为富要仁。

南音本在确立了仁为伦理体系的基石之后，又形象地展示了其它伦理要素。通过凌云自售其身，获值以埋葬父母等故事，肯定了为子女者对父母要生养死葬的道德；通过何有声兄弟俩即使落难街头，但仍然相互敬爱的故事，肯定了兄敬弟悌的道德；通过哑夫幼妻患难与共与李翠莲受到丈夫无故怀疑而致死的故事，肯定了夫妻之间互敬互信互助的道德；通过目连母刘青提出尔反尔，背誓开戒而被罚入地狱的事，肯定了诚信的道德；通过目连妻赛英守贞不嫁，随从丈夫的故事，肯定了妇女贞节的道德，等等。

南音本在诠释这些伦理道德之时，既有正面歌颂型的，又有反面批判型的。为了让人们接受正确的伦

理观念，作者通过两方面的内容对众生进行儆戒。一是神光普照，每一个人不论在何时何地都会受到神灵的监视，因此，任何欺天瞒地的事都是不能得逞的。刘氏背着儿子杀生茹荤，打僧骂道，为了消除儿子的怀疑，她竟在花园中对天地发誓：“刘氏若然有此念，立刻昭彰报应人。七孔皆流鲜血死，重重地狱受灾殃。”为了不让刘氏达到欺骗的目的，鬼神立即戳穿了她的谎言，让她“说罢一声跌倒地，四边鬼卒叫声频。当时火焰腾腾起，劈开坑窖白粼粼。鸡鹅狗骨皆出现，杀生之事没虚陈。”（《勾捉生魂》）作者构思这样的情节，无疑是想展示神灵的非凡能力，让听众或读者认识到，一切昧心之举都是徒劳的，神明洞然，到头来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二是充分展示地狱的恐怖情状，让人毛骨悚然，对地狱世界产生畏惧之心，从而收敛作恶的念头。目连救母的故事通过刘青提在阴间经历十殿拷掠受刑的过程，来描绘十殿是如何处罚恶人的，如七殿：“只见罪人来受苦，铁磨将来粉碎身，骨头脊烂成灰烬，喊天叫地不容人。血漫磨床真可叹，岂吾无受这艰辛。思想起来唔敢体，劝人为善念经文。”（《七殿冥王》）南音本不吝篇幅，从一殿到十殿，将地狱酷刑的刑具、受刑人的痛苦、刘氏的悔恨都一一地绘声绘色地介绍出来，这肯定会让有地狱观念的听众与读者产生极大的畏惧之心，会反思过去做过哪些错事，并盘算着未来的从善之路。

三、塑造了一个伦理圣者的形象

南音本与许多目连救母故事一样，将罗卜（目连）作为最主要的人物来进行摹写，并突出救母这一行为。他对他的父亲“事死如事生”，禀承其遗志，食斋施善，筑庐守墓，三年服丧；对母亲温驯恭谨，昏定晨省，得知母亲被打入地狱后，便跋山涉水，往西天求佛救助；对仆人甚至路人，总是慈爱关怀，给予能力内的最大的帮助。但是，如果仅仅具有这些品格，他就和一般的孝子没有什么两样，罗卜最闪亮的品格应是对伦理奉行的坚执态度，不论是利诱，还是恐吓，是顺境，还是逆境，他都始终不渝，认真地按照伦理的要求去做，这是普通人甚至被人们称颂的孝子们所无法比配的。

南音本比起其它的目连救母故事，增加了罗卜处境艰难的情节，在罗卜救母之前、救母之中与救母之后，都经历了无数的严峻考验，有的险境是神祇有意设计的，有的就是客观存在的，但罗卜都表现了对伦理道德至诚的态度，与坚毅奉行的精神。

玉皇为了弄清罗卜志节，有无必要让他到地狱去解救他罪孽深重的母亲，便派观音去测试他的品性，“观音变化凡间女，特来偷试个斋人。淡妆素质真清雅，飘飘仙气迥凡尘。来到庵门将手扣，双环摇动响传音。”她装成被丈夫赶出家门的可怜女子，百般哀求罗卜留她过夜。“罗卜听言将语道，古云男女不相亲。亲娇本是坚贞辈，瓜田李下古来云。劝娇早往人家去，切莫痴缠乱佛心。”女子不走，罗卜就自己住到屋外。像这样遭受女色的考验不止一次，在取经的路上，还遇到了狐狸精变成的美女，“狐狸打扮一娇女，淡施脂粉貌如神。慢举金莲移玉步，微启朱唇细语音。”见勾引不成，便勃然大怒，“若然见弃奴归去，有场祸事到来侵。”但是罗卜心坚如磐，决心以生命来抗争，“就死不成来破戒，娇娇不必再言陈。……倘若不容吾此事，万割千刀任尔行。”一个人在众目睽睽之下，奉行道德，并不是件难事，也不能说明该人的道德有多么的高尚，最能表现一个人道德水准的是在他独处之时，若仍能循规蹈矩，严守道德，则无疑是个君子。罗卜不但在一人独处之时不逾礼越道，即便是在有着强烈的诱惑与生命的严重威胁的情况下，也丝毫不为之所动，这就不是常人所能做得到的了。

在前往西天求佛教母的旅程中，跋山涉水，经历着自然界无数的艰难困苦就不用说了，最危险的则是一个个妖魔的阻挠与迫害，白猿精捉住他，要把他当作美食；狐狸精截拦他，逼他与己交欢，不从便绷扒吊拷。但是罗卜丝毫没有动摇自己救母的决心，依然勇往直前，以一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态度面对着未来。

到了西天之后，摆在他面前的，仍然是重重的困难，首先是佛祖不甚愿意告知他入地狱救母的方法，“如来佛乃开言道，尔娘十恶又开荤，此乃玉皇亲敕旨，严拿问罪不容人。为善自然当奖劝，作恶须当究罪深。若然无报谁为善，警戒阳间世上人。”其次是阴森森的地狱有十殿之多，刘氏由于罪孽深重，不能免去经历十殿刑罚之苦，罗卜只得央求每一殿的冥王与鬼差，宽恕自己的母亲，有的冥王与鬼差并不通

融，他只得在佛与地狱之间来回奔波。三是刘氏在经历了十大地狱之后，被罚投胎作狗，长大后又被主人卖给屠户，剥皮剔肉，在街上出售，目连只得一路追踪，寻找已托身为狗的母亲，最后焚化狗的皮肉，让灵魂摆脱轮回之苦。

如若没有已陶铸成性的道德品质，没有难以言喻的坚毅性格，没有誓志不渝的追求理想的精神，他抵挡不了美色的诱惑，承受不了致命危险的压力，忍受不住漫长时间的折磨，他的高尚顽强、坚韧，都是非凡的，不是圣者是难以做到的。或许，普通的人们并不会以他为学习的榜样，也不会去效法他上西天、入地狱的救母方式，但他身上所体现的精神——克己奉孝、追求理想而不怕牺牲一切、严守伦理原则，毫无疑问，会感染着人们，陶冶着人们的情操，对提升整个社会的文明水平起着巨大的作用。

南音《目连救母》在艺术上也有自己的特色，首先是情节紧凑，叙述的节奏较快。第一卷写傅相的广博施舍，被施舍的对象接踵上场，每个人都自我介绍一段酸辛的身世故事，让人有目不暇接之感。第三、四卷描写刘氏在阴间经历着从一殿到十殿的地狱惩罚，也是一座座地介绍，所描述的每个地狱的恐怖气氛不一样，惩罚的方式也不一样，就像电影的镜头，将整个地狱的场景连续地映现了出来。这样的描述生动而不板滞，内容丰富却不冗繁。其次是详略得当。作者深深地懂得听众或读者的接受心理，哪些是听众或读者愿意多了解的，能抓住他们注意力的，哪些是不愿意多听多接受的，于是，作者对故事重新编排，该详就详，该略就略。写女神以色来测试目连的品质，与和尚尼姑思凡的情状，其过程的描写是相当详细的，而目连拜见佛祖的场面与过程则相当的简略。三是唱词既俗又雅，说它俗，是因为它的每一句唱词都明白如话，说它雅，是因为它的语言没有粗俗语、没有多少口语，甚至没有多少方言。有的唱词还能产生出文学的意境，如写西天佛地：“四时花果极清新，山清水秀灵奇物，仙鹤遍地不怕人。古云紫芝开并蒂，半枝红杏极新鲜。”

责任编辑：王法敏

论古今汉字形音义关系之变迁

◎ 张会

[摘要] 由于汉字字形、字音与字义的历时变化，字形反映字音、字义的能力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与古代汉字相比，现代汉字的字形、字音、字义的关联程度有所降低。因此有必要对古今汉字形音义之间的差异进行分析，以明确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正确认识古代汉字与现代汉字的关系。

[关键词] 古代汉字 现代汉字 表意 表音

(中图分类号) H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7) 03-0151-03

汉字是形音义的统一体，形、音、义之间是相互关联的。虽然从古至今，汉字的形体、读音和意义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是汉字的基本性质没变，现代汉字仍然是形音义的统一体，形、音、义之间仍然或多或少地存在某种关联。

造字之初，每个字的定型应当是有一定根据的，许慎据小篆之形将汉字分为六种，象形字、指事字以形表义，会意字合形会意，形声字兼表音义。可是隶变使汉字形体不再象形，简化更是增强了汉字的符号性；语义的演变和渐趋丰富又让字形与字义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语音系统的演变则使形声字的表音功能降低。那么，古今汉字在形音义的关系上到底存在哪些差异呢？

一、古今汉字的形义关系

由于字形的演变和汉语的不断丰富与发展，字形与字义的关系也在不断变化。在古代汉字阶段，字形与字义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字形与本义（即当时的常用义）的关系上，而现代汉字阶段字形与字义的关系主要是字形与现代常用义的关系。

1. 古代汉字的形义关系

汉字产生之初，其形体与意义的关系是怎样的，因为没有流传下来的文献可供参考，我们不得而知。根据汉字的性质，我们可以推断，在造字之初，或者说在图画文字阶段，汉字数量尚不多，其形体与意义的关系应该是很简单的、直观的，这时的字形基本上反映的是字的本义。可是文字要成功地记录汉语，满足记录语言的需要，上升为记录汉语的工具，就不能总是停留在象形阶段，而只要离开了图画阶段，字形的表义功能就会受到限制。

到了古文字阶段，部分汉字形体还具有相当直观的表意性。这种通过自己的形象表意的字符称为形符。早期汉字象形程度较高，表意字多使用形符。象形字、指事字如“山、鱼、鸟、木、本、末”等以形表意，会意字如“寇、即、既、北、得、弃”等合形会意。这种形义关系，可以帮助人们理解语义。

早期的形声字是在象形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某些形声字的字义与形符的意义基本相同。如“船、頭、爹、爸”。

随着汉字象形程度的逐渐降低，汉字变得不象形之后，形符的表意作用被破坏了，人们不再依靠字符的形体而是根据它所表示的字义来判断。这种依靠字义来表意的字符称为义符。春秋以后的表意字，有许多就是用义符构成的。如“楞、甭、孬、尘、尖、耷、瓣”等等。后来，义符逐渐取代了形符。形声字往往直接用义符与音符合成。义符的意义是固定的，用有限的义符来造出数以万计的形声字，义符肯定不能准确地表示每个形声字的字义。所以，形声字的形旁多数不能准确表意，它只表示事物的类属、范畴，目的就是给同类事物一个共同的特征，将同类的事物聚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明显的字族，显示此族字的系统性和清晰的血缘关系，同时也显示了先民对事物的认识程度。《说文解字》“足”旁有85个字，其意义与足（膝盖以下部分）有关，但有的是足的动作，如“践、踏、跳”，有的是足的部位，如“跟、踝”，有的是足行的样子，如“跛、蹇”，此外，足所涉及的“路（道也）”“蹠（马行貌）”等字也以“足”为义符。所以说，形旁和形声字的字义联系是比较宽泛的、不太确切的，只是提示一个义类的信息而已。但就是这样一个提示作用，就可以帮助人缩小认知的范围，减轻大脑的负担。例如听到“只”这个音，无从知其形与义，但看到字形“枝”“肢”，就马上知其所指。

2. 现代汉字的形义关系

作者简介 张会，北京师范大学汉语文化学院讲师、博士（北京，100875）。

如果说在古代汉字阶段，我们探讨字形与字义的关系主要以字的本义为主的话，可是到了隶楷阶段，汉字彻底摆脱了象形表义的形态，成为记录汉语的符号，从字形上往往看不出什么意义的信息，即便是原本象形的字，也早已失去了本来的面目。例如“寒”金文像人在房屋里铺草以御寒意，隶变后“人、房、草”形与原来的形象相去甚远。

有的意符在隶变后形体因构字部位的不同而发生分化，例如“心”本是象形字，《说文解字》“心”部字 263 个，无论居于何部位，其字形不变；可是隶变后，处于左旁的“心”受汉字方块的约束，变为“忄”，二者相去甚远，这时我们分析字形与字义的关系就需要先经过溯源使变形部件获得音义，然后才能谈论形义关系。

同样，古今字义的变化也是必须注意的。由于汉语在不断变化，语言中某些意义的消失往往会造成字本义的消失，进而引申或假借出了新的意义，这又使得字形与意义的联系中断。如“我”本象形字，甲骨文象兵器形，假借作第一人称代词，本义消失。再如“特”本指公牛，其义今不存。

因此，到了现代汉字阶段，就不能仅仅以传统六书来分析现代汉字的形义关系。要考察字形与字义之间的关系也不能再以字形是否能表意为标准来探讨字形与字本义的关系，而应根据现代字形分析现代字形和现代常用字义的关系，从字形与它所代表的词的意义是否一致入手。比如“马”本是象形字，现在虽然不象形而成为记号字，但它本身固定下来的“马”这个词的意义始终没变，当它作意符组成“骏、驭、驰、驯、骑”等形声字时，也是靠它自身固定下来的词的意义来表与“马”有关的意思，所以还应把它看作是真正的意符，是可以反映字义的。只要了解“马”的意义，一旦见到以“马”为左偏旁的字就会自然地联想到这个字所代表的词的意义与马有关。但是“骗（《集韵》：跃而乘马也。）、骄（《说文》：马高六尺为骄。）”等字义本与马有直接联系，可是现代常用义“欺骗”“骄傲”与“马”无关，所以“马”在现代人的心中就成了记号。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们在理解字义时往往倾向于选择自己熟悉的简单事物来帮助记忆，愿意从字面上建立最直接的联系。这是人的一种直观第一的认知心理的反映。见“三点（丶）”而知为“水”，见“王”旁却不知是“玉”，也是因为人的认知心理在作怪。“玉”与人的现实生活逐渐脱离，人们对它的认识也就逐渐陌生，只知道“玉”表“玉石”而不必知道“王”是“玉”的古形体。这种心理是长期应用汉字的过程中约定俗成下来的。

根据上述规则，参考传统六书，现代汉字基本上也可以分为六种——会意字、形声字、半意符半记号字、半音符半记号字、独体记号字、合体记号字。所谓记号字就是形体不再表意的或不再表音的，或既不表意也不表音的，它主要来自古代的象形字，往往具有较强的构字能力，是理解或掌握其他字的基础。

现代汉字字形反映字义的能力到底怎样呢？施正宇对 3500 个现代汉语常用字中的 2522 个形声字的形符进行了测查，发现现代形声字有效表义率为 83%。^⑩ 可见，现代汉字的形义联系还是比较紧密的，同时也证实古今汉字的基本性质是一致的。

二、古今汉字的形音关系

1. 古代汉字的形音关系

在古文字阶段，象形字、指事字和会意字等字形本身不能提供任何语音信息，都和语音没有直接的联系。假借字虽和语音有关，但属于同音字的借用，与字形无关。汉字的字形与语音发生直接联系始自形声字的产生，只有形声字的出现才使汉字的形体和读音具有了切实的联系，汉字的形体开始具有了表音的功能。

由于上古音研究的不足，我们不能详细统计古代形声字的声旁的表音功能，但是根据形声造字的原理，可以推知初造出的形声字，凡是同一声旁的字读音都是相同或相近的。在古文字阶段去古未远，形声字的声旁也基本能起到表音作用，能够比较准确地提供字音信息。《说文解字》收字 9353 个，形声字多达 7697 个，占了总数的 82% 还多。许慎均采用“从某，某声”的解说方式分析字形标注字音，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2. 现代汉字的形音关系

在现代 7000 个通用字中，形声字有 3975 个，占 56.7%。形声字在现代汉字中的地位和作用仍然相当重要。可是到了现代汉字阶段，形声字声旁的表音功能相对于古代汉字而言已经大大弱化了。周有光 1978 年的研究表明完全规则的形声字大约只占汉字的 30%，声旁的有效表音率只有 39%。^⑪ 20 世纪 90 年代初，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汉字整理研究室从声韵调三方面对声旁与整字读音的声、韵、调关系的研究表明，声旁与整字读音的声、韵、调全相同的情况占 38%，声旁与整字读音的声、韵相同，调不同的占 18%，声旁与整字读音的韵相同，声、调不同的占 16%。^⑫ 由此可见，现代汉语形声字声旁的表音功能总的来说削弱了。在这种情况下，形声字的声旁可以帮助提示一定的读音信息，但也可能会起干扰作用。

声旁表音功能的弱化，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

一是语音系统的演变。在语音演变的过程中，形声字的声旁或形声字本身的读音发生了改变，于是产生了声旁表音不准的现象。“古无轻唇音”，本来都读重唇音的字到隋唐时代发生分化，如“昧”及其声旁“未”在古代同属重唇，后来“昧”

读重唇，“未”读轻唇。这种情况相当多。“胎、怠、殆”和“治、始、怡”两组字都以“台”为声旁，而今读音并不相同，也是由于语音发生了演变的缘故。

二是字形的变化。汉字形体在历史上有两次重大的变革：一次是秦汉时期的隶变，一次是解放后的汉字简化。这两次变革使许多形声字的声旁发生变化，如“更（原从支丙声）、急（原从心及声）、布（原从巾父声）、疫（从役省）”都是隶变后消失的形声字；“鸡（雞）、办（辦）、盘（盤）、际（際）”都是简化后消失的形声字。

虽然有少数字在简化时对其表音不准确的声旁进行了替换，使简化后的汉字表音更准确，如“態、證”分别简化成“态、证”，改变了一些由于语音的演变造成的声旁表音不准确的情况，增强了表音功能，但数量太少，不足以扭转声旁表音率低的现实。

三、汉字的音义关系

一般认为，语言中音与义的结合是任意的，声音和概念没有必然的联系，任何声音都可以表示任何概念。但是，经过社会长时间的约定俗成，某一声音就固定地表示了某个概念，于是在这一语言系统里它们发生了联系。

汉字在记录汉语的时候，一般并不直接显示读音，而是侧重显现它所表达的某个特定的含义，因此，最初的象形字、指事字和独体会意字都体现了以形表义的思想，没有考虑声音的成分。有一部分会意字，其中某个意符除了表意以外，还有表音的作用，但这种表音是次要的，它的主要作用还是表意。这种字叫做“亦声字”，《说文解字》有“某亦声”的提法。如：

珥：是一种耳饰，从耳玉，耳亦声。 坪：是平土，从平土，平亦声。

返：是还走，从反走，反亦声。 娶：是取女作妇，从取女，娶亦声。

此外，一部分形声字的声符在表音的同时也有表意的作用。本来形声字形符表义，声符表音，分工明确。可是在语言文字的发展过程中，重视表义的民族思维促使人们给表意不清的字加注意符，造出新的形声字。因此，一部分声符的意义和形声字的字义有联系，即音符兼表意。例如：

蛇：由初文“它”加注意符“虫”。 暮：由初文“莫”加注意符“日”。

征：由初文“正”加注意符“彳”。 捧：由初文“奉”加注意符“才”。

古人就注意到了某些声符能表意的现象，汉代开始使用声训的方法，即用同音字或音近字去解释字义。许慎作《说文解字》，郑玄注经，都使用读若、读为的方法，就是声训的应用。刘熙作《释名》，通篇使用声训的方法。到了宋代，王安石在《字说》中指出“凡字声都有义”。王圣美进而提出“右文说”，认为“凡字其类在左，其义在右”。虽然这种因声求义的做法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毕竟发现了汉字形体的读音与意义的关系，为汉字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

因为这类兼表音义的字在汉字中数量不多，而且这种音义关系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对语源的探求上，属于训诂学的范畴；而现代汉字的形义关系重点在现代常用义上，所以对音义关系的分析不是现代汉字学研究的重点。

综上所述，因为现代汉字的字形、字音、字义不同程度地存在联系，所以我们可以在汉字教学实践当中充分利用这种联系，提高汉字学习的效率。为了充分认识和了解现代汉字，人们仿照传统六书的分类方法，把现代汉字基本上也分为六种——会意字、形声字、半意符半记号字、半音符半记号字、独体记号字、合体记号字。其中记号字是形体不再表意的或不再表音的，或既不表意也不表音的，它主要来自古代的象形字，往往具有较强的构字能力，对这部分字进行溯源析流，有助于与之相关的其他字的识记。这种汉字分类法是基于一般人对汉字的理解与认知的，它与语言学家理解的结果可能会或多或少存在一些差异，但并不影响我们对汉字中现存的形音义关系的利用。

[参考文献]

- [1] 施正宇. 现代形声字形符意义的分析 [J]. 语言教学与研究, 1994, (3).
- [2] 周有光. 现代汉字中声旁的表音功能问题 [J]. 中国语文, 1978, (3).
- [3] 李燕, 康加深. 现代汉语形声字声符研究 [C]. 陈原主编. 现代汉语用字信息分析.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3.

责任编辑：陶原珂

•学海酌蠡•

“廷珪”辨

◎ 黄世瑞（华南师范大学行政管理学院教授，广东 广州，510631）

〔中图分类号〕 K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03-0154-01

东坡《书海南墨》一文曰：“此墨吾在海南亲作，其墨与廷珪不相下。海南多松，松多故煤富，煤富故有泽也。”

这是坡翁流放海南期间写下的他在海南亲自制墨的短文。除“廷珪”外，全文意思很清楚，可谓明白如话，略无歧义。那么，“廷珪”应作何解呢？有注释本解作“黑色的玉板。玉板为古代帝王诸侯所用的信符。”（或许因排版误植，该注释本将“廷珪”误作“延珪”。）

窃以为此注释有误。

若将此注释代入原文，则意思就变成了坡翁在海南亲制作的墨与古代帝王诸侯所用的玉板不相上下了。管见认为如此解释则义理难通。坡翁缘何将二者本不相干的墨与玉板相比，其类比的联想未免离奇了一些。更何况“廷珪（或延珪）”是否真为帝王诸侯所用的信符玉板，恕我寡陋，尚不敢肯定。即便有确凿证据能够肯定，笔者也认为坡翁此处的“廷珪”指的并不是帝王诸侯所用的玉板，而是大名鼎鼎的制墨大师李廷珪。这里的“廷珪”乃专有名词（Proper Nouns）而非普通名词（Common Nouns）。

提到“文房四宝”中的墨，一般都会想到著名的“徽墨”；提到“徽墨”，搞科技史的人一般就会想到徽墨的前身“李墨”及其创制者李超、李廷珪父子。碰巧笔者滥竽充数于科技史研究队伍之中，故能对此略知一二，一看到《书海南墨》中的“廷珪”，便想到应是制墨宗师的廷珪（因其与墨关系密切），而不可能是古代帝王诸侯所用的玉板。

李超本姓奚，乃唐末河北易水著名墨工，后流落皖南，见皖南多品质上上之松，诚为制墨的好原料，于是就定居下来，重操旧业，与其子廷珪因地制宜，根据皖南松的特点，刻苦钻研，不断改进制墨技术，制出了质量上乘的好墨。众所周知，南唐李后主是著名词人，也喜欢墨，见其臣民奚氏父子制出了“丰肌腻理、光泽如漆”，“拈来轻、嗅来馨、磨来清”的好墨，龙颜大悦，遂赐奚氏父子姓李，以示恩宠。这样，奚超、奚廷珪就成了李超、李廷珪。制出的墨，人称“李墨”。李（奚）氏父子在技术上更是精益求精，尤其是廷珪，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集南北制墨技术之大成，成为制墨宗师，名满天下。故坡翁在《书海南墨》中提到“廷珪”无须加注。至于“其墨与廷珪不相下”，乃坡翁自诩其制墨水平之高也。

责任编辑：郭秀文

《葡萄牙东波塔档案馆藏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勘误

◎ 刘冉冉(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 山东 济南, 250100)

(中图分类号) K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7) 03-0155-01

《葡萄牙东波塔档案馆藏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以下简称《汇编》)^[1]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特殊的历史意义, 是一份关于清代澳门历史的珍贵档案资料。对于目前研究清代澳门历史的学者来说, 可谓一部不可不读、不可不用的重要著作。然而, 笔者在阅读《汇编》的过程中发现了两处细微之误, 有必要在此提出校正。

(一) 《汇编》第339号, 是乾隆五十七年二月二十日(1792年3月12日)《粤海关监督盛佳为饬蕃船出入务须报明关口查验事下理事官谕》。^{[1](P192-193)}第1229号, 为乾隆五十七年五月十九日(1792年7月7日)《粤海关监督盛佳为蕃人咼呢私搭外船进埔事下理事官谕》。^{[1](P627)}第1237-1240、1372号,^{[1](P631-633,P706)}也均是粤海关监督盛佳下发澳葡理事官的谕令。然而, 据梁廷枏《粤海关志》, 乾隆五十六至五十八年(1791-1793年), 粤海关监督应为盛住。^{[2](P496)}而且,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中也收录了乾隆五十七年三月二十四日(1792年4月15日)《粤海关监督盛住奏报查看澳门等税口均系实征实报并无需索情弊事竣回署日期折》,^{[3](P510)}以及乾隆五十八年五月十九日(1793年6月26日)广东巡抚郭世勋、粤海关监督盛住奏报英国贡船已通过澳门外海洋面北上的奏折。^{[3](P528-529)}由此可以证明, 《汇编》中所谓盛佳, 当为盛住之误。

(二) 《汇编》第853号, 是道光二年六月二十二日(1822年8月8日)《署澳门同知金为饬查不法蕃人纠集滋事下理事官谕》。^{[1](P436)}到第1410、1411号, 同样是道光二年署澳门同知下澳葡理事官的谕令, 然而标题中的发文者却被明确写成“署澳门同知兼理香山知县金毓奇”。^{[1](P728-729)}据光绪《香山县志》, 金毓奇是嘉庆八年至九年(1803-1804年)的香山知县, 而在道光二年兼理香山知县的应是金锡鬯。^{[4](P27)}显然, 以上两件档案中的“金毓奇”, 应为金锡鬯之误。同时可以进一步推知, 第52号, 道光四年九月初六日(1824年10月27日)《署澳门同知金为原禀饬差押改铺民许亚炳住屋改铺事下理事官谕》和第1305号, 道光五年八月二十三日(1825年10月4日)《署澳门同知金为饬令寄泊零丁之三艘小吕宋船回国事下理事官谕》^{[1](P33-P667)}中的发文者, 也应是金锡鬯。

由于《汇编》中各件档案文书的标题是由辑校者拟定, 所以以上两处细微之误, 当为辑校者的无心之失而非原档之误。

[参考文献]

- [1] 刘芳辑, 章文钦校.葡萄牙东波塔档案馆藏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 [Z]. 澳门: 澳门基金会, 1999.
- [2] 梁廷枏.粤海关志(卷7) [M]. 台北: 成文出版社, 1968.
- [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澳门基金会, 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1册) [Z].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 [4] 田明曜修, 陈澧纂. (光绪) 香山县志(卷10) [M]. 续修四库全书本.

责任编辑: 郭秀文

•书评•

文化生态园中的理论奇葩

——《文化生态学》评介

◎ 范英（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研究员，广东 广州，510050）

〔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1000-7326(2007)03-0156-02

戢斗勇研究员是广东中青年学者中不断有创新成果问世的文化人之一，新近又完成了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课题《文化生态学——珠江三角洲现代化的文化生态研究》，并由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年9月出版。这部书是作者几年来做了大量艰苦的研究工作而完成的专著，在研究珠江三角洲文化生态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文化生态学体系的全面方案，其中包含了一批有创新价值的学术观点，突显了鲜明的学科性和实践性。

一、戢著初步构建了体系较完整的文化生态学的理论框架，具有鲜明学科性

“文化生态学”是20世纪中叶以后在西方兴起的新兴学科，由美国的斯图尔德首先提出，他在1955年出版的《文化变迁理论》一书中阐述了文化生态学的基本理念。在他那里，文化生态学是人类学与生态学的交叉学科，主要研究的是环境对文化的影响，由此研究不同种族、宗教的地域环境制约因素。直至20世纪90年代，文化生态学在美国仍然是人类学系或人文地理系的课程。这一状况到了上世纪90年代后期才得到改变，随着以电视、网络为代表的新传播媒体的流行，人们把目光投向了新旧媒体的文化生态关系，1997年出版了D·克里克的《文化生态学：变化中的传播》一书；日本学者也发起了“传播新技术与文化生态学”的国际研究；1999年9月在吉隆坡召开了“文化生态学国际讨论会”。目前，文化生态学已进入“大文化”研究的视野之中，探讨文化生态学的概念、斯图尔德的理论在当今世界的应用、媒体伦理学、文化资本、城市信息环境与文化生态、儿童成长与媒体生态、媒体的全球化和文化变迁、传播革命的基本性质及其对人类生活和社会尤其是文化的正、负面影响、新媒体环境对人类社会和文化的影响、多媒体与社会改造、后现代思想与新媒体的关系等等。可以说，文化生态学已成为世界文化研究的新的前沿性学科。但在国内，文化生态学只是在某些文化人类学、社会学的著作中有简单介绍，以及有数篇文化生态学主题的论文，尚未有文化生态学的专著出版。也就是说，文化生态学虽然已经问世数十年，但概论性质的基础理论还不成熟，而这正是戢著的着力点。他在书中初步建构出一个较为完整的文化生态学的理论体系，包括文化生态学的概念、历史、特点、任务以及文化生态的系统、资源、环境、态势和规律等内容，在文化生态学基础理论和学科建设方面成为一家之言。

二、戢著以文化生态学理论来观照珠江三角洲的发展，具有鲜明的实践性

珠江三角洲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生态问题研究，目前在国内外尚属空白。戢著则把“大文化”观念上特别是在广东建设文化大省《纲要》的“文化”范围上建构起来的文化生态学理论体系直接应用于研究珠江三角洲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建设，主要探讨珠江三角洲经济社会的现代化与文化之间的依存互动关系，以及不同类型文化之间的依存互动关系。作者以“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和科学发展观为指针，认为珠江三角洲现代化的文化建设，应以主导性文化产业的有机构成和不同类型文化的综合优化为其发展战略。作者指出，文化生态学是研究文化存在和发展的内部及外部环境的科学，它不仅要研究文

化与外部经济、社会环境的互动关系，也要研究文化的内外各种不同形式及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其旨归是要使文化的存在和发展形成良好的功能态势。因此，文化与现代化之间无疑存在着“生态”的关系。经济社会的现代化是文化生态的最为重要的影响因子。一方面，文化是现代化的内容之一和主要软件；另一方面，现代化也制约着文化的形态和变迁。书中特别强调了珠江三角洲文化的原生态是以近代文化为标识的；珠江三角洲文化的新生态则以改革开放后的现状为标识。而衡量珠江三角洲文化生态是否平衡和优化的标准，乃是珠江三角洲实现现代化的近期和远期目标所提出的客观要求。珠江三角洲现代化的进程说明了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带动作用，以及现代化决定了文化的形态、格局和特征，引起了文化的变迁。我认为，珠江三角洲的个案为文化生态学关于文化与外部环境的互动研究提供了生动的实例。作者以现代化的标准和进程来分析珠江三角洲文化，说明珠江三角洲文化中的各种文化形式如器物文化和制度文化及观念文化、雅文化与俗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都市文化与乡村文化、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粤文化与港澳文化、理性文化与非理性文化、学术文化与应用文化等，应当有一个恰当的生态格局，这是颇有见地的看法。目前珠江三角洲文化的各种形式，其格局大致上符合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发展的要求，但也有不尽人意之处。珠江三角洲现代化向纵深发展有赖于文化生态的优化。作者提出，珠江三角洲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应当注重文化的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使人们明确不仅资源环境有生态保护的问题，文化也需要生态保护和优化；提出珠江三角洲现代化的文化发展战略和文化产业化之路，在于以信息化社会为基础，建设具有珠江三角洲特色的现代文化，使珠江三角洲文化成为中国先进文化的示范区或有代表性的先进的地域文化。

由于具有上述的学科性和实践性特点，这部著作无论是对于推进文化生态学学科本身的成熟和发展，还是对于推进珠江三角洲现代化过程中和谐文化的建设，都有重要的积极的意义，都能给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提供及时的有益的思考。

责任编辑：柏 桐

•学术动态•

“纪念罗香林诞辰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梅州举行

2006年是著名历史学家、民族学家罗香林(1906-1978年)诞辰一百周年。为了纪念这位客家研究的奠基人，推进客家研究的深入发展，11月11-12日广东省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举行了由梅州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纪念罗香林诞辰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与会的80多名中外学者，在其学术精神的感召下，对客家文化研究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罗香林为广东兴宁人，1925年入清华大学历史系，1929年入清华研究院和燕京大学研究院，1930-1932年编《客家史料丛刊》；其客家研究撰著主要有《粤东之风》、《疍家》、《客家研究导论》、《丘逢甲传》、《西婆罗洲罗芳伯新建共和国考》、《国父家世源流考》、《宋芷湾先生集外自寿记》、《客家源流考》、《客属公会各团体的组织及发展》、《客人及其造就》、《胡晓岑年谱》、《客家史料汇编》、《黄遵宪先生传稿序》、《客家迁移及分布地图》、《客家的语言》等，又有《中国民族史》、《中夏系统中之百越》、《百越源流考》、《中国族谱学研究》、《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世考》、《兴宁明清县志》、《兴宁明清县志考》和《兴宁廿五家诗选序》等在不同的学术层面涉及客家研究的著作，故有学者指出，若说客家意识在宋湘时觉醒，客家研究在黄遵宪时发端(成立客家研究会)，则罗香林承前启后，做系统研究而有集大成的成就，成为客家学奠基人。

在研讨中，与会论者较为关注的是罗香林客家研究最为突出的两个方面。一是民族混化融合论和民系生成论的思想，即认为汉族和各民系在历史的发展和迁徙中都或多或少融合了多个民族的成分，并非纯粹无杂的(畲族和客家的关系就是一个显例)，民系的形成受到自然环境(天截)、外族关系(外缘)和内部演化(内演)诸因素的影响，因而需要兼顾民族文化认同与血统关系的双重标准来进行民系的判断。一是客家学的研究方法，尤其注重田野调查(主要是访谈和语言调查)、族谱(谱牒)研究(探讨宗族祖先的历史)、追溯源流(提出客家五次大迁徙说与中华民族历史相印证，又追溯客家山歌源流而形成史学家的文艺观)和区域调查(包括地理环境、社会组织、四民行业、生产方式、分配状况、教育状况、人口分布、生死常率、婚娶常律、特殊文化、特殊工具、民情风俗、群众心理、团体情绪、历史传说、新旧著作等)，并在此基础上分析确定纯客县与非纯客县。

与会学者普遍认同罗香林在多个领域和研究方法上的开创性，尤其强调客家研究中学科和方法的多样化，重视比较研究、专题研究与综合研究相结合，以资进一步拓展客家方言研究、民系的文化融合(如研究广府化的客家山村与饶平半山客)的研究和客家人文中心的形成与文化认同(如探讨大埔县白堠村与台湾六堆地区文教兴乡)的研究，并深入开展区域文化研究(如广西的客家区域)。

在深化客家研究中，个别学者根据出土文物提出拟定客家第一次南迁始于秦汉；而在民俗研究方面，有学者比较深入探讨了客家萨满和江西宁都县汉帝民间信仰，后者让人想到客家为汉人正统性的历史认同记忆的起始时间似应在汉以后，故客家六次迁徙说还有待深讨。(本刊记者 王可)

Main Abstracts

A Logic Mythology of Metaphysics: Non-being Means Having No Logic

Cheng Zhongtang 25

It is said that, logic and metaphysics or ontology all use 'to be' as their nucleus. If without 'being', there would be no ontology. Likewise, it is a logic mythology of metaphysics that non-being means there would be no logic.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deconstruct the logic mythology. Readers will find out that 'to be' in the logic of Aristotle's terms just acts as a small dispensable role, some kind of language factor consisted of logic constants, which can be chosen. It has no position in the prepositional logic of the school of Stoic totally, and disappears completely in modern logic. All of these indicate that, logic can operate without 'to be' as usual. The crux of the view taken non-being as no logic is that, it lumps together logic with metaphysics.

A Study of the Theory of Building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 in an Ecological View

Peng Biyu 50

Organizational ecology is a cross science newly developed which focuses on the organizational foundation, evolution and death. This paper concludes the main factors infecting the organizational foundation from ecological process and institutional process. In the ecological process, there is some relation of inverted 'U' pattern among founding rate, population density and founder density. There is a negative relation between founding rate and non-overlapped niches. As in the institutional process, there is a relation of inverted 'U' pattern between founding rates and related density, and the regulation of regulars can determine the rate of organizational establishment directly.

The Latent Absorptive Capacity, the Capacity of Application, and the Industrial Efficiency and Achievement

Zhan Zhengqun 56

Based on the work of Cohen and Levinthal's research on absorptive capacity, we develop the concept of latent absorptive capacity (abbr. LAC), and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the LAC on firm's capacity of applying knowledge and performance. The main findings are: (1) the LAC constructed by learning orientation, market orientation and corporate experience has constructive validity; (2) there is a positive relation between the LAC, the applying capacity and the firm's performance; and (3) there are substitutive effect between the LAC and the applying capacity.

A Tentative Study of the Countermeasures to the Problem of Mendicity in China

Wang Baoqing 68

The present thesis tries to seek for countermeasure to the phenomenon of mendicit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It dissertates two stages of permanent control and stopgap measure from three angles of macro-aspect, meso-aspect, and micro-aspect. Borne some practical value, it is of help and reference to our Party and government in making decisions, and is quite significant for us to show concern with the weak, to carry forward and foster the national spirit, to maintain social stability, to fully act on the important thought of 'three represents', and to build a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The Scholastic Crowds Who Studied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Chinese Borderlands and Foreign Countries around the Opium War

Zhang Yongjun 98

The scholars who studied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during the first upsurge of the Opium War amounted to more than 48 persons, which consisted of Yu Zhengxie, Zhang Shu, Gong Zizhen, Lin Zexu, Wei Yuan, Shen Yao, besides the famous scholars Xu Song, Zhang Mu and He Qintao. They formed a scholar group which mainly studied China frontier historical geography, advancing the study of foreign historical geography and other fields. In a view of their social status, they may be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scholarly officeholders, official scholars and relatively pure scholars. Though different in their insight, accomplishment and learning belief, they all had contribution to the upsurge and development in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Chinese borderlands and foreign countries.

Personal Experience in Ecological Aesthetics

Gai Guang 116

The eco-aesthetic appreciation is a complex style of the human life experiencing, called eco-life-experience here. The eco-aesthetic appreciation experience activates eco-life-experience through the alteration and inter-growth of the human and nature ecology, which helps produce the eco-existence of human beings. It focuses both on the human's current life and on the future life. The eco-aesthetic appreciation takes the harmony as our essential existing style and the love-existence as the living style of our civilization. The human beings must approach the eco-existence through the natural and our own twofold liberation.

On the Modernity of Decadence

Chen Ruihong and Lü Pei-ai 121

As an important phenomenon of the 19th century's culture and art, decadence reflects the crisis of modern culture, in which rationalism plays a leading role. Decadence is both a life style and an artistic style by which artists try to evade those contradictions, affliction and weariness of modern life and express their resistance against bourgeois rationalism. Decadence, whether as an aesthetic ideal or a form of culture, is modern in substance.

The Change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Dramas in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Liu Ping 125

The change of Chinese drama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is related closely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history. The causes of that have three points, political stimulation, dramatists' awakening themselves, and audiences' choice. The change and development appeared in two periods: the improvement of drama and the origin of new drama (stage play). The two kinds of dramas have been mutually influenced, studied and enlightened, gradually formed a nationalized artistic style pattern. After liberation, the political demand raised a higher requirement to the dramas, so that the modern drama was born to the time. The art had to go closer to politics, and its development was hampered and limited. In the period of reform and open after 1979, the drama creation has caught a chance to return to its own noumenon.

Liao Entao's Drama Writing, as a Diplomat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Xia Xiaohong 132

Mr. Liao Entao, once the China's consul general at Cuba, was not only a professional diplomat of the Qing Government but also an active participant of the Literature Reformation Movement. He published at least three dramas with the pen name 'Chun Mengsheng'. In this paper, after examin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Liao's career of drama writing and the Drama Reformation Movement, I explore the political ideas in his three dramas: 'Leaders of the Boxing Uprising', 'a Dream of Reform', and 'a Legend of Campus Upheavals'. Mr. Liao revealed that the reform of the Qing government was false, showed sympathy and approval to the Reform of 1898, and also took the campus upheavals liberated Cuba as a prospect of China. The three different but connected topics constitute a trinity.

《学术研究》读者评议表

尊敬的读者：您好！

《学术研究》的发展和完善离不开您的支持和帮助，为使我们的刊物能够更好地满足您的要求，我们希望能够听到您对我们刊物的评价和建议。请将以下问卷填妥后寄至：广州市黄华路四号之二《学术研究》杂志社（邮政编码：510050），或（Fax）020-83846177。联系电话：020-83846307、020-83846163，电子邮箱：bjb@gdskl.cn

我们将不定期邀请热心读者召开座谈会，对刊物的发展提出有价值的建议的读者，我们将会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对于您所提供的个人资料，本刊将予以保密。

姓名：_____ 单位全称：_____

地址：_____ 邮政编码：_____

电话（请务必填写）：_____ 手机：_____

传真：_____ 电子邮箱：_____

1. 在本刊所有学科中，您最关注的学科是：_____

2. 在本期您所关注的学科中，您最喜欢的文章是：_____

3. 在您所关注的学科的文章中，您在其选题意义、文章内容、学术价值、研究的创新程度上的评价是：

指标	评价				
选题意义	<input type="checkbox"/> 1/很差	<input type="checkbox"/> 2/较差	<input type="checkbox"/> 3/一般	<input type="checkbox"/> 4/较好	<input type="checkbox"/> 5/很好
文章质量	<input type="checkbox"/> 1/很差	<input type="checkbox"/> 2/较差	<input type="checkbox"/> 3/一般	<input type="checkbox"/> 4/较好	<input type="checkbox"/> 5/很好
学术价值	<input type="checkbox"/> 1/很差	<input type="checkbox"/> 2/较差	<input type="checkbox"/> 3/一般	<input type="checkbox"/> 4/较好	<input type="checkbox"/> 5/很好
创新性	<input type="checkbox"/> 1/很差	<input type="checkbox"/> 2/较差	<input type="checkbox"/> 3/一般	<input type="checkbox"/> 4/较好	<input type="checkbox"/> 5/很好

4. 您认为本期《学术研究》在栏目设置、校对水平、版式设计和印刷质量方面做得如何？

指标	评价				
栏目设置	<input type="checkbox"/> 1/很差	<input type="checkbox"/> 2/较差	<input type="checkbox"/> 3/一般	<input type="checkbox"/> 4/较好	<input type="checkbox"/> 5/很好
校对水平	<input type="checkbox"/> 1/很差	<input type="checkbox"/> 2/较差	<input type="checkbox"/> 3/一般	<input type="checkbox"/> 4/较好	<input type="checkbox"/> 5/很好
版式设计	<input type="checkbox"/> 1/很差	<input type="checkbox"/> 2/较差	<input type="checkbox"/> 3/一般	<input type="checkbox"/> 4/较好	<input type="checkbox"/> 5/很好
印刷质量	<input type="checkbox"/> 1/很差	<input type="checkbox"/> 2/较差	<input type="checkbox"/> 3/一般	<input type="checkbox"/> 4/较好	<input type="checkbox"/> 5/很好

5. 您认为今后《学术研究》还应该增加哪些栏目和内容，或是做哪些改进？（请填写）

6. 您认为《学术研究》的特色主要应表现在哪些方面或今后应该做哪些改进？（请填写）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请继续关注《学术研究》！

《学术研究》编辑部

2007年3月

岭南人文图说之三十九——

西秦戏

西秦戏又称乱弹戏，流行于广东海丰、陆丰、潮汕和福建南部及台湾等地，是明代西北地区的西秦腔流入海陆丰后与当地民间艺术结合形成的地方小戏，具有独特的艺术特色与丰富的文化价值，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西秦戏源自秦腔，即琴腔、甘肃腔。西秦戏传入海陆丰，说法有二：一明代万历年间，陕西陇右（今甘肃天水）刘天虞到广州做官，带3个西秦腔班子，经过江西流入广东、闽南、台北一带，后来在海陆丰扎根，并与海陆丰民间艺术和语言结合，逐渐游离于西秦腔而自立门户，形成现在的西秦戏；二明代崇祯年间，甘肃一带的李自成败军沿闽赣边界进入广东之后，败军中一些陕甘艺人在海陆丰聚班演戏从而流传下来。西秦戏植根海陆丰之后，深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西秦戏的唱、白虽然沿用中州音韵，但曲文通俗浅显，加上艺人们不断学习正字、白字等兄弟剧种和民间艺术的长处，因而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别具风格与特色的地方剧种。在清代乾隆、嘉庆年间，海陆丰拥有40多个西秦戏班，流行地区从原来的粤东、闽南、台北，扩大到广州、香港及东南亚等地。

西秦戏表演风格粗犷豪放，雄浑激昂，长于武戏，其武打技巧取法南派武功。西秦戏脚色分“打面行”、“打头行”、“网辫行”、“旗军行”几种，“打面行”包括红面、乌面、丑等；“打头行”包括正旦、花旦、蓝衫、婆脚等；“网辫行”包括老生、文生、武生、公末等；“旗军行”包括乌军、红军等。西秦戏传统剧目有一千多个，其中较有影响的包括《龔克己》、《三官堂》、《宝珠串》、《贩马记》等“四大弓马戏”，



▲ 西秦戏演出情况



▲ 西秦戏演出剧照

《打李凤》、《棋盘会》等“三十六本头戏”，《斩郑恩》等“七十二提纲戏”，《回窑》、《葛嫩娘》、《秦香莲》、《赵氏孤儿》、《游西湖》等剧目也深受观众欢迎。西秦戏的音乐唱腔为齐言对偶句的板式变化体，曲调有正线、西皮、二簧、小调四类，正线是西秦戏的主要声腔，又分二方、平板、梆子三种。西秦戏唱、白沿用中州音韵，男女异声同调，男唱真嗓，女唱假嗓。乐队分“文畔”、“武畔”两种，“文畔”使用头弦、二弦、三弦、月琴、唢呐、号头等乐器，“武畔”主要使用锣鼓等打击乐器。



▲ 西秦戏剧团戏箱



▲ 西秦戏演员化妆



▲ 西秦戏剧团获奖情况



▲ 西秦戏演出获奖

西秦戏中留存了古老剧种西秦腔的艺术因子，是清代地方戏曲声腔传播流变的活证物，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宋俊华、刘红娟供稿）

Academic Research



春色客家春 张杰 作

刊物名称：《学术研究》
主办单位：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主管单位：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主编：叶金宝
地址：广州市黄华路四号之二
邮编：510050 电话：020-83848163
出版日期：2007年3月20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粤工商广字010349
印刷：广州佳达彩印有限公司
期刊基本参数：CN44-1070/0*1958*m 大16*160*zh P* ¥8.00*3200*29*2007-03
ISSN 1000-7326
9 771000732000
03>
定价：8.00元"/>

网址：www.gdskl.com.cn
发行范围：国内外公开发行
订购处：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内总发行：广东省报刊发行局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邮发代号：46-64
国外代号：M258（北京399信箱）
刊号：ISSN1000-7326
CN44-1070